

竺可桢校长 和浙江大学

竺可桢日记史料札记
(1936—1949)

蔡恒胜 编著



求是精神
竺可桢题



浙江大学出版社

竺可桢校长和浙江大学

竺可桢日记史料札记
(1936—1949)

蔡恒胜 编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竺可桢校长和浙江大学：竺可桢日记史料札记
(1936—1949) / 蔡恒胜编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5
ISBN 978-7-308-21276-2

I. ①竺… II. ①蔡… III. ①竺可桢 (1890-1974)
一生平事迹②浙江大学—校史—史料—1936-1949 IV.
①K826.14②G649.28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069189号

竺可桢校长和浙江大学：竺可桢日记史料札记 (1936—1949)

蔡恒胜 编著

责任编辑 牟琳琳
责任校对 吴 庆
装帧设计 尤含悦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良诸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30千
版 印 次 2021年5月第1版 202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1276-2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序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了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不仅毁坏了大批城市建筑，屠杀了大批无辜百姓，也严重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环境。

我父亲 1936 年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为了保护学校的资产、维护师生的生命安全、保持良好的教学环境，我父亲决定举校西迁。在他领导下，全校教师带领学生和家属，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想，踏上漫漫西迁路程，历时两年余，穿越南方 6 省，行程 2600 多公里，坚持办学 7 年，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当时，我尚处童稚时期，就经受了这样的磨炼。时过境迁，到了晚年，这些艰难困苦反而成了甜蜜的回忆。我认为有责任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迁的历史、前辈的精神以及浙大人的情怀，以确保这一珍贵的精神财富能够世代代流传下去。

2018 年，蔡恒胜专程由加拿大归国，参加了浙大西迁后人“重走西迁路”活动，感触很深。他 1943 年诞生于西迁途中的湄潭，是标准的“湄潭人”。他怀着深深的湄潭情结，重新走完这段路程之后，所写的文章是深为感人的。现在，他提取汇编了 1936—1949 年的竺可桢日记，撰写了史料札记，并添加了详细的注释，相信所有的西迁二代、三代乃至更远的后代都会理解，并深感兴趣地将其珍藏在脑中，同时，对浙江大学这段历史有兴趣的所有人也会有所感受和得益。

竺 安

2020 年 9 月 24 日于北京

（竺安：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竺可桢之子。）



日记历来是倍受史家重视的重要史料。竺可桢作为在国内外影响巨大、交游广泛的科学界、教育界巨擘，他的日记堪称一座史料的宝库，被史学界公认为“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教育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的珍贵史料。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绍兴上虞区）人。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1910 年 9 月，作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赴美，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选习农学专业。1914 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气象学。1918 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开大学等校任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第一个地学系。1936 年 4 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 1949 年 4 月，主持浙大校务达 13 年之久。1948 年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 年，竺可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在气象学、地理学、自然资源考察及科学史等诸多领域皆有杰出贡献。更难得的是，他以科学家严谨、细致的日常记录和渊博的学识，为世人留下了涉及范围极广、具有特殊史料价值的日记。竺可桢记日记的习惯始于留学期间，至去世前一天，60 余年未曾间断，这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家中并不多见。2004—2013 年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的《竺可桢全集》，收入了存世的全部日记，从 1936 年 1 月 1 日至 1974 年 2 月 6 日，是目前国内已经出版的时间跨度最大、文字篇幅最长的近代学人日记之一。

在竺可桢的全部日记中，1936—1949 年的日记，对于研究浙江大学

校史弥足珍贵。这13年，是竺可桢主政浙大、实践其教育理念的13年，期间经历了抗日战争，是浙江大学成长与发展进程中最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竺可桢校长以其非凡的能力、坚强的毅力，率领浙江大学全体师生，跨越6省，四度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完成了“文军长征”。他苦心经营，锐意改革，确定“求是”校训和校歌，阐述并实践自己独特的办学思想。在竺校长的主持下，浙江大学由西迁前的3个学院、70名教授和副教授、512名学生的规模，发展为7个学院、教授和副教授201人、学生2171人的规模，由一所地方性大学跻身中国著名大学，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因此，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的发展，是浙大校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蔡恒胜先生编著的这部史料札记以1936—1949年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校政为主要考察范围，表达了作者对这段历史深切的追怀与敬意。当时浙江大学汇集了一大批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到校任教，蔡恒胜的父亲蔡邦华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浙大西迁二代”，蔡恒胜多年来反复阅读、翻检24卷《竺可桢全集》所收入的竺校长的日记。这些日记一般读者较难得见，且内容极为丰富，阅读全貌又须对时代和人物背景有较好的认知，因此，让日记中与浙大关联的内容真实而又相对精要地呈现，使广大读者一目了然，引发探索研究之兴趣，成为编著者希望实现的目标之一。

通览本书，我们不难发现，蔡先生继承了前辈求真的精神，通过系统、细致的研读，发掘、择取与浙大相关的日记史料，并进行严谨的摘录和归并，辅之以浙大报刊、档案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梳理汇编了“竺可桢初掌浙大”“浙大西迁之路”“浙大的遵湄办学”“做浙大校长的最后三年”四部分，下设二十余个专题，并为每一专题撰写综览式的阅读札记。比如，在“竺可桢初掌浙大”部分，通过日记真实地还原了一位具有远大抱负的科学家在自身学术发展、个人家庭和民族大义、社会担当之间的取舍抉择。又如，书中大量引用竺可桢日记中关于迁校择址、踏勘落实、争取资源的翔实细节，反映了竺校长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带领浙大艰苦跋涉、百折不挠的西迁过程。本书的一个亮点是编著者创

新地借鉴了大数据的研究方法，通过检索、词频分析等手段，绘制了浙大人物“词云图”，使读者对与竺可桢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和事一目了然。

本书的出版，为研究竺可桢主持浙大13年这一重要阶段提供了便利，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了解竺可桢的教育活动及其思想理念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本书通过竺可桢日记与办学档案史料互证，增添鲜活、详尽的内容，进一步发掘了竺可桢日记的文献价值，相信这会对我国大学校史、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工作有所助益。

竺可桢校长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已成为浙江大学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本书，缅怀竺可桢的业绩、思想和境界，将给后人带来无穷启迪，也为浙江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途中传递巨大的精神力量。

程家安

2020年11月5日

（程家安：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浙江农业大学副校长、校长，浙江大学副校长。）

前言



2018年11月，我应邀参加了浙大西迁后人“重走西迁路”的活动，从杭州出发，到江西吉安、泰和，再到广西宜山，最后抵达遵义、湄潭。这是我72年后第一次回到魂牵梦萦的出生地——湄潭，收获颇多，感慨不已。回到北京后，我拜访了与我有同样经历的三位大哥贝德、张克飞和竺安。正如竺安兄所说，我们有同样的“湄潭”情结，从童稚时期起就经受了这样的磨炼，到了我们的晚年，这些艰难困苦反而成了甜蜜的回忆，我们要让这珍贵的精神财富世代代流传下去。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不得不宅在家中，但对我而言，正好有时间来实现多年的愿望，心无旁骛地通读卷帙浩繁的《竺可桢全集》。24卷，2000余万字，涵盖38年的日记（16卷，1000余万字）和其他的文献，为研究中国当代教育史、科学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是一座宝贵的金矿。

本书所涉及的竺可桢日记和有关史料，起止时间为1936—1949年，正是他担任浙大校长的13年，故题名为“竺可桢校长和浙江大学”。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13年，浙大正处于举步维艰的特殊历史时期。抗日战争的烽火，逼得浙江大学颠沛流离，辗转西迁。这13年，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带领下，以他倡导的“求是”校训为指南，迅速发展，从一所普通的地方性大学，跃升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称赞竺可桢的文章，屡见国内外报刊，史料确凿，论述中肯，作者多为竺老的同仁、弟子或历史的亲历者。但也有另一种声音——一些并不认识也没有接触过竺老的人，没有认真阅读过竺可桢日记或其他文献资料，东拼西凑，写出的文章不实事求是。

我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戳穿假象，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是责无

旁贷，义不容辞的，因为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家父蔡邦华与竺可桢先生交往，缘于浙大，历经 30 余年的风风雨雨，建立了深厚友谊。1933 年 6 月，家父因对时任校长的不满离开了浙江大学。1938 年 2 月，为避兵燹，我们一家西迁至江西吉安，浙江大学也恰好搬迁到此。身为校长的竺可桢坚意邀请家父重回浙大任教。竺蔡两家从此甘苦与共，随浙江大学迁泰和，搬宜山，往遵义，到湄潭，回杭州。1939 年浙大陷于建校以来最困顿的处境，竺可桢任命家父出任农学院院长，成为浙大校务委员会成员。竺可桢在浙大做了 13 年校长，而家父也在浙大担任了 13 年的院长，其中有 10 年他们是在一起工作的。1953 年，家父调到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时任副院长的竺可桢恰好分管生物地学部。他们二人都属虎，竺先生长家父一句。虽属上级与下级，但他们休戚与共，亲如手足。竺先生为人正直公正，在“文革”时期，自己身处险境，却挺身保护家父。30 余年来，竺可桢一直是父亲的良师益友。我因父母的关系，从小接触竺老，年幼时蒙然无知，没留下太多印象，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对竺老有些感性认识，把他作为父辈对待，称他竺伯伯。1974 年元旦，我随家父拜访竺老，当时我 31 岁，刚调回北京搞石油科技长远规划，看到竺老把新发表的文章《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交给家父，写下“请邦华先生指正”。这个题目一下就给了我极大的震动。随后我问了家父有关竺老的很多事情，从家父嘴里，得知竺老有长期记日记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不论公务多忙，时间多紧，从不间断。同时，他必记录当日的相关物候情况，诸如气温高低、阴晴冷暖、风霜雨雪、气象变化。如此重如千钧的课题，厚积薄发，水到渠成，与竺老毕生不变的记日记习惯不无关系呀！

所以《竺可桢全集》一出版，虽然我人在国外，仍及时托人购买了《竺可桢全集》西迁部分的 5 卷日记，作为随时翻阅之用。在日记中，竺可桢记录了诸多浙大西迁往事。他与浙大教授同仁的相处，平时工作中的交往自不必说，连我家在宜山、遵义、湄潭的门牌号码，他都细心地记下，有些我都不知道。这越发促使我通读《竺可桢全集》。

抗疫宅家期间，我认真阅读了竺老的日记和讲演稿，归纳之，条理

之。由于纸质书不便搜索与分类，摘录亦有所不便，遂在网上购买了《竺可桢全集》24卷的电子版，提取合并成为竺可桢日记（1936—1949年）。我借助TF—IDF（词频—逆文本频率）技术，挑选和提取日记文本中反复出现的重点内容。这种全新的阅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我的阅读速度和深度。我把写好的札记分别发给浙大同仁和西迁后人审阅，讨论后再进行修正，不断完善，已改了十余稿。

今年是竺可桢诞辰130周年，也是浙大西迁遵湄80周年，希望《竺可桢校长和浙江大学：竺可桢日记史料札记（1936—1949）》对竺可桢先生和浙大校史的研究工作能有所助益！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蔡恒胜' (Cai Hengsheng) in a cursive style.

2020年10月



迄今国内最大规模自然
科学家全集出版工程
《竺可桢全集》



部分竺可桢日记手稿



浙江大学 120 周年校庆时，竺安代表竺可桢家属向浙大捐赠 56 本《竺可桢日记》手稿

第一部分 竺可桢初掌浙大

(1936年1月—1937年11月)

| | |
|---------------|----|
| 一、接掌浙大校长的经过 | 3 |
| 二、阐明办学方针 | 9 |
| 三、初掌浙大时期的读书笔记 | 23 |

第二部分 浙大西迁之路

(1937年11月—1940年2月)

| | |
|---------------|----|
| 一、离杭西迁 | 32 |
| 二、西迁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 | 47 |
| 三、西迁期间的读书笔记 | 61 |
| 四、西迁期间的重要校务会议 | 72 |
| 五、西迁黔北的先行准备 | 78 |

第三部分 浙大的遵湄办学

(1940年2月—1946年6月)

| | |
|------------------|-----|
| 一、遵湄办学的过程 | 89 |
| 二、遵湄时期的案件 | 107 |
| 三、遵湄时期的读书笔记 | 126 |
| 四、李约瑟两访浙大 | 132 |
| 五、遵湄时期的校务会议 | 142 |
| 六、遵湄时期的重要讲话和办学思想 | 154 |
| 七、浙大复员离黔 | 220 |

第四部分 做浙大校长的最后三年

(1946年6月—1949年4月29日)

| | |
|---------------------|-----|
| 一、主持校舍修复，安排浙大复员 | 232 |
| 二、欧美之行 | 234 |
| 三、复员回杭后的浙大校务会议 | 281 |
| 四、浙大“一·四”事件 | 284 |
| 五、复员回杭后发表的重要讲话和研究论文 | 306 |
| 六、离开浙大前的主要活动 | 317 |
| 七、离校当年提及的浙大相关事宜 | 328 |
| 参考文献 | 336 |
| 后记 | 337 |

第一部分 竺可桢初掌浙大

(1936 年 1 月—1937 年 11 月)



竺可桢（摄于 1936 年）

1936 年 4 月下旬，竺可桢正式履职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一、接掌浙大校长的经过

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迫于教师与学生的不满情绪而辞职之际，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继任者三人：吴雷川、周炳琳和竺可桢。吴、周曾担任大学校长或省教育厅厅长等职，竺是纯然一学者，可是各方面几乎一致看好竺可桢。首先是浙大教务长郑晓沧、陈布雷胞弟陈训慈等省内贤良之士，继而是蒋介石“近臣”翁文灏、陈布雷等人进言推荐，江浙知识圈

的呼声也颇高。蒋介石召见竺可桢时，竺明言须遵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意见。蔡先生对此事的态度是，只要兼顾气象所工作，便无障碍。竺可桢既要坚守气象专业，同时也愿意尝试新挑战。他向陈布雷郑重提出两项任职条件：其一，“财政须源源接济”；其二，“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陈布雷当即表态：浙大经费每月四万五千，由国库拨付，可保障；而“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内”。此次谈话只过了二十余日，竺可桢访见教育部长王世杰，“余要求国库接济浙大之款必须增至每月六万元，并声明自始即以此为条件……雪艇即允每月由国库解六万元之数”。4月7日行政院政治会议通过了竺可桢任浙大校长事。4月下旬正式履职，5月18日补行校长宣誓仪式。

竺可桢何时得知要更换浙江大学校长？他的最初反应如何？何时下决心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何时到杭州？何时开始行使浙江大学校长职权？何时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会议的内容有哪些？何时补行宣誓仪式？在宣誓时讲了哪些话？参见竺可桢日记：

（1936年）1月28日 星期二 据咏霓¹云，浙江大学教员与学生均不满于校长郭任远²，郭辞职，教部已有允意，但蒋因学生排斥校长势不可长，故决维持郭，在郭辞职时曾有人主派余前往长浙校之议云。

2月11日 星期二 八点咏霓来谈一小时，据谓陈布雷³等拟提出以余为浙江大学校长。余谓在此时局，难保于三四月内不发生战事，京杭兼顾势所不能，故余不愿就，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尽全力以赴之也。

2月16日 星期日 八点王学素⁴来，述布雷先生谓蒋先生嘱余

1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早期最著名的地质学家之一，在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方面有杰出贡献。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2 郭任远（1898—1970），心理学家。1933—1936年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3 陈布雷（1890—1948），评论家。受蒋介石赏识，弃文从政，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4 王学素，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

于星期五往晤云云。

2月17日 星期一 八点晤蔡先生¹，告以咏霓曾来征余同意就浙江大学校长事，并询是否应去看蒋。蔡先生以为能不往浙最好，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

2月21日 星期五 晤蒋院长介石。偕布雷同见蒋。渠最初问余是否初来自北平，余告以去年曾至北平，但渠意中终以为余方由北平回也。次即约余赴杭州长浙大事，余告以须与蔡先生谈后方能决定。渠意即欲余允任，余告以尚须考虑，谈约七八分钟而出。

2月23日 星期日 三点至定西路延陵村刚复²处，并至愚园路884号蔡先生寓。余数日各方探访结果，知浙大自程天放³长校以后，党部中人即挤入浙校。程离浙时陈立夫拟提余井塘⁴，但为学生所不愿，乃推郭任远。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学生方衔恨郭甚，有欲推黄华表⁵为校长者，故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余固思推人以自代，联想及于季梁⁶，渠本夏即可返国。此事刚复及蔡先生均赞同，余并请蔡先生提人，蔡先生谈及汤尔和⁷。

2月24日 星期一 晤蔡先生。昨谈后，蔡先生为浙大事又想及陈剑修⁸，故正作两函，一致青年会，一致南京。时余适来，即以面交。

1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曾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

2 胡刚复（1892—1966），江苏无锡人。物理学家。首批庚款留美学生，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任交通大学教授。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后，力邀他同入浙大，就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

3 程天放（1899—1967），江西新建人。曾任浙大校长。

4 余井塘（1896—1985），江苏兴化人。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苏省政府民政厅厅长。1939年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

5 黄华表，时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6 王璉（1888—1966），字季梁。化学史与分析化学家。时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硕士。

7 汤尔和（1878—1940），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

8 陈剑修（1897—1953），心理学家。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教务长。

2月25日 星期二〔南京〕午后四点半约侠¹至二姊²处晤翼如³，与商浙江大学事。二姊劝余往，以为借此可以转易学风，施展怀抱。余谓余之志愿并不在此，不过能将学校安定过去，半年以后就回复我的现在生活。翼如并不坚劝余往，并谓党部方面现值二陈不甚受蒋信用之际，当不致明与为难，但暗中挑拨等事则在所不免也云云。余个人之困难在于：一，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二，时局如斯，万一半年内战事发生，余不能离杭，则不免悬心吊胆；三，余目的并不在于要能长做校长，故半年之内亦难看见成绩也。（邵元冲曾表示：“当劝其宜暂往一试”——邵元冲日记）

3月1日 星期日 为浙大校长事访咏霓、布雷。余对于浙大校长虽非素愿，但咏霓、布雷等既相推重，余亦愿牺牲于一时，但不愿放弃气象研究所事。若四五年以后则后起者已可顶替，余可放手，但目前尚非其时。至于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十倍于研究所所长，且欲见能效非三五年所能为事，因校长之最要在能请得良好之教员，而良好之教员老者已为各方所罗致，一时不能脱身，而欲养成新者则非短时间所能为力也。布雷述蒋先生意谓欲余速决，余以久兼决非办法，故以半年为期。布雷则以时期太短，且谓郭任远恐不能维持至暑假，并允以余意转达于蒋云云。

3月6日 星期五 接陈叔谅⁴自杭州来长函，知其兄布雷已将余只允就浙大校长半年事告知渠，怂恿余接受浙大校长事不加以期限，且谓外间谍此事者人多，不宜久搁。且谓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并谓晓沧⁵欲赞成余往云云。

3月8日 星期日 昨晚至布雷处，先晤王学素。渠以为去浙大时期最好不提，不然如存五日京兆之心，且谓两面兼事可以藉此与

1 张侠魂（1890—1938），竺可桢夫人。

2 张默君（1883—1965），立法委员，妇女活动家。张侠魂二姐。

3 邵元冲（1890—1936），字翼如。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默君夫婿。

4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陈布雷之弟。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史学系。

5 郑宗海（1892—1979），字晓沧，浙江海宁人。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时任浙大教务长。

蒋接近，而因以得扩充气象事业。但余以此事不能〔从〕利害方面着想，因研究所欲与航空方面联络，乃是应有之事，但同时不愿受政治之干涉。

寻与布雷谈，渠以为时间问题暂可不必提出。余则以为非提出不可，因日后欲脱离时反难以藉口也。惟时间可不必限定半年，以最短时期能觅替人为止。余提三要求，三点即：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据布雷云，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内，经费则国库之四万五千按月可靠云。

3月9日 星期一 接杭州郑晓沧寄来《浙江大学概况》，中述浙大成立经过情形，于郭任远任内各项工作叙述甚详。大致郭任内重要政绩在于增加军训，使学生生活军队化；于杭城太平门外购地千亩为新址基础；改变内部组织，如农学院之分系不以畜牧、农艺等名称，而用农业动物、农业植物等等。此三者自以第一着为最重要，但因此连带及于大学之目标。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如以和平相号召，则根本郭之做法即违反本意。余以为大学军队化之办法在现时世界形势之下确合乎潮流，但其失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惟以实用为依归，不特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与英美各国大学精神在于重个人自由，亦完全不同。目前办学之难即在此点。郭之办学完全为物质主义，与余内心颇相冲突也。此外浙大尚有数点应改良：课程上外国语文系有七个副教授，而国文竟无一个教授，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其次办事员太多，薪水当在每月万元左右；一年级学生即分别系科亦嫌太早也。

3月16日 星期一 午后二点半王雪艇¹来谈浙大事，渠意以为余去浙大，最好不要限定时期，因一则限定时间教员难聘，二则时间短未易见功。渠以为总须有一二年之时间。余则谓如欲将学校办好，亦非一二年之事，故余去只能任过渡时期，而过渡时期则半年

1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著名政治家、教育家、武汉大学首任校长。1933年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已足矣。关于发表时间，余须赴沪与蔡先生面陈后始可发表。至于到校时期则余主张在四月底，因四月十六有中研评议会，四月廿六又有气象学会也。雪艇意以为能提早在四月初到校，因恐杭校再发生变故也。

3月25日 星期三 十一点至教部晤王雪艇，商谈浙大经费问题。余以省府经费不可靠，而中央之每月五万二千元，其中教职员薪已占去百分之七十七，即四万元，故主张国库增至六万元。雪艇意以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浙省经费亦不应放弃，因库增至六万元故作另一事办理。

4月7日 星期二 今日行政院政治会议通过余长浙大事，即有通讯社人员来询行期，余不愿发表任何意见。

4月21日 星期二〔南京—上海—杭州〕偕志超¹、刚复、鲁珍²至杭州。七点至杭州城站，即有孙季恒³、诸葛振公⁴来接。即偕刚复等访晓沧于龙游路寓所，谈校内经济状况及学生情形约三小时。

4月22日 星期三 九点郑晓沧来，即偕刚复、志超、晓沧往里西湖廿二号王庄晤郭任远，谈约二小时。

4月25日 星期六 三点至文理学院新教室三楼开茶话会，到教职员八十余人。四点一刻余演讲约四十分钟，述办教育之方针。

5月9日 星期六 下午四点开第一次校务会议，到廿三人，余主席，振公记录。首由余报告，次倪志超报告经济状况。

5月18日 星期一 十点半即开始行礼，到学生四百余人，教职五六十人，来宾卅人。国府本派黄季宽，因留京，故托教部代表蒋梦麟⁵为两机关之监誓员。行宣誓典礼，所宣之誓为：“余敬宣誓。

1 倪志超（1898—1988），时任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竺可桢邀他来任总务长，协办接收。（倪不久辞去，由沈鲁珍升任代理。）

2 沈思珩（1900—？），号鲁珍，安徽合肥人。时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秘书。

3 孙恒（1892—1973），字季恒。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时任浙大总务处会计课主任。

4 诸葛麒（1901—？），字振公，浙江东阳人。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曾任南高史地研究会总干事。时任浙大校务秘书。

5 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著名教育家、作家。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之处罚。此誓。年、月、日、人名。”

二、阐明办学方针

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后发表数次重要讲话，阐明办学方针：包括《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1936年4月25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1936年9月18日）、《大学生之责任》（1937年10月25日）等。他提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明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藉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他还指出：“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他在就任浙大校长后对学生的第一次讲话中就提出著名的两个问题：“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对这两个问题做了明确答复。

1. 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¹

（1936年4月25日）

（一）

诸位同学：这次中央任命本人来担任本校校长，我个人以前对大学教育虽也有相当渊源，但近年潜心研究事业，深恐对于这样重大的责任，不胜负荷，因当轴责以大义，才毅然来担任了。今天与诸同学第一次见面，就来略谈本人办学的主要方针，和我对于本校与诸同学的希望。

明了往史与现势二条件 大概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刊于《国风月刊》8卷5期（1936年5月）145—155页，原文标题下记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对浙江大学学生训话纪录”。此前曾以《竺校长训词》为题载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48期（1936年5月9日）。此后载于《浙大学生》复刊第2期（1941年9月）。

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明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藉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可是我们讲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固然绝不能忘了本国民族的立场，也不能不措意于本地方的旧事和那地方文化的特色。本校诚然是国立的大学，可是办在浙江，所培植的学生又多数是浙江人，诸位将来又大致多在浙江服务，所以我们也应得注意本省学术文化的背景。

（二）

浙江的开化与学术的发达 我们回溯浙江的往史，就容易联想到浙江省是越王勾践的故地，他那兴国的事业，雪耻自强的教训，深深地印入浙人的脑际。自东晋民族南迁，五代时吴越钱氏保浙，于是浙水东西开发日广，浙江文化与江南相并进。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浙江尤成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学风盛极一时。这期间既然发生许多极有贡献的学者，而如南宋浙人的匡业与捍卫，明代于谦的定边与浙海的抗倭，以及明季的匡复运动，常以一省的人文关系民族的安危存亡，尤足见本省的特殊精神。这些远的姑不具论，只就近三百年的浙江学术史中，我们就可举出两位杰出的人物。

黄梨洲和朱舜水 他们承晚明风习败坏之余，而能矫然不阿，以其宏伟的学问，光明的人格，不但影响浙江，且推及于全国，甚至播教于海外，并且影响不限一时，而且及于身后几百年，这就是我们共知的黄梨洲先生（宗羲）和朱舜水先生（之瑜）。黄梨洲因为图谋抗满复明，被清廷指名缉捕至十一次之多。匡复之谋不成，乃奋志著书讲学。他那部《明夷待访录》，包含了浓厚的革命思想。《原君》之作，早于卢梭的《民约论》一百年，实为近代民权思想的先觉。他所至讲学，著述极富，弟子光大其教，影响吾浙学风甚深。朱舜水与梨洲是余姚的同乡，并且同是复明运动的健将，曾到安南、日本运动起义，事既不成，就隐遁日本，立誓不复明就不回国，因此终其身于异国。那时日本人已传入我们浙江大儒王阳明先生的学说，他的伟大人格也就引起他们的重视，日本宰相

德川光国尊之为师，讲学论艺，启导极多。所以梁任公先生说，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至少有一半是他造成的。

致力学问与以身许国 梨洲、舜水二位先生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一方为学问而努力，一方为民族而奋斗。因为他们并不仅为忠于一姓，推其抗满的热忱，就是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及详说浙江其他伟大的学者，单说这二位先贤，已足为今日民族屈辱中我们所以报国的模范。我们生在文化灿烂的中国，又是生在学术发达先型足式的浙江，应如何承先启后，以精研学术，而且不忘致用实行为国效劳的精神！

中国目前环境的艰危 其次讲到中国“目前的环境”，我们有智识有血气的青年早已感到今日国家情势的危迫。近百年来列强侵略进行不息，中国不能发奋自强，以致近几年国家已到了最严重的危机。内乱的频仍，外患的迫切，一般人民风习之不振，较之明清间更有过之。现在国内诚已统一，兵患逐渐肃清，可是野心国不愿见我们的统一进步。他们可说是抱着“两重标准”的观念来任意行动。所谓“两重标准”，从前是指中国社会里的男女道德问题，因为本着男女不平等的传统观念，所以法律容许男子纳妾，而风教强迫女子于夫死守节，这可说是两重标准。现在国际关系也是如此，弱国要受公法的限制，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强国就可不必，矿产、铁路可以任意租借或敷筑，关税可以强人协定，以及进一步的任意私运，飞机、炮舰可以任意横行，甚至人家的土地也可任意借口而攘夺！这种国际形势的存在，就是隐存着二重的标准，显然是只有强权没有公理。所以国际联盟对中日问题终于束手旁观，最近对于意大利横行侵〈菲〉〔阿〕¹也只空言制裁，我们至今完全可以明白，国际间还绝对谈不到公道与和平。中国民族虽说是重尚和平，可是我们尽可祝望将来世界的和平，而在今日则应确信国际间只有武装才能讲和平，并且为了取得和平的保障不能不增厚国力。中国以往因为不明白这种国际关系，所以受了奇耻大辱，今后惩前毖后，必须急起直追。我们应知一国的强弱盛衰，并非偶然而致，而有积久的自取的理由。人和别的生物一样，一定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否则就趋于衰败或归淘汰。现在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作者所藏《浙大学生》载文上有作者订正手迹，改为“侵略阿比西尼亚”。

这世界是机械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中国人对于科学研究，虽有深远的渊源，可是不久中衰，清季兴学以来也继起不力。今后精研科学，充实国力，大学生固然应负极重大的责任，而尤其重要的是养成一种组织和系统的精神。我们知道现今的世界一切事物最重组织，可是中国社会的旧习惯与此很难契合。中国人民积习最喜个人放任无拘的自由，家庭街市随意吐痰小便，就是一个最简明的实证。这种自由对于个人生活自然便利，但对社会国家的影响便十分不利。试问我们以散沙一般的许多个人来和有组织有〈规〉〔纪〕律的现代国家来对敌，真似螳螂当车，必无胜理。近代中国外交、军事的着着失败，总因在此。

民族自由重于个人自由 今后我们的问题，就是：“个人的自由要紧呢？还是全民族自由要紧？”我们大家对此应加以深切考虑。如果明白了“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我们就必然以实心实力共来完成民族的自由。现在中央决定在学校里实施军事训练，就是要先使全国学生实现纪律化组织化，以期进而推播于全民众，也就是要谋我们全民族适应现世界的环境，以恢复民族的自由，保障民族的生存。本校经历届校长教授的努力，学风素称纯正而有规律，而前校长郭任远先生对于推行军训的毅力，就因深切认识其客观的重要，要使学生都能纪律化组织化，我觉得很钦佩与同情的。可是本校学生未能完全接受，实是可惜，尤其是近数月以来，听说学校里的纪律竟渐渐的松懈，如生活的严肃，衣冠的整齐，渐不及前，这决不是小节，而是一件极不幸的现象。

军训与组织化的重要 今后校内军事管理的组织，自应从详规划，以更谋其健全与安定，而组织化纪律化的精神，必须求其贯彻的。要而言之，中华民族今后复兴的途径，须全国一致，遵守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在中央领导之下，共同努力，而大学生在这个大业上所负的责任甚大。浙江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都极重要，浙江大学的学生就“目前的环境”一层上着想，尤应刻苦砥砺，才无负本省过去光荣的地位，与今后神圣的使命。

(三)

以上就过去历史和目前环境二方面来讨论中国和浙江省的地位，来证明本校所负的历史的和时代的使命，而同时也已将我对于本校训育方面的宗旨和趋向说明了。现在再从学校教科等各方面来略说我个人的意见，并且就此提及我们今后想走的途径。

教授人选的充实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一)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我们中国之有现代式的大学，虽还只是近四十年间事，但历史上的国子监实际上近乎国立大学，而许多大书院也具有一时私立大学的规模。南宋国子监就在杭州城西纪家桥，而万松岭的万松书院，到清代改敷文书院，源深流长，并可见浙省大学渊源之早。书院教育，最有“尊师重道”的精神，往往因一二位大师而造成那书院的光彩，例如讲到白鹿洞书院就令人联想到朱晦庵，鹅湖书院就因陆象山讲学而出名。近代的大学也正是如此，例如英国剑桥大学 Cavendish 实验室¹之所以出名，就因有 J.J.Thomson²，Sir.Rutherford³ 几位教授。三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学生去研究哲学，就因为 J.Royce⁴，Satayana⁵，William James⁶ 诸教授的主讲。俄国出了一位 Pavlov⁷ 教授，使俄国的生理学闻名于世。所以，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并且也是国家的光荣；而作育人才以为国用，流泽更是被于无穷。现在中国的大学太缺乏标准，但几个著名的大学也多赖若干良教授而造就甚宏。不过要

1 卡文迪许实验室，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实验室，以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亨利·卡文迪许的名字命名。

2 约瑟夫·约翰·汤姆森（1856—1940），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3 卢瑟福男爵，即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新西兰、英国物理学家，原子核物理学之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4 罗伊斯（1855—1916），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曾任教哈佛大学。

5 乔治·桑塔亚那（1863—1952），美国批判实在论的倡导者。曾任教哈佛大学。

6 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心理学之父，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教哈佛大学。

7 巴甫洛夫（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荟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而必须相当的岁月，尤须学校有安定的环境。因为教授在校有相当的年份，方能渐渐实现其研究计划，发挥其教育效能；而且对学校感情日增，甚至到终生不愿离开的程度，这才对学术教育能有较大的贡献。反之，若学校不幸而有学潮，不但使学者大师裹足不前，就是原来好教授也容易离去，学校就大伤元气。所以无论学潮的原因如何复杂，为学校前途计不得不想法去消灭他。今后本校惩前毖后，必先谋学校安定，然后方可网罗人才。本人决将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尤希望学生对于教师，必须有敬意与信仰，接受教师的指导，方能发挥教师诲人不倦的精神。

图书仪器设备的重要（二）其次讲到设备。人才诚然重要，可是图书仪器等设备也是学校所不能忽视的，尤其是从事高深研究的大学。一个大学必有众多超卓的学者，才能感得图书设备的重要，而且会扩充合用的图书；也唯有丰富的图书，方能吸引专家学者，而且助成他们的研究与教导事业。简言之，人才与设备二者之间必然辅车相依，相得益彰的。俗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教授学生欲利其研究，必须充实其图书仪器各项的设备。现在中国许多大学有一共通的弊病，即在经常费中，教职员薪给之比例太高，而图书设备费的比率太低。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有优良教授也无所施其技，且设科太繁，或职员人数太多，结果连一个院或系都不能健全发展。我们听到一部分大学近年颇致力扩充其图书馆，固为可喜的现象，然而图书设备究是一般的贫薄。据我所闻知，除清华大学藏书二十八万余册，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各约二十七万册，北京大学二十三万册，已算最多，次则中央大学、金陵、岭南、南开也都在十五万册以上。此外则图书在五万册以上的大学，已是寥寥，甚至还有图书不及万册的也居然称学院或专校了。我们若就欧美举一二个例，柏林大学图书馆藏书达二百万册，且得普鲁士邦立图书馆（藏书二百五十万册）的协助。哈佛大学图书馆现有图书三百七十万册，去年一年增加新书五万余册。当意军初侵阿比西尼亚的时候，美人对阿的情形大都茫然，哈佛图书馆乃检取关于阿比西尼亚的书，就有

五百册之多，以供给师生与外界的参考。这样的图书馆，才不愧为一国的学府。可惜中国大学多不知重视图书之充实，而犹翊然自负为“最高校府”。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家加莱尔（Thomas Carlyle）说“一个好的图书馆就是大学”，公共图书馆尚且如此，大学图书馆自更有高尚的学术价值了。所以我以为大学经常费，关于行政费应竭力节省，教职员薪金所占不能超过百分之七十，而图书仪器设备费应占百分之二十或至少百分之十五。本校因扩充成立为时尚近，听说图书仅六万册之谱，虽说省立图书馆近在咫尺，可助应用，但那边究以旧书为多，所以专门的中西文新书以及基本名著，本校实大有充实之必要。本人已在考虑扩充图书馆的地位，下年度起并将谋增加购书经费。就是各系仪器，也当陆续添补，以发挥增高研究试验的效率。至于如何酌减学生上课的时间，促进利用图书馆和自由研究的习惯，或增进教师对学生课外的指导，凡此种种，还得和各教授共同研究，力谋以图书馆实验室来辅助大学教育的成功。

校舍的最低标准（三）复次，是校舍问题。我们对于现今社会之过重屋宇的建筑，固然有些怀疑，如大学校舍已有相当基础，而竟不知充实设备，只求大规模的兴筑新宇，我曾谓为是缺乏办学的常识。可是一个大学的环境原也重要，相当完整的校舍也是决不容忽视的。我今天视察了本校文理学院、工学院房子之后，才觉得浙大校舍需要改建和添建的迫切。大概要建筑校舍，第一须有具体的计划，计划既定，步步进行。这样，建筑的形式才能调和，而不致互相林凿。第二，房屋要求其坚固合用，最好更能相对的顾及美观，但不必求其讲究奢华。目前全国各国立大学中，浙大的校舍恐怕要算最简陋，除一小部分外，大都是陈旧不整齐而且不敷应用。郭校长在任的时期，在华家池新建了农学院新舍，文理学院里的新教室，和其他几所小房子，终算立了相当的基础，但为适应目前的需要，修建的要求还很迫切。现在中央财政的艰绌，在此非常时期中教育经费开源诚极不易，然而一个大学，如欲使其存在发展，最低限度的校舍建筑是不可少的。我来杭之前对当局接洽，虽还没有具体的结果，但我此刻却已感到校舍修理和增筑的必要，此后自当设法进行临时费，从事规划，以逐渐实现最低限度的本校校舍，改善诸君读书的环境。

（四）

贫寒子弟的求学机会 此外，为了奖励贫寒好学的子弟，我已订定了在本校设置公费生的办法。对此一事，我以为有极充分的理由。在从前科举取士及书院通行的时代，中国的教育还可说是机会均等的，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常听到由寒士登科而成名立业的，在清代书院养士制度下也造就了不少的贫寒子弟。自从学校制兴，有学费的明白规定，情形就渐渐不同了。近来国民经济的低落，与学校收费及生活费的提高，恰恰成了反比例，因此这问题就更见严重。中学读书已非每年五十元或一百元不办，等到一进大学，每年连个人日用有需四五百元以上者，至少也得要二三百元之则。我记得江苏当局曾有省民经济的调查，得知百分之六十六的人民每年收入不到九十元，这就可见百分之三十的人家不易进中学，没有机会进大学的恐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江苏平均富力大概高于浙江（尤其是江苏南部），那么浙江贫寒而优秀的子弟被剥夺了入中学大学受教育的机会，其数必更可惊。在这样情形之下，大学变成有资产的子女所享受，聪颖好学但是资力不足的人家完全没有同样机会。这样的教育制度不但是对人民不公允，并且因为埋没了许多优良青年，对于社会与国家更是莫可挽回的损失。我以为天才尽多生在贫人家，而贫困的环境又往往能孕育刻苦力学的精神，所以如何选拔贫寒的优秀学生使能续学，实在是一国教育政策中之一种要图。浙大虽已有免费生的办法，但所免的只是局部的学费，每年所省只自廿五元至五十元之则，贫家还是不得实惠，根本上仍惟有裹足不前。上月间教育部在院会提出通过奖学金的办法，前几天在报上看到清华已有公费生办法的公布。

本校决定设置公费生 根据当局宏奖人才的意旨，体察本省实际情形的需要，我已决定自来学期起，即规划公费生的设置，尚须详定办法。大概公费生入学〔考〕试要比较严格，并须经审查家境情形合格。录取以后，只要学业达到预定的优良标准，就继续由学校供给他四年中的费用。为谋由根本选拔起见，并当与本省教育厅联络，促早实行中学酌设公费生的办法，俾贫苦的人才也有入大学的机会，不致埋没无所表见。同时现行的补助费、奖学金仍当酌定存在，庶几广育英才，更可推广大学教

育的成效。

(五)

关于诸同学的学业指导和人格训练的各方面，个人虽还有许多意见，可是匆促之间，不能充分讲明，并且必须多方观察现状的得失，方可逐步从事改善的设施，现在可暂不说。

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 不过有一点在此刻不能不一提的，就是希望诸君能运用自己的思想。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智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大学生不应仍如中学生时代之头脑比较简单，或者常赖被动的指示，而必须注意其精神的修养，俾能对于一切事物有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虑，自动的取舍之能力。我们固不肯为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尤不应被一时情感所冲动，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或者受少数人的利用。今后赖许多教授的指导和人格感化，希望诸位更能善于运用自己的思想，不肯作轻率浮动的行为。中国今日的国难，其严重性与复杂远过于五四或革命北伐的时期，解救之道，非短时间可以为力，也非一部分人所应独负，最重要的却是统一全国的团结，齐一全国的步趋，共同树起对民族的自信力，对政府领袖的信仰，重视本身的责任，从事基本准备的努力。当然我们要严密注意时事，并且发扬抵抗强暴捍卫国家的热忱，但我决不愿学生作浮夸无效的行动，而应作沉着应变的准备。

以沉着的准备代盲从 半年来的学生运动，固然热情可佩（少数另有作用者是另一问题），但其方式之无当，实为可怜。诸君既受高深智识，决不应再有贸然的盲从，而宜深切考虑一切的行动，惟有能思想才不至于盲从，亦惟有能思想才能作有效的行动，应付我们艰危的环境。十年廿年以后的诸君，都可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中国今后正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

总之，我希望诸位同学要深切体念在今日中国受高等教育者的稀少，

因此益自觉其所负使命的重大，努力于学业、道德、体格各方面的修养，而尤须有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一个学校的健全发展，自然有赖教授校长之领导有方，同时尤需要全体学生有深切的自觉与实际的努力。全校合作以谋本校的进展本人愿以最大的诚意与专注的精神，来力谋浙江大学的进展，而要达到相当的成功，必然期待诸位的合作和努力。

关于大学教育之目的，竺可桢 1935 年 9 月在南京高师 20 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也有涉及，此演讲后发表在 1936 年的《国风月刊》，题目为《常识之重要》（见《竺可桢全集》第 2 卷）。下面摘取其中重要一段：

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者之富于常识也。

遵湄时期，他又多次重申此观点。1942 年《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刊载了竺校长《大学之使命》一文，该文关于大学使命的主要观点与大学教育之目的相似，但文字并不完全一致。

（1936 年）9 月 17 日 星期四 上午至图书馆查哈佛大学之历史，知 1636 年哈佛大学成立，时殖民地政府只补助四百镑之经费，到 1638 年 John Harvard 去世，以遗款七百八十余镑、书二百六十本捐赠大学，遂名为哈佛大学。最初完全为教会学校，至十八世纪末，教会之势力始衰。在美国，哈佛称最老之学校，而在欧洲则意大利之 Palermo 巴勒莫大学成立于九世纪，以医科著名。英国最早之牛津成立于 1163 年，法国之巴黎大学稍早，均在南宋孝宗时成立。而当时杭州亦有国立大学即“太学”，以纪家桥岳飞宅改建。光宗、宁宗时有学生一千七八百人云。……午后开始写《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六点半偕张苾谋¹赴镜湖厅，到同学孙季恒、贺懋庆、程世

1 张绍忠（1896—1947），字苾谋，浙江嘉兴人。时任物理系主任。

抚、梁庆椿¹、沈秉鲁、毛燕誉、桂未辛、沈有乾、徐恩培、毛启爽²等，来宾周企虞、罗霞天、茅唐臣³、蔡竞平、许绍棣、周三农诸人。膳将半余起立致辞，次梁庆椿唱 Fair Harvard《公正的哈佛》歌，来宾致辞，最后赵真觉答辞。

9月18日 星期五 今日将昨日演稿拟就交与《日刊》去印。

晚七点半至新教室楼上与一年级生谈话，由陈柏青主席。首余演说，嘱学生注意两点：（一）我们到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学一技一能果要紧，而最要实是养成一个清醒的头脑。（二）我们出了大学以后将何如？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以享福为无上光荣，但照现在看来，享福是一种可耻的事，我们出校以后应该为社会服务。

2. 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⁴

（1936年9月18日）

诸位同学，学校开课已一周，今天训育处召集这个会，能如家人似的在一起谈话，觉得非常愉快。

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直接的经济负担，没有谋生的问题。诸位在中学时，同学大都是同县或同省，可是，来大学后，有从全国各方面来的同学，可以知道全国的情形。时间长了，各人都认识，这样，各人家庭的状况，故乡的风物，都能互相知道，这亦是一种教育。大学比之中学，在经费和设备方面，都来的充实，教师的经验和学识，也远胜于中学，这供给诸位切磋学问的极好机会。同时，国家花在诸位身上的钱，每年有一千五百元，而且，全中国大学生仅四万人，诸位都是这四万分之一的青年，这种机会，万万不能错过。

诸位到这里来，应该明了这里的校风。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英文称为 College Spirit。至于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浙

1 梁庆椿（1901—？），广东中山人。哈佛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时任浙大农业社会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2 毛启爽（1907—1966），江苏宝应人。时任电机系副教授。

3 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桥梁专家。时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

4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20号（1936年9月23日）“讲演”栏。原标题为“新生谈话会校长训辞”，现篇名为编者所加。讲话时间见于作者当日日记。

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不愿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我想诸位中间，一定没有人说为文凭而到浙大来的，或者有的同学，以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作谋生的工具。但是，谋生之道很多，不一定到大学来，就是讲技术，亦不一定在大学。美国大文豪罗尔氏说：“大学的目的是，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的面包味道更好。”教育不仅使学生求得谋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中国古时有一个人求神仙心切，遍走名山大川。吕纯阳发慈悲，知道他诚心，想送给他一点金钱宝贝，向他说道，我的指头能指石为金，或任何物件，你要什么我便给你什么。可是那个人并不要金钱宝贝，而要他那只指头。这故事西洋也有的，英文所谓Wishing ring，便是这个意思，要想什么就可得什么。世界上万事万物统有他存在的理由，朱子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即事而穷其理。要能即事而穷其理，最要紧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

清醒的头脑，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二三十年以后诸位出去，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无论工农商学，都须有清醒的头脑。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救。凡是办一桩事或是研究一个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复杂的变成简单；

第二，以公正的态度来计划；

第三，以果断的决心来执行。

这三点，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统应该在求学时代养成和学习的。中国历年来工商业的不振，科学的不进步，都是由于

主持者没有清醒的头脑。瘟疫流行，水旱灾荒，连年叠见，仍旧还要靠拜忏求神扶乩种种迷信方法。兴办事业，毫无计划，都是吃了头脑不清楚的亏。风水扶乩算命求神等之为迷信，不但为近世科学家所诟病，即我国古代明理之君子亦早深悉而痛绝之。但到如今，大学毕业生和东西洋留学生中，受了环境的同化，而同流合污的很不少。大的企业如久大公司、永利公司和商务印书馆的成功，要算例外了。近年来政府对社会所办的棉纱厂、面粉厂、硫酸厂、酒精厂和糖厂等，大多数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或是由于调查的时候不用科学方法。譬如办糖厂，应在事先调查在该厂附近地域产多少甘蔗，出产的糖销至何处，成本的多少，赢利的厚薄，与夫国外倾销竞争的状况。若事先不调查清楚，后来必致蚀本倒闭。这类事在中国司空见惯，如汉口的造纸厂，梧州的硫酸厂，真不胜枚举。还有失败的原因是用行政重情而不重理，这就是没有公正的态度。用人不完全以人才为标准，而喜欢滥用亲戚。每个机关、公司应该多聘专家，计划决定以后，外界无论如何攻击，都得照着计划做去，这样才能成功。

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不能因为口号叫得响一点，或是主义新一点，就一唱百和的盲从起来。我们大家要静心平气的来观察口号的目的，主义的背景，凭我[们]的裁判，扪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主张。若是对的，我们应竭力奉行。若是不对的我们应尽力排除。依违两可，明哲保身的态度，和盲从是一样要避免。我们要做有主张有作为的人，这样就非有清醒之头脑不可。

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便是，离开大学以后，将来做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观应如何？有人认为中国的人生观很受孔孟的影响，实际影响最大的还是老子。孔孟主张见义勇为，老子主张明哲保身，孔孟主张正是非，老子主张明祸福。孟子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不是享福哲学。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又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现在中国一般人的最后目的还是享福。我们羡慕人家说某人福气好。娶媳妇进门，即祝之曰“多福多寿多男子”。就是生子的最大目的，也就

是想年老的时候可以享福。中国普通人意想中的天堂，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一个世界，茶来开口，饭来伸手，这样享福哲学影响于民生问题很大。一般人以享福为人生最大目的，中国民族必遭灭亡，历史上罗马之亡可为殷鉴。现在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如果一个民族还是一味以享受为目的，不肯以服务为目的，必归失败。我们应该以享福为可耻，只有老弱残废才配享福，而以自食其力为光荣。英国国王在幼年时，必在军舰充当小兵，惟其如此方能知兵士的疾苦。全世界最富的人是煤油大王 Rockefeller，他的儿子做事从伙计做起，所以他们的事业能子孙相传不替。二十多年前，中日同时派学生留学欧美，中国的学生，一看见各类机械，便问从何处购买？何处最便宜？而日本的学生，只问如何制造？中国人只知道买，以享受为目的，而日本人则重做，以服务为目的；中国从前学工学农的人，统是只叫工人农夫去推动机器，耕耘田亩，而自己却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样讲究农工业是不会进步的。中国古代轻视劳力，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样应该自己动手，这种人生观的改造，是极重要的。

以上所说的两点：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1937年）10月25日 星期一〔天目—杭州〕九点至总办公处，即至有缘堂膳厅作纪念周，毕即由余作演讲，题为“大学生之责任”，讲约三刻钟。

3. 大学生之责任¹

（1937年10月25日）

诸位在天目山能安谧地天天上课，这更是不幸中之大幸。禅源寺是我国东南各省的有名大丛林，西天目参天夹道的柳杉，更是中国各地所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系在天目山对一年级新生的演讲，摘自《竺可桢传》上册（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著，1982年）96—98页。讲演时间见于作者当日日记。

少见。在这种心旷神怡的环境之下，我们应该能够树立一个优良的学术空气。中国向来的高等教育，除了太学或国子监以外，就要算书院。有宋一代，书院之制，更是盛行一时，如白鹿、岳麓、应天、石鼓、东林，其尤著者。书院制的特点，就在熏陶学生的品格。我们只要看朱晦庵、陆九渊或是王阳明的遗书，就可以知道当时师生中切磋砥砺的状况。自从我国创设学校以来已逾三十年，这三十年当中，在设备和师资方面，不能不算有进步，但是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其上焉者，教师传授他们的学问即算了事；下焉者，则以授课为营业。在这种制度下，决不能造成优良的教育，所以近年来教育部又有“训教合一”的主张，这话虽然说来已有两三年，但是能实行“训教合一”或导师制的还没有。他的原因，是学生与教员很难有接触的机会。天目山是个小地方，诸位老师和同学统在一处，导师制的实行，就没有十分的困难。以我个人所晓得实行导师制的，浙江大学要算第一个。至于导师制的结果如何，全看诸位教授的指导方面和学力的程度。依据目前的推想，应该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即如在这很短的时期中，据各方的报告，都说天目山浙大的精神特别好，学生非常用功。师生融融一堂，通力合作，这是一桩可喜的事情。但是有人可以问为什么我们要行导师制？所谓熏陶人格，这句话还是空的。对于这问题，我可以简单的回答，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诸位在大学一年所化的不过二三百元，而国家为诸位所化的，每年却要到一千五六百元，所以国家所化的钱，比诸位自己所化的要多到七八倍。国家为什么要化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

三、初掌浙大时期的读书笔记

（1936年）3月9日 星期一 接杭州郑晓沧寄来《浙江大学概

况》，中述浙大成立经过情形，于郭任远任内各项工作叙述甚详。大致郭任内重要政绩在于增加军训，使学生生活军队化；于杭城太平门外购地千亩为新址基础；改变内部组织，如农学院之分系不以畜牧、农艺等名称，而用农业动物、农业植物等等。此三者自以第一着为最重要，但因此连带及于大学之目标。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如以和平相号召，则根本郭之做法即违反本意。余以为大学军队化之办法在现时世界形势之下确合乎潮流，但其失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惟以实用为依归，不特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与英美各国大学精神在于重个人自由，亦完全不同。目前办学之难即在此点。郭之办学完全为物质主义，与余内心颇相冲突也。此外浙大尚有数点应改良：课程上外国语文系有七个副教授，而国文竟无一个教授，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其次办事员太多，薪水当在每月万元左右；一年级学生即分别系科亦嫌太早也。

5月13日 星期三 午后阅董任坚著《大学教育论丛》，关于大学之课程目的、指导教法等颇多可采处。其中有云美国大学学生数与教员作十二与一之比，经费设备佳者作五百与一之比，则国内大学学生之数实嫌过少。如以浙大论，教授八十余，则至少应可有大学生千人之数，如以经费论，则数应更多。

5月15日 星期五 阅王友鲁著《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中有关于图书馆一章，述“东洋文库”与“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系民元国府顾问马利孙所藏书，共有书籍二万四千册，均关于东亚方面，图千幅。哈佛大学以四十万美金欲购之，不允。马氏主张留在东亚，卒于民六，为日本三菱财阀岩崎以三万五千〔倍〕〔镑〕购去。在此以前归安陆存斋所藏十万卷楼昶宋楼图书，为全国精华，共二十万卷四万四千余，亦为岩崎弥之助购去，成立“静嘉堂文库”。凡此皆足以知日人以图书为瑰宝，而我则弃之若敝屣也。

6月9日 星期二 在书肆购得《鲁迅书信选集》，有鲁迅与许广平（鲁迅之妻）两地通讯，述及民十五六年间厦门大学之风潮甚详。

6月24日 星期三 在车中阅 Max Planck 普朗克 *Philosophy of Physics* 《物理哲学》，其中述 Classic Physics 经典物理与 Quantum Physics 量子物理之分别，谓在旧物理学上，事事可以预告，而新物理学上则否，完全乃为统计上之平均数而已。又谓量数之精密只能至一定限度而止，过此限度则所用之仪器即影响于所量之物质云云。

7月4日 星期六 阅《哈佛大学同学会会刊》中有关于校歌起源文。该歌 Fair Harvard 《公正的哈佛》系 Samuel Gilman 所著，G 系一牧师，游历各地，于短时间内作此歌，成名不朽。此歌唱时确足以动人，可惜中国人对于口之于味甚有研究，但耳之于声则全不关心。梅兰芳之歌徒足以悦耳，而不足以使人兴奋有作为如法国之国歌，或使人心意超然如 Fair Harvard。我国党歌虽庄重，但嫌过于滞凝稳重无激〔昂〕慷慨之态度也。

7月5日 星期日 晚阅 Henri Bernard 裴化行 Matteo Ricci's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to China* 《利玛窦对中国科学的贡献》，第五十九页有关于利玛窦对于北极阁观象台之纪录，谓城之一边在墙以内有一高山，山上有广大平台宜于天文观测，建筑极伟观，为观测员住宅，平台以上有铜制观测仪器，不但伟大而且美观，为欧洲所不及，在山上已 250 年，虽受风雨之剥蚀，而光泽并不因以少减云云。

8月25日 星期二 阅英国《天然》〔《自然》〕杂志及 *Reader's Digest*，其中有 Helen Wills 所著《我所知道世界上必然的两件事》，即第一，世界上件件事物都在变动；第二件，凡物之存在必有其理，云云。

8月28日 星期五 至图书馆阅书报，见《亚细亚》杂志上有关中国共产军一文，述共产党四巨头陈独秀、李立三、朱德、毛泽东之历史。其中李与毛为湖南人，朱系云南人。

9月17日 上午至图书馆查哈佛大学之历史，知 1636 年哈佛大学成立，时殖民地政府只补助四百镑之经费，到 1638 年 John Harvard 去世，以遗款七百八十余镑、书二百六十本捐赠大学，遂名

为哈佛大学。最初完全为教会学校，至十八世纪末，教会之势力始衰。在美国，哈佛称最老之学校，而在欧洲则意大利之 Palermo 巴勒莫大学成立于九世纪，以医科著名。英国最早之牛津成立于 1163 年，法国之巴黎大学稍早，均在南宋孝宗时成立。而当时杭州亦有国立大学即“太学”，以纪家桥岳飞宅改建。光宗、宁宗时有学生一千七八百人云。

10 月 8 日 星期四 阅 Yale Review 《耶鲁评论》，其中有芝加哥大学校长 Hutchins 著文题为“大学教育”，谓在希腊时代知识之中心为玄学，中世纪大学中各科之中心为神学，惟其有中心故各种学问虽千门万类，而求学者则精神颇能贯注于一方，惟时至今日各人惟知崇拜金钱，学校仿佛如工厂，以制货为目的，实非所宜。故渠主张将农、工、医各科须摒诸于大学之外，另设研究所专研其事，而大学则有神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三门，三科之目的亦不在于求事实或研求其历史，而在了解原则，如世界变迁之原因、人与人之关系、人与物之关系等等。其说虽新颖，但亦不彻底也。

10 月 29 日 星期四 阅美国《科学》报上关于高空对于人身生理之影响，乃系著者十余人向南美洲伊块多〔厄瓜多尔〕地方登高至二万呎之经验，结论谓至高空红血球之数增多，但以收吸之养〔氧〕气远较海平面为少，故红血球所含养气只 60% 饱和而已云云。

11 月 11 日 星期三 阅苏州《振华女学纪念刊》，知该校前任校长王谢长达及现任校长王季玉均未支薪，完全义务性质，洵可表率。卅年来无一风潮，而学校所费极少，每年二万九千元，有学生四百余人，即每个学生仅七十元，而学校尚能抽出六千元之数在设备上，洵非易事也。

11 月 12 日 星期四 阅老子《道德经》。老子喜以利害祸福动人，如云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此种论调于中国后代有大影响。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云云。此又不战主义也。所以

老子学说全然是功利主义、不抵抗主义，国内有教育者至愿作汉奸，老子之影响不少。

11月13日 星期五 至图书馆阅《论语》、《孟子》。《孟子》中有易子而教一节，理论极合乎近世教育原理，可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

12月4日 星期五 阅 Schonemann 著《从德国人眼中所见之美国教育》，谓美国大学太注重房屋而不注重人选，中等学校不严格云云。

(1937年)2月18日 星期四 阅上海 *Evening Post* 《晚邮报》(有三、四、五号)晚报 Edgar Snow 埃德加·斯诺关于陕西共产党之情况。谓共产组织严密，为首领者能与士人共甘苦。共产军十分之七识字，共产区农民对于政治均能有兴趣。又谓当地农民均欢迎共产军。

2月24日 星期三 阅本年冬季号 *Yale Review* 《耶鲁评论》中 Harold Laski 著《英国考试制》*British Civil Service*。谓英国各种制度中以此最可宝贵(见结论)。此制始创于1853，至1870始得实现，经六十年之经验益形巩固，其好处有数：(一)与学校制度有关，共分四级：(甲)统计员，凡高中未毕业学生，年在16岁左右者考入。(乙)助理员，高中毕业后，18岁左右考入。(丙)科员，大学二年级生考入，年在20左右。(丁)科长及行政人员，大学毕业生，22—24岁左右。(二)优点，考入与政治完全断绝关系，故党派虽有更易而技术人员可以不动。(三)职业稳固，薪水年有增加，至六十岁退职可得2/3最后三年平均之年俸。女子嫁人以后即须辞职。考试由考试部主管，而不由主管机关，所考者乃考其普通知识，至于行政能力经入部学习，升级亦经特设委员会。现英政府有雇员四十万人，大部之薪水在二百镑一年以下，每星期工作 $38\frac{1}{2}$ 小时，每年有三星期之休假。英制缺点：(一)行政官均为大学毕业生，有天才而乏教育者无机缘上升，外交官50%以上 Eton 伊顿公学毕业生。(二)下级者上升中级及上级极难。(三)有若干不相宜者不易

淘汰，直至六十始可。（四）财政部权过大。（五）因政策难改，有过于保守之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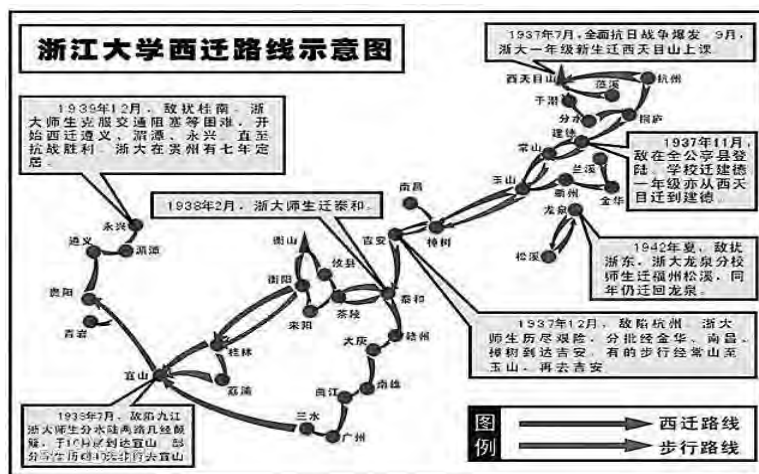
9月2日 星期四 见七月十日 *Nation* 《国家》有一文，Janeway 著，题为“日本之困难”，谓日本一月间向美定购钢铁多于去年一年，自一月至四月所购之数多于过去六年美国售与世界各国之数。故日本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

9月7日 星期二 Horace Mann *Idea & Ideals* 《观念和理想》by J.E.Morgan, 1936，曾谓“The hand is almost valueless at one of the arm unless there is a brain at the other end”臂端的手几于无用，如果另一端没有头脑。但余则谓“Brain is of little value unless there is a pair of hands on the other end”如果没有一双手，则头脑没有多少价值。

第二部分 浙大西迁之路

(1937 年 11 月—1940 年 2 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竺可桢亲率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 2000 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赣、湘、粤、桂、黔等六省，行程 2600 多公里，先后迁到建德、吉安、泰和、宜山等地。一路颠沛流离，疾病肆虐，日机轰炸，浙大人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念，艰辛办学，历时两年有余。西迁过程中，竺可桢的辛劳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从日记中就可以看出，他想得很细。每一次迁移，他都会亲自或者派信任的人先去探路，将住宿、交通等问题一并安排妥当后，才进行搬迁。他公而忘私，无暇顾家，夫人张侠魂和次子竺衡都被疾病夺去生命。1940 年，浙江大学在贵州遵义、湄潭落脚生根，坚持办学。





离杭南行（1937年11月11日—12月22日）
 建德两月（1937年11月14日—12月27日）
 赴赣途中（1937年12月23日—1938年1月27日）
 吉安小住（1938年1月18日—2月18日）
 泰和乡间（1938年2月18日—10月8日）
 来桂纪行（1938年8月30日—10月20日）
 宜山近事（1938年9月8日—1939年6月）
 西迁回顾

参李絮非¹编《浙江大学西迁纪实》，该书1939年在广西宜山印制。

1937年浙大开始西迁，流亡办学。初迁浙江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几经周折，历尽艰辛，于1940年1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到抗战胜利。

一、离杭西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中日不宣而战，上海沦陷，杭州局势不稳。9月11日，竺可桢校长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报告迁校计划：浙大本部迁天目山禅源寺，定于9月20日前迁一年级，二、三、四年级双十节以前迁禅源寺临时校址上课。9月21日一年级学生第一批出发赴天目山。11月10日学校发出布告，令学生于11、12、13日三天迁往建德。12月24日杭州沦陷。第一批二年级学生及全体女生由梁庆椿、舒鸿领队，从建德出发向江西吉安搬迁。12月25—26日第二批三、四年级学生及教职员由陈柏青、陈大慈领队，第三批一年级学生由夏济宇、储润科领队，先后出发赴吉安。1938年2月18日全体师生到达泰和。于2月24日在泰和开课。随着战事的西进，日军进犯九江、鄱阳，赣中告急。泰和办学仅一学期，浙大即再次西迁，由泰和赴宜山，分水陆两路。陆路经茶陵、衡阳、桂

¹ 李絮非，时任浙大文书课课员，毕业于中央大学史学系。

林、荔浦、柳州，分三支队伍。一是教职员工及其家属。8月30日第一批教职员家属乘校车离开泰和，前往茶陵，孙逢吉、蔡邦华、叶良辅、张孟闻等同往；第二批图书仪器计880箱启运，9月8日抵宜山；最后一批教员离开泰和已经是10月8日了。二是学生。行前，竺可桢专门召集学生谈话，叮嘱路上的注意事项。9月15日浙大第一批女生出发赴桂林。三是学校和学生自治会专门组织的步行团。9月19日，由陶光业、吴恕三等20名男同学组成的“浙江大学呐喊步行团”出发，取道茶陵、攸县、衡山、南岳、衡阳等地，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10月底抵宜山。9月18日竺可桢离开泰和赴衡阳，9月26日从阳朔至宜山。11月1日召集学生约200人在膳厅谈话。11月14日全校开课。

（1937年）8月10日 星期二 开特种教育委员会，由苕谋¹提议组织特种教育委员会，以为执行警卫、防毒等事。决推定苕谋、刚复、柏青、周承佑、李乔年²、黄瑞纶、梁庆椿等七人，并嘱黄君理在土山下筑隧道，以为飞机轰击时避难之所。

8月26日 星期四〔杭州—西天目山—杭州〕上午与苕谋等谈，关于浙大避难地点尚有考虑之必要，西天目须再度视察。乃于十点半偕亦秋³、刚复、黄君理⁴、潘承圻⁵五人乘湖滨汽车行之车赴西天目。……二点至天目山管理局。遇俞士杰君，由渠陪同至禅源寺，晤方丈妙定，视察寺院。先至来青阁，次及戒台、上客堂、有缘堂、新老客堂诸地，大致可容学生四五百人，教职五六十人。但课堂不过四五处而已，膳厅、礼堂须另建。据俞士杰君云，米粮此间〈一〉三两〔年〕都有余，可以供给数百担。交通方面，曾有计划自鲍家站修路至来青阁，计五里，约须二千元。四点半告别。

8月27日 星期五 十一点召集非正式讨论会，谈校址迁移问

1 张绍忠，时任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物理系主任。

2 李寿恒（1898—1995），字乔年，江苏宜兴人。时任浙大工学院院长兼化工系主任。

3 卢守耕（1896—1989），字亦秋，浙江慈溪人。时任浙大农学院院长（1936—1939），农艺系教授。

4 黄君理，时任浙大土木系教授。

5 潘承圻，时任浙大化学系教授。

题，到亦秋、刚复、鲁珍¹、君理、苳谋、承圻与晓峰²。无决定议案，决调查西天目山之运输问题。

9月5日 星期日 三点开会讨论迁移天目山各类问题，到柏青³、苳谋、仲翔⁴、刚复、亦秋、庆椿、劲夫⁵、鲁珍诸人，谈及交通、房屋、水电、警卫各问题，六点散。

9月14日 星期二 下午仲翔及鲁珍与西天目山和尚妙定及无净接洽租屋事，至晚始定每月租金四百元，假定以一年为期，由双方签字，罗霞天为证人。

9月17日 星期五 午后三点开一年级教授会议，到仲翔、朱叔麟、朱福炘、张荫麟、储润科等十八九人，决定二十一二日移往天目山，实行训教合一等等。五点散会。晚七点半在新教室礼堂开一年级新生大会，到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其中女生二十人左右。由余主席，报告约十分钟；次晓沧、钱子泉及朱仲翔与陈柏青均有讲演。

9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一年级生第一批出发赴天目山。仲翔来，余告以天目山马路测量已停止进行，因二、三、四年级生不往天目也。

9月26日 星期日〔杭州—天目山—杭州〕七点半赴天目山，晚七点回。……十点一刻至禅源寺，晤仲翔、承圻、苏叔岳诸人，知星期一可以上课。已到一年级学生二百一十人，住班首堂与第二宿舍，女生计有三十人。因与诸人至来青楼及老客堂、戒坛等周视，知课堂中桌椅已制就，一年级之一部正在移入有缘堂。现教室尚有多，而有缘堂尚可住一百余人之数。

9月27日 十点有警报，……三点左右又有警报，约三点半见有敌机七架，在城之东北即笕桥环绕，投下炸弹五枚，共经一小时

1 沈思珩，时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浙江大学总务主任。

2 张其昀（1900—1985），字晓峰。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时任浙大史地系主任。

3 陈柏青，时任浙大教授、校训育委员会成员。

4 朱庭祐（1895—1984），字仲翔，江苏川沙人。地质学家。时任浙大史地系教授。

5 王国松（1902—1983），字劲夫，浙江温州人。电机工程学家。时任浙大电机系主任。

始去。……五点半又有警报。

9月28日 八点半即发警报，九点余即闻飞机声，绕空中多时，仍在城东北，但在学校上空亦盘旋多时，并曾开机关枪扫射。计在笕桥投炸弹十四枚。十点解除警报。十一点半又有警报来，与柏青、苌谋避入地窖。初入时人甚众多，待二小时空气即甚闷，因温度、湿度加高而不通风之故。

9月29日 晨六点余即有警报。……十点解除警报。上课两小时。中膳。未三点又有警报，至四点半解除。

9月30日 八点余又有警报，嗣后解除，而又发警报者数次。至十一点左右即有飞机三架在城南翱翔，未闻炸弹声。但后得蔡竞平¹电话，知在南星、闸口车站投五六弹，并伤数人，电厂及钱江大桥均告无恙。

10月1日 二点余又有警报，二点半解除。四点又有警报，五点解除。²

10月2日 星期六〔杭州—建德—杭州〕偕乔年、黄瑞纶赴建德。……十一点至建德，开入城中，直至县署。因黄家暂寓此间，故由渠带至县署晤科长陈亨钊（系去年毕业之高农学生）与马逸鸣（弋冥，即仲翔之亲戚也）。马、陈诸人均极欢迎浙大来此，因建德自洪杨后市面衰落，希望有大学来此，可以繁荣市面也。

10月5日 星期二 四点开校务会议，谈迁移校址问题。……当时提出者有三种意见：一庄泽宣，在杭州不迁移；二周承佑³，全体移天目；三郑晓沧、黄羽仪⁴，二、三、四年级移建德。在杭不动之提案，余颇心善其说，但许多教授在警报后不能居校内，如晓沧即其一例。故若目前故示镇静，万一城站受炸，则必致一哄而散，故非有大多数之赞成不行。但庄之提议留杭不迁，赞成者只八人，而反

1 蔡竞平（1892—1962），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时任杭州电厂总经理。

2 1937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竺可桢记录的日机轰炸和警报数：5天内发警报数十余次，在笕桥投炸弹14枚，在南星、闸口车站投五六弹，并伤数人。

3 周承佑，时任浙大机械系主任。

4 黄翼（1903—1944），字羽仪。心理学家。时任浙大教育学系教授。

对者却有十五人。维持原案移天目，则以潘承圻之报告对于天目〔印象〕不甚好，且大多数教员又以赴天目不能挈家眷，故移建德之议遂得以十五票通过。

10月24日 星期日〔杭州—天目〕开会讨论迁校址问题，到乔年、亦秋、苕谋、振公及刚复，稍晚仲翔亦来。决定二、三、四年级全移建德，预期于一星期内开始迁移。……二点偕仲翔、承圻、鲁珍赴天目。

10月25日 星期一〔天目—杭州〕九点至总办公处，即至有缘堂膳厅作纪念周，毕即由余作演讲，题为“大学生之责任”，讲约三刻钟。

11月1日 星期一 十一点作纪念周，余报告暂定十一月七日移建德之决定。午后开常务委员会，到刚复、苕谋、亦秋诸人。决定致一电与王雪艇，告以迁移校址，嘱其电复。余以此事关系浙大前途极大，且迁建德安全问题未可知，而杭州校舍将受大损失，故又作一书于雪艇详告之。

11月3日 星期三 据蔡竞平所记之警报时间表，徐谷麒作一统计，自浙大九月廿日上课至十月卅号，六星期中因警报而不能上课时间，自晨至晚平均为16%；最坏为8—9，占28%；次之下午2—3，为22%。从前以为平均占40%，实过多也。

11月5日 星期五¹ 日本兵在江浙交界沿海之漕泾、金丝娘桥登陆。全公亭失守。……晨六点起。时高空虽清晰而地面有雾，但未几即有警报，未七点解除。下午十二点半有警报，十二点三刻解除。时适在大雨中，后知日兵〔登陆〕，在乍浦左右之全公亭失守，敌兵上岸者达二千人之多，松江后方岌岌可危。

11月6日 上午八点廿分、十点、十点卅分，至晚五点始解除，终日未能上课。下午有五机在杭炸艮山门外之机神庙、闸口及西兴。……后阅报知，今日闸口投弹十二枚，货栈中四弹；艮山门投十弹，死平民三人；西兴投十六七弹，死平民二，路警一，童子一云

1 1937年11月5日至11月6日，杭州形势急转，竺可桢记录的日机轰炸和警报数：两天共5次。

云。嘉兴有警报二十四次。

11月7日 星期日 昨午上岸敌军已占离松江南卅里之松隐，可称神速。殆因飞机到处在浙轰炸，我军不能出动之故。敌机在嘉兴、嘉善投弹至三百余枚之多云。……八点半至校。与鲁珍谈，嘱其速将床、椅、桌、凳等1750件运建德，学生则预备于十号开始能移。

11月8日 星期一 十一点作纪念周，余即报告迁建德之计划。……午后与张荃谋、卢亦秋、鲁珍等谈移建德后之问题：一为学生训育问题，一则为校舍保管问题。招徐谷麒及王以中来，谈注册股及图书馆大部人员须留杭垣。

11月10日 星期三 今日出布告，令学生于十一、十二、十三三天移建德。

11月11日 星期四（是日起，教职员学生按三批分配定当，每晚一批，约200人，下午6时起至11时止，半小时一次校车送至钱江江干码头，舍路登舟，留船一宿，黎明出发迁移建德。）¹

11月13日 星期六² 午后得晓沧电话，知二年级生已于昨日下午五点到建德。昨晚三年级生出发较[迟]，至晨二点始开船，故今日到达亦必稍迟矣。昨教职员家属去者颇不少，故秩序不甚佳。

一迁建德（1937年11月14日—12月27日），一个半月。

11月14日 星期日〔杭州—建德〕由杭州赴建德。……九点二十分始由杭动身，幸无警报，故得出城无碍。十点十分过富阳，十一点十分过桐庐，过渡时并不费时间。在桐庐车站遇馥初。十二点半至建德，即进城。

11月15日 星期一〔建德〕八点至总办公处。知四年级生尚未到，直至下午三点半始来，同来者有顾青虹、丁炜文等。据云，自星期六晚十一时启行后，轮中极为拥挤。教职员及家属住官舱，最挤；女学生住房舱，尚较舒适；男生则住上舱；并有搭载行李轮者。

1 括号内容参《浙江大学西迁纪实》。

2 1937年11月4日至11月13日竺可桢记录10天内共发日机警报数26次。

昨中午始至桐庐，因载行李过重、富阳耽搁四小时之故，及晚间行至桐庐上游又停，晨间遇大雾不能开，至九点始启行，故于下午三点始到。在桐庐之漏港滩因水浅须换船，三小时抵乌石滩，又不能进，离轮，由民船撑至建德，亦须三小时云。

11月20日 星期六〔天目山—歙县〕晚闻苏州陷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有人主张速搬，因之人心摇动。……余主张过去不谈，希望以后和衷共济，并说日兵不至富阳则建德分校不移，不至余杭则天目分校不动。今晨七点召集学生谈话，大意亦同。嘱学生安心读书，并报告江西吉安校址之接洽经过，与天目情报方面、交通方面之布置。

11月27日 星期六〔建德〕今日宣布高工、初农停课，教职员发薪至十二月底止。

12月3日 星期五〔补注：此系星期四日记〕接教育部东电，知马电（廿一电南京）已到，嘱移浙江或江西南部，适与吾辈所计划者相合矣。且如此，则以后经济教部似当仍须维持也。得周承佑廿七日电，谓允溪白鹭可容全校，请派人复看云云。¹

12月5日 星期日 自前日接周承佑电，知吉安白鹭洲可容全校，又同时得教育部电，赞成浙大移赣南，则吉安之议势必成为事实。迁移事以人手众多，迁移费用较大，不得不缩小范围。故已决定，凡助教既在建德无工作可做，初移吉安时可不必同去，俟吉安地方布置就绪后，再酌量指令前往。其余暂时留职停〔薪〕，听候调迁。

12月9日 星期四〔建德—玉山〕出发赴南昌，在玉山大东旅社（城外中关）八号停歇。

12月10日 星期五〔玉山—南昌〕至玉山城内林家弄浙赣铁路总局……请其拨车五辆至衢县。²

12月12日 星期日〔吉安〕九点半，余与周、胡、滕四人徒步行往青原山，……遂至阳明书院，即在左邻，正在修理，其中可

1 另参《浙江大学西迁纪实》：同日，天目山分校一年级学生首批抵建德。

2 另参《浙江大学西迁纪实》：天目山分校一年级学生最后一批抵建德。

住学生 180 人之数。而青原寺则可作教室，颇适于一年级之用。……五点偕胡、周、滕诸人至乡村师范，适校长不在，乃视察一周。现有学生 160 人，共四班。阳明中学即在其旁，因阳明中学之新屋将成，故阳明中学及师范之一部可以借用。盖乡村师范学生之卧室与自修室均分开，且系单人铺，大可合并也。次赴白鹭洲，须经一渡，地在洲上，系宋江文忠公（万里）所立，然常遭大水冲坏，今年水亦没上岸二三尺之多。至校后视察一周。该校有学生六七百人，以借读者多，故极拥挤。未几校长徐君〔来〕，因教育厅之电令允借教室四间，但于浙大殊乏用处也。

12 月 13 日 星期一〔吉安—泰和—南昌〕南京失守。七点半偕刚复、承佑、滕和卿四人乘四号车由大同旅馆出发赴泰和。……至县署晤县长鲁绳月，湖北人，在任两年余。余等约其同赴上田看萧家屋，只离城六里许。称萧百万，以盐业起家，名萧炳南。……十一点至附近村落一观，计有五村落，均属萧氏。其中以萧百万屋为最大，亦最空，计九幢（连祠堂在内），离马路及赣〔江〕均里许而已。交通方便，出产丰富，兼有屋宇，故颇适宜于大学暂避也。

12 月 14 日 星期二〔南昌—贵溪〕知今日上午省府会议决定，决拨吉安青原山及泰和大原书院与浙大，但希望将来能集中于泰和。

12 月 17 日 星期五〔建德〕午后三点召集特种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到晓沧、荃谋、刚复、乔年、鲁珍，决定提早迁赴吉安。

二迁吉安、泰和（1937 年 12 月 23 日—1938 年 10 月 8 日），十个月。

12 月 23 日 星期四〔建德〕下午四点开特种教育委员会，并请出发时领队诸人出席，决定明晚第一批二年级及女生；星期六晚三、四年级；星期〔日〕晚第三批一年级。每次约需船十只，由事务课偕同免票学生前往押船。至于领导，第一批梁庆椿、舒鸿¹；第二

1 舒鸿（1894—1964），字厚信，浙江宁波人。时任浙大教务处体育部主任。

批陈柏青、陈大慈¹；第三批夏济宇²及储润科³；余与三院长拟于星期一、二出发。

12月24日 星期五 敌兵至拱宸桥。布告学生出发办法，……⁴

12月25日 派沈仁湘赴兰溪雇小船，为生员在兰换船之用，因今晨四点二年级在建德启行，于晚间可到也。今日下午四点又有三、四年级学生与教职员出发；明晨第三批学生一年级共约一百五十人，以夏济宇、储润科领队，于十点左右可以出发。故至明日全校员生可以全部开拔矣。⁵

12月26日 五点出发，在白沙渡待三小时。至十点始至兰溪，即至萍香旅馆晤沈仁湘。时二、三、四年级同学及领队教员如陈柏青、舒鸿与梁庆椿均已到。余告以金华车如不通，决取道常山。

12月27日 星期一〔兰溪—金华〕九点偕侯德齐、李乔年及刚复、亦秋四人出发赴金华。十一点至金华，见各店均闭，状况更比上次为凄凉，良由省府已搬家也。……据云今日下午四点有车自玉山来，其中有三辆军用品、二辆煤在金卸货，或可设法。……但谓与军部之车站司令部成鸿熙司令接洽。此时适有警报，至十二点警报解除。遂偕文佑彦赴车站，晤成司令不值。遂行二里许至和盘桥成鸿熙宅，遇成。渠系湘乡人，据谓目前军队不听指挥，渠不能保证可以得此五车皮与浙大，但至下午等回音。余等兴辞出，约二点再等回话。……往晤成司令，亦不在，见董参谋，允不令兵士占五车皮，余等遂出。时二、三、四年〔级〕同学已先后到，余即告以消息。但行至第一旅馆，则知事又中变。盖自江山来金华之车在衢州为兵所扣，因是决定令学生教员均设法回兰溪，走常山。五点余偕李、胡等乘车回。

1 陈大慈（1904—1939），时任浙大中文系教授。

2 夏济宇，时任浙大军训教官。

3 储润科（1900—1969），江苏宜兴人。时任浙大化学系教授。

4 另参《浙江大学西迁纪实》：杭州沦陷。第一批二年级学生及全体女生由梁庆椿、舒鸿、郑奎联领队，从建德出发向江西吉安搬迁。

5 另参《浙江大学西迁纪实》：第二批三、四年级学生及教职员由陈柏青、陈大慈、白起凤领队，第三批一年级学生由夏济宇、储润科领队，先后开拔赴吉安。

12月28日 星期二〔金华—常山〕至十点始出发，并告沈仁湘于兰溪学生全体出发以后，即乘自行车赴常山，与叶克勤料理常玉间交通事。……一点车至龙游，在龙游酒店中膳。二点由龙游出发，三点至衢州。至中国银行晤孙省三。适浙赣路车站站长章君亦在，据〔云〕三四天内无希望在衢上车。因此托中行致一电话与兰溪，嘱各生集中玉山……

12月29日 星期三〔常山—玉山〕十点偕刚复、学启赴悦宾旅馆晤线区司令陆福廷，适陆与副司令周金台及参谋长张觉吾及浙赣路副局长吴镜清与运输处处长钟湘青〔均在〕。吴等一见后，即声明对于浙大极为关心。陆尤关切，谓昨日金华曾见学生在兰溪、金华间徒步，心觉不安，故可保证决计尽力运送。谓由萧山出发有马副〔司〕令一列车共十八辆，于今日下午可到金华，我校学生可以即在金华挤上。并谓此列车本拟至玉山，再开至金华为我校开一列专车。余告以我校学生已向玉山集中，于星期日或星期一可以在玉山集中，故请陆于星期一拨一列车为浙大运输之用。……四点半偕刚复、陆子桐乘四号车赴广丰，五点半至广丰，即入大北门。至东城俞应麓（咏瞻）即常玉汽车公司董事长家，情商借卡车两部，运输于玉山、常山之间。渠允可以照办，余允派陆子桐于二日内将所需之零件交与，谈至六点半出。

（1938年）1月17日 星期一 四点开会（特种教育常务委员会），到周承佑、张荃谋、刚复、乔年、亦秋、鲁珍，由章诚忘记录。决定全校于二月十号左右移泰和，一年级住大原书院，二、三、四住萧宅。决收借读生五十名，二月五号以前报名。

1月21日 星期五 三、四年级学生均到。¹

2月18日 星期五〔吉安〕²（全体师生到达泰和。）

2月19日 星期六 十一点一刻偕梅及丁炜文由吉安木匠街出

1 另参《浙江大学西迁纪实》：最后一批学生舟行抵吉安。此次迁徙，时近一月，由建德经兰溪、金华、衢州、玉山、樟树抵达，行程752公里。于吉安临时落脚。

2 括号内容参《浙江大学西迁纪实》。

发至泰和，留侠在吉安，期于廿一号来泰。木器等由船运来。十二点一刻至大原书院。在校中膳后即至老村，将行李移入庄泽宣所住屋，名有间轩，盖泽宣已于十四日赴粤矣。

3月8日 星期二（竺可桢校长致函教育部，报告浙大学生426人、教职员179人已于2月24日在泰和开课。2000箱图书、仪器也全部运达。）¹

6月26日 星期日〔泰和〕八点至新村萧氏宗祠举行浙大第十一届毕业典礼。……首由余致词，余述三点：（一）大学生入社会后，在此国难时期应人人负起责任，使中华民族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二）目前学校缺点在于只传授知识，而不注意智慧，不能使人深思，以后毕业生应能慎思明辨，俾能“日日新，又日新”，以发扬而光大之。（三）在社会服务，不求地位之高、薪水之优，而在于努力去干，只要所干之事是吾人份内应做之事。次晓沧报告本届毕业共七十人，女生十四人，占五分之一。

7月21日 星期四〔南岳—祁阳〕〔补记：今日下午八点，衡儿在泰和间余轩西斋，因患禁口痢去世，余于二十五下午八点回泰和始知之，呜呼悲哉！……（仲子竺衡）生民国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卒民国廿七年七月廿一日。〕

7月23日 星期六〔桂林〕在仲揆处得章诚忘转来振公、鲁珍电催回，并云侠病痢未愈，或因校中离别太久，故催归也。

7月25日 星期一 由衡阳回泰和 8：20至上田村堤上。下车即遇宁、彬诸儿，梅儿即谓妈妈病好点。余问衡，谓衡没得了。余闻信之下，几不能辨是真是梦，因章诚忘告余谓侠及衡病痢已稍佳，何竟至去世耶？……回家则炜文、朱诚中等均在。见侠卧床上，唏嘘不能言，谓恐不能再相见。询医生知温度已退净，惟脉搏在100—110之间，恐心脏不良。

8月3日 星期三〔泰和〕晨侠脉搏115，温度38.3，呼吸33。侠于上午十一时二十四分去世，悲哉！

1 括号内容参《浙江大学西迁纪实》。

8月18日 星期四（竺可桢校长致电教育部长陈立夫，请电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准拨安顺标营为校址。因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请求划拨搬迁费8万元。）¹

8月19日 星期五 首批图书仪器装船起运。

8月27日 星期六 泰和（竺可桢校长致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告以“万一安顺无适当地址，则惟有暂驻宜山，先筹开学，徐图遵陆入黔”。）²

9月9日 星期五 泰和 今日得教部陈立夫函，谓赞成浙大先在宜山暂时开学之议。

9月11日 星期日 泰和 五点邀各系主任开谈话会，到亦秋、乔年、晓沧、馥初、作屏³、晓峰、洽周⁴、储润科、苏叔岳⁵及振公与章诚忘⁶等等。谈及自八月份起薪水打七折，较前增加一折，以校中经费有余也。次谈及迁移校舍问题。

9月12日 星期一 泰和 接刚复电，知桂省府已拨宜山标营与本校。下午又得宜山九日李絜非⁷电，知标营团部已迁移，正在着手修缮。学生、教职员去宜无问题矣，心为之大慰。

9月15日 星期四（由100多名师生员工护送，竺可桢校长归葬亡妻张侠魂和次子竺衡于泰和县城西郊松山（松毛岭）。同日，浙大第一批女生出发赴桂林。）⁸

三迁宜山（1938年8月30日—1939年12月底），一年四个月。

8月30日 星期二 第一批教职员家属由校车送往茶陵，计有

1 括号内容参《浙江大学西迁纪实》。

2 括号内容参《浙江大学西迁纪实》。

3 蔡堡（1897—1986），字作屏，浙江余杭人。时任浙大生物系主任。

4 郭斌稣（1900—1987），字洽周，江苏江阴人。语言文学家。时任浙大中文系主任。

5 苏叔岳，字毓棻。时任浙大史地系历史学教授，在校部兼训导员。

6 章德勇，字诚忘，时任浙大校长秘书。

7 李絜非（1907—1983），时任浙大史地系史学组教员。

8 括号内容为编著者据竺可桢日记综合表述。

孙逢吉¹、蔡邦华²、叶良辅³、张孟闻等同往。

9月18日 星期日〔泰和—衡阳〕晨80° 晨泰和出发赴衡阳。

9月19日 星期一（由陶光业、吴恕三等20名男同学，组成“浙江大学呐喊步行团”，分两队出发，取道茶陵、攸县、衡山、南岳、衡阳等地，一路翻山越岭、餐风宿露、徒步千里。沿途访问各县商会以及民国“副刊大王”孙伏园、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的夫人，采访搜集各地民风、习俗，不时还登台演出，宣传抗日，历时40天，10月底才安抵宜山。）⁴

9月20日 星期二 抵桂林 晨一点半醒，不能成寐，因续成步放翁原韵悼侠魂绝句两首。（一）“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二）“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9月25日 星期日 由阳朔至宜山。

11月1日 星期二 九点至标营，召集学生在膳厅谈话，到学生约二百人。余讲阳明“知行合一”与“良知”之说。阳明先生发明“知行合一”之说，在于正德初年，时被谪龙场，于动心忍性之余而发现者。至于致“良知”之说，则起于擒宸濠而横遭谤毁之际，时在正德十五六年矣。

11月14日 星期一 全校开课，教授到者过半数，学生注册共320余人。

11月18日 星期五〔宜山〕得二姊自昆明来函，并附侠传略，可称不朽之作，而侠亦得以流芳，实为幸事。都三千余字，拟在桂林印刻。余悼亡诗，二姊以为甚佳，其中以第一首为尤好云云。但“何堪凤去只留台”一句之“留”字应改为“余”字。又第二首末二句原为“岂知一病终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拟改为“伤心一病成长

1 孙逢吉（1904—？），字念慈，浙江杭州人。时任浙大农学院农艺系教授。

2 蔡邦华（1902—1983），江苏溧阳人。昆虫学家。时任浙大病虫害系教授。

3 叶良辅（1894—1949），字左之。地质学家。时任浙大史地系教授。

4 括号内容参李杭春《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1936—1949》。

往，倦旅孤眠梦黯然”云云。但“客舍梦回又泫然”乃系一事实，故次句似可不改也。

（1939年）2月5日 星期日 未几即闻飞机声，时约11：15。余等在途稍停，见有十八机分为两群，经宜山城，由东南南向西北北飞。飞稍远，余等又行，但机声又逼近，仍向宜山。至宜山天顶，初闻一枪声，见半空有烟一阵，未几即闻重大之轰炸声，宜山起火。十八机即向东行，但未几有九机折向南，又作大围绕，余等所在地却在中心。时适十二点，已抵太平乡，将至乡公所打电话，因机又折回宜山城，乃在一山顶瞭望。见九机折回至宜山，由西向东，飞至东城时，落轰弹甚多，连续可闻者八九声。向东去复又折回南而西作大围绕，再转北方，又由东向西过宜山，作〔第〕三次轰炸，此次凡四声。自第一次炸至第二次约费时十五分钟。其半径约为三十华里，故机行之速度每小时约三百六十公里也。机之高度最初在三千公尺，至轰炸时稍低。

……回至半途即闻赶墟之村人言标营被炸。过了歌山将至城，忽讹传警报。余等在了歌山足略停。适朱亮臣来，乃〈未〉知标营及乐群社之大礼堂被炸。稍息后，余等沿南城墙脚而东至标营，时已三点余。至农场左近，见路上落弹累累。后据点数，共有八十六枚之多。至标营，知计共烧去二年级学生宿舍一所、标营大门及办公室与新成之礼堂及农场对门之新造茅屋顶教室一所。五日下午余等在标营，知学生因均于第一次轰炸后避于江边，故无一重伤，〔伤者〕仅徐嘉森与高昌瑞二人及一校工。徐脑后破皮，高手指略伤，校工略重。其余尚有徐守渊等因救宿舍之火足上受伤。四点余进城，知乔年住南一街屋落一弹，正中后房，刚复住西一街50号落二弹，炸去屋角。余均往一一慰问。并至指挥部询悉此次共死市民三十余人，伤二十余。而浙大员生、眷属均无恙，亦可谓大幸矣。晚七点召集行政谈话会。

2月6日 星期一 昨日敌机轰炸，东面乐群社及县党部落弹，西面则西一〔街〕50号落弹，若系延烧弹则余寓必无幸矣。所用者

似均系 50—100 公斤之炸弹，〔弹坑〕直径约一丈五六左右，在 50 号死一不知姓名之男子。

……四点至文庙作纪念周，因礼堂被炸故。余首先报告，谓以日本人之迭次摧残文化，浙大早应在被炸之列。如北方南开、昆明联大、南京中大、梧州西大、长沙之湖大、八步之同济皆一再被炸，而本校之独后已属偶然之事。但勸勉学生不要惊恐。

4 月 9 日 星期日 派冯言安¹、程耀椿²、张孟闻³、张晓峰、吴馥初⁴、梁庆椿、雷宾南⁵、沈鲁珍等为迁校委员会。

4 月 13 日 星期四 午后四点开迁校委员会。因教育部电未到，故目前暂时不能进行迁移事务，但可各方询问，如各教员所需之房屋及询全曦堂以建水木器之价目等。开会时到雷宾南、张孟闻、程耀椿、梁庆椿、吴馥初等。张晓峰、冯言安二人告假。

4 月 19 日 星期四 四点半开迁校委员会，到梁庆椿、冯言安、沈鲁珍、张孟闻、程耀椿、张晓峰、吴馥初及各院院长，议决派梅迪生赴渝与教部接洽迁移事，如迁滇不成，则依照原议移黔之湄潭及赤水等地。

5 月 17 日 星期三 三点至校开迁校委员会，决定于乔年、亦秋返校后派人去黔。

6 月 2 日 星期五 午后四点开迁校委员会，迪生报告去渝之经过情形，以大体而论，赞成湄潭。桐梓专员刘千俊极赞成湄潭。赤水则以治安不佳兼之公路一时亦不能通，天气又热。程耀椿主张在威宁，该处交通甚方便，但是否适宜，非一往视察不可。

1 冯言安，时任浙大园艺系主任。

2 程耀椿，时任浙大化工系教授。

3 张孟闻（1903—1993），浙江宁波人。动物学家、教育家。时任浙大生物系教授。

4 吴钟伟（1894—1967），字馥初。时任浙大土木系主任。

5 雷沛鸿，字宾南。时任浙大训导长，后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

二、西迁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

（1938年）6月26日 星期日〔泰和〕八点至新村萧氏宗祠举行浙大第十一届毕业典礼。……首由余致词，余述三点：（一）大学生入社会后，在此国难时期应人人负起责任，使中华民族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二）目前学校缺点在于只传授知识，而不注意智慧，不能使人深思，以后毕业生应能慎思明辨，俾能“日日新，又日新”，以发扬而光大之。（三）在社会服务，不求地位之高、薪水之优，而在于努力去干，只要所干之事是吾人份内应做之事。

6月29日 星期三〔泰和〕将毕业典礼演讲写就，交与陈汉兴抄写，以便在《国命旬刊》¹与《教育通讯》上印刷，共约三千字左右。

1. 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²

（1938年6月26日）

诸位同学，今天是本校举行第十一届毕业典礼，正值倭寇猖獗万方多难的时候，诸位毕业生初入社会，就遇到国难，因此诸位的责任，就格外的重大。我们晓得范文正公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现在诸位离校以后，每个人也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目前虽然敌人炮火飞机连续的天天轰炸，我们前方将士们仍能奋勇杀敌，前仆后继，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新精神，这新精神是铁血铸成的。从前战国的时候，秦国是有名强暴的国家，他把韩、赵、魏、齐、楚、燕一个一个的并吞。当时有句童谣，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据《史记》太史公的解释，以为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怀王

1 1937年10月10日创刊，由浙大史地系编辑出版。竺可桢在1937年10月22日和1938年4月3日日记中曾提及有关事宜。

2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刊于《浙江大学西迁纪实》（1939年）一书附录1—6页，原文标题下记有：“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国立浙江大学举行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于江西泰和上（甸）（田）村校舍，竺校长致训辞，此文为是日讲辞笔记稿。”此前曾以《抗战中之大学毕业生》为题，刊于《国民旬刊》第9期（1938年6月30日）。

入关，为秦所杀，楚人哀之，故亡秦必楚。这话是不对的，国之兴亡不能以其君主之如何被杀来断定的。楚之所以能复兴，乃是因为当时楚之民族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有以促成之。只要看当时，几个伟大人物如汉高祖、楚霸王、韩信统是楚人，巨鹿之战，各国诸侯兵皆作壁上观，惟有抱破釜沉舟之楚兵，始能以一当十，击败秦人。这都是表示楚之民族是可有作为的民族，不是一个堕落的民族。最近德意志虽经欧战败迹，而不出二十年，一跃而又成为欧洲的盟主，乃是德意志民族刚毅不屈的精神。所以中华民族只要能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日本虽如何强暴，如何诡计多端，亦徒见其心劳日绌，而不能成功。我希望诸位到社会作事，能够把这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传播于各村乡、各城市、各机关去。

其次，诸位在校四年，所得于学校及诸位老师之益不少，但同时不可以不知中国现行学校制度之缺点与优点，而对于缺点尤其应该知道。惟知道缺点方能谋补救之方。许多人常以学校培植学生和工厂制造物品相比，毕业生没有出路好像是工厂出品无处可销。这比喻有很重要一点根本不合。工厂出货无论是一部汽车、一只表或是一个铁钉，总是出厂的时候最适用。等到旧了，表会停、汽车会抛锚、铁钉会生锈，毕业生，可不能一离校就天天腐化下去。他必得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内在力，使其出校门后能利用其思想以增加智识经验，锻炼身体品性，使学问道德又日新日日新。有若干教育家以为现代的学校，是教而不育，即是专重智识的传授而缺乏道德的修养。因此也就有许多人赞成恢复从前的书院制度。但即以智育一端，现行制度亦有重大缺点，即专重智识的传授而不注重训练智慧。过于用授课方法来灌输各国学者已发明的事实，而对于思想的训练方面全未顾及。《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宋程伊川说道：“为学之道，五者缺一不可。”但实际现在大学能行到博学、审问已经算好的了。现在各大学统以读满多少学分即算毕业，这种制度的弊端到了极点，变了北京填鸭式的教育。孔子教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程子解说道：学者须是深思，思而不得然后为他说便好。伊川大弟子尹彦明（焞）见伊川半年，

方得《大学》和《西铭》看。这好像新生到校第一学期，不叫他上课，先看其人志趣如何，到第二学期方给他两本书看。有人问朱子此意如何？朱子答道也是叫他自就切己处思量。在杜威（John Dewey）所著的 *How We Think*（1933 Ed.p.257）讲到如何能使接受各种智识不像囫圇吞枣的咽下去。他的第一个条件是教师所供给的材料必是学生所期望而切实有需要的，第二是能有刺激性而使学生觉得尚有改进之可能的。若是老师铺陈事实时使学生得一印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许多学者的研究，已如《吕氏春秋》一字不得增减时，其结果学生但可接受而无自动思想之能力。所以程子说学者要先会疑，他又说“学原于思”。二十年前有一次哈佛大学校长 Lowell 召集一年级学生讲话，他说你们不要过信老师所讲的话，以为金科玉律不能变动的。这话初听很足惊异，但其实理由是很明显的。以物理学而论，四五十年前当 Lord Kelvin 最有权威的时候，那时物理学家以为所有物理学上重要的学理已经发挥无余，但不久 Curie 镭的发明、Roentgen X 光的发明，使物理学上思想大起变化。从前所谓 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能力〔能量〕不灭、Immovability 物质不变诸定例，到现在统须加以重新估计了。所以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有许多定例，安晓得二三十年以后，不被推翻吗？

中国古代虽无近世的实验科学，但是南宋理学家的思想，却是很科学的。近世科学均推培根（Francis Bacon）为鼻祖，培根距今不过三百年。他和明朝徐光启是同时，小徐光启一岁，世人之推他为科学鼻祖，是因为他是第一人提倡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同时注重实验。程子的格物致知实在也是归纳法，如〈他答〉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是〕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答曰：“怎得便为贯通，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恍然自有贯通处。”又道“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这所讲就是归纳法。察就是观测。所谓归纳法也者，无非从许多观测的事物，寻求一个公共原则，是为定例。定例既立，然后由定例以推同样事情的归宿，是为演绎法。如 Euclid 几何定例的推演即是。或问程子曰：“如何是近思？”他答道：“以类而推”，就是演绎法。宋代程朱之学确有科学见地。朱子对于进化论，对于化石，对于雷雨的解释，与近

代科学的解释甚相吻合，但是所差有一点，就是并无所谓实验。据杜威说，实验者乃是依据一种理论而设计之观测，近世科学以实验为最要之工具。〈陆九渊〉〔王阳明〕嘲笑朱子的致知格物，说他照朱子办法，坐在竹子旁边去格竹子的物，结果坐了十天，人几乎病倒了而不能格得一个道理出来，这就是因为不知实验的缘故。广东岭南大学的植物教授 Prof. Milure，他化了十几年功夫，把世界所有竹子五百几十种，统种在岭南植物园里，天天观测，数年以后，竹子的性质统被他弄明白了，这才配称格竹子的物。所以实验是近世科学的特长，为中国所无的。至于科学方法即是归纳法与演绎法，以及学者之须善疑，之须深思，则程朱既已倡之于千年以前矣。七八年前国际联盟派了几位教育专家，法国的 Langevin、英国的 Jawney、德国的 Becker 和波兰的 Falski 等来华考察教育，回欧以后，出了一个报告：The Repor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Mission of Educational Experts of China。其中，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说中国一般人士以为欧美的文明，是受近代科学发达之赐，所以中国只要应用欧美的科学技术，就立刻会把中国跻于欧美文明的水平线上，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欧美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产生现代欧美文明，倒是欧美人的头脑，才能产生近代科学。换言之，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好像沙漠里虽移植新鲜茁壮的果树，其萎谢可立而待。我们用许多金钱去买飞机、无线电、电机引擎到一个没有科学头脑的国家，正好像移植果树到沙漠而希望其蕃生。我们一般人的无头脑，可以从一般人的轻信和盲从看出来。民国二十年，山东乡人梁作友冒称富翁，欲捐巨款与政府，一时社会人士多以上宾相看待；“一·二八”〈时代〉〔事变〕日本白川大将被击死的谣言，更哄动一时，甚至各地结队游行，放炮庆祝。到了去年卢沟桥事件发生，神圣抗战开始，各种无稽的谣言更是层出不穷。一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一味盲从，尚无足怪，所可痛恨者，就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自命为智识阶级的人们也毫无常识的一唱百和，这是中华民族前途最危险的一桩事。推究其原因，大学里专重传授智识而不训练智慧是最重要的一个。诸位毕业离校以后，若要发扬光大你们的学问道德，必得能深思、

能善疑，利用实验方法来解决问题，要晓得天下事不进则退，不能发扬光大就是腐化。

最后诸位毕业以后，就得寻一个职业，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许多工厂学校已被毁于敌人炮火之下，机会比平时尤难。望诸位就事，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辽远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新毕业的人，一进社会，就一跃而做一个机关的最高职员，不熟悉机关的内容，不能与下级职员同甘苦，则日后必致失败。俗语有句话说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孟子有曰：“故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篇）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

11月1日 星期二〔宜山〕九点至标营，召集学生在膳厅谈话，到学生约二百人。余讲阳明“知行合一”与“良知”之说。阳明先生发明“知行合一”之说，在于正德初年，时被谪龙场，于动心忍性之余而发现者。至于致“良知”之说，则起于擒宸濠而横遭谤毁之际，时在正德十五六年矣。讲约半小时余。

11月4日 星期五〔宜山〕十一点蒋百里来。晚十点百里患心脏麻痹去世。渠因病耽留此间四天，幸得周仲奇医生为之打Ephedrine麻黄素，得以痊愈，将于明日赴遵义陆军大学。据云现有学生三百人，拟请晓峰前往作短期之演讲，余亦请其来校讲演，并另邀军事教官来讲军事学。谈及抗战前途，据谓西安事变以后，曾有与英国携手之机会，当时曾与主席谈起此事，后至孔祥熙赴英贺加冕典礼，英国尚有意借二千万镑之款，以关税总税务司以英国人任之为条件，但中国未允，此事遂搁置云云。至于甘介侯所云战前俄国曾要求结攻守同盟之约，殊不可靠云。

1939年2月4日竺校长在宜山对一年级新生讲话，阐明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关系。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

佛大学的校训，意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欧美之所以有今日的物质文明，也全靠几个先知先觉，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的精神。

（1939年）2月4日 星期六 下午三点召开行政谈话会。到晓沧、乔年、亦秋、刚复、迪生¹、鲁珍诸人。得教部电，不准浙省设战时大学，并寄协款；但浙大须至浙江招生一次。决请晓沧与叔谅赴浙省设一年级分校。新生中本学期如有五分之二不及格，下学期即入补习班。……七点半至湖广会馆召集一年级全体学生谈话，述浙大校训“求是”的精神与大学新生应有的使命。

2. 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²

（1939年2月4日）

诸位同学：诸君进到本校，适值抗日战争方烈，因为统一招生发表较迟，又以交通不便，以致报到很是参差不齐，比旧同学迟到了一个月，才正式开课。诸君到浙大来，一方面要知道浙大的历史，一方面也要知道诸位到浙大来所负的使命。

浙江大学本在杭州，他的前身最早是求是书院，民国纪元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即光绪二十三年）成立，中经学制更变，改名为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到民国十年，省议会建议设立杭州大学，但迄未能实现，到民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底定浙江，始能成立。合前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而成，所以浙大从求是书院时代起到现在可说已经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到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

1 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安徽宣城人。时任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

2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刊于《浙江大学西迁纪实》（1939年）一书附录第17—22页，原文篇名下记有“二十八年二月四日竺校长对一年级新生训话之笔记稿”。已较前《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2期所载有所修正。其节选文曾以“求是精神”为题刊于《科学画报》5卷21—22合期。

谓求是？英文是 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意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人类由野蛮时代以渐进于文明，所〈倚〉以能进步者全赖几个先觉，就是领袖；而所贵于领袖者，因其能知众人所未知，为众人所不敢为。欧美之所以有今日的物质文明，也全靠几个先知先觉，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在十六世纪时，欧美文明远不及中国，这不但从中世纪时代游历家如马哥孛罗到过中国的游记里可以看出，就是现代眼光远大的历史家如威尔斯，亦是这样说。中世纪欧洲尚属神权时代，迷信一切事物为上帝所造，信地球为宇宙之中心，日月星辰均绕之而行。当时意大利的布鲁诺（Bruno）倡议地球绕太阳而被烧死于十字架；物理学家加里奥（Galileo）以将近古稀之年亦下狱，被迫改正学说。但教会与国王淫威虽能生杀予夺，而不能减损先知先觉的求是之心。结果克卜尔（Kepler），牛顿（Newton）辈先后研究，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而真理卒以大明。十九世纪进化论之所以能成立，亦是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当时一般人尚信人类是上帝所创造，而主张进化论的达尔文（Darwin）、赫胥黎（Huxley）等为举世所唾骂，但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得最后胜利。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我再可以用历史上事实来做几个笃行的引证。十六世纪时，一般人士均信地是平的，地中海是在地之中，所以叫地中海。意大利人哥伦布（C. Columbus）根据希腊哲学家的学说，再加上自己的研究，相信地是圆的；他不但相信，而且能根据他的信仰以达到新大陆。哥伦布的一生梦想就是想到新大陆。但意大利王和欧洲一般人都都不热心，最后还是西班牙王给他钱，装了三船的囚犯，向大西洋冒险出发，卒达美洲，这才可称为“求是”。中国的往史，不乏这样例子，最近的就是中山先生。满清以数百万文化低落游牧部队，灭亡明朝，奴使汉族，以少数制多数，以低文化的民族，来压迫文化高的民族，这是不得其平。但一般人都

敢讲，若有人敢提到兴汉灭满，就是极大的危险。雍正、乾隆两代文字狱是一个明证，至于实行革命，更是难能。唯有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的精神。

浙江大学原在杭州。诸位到过杭州的，晓得杭州苏堤南端有一古墓，是明末张苍水先生（名煌言）的墓。自李闯入京，崇祯缢死煤山，吴三桂请清兵入关。张苍水是宁波一举人，明亡屡起义兵，及鲁王亡，张名振亦歿，而郑成功居海上抗清，受桂王册封，公亦遥奉桂王。其时桂王已势衰走云南，清军方致力于西南。张公遂乘机和台湾郑成功联军攻长江，下芜湖等二十七州县，从镇江直逼南京，以成功轻敌深入，败于南京。公知事不可为，乃潜居于南田小岛上，为汉奸所卖被逮，劝降不屈，从容就义于杭州。他给劝降的赵廷臣说道：“盖有舍生以取义，未闻求生以害仁”，又说道：“义所当死，死贤于生”。像张苍水这样杀身成仁，也是为了求是。

以上是讲到浙大校训“求是”的精神，这是我们所悬鹄的，应视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其次就要讲诸位到本校来的使命。在和平时期我国国立大学每个学生，政府须费一千五百元的费用。在战时虽是种种节省，但诸位因沦陷区域接济来源断绝的同学，还要靠贷款来周济，所以每个学生所用国家的钱，仍需一千元左右。现在国家财源已经到了极困难的时候，最大的国库收入，以往是关税，现在大为减色。其次盐税，因为两淮和芦盐区的陷落，以及两浙两粤交通的不方便，亦已减收大半。在这国家经费困难的时候，还要费数百万一年的经费来培植大学的学生，这决不是仅仅为了想〈把〉〔让〕你们得到一点专门学识，毕业以后可以自立谋生而已。而且现在战场上要的是青年生力军，不叫你们到前线去在枪林弹雨之中过日子，而让你们在后方。虽则各大学校的设备不能和平时那样舒服，但是你们无论如何，总得有三餐白饭，八小时的睡眠，和前线的将士们不能比拟。就和我们同在一地的军官学校的学生相比，也要舒服多了。他们常要跑到野外练习战术，有时四十八小时没得睡眠，整个白天没得饭吃，行军的时候，一天要跑到一百二十里，背上还要负荷二三十斤的粮食军需。国家既如此优待诸君，诸君决不能妄自菲薄，

忽视所以报国之道。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或是旁的国家再也不敢侵略我们。诸位，你们不要自暴自弃说负不起这样重任。因为国家用这许多钱，不派你们上前线而在后方读书，若不把这种重大责任担负起来，你们怎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前方拼命的将士？

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这几点是做领袖所不可缺乏的条件。去年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诺亭亭（Nottingham）开会，他们报告已经出版，在新出的《民族》杂志上，就有一篇简单的节略。从这报告可看到英国的学生觉到，在现时欧洲群雄争长，有一触即发之势。他们所需要，第一是专门技术，使他们一毕业即在社会上成为有用的分子；第二是要〔养〕成清醒头脑，对于世界大事有相当认识。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第三点要能吃苦耐劳和肯牺牲自己，是更不可少的要素。去年九月的明兴（München）〔慕尼黑〕会议就可以作一个很好的例子。明兴会议的结果，无疑的是希特勒很大的成功，而是英法两国的可耻的失败，白白牺牲了英法的与国捷克斯拉夫。但是为什么英法尤其是英国会甘心屈服的？一般人以为英法俄捷四国合起来的军备不及德意两国，这是大大不然。据去年十二月份《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杂志上沙卜德少校所发表的统计，就可知欧洲各大国陆军数如下：

| 国别 | 常备军 | 后备军 |
|----|-----------|------------|
| 德国 | 一，〇〇〇，〇〇〇 | 二，〇〇〇，〇〇〇 |
| 意国 | 五〇〇，〇〇〇 | 一，〇〇〇，〇〇〇 |
| 法国 | 六六〇，〇〇〇 | 五，〇〇〇，〇〇〇 |
| 捷克 | 七五〇，〇〇〇 | 二，〇〇〇，〇〇〇 |
| 英国 | | 一，〇〇〇，〇〇〇 |
| 俄国 | 一，三三〇，〇〇〇 |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

海军则英国三倍于德意志，而意国海军尚不及法，俄国姑不论。空军则战争开始，德国可出三千架飞机，意大利二千五百架，后备者两国合计约三千架，而英法俄最初即可加入七千架，后备三千架。英法既在海陆空三方都占到绝对优势，何以张伯伦会忍耻受辱作明兴之盟。果然如沙卜德所云，德国可以于三个月内征服捷克，而英法俄三国均鞭长莫及。因为俄国须取道于罗马尼亚或波兰，而英法欲救捷克，则非征服德国北部不可，但如假以时日，英法终能取得最后之胜利。而为什么英法竟至屈服，甘弃捷克于不顾呢？这是很显明的，由于英国保守党和一般有资产阶级的人们不肯牺牲自己的安全恬适的生活，来为国家保持威信。所以当八月间欧洲各国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候，英法诸国统下了动员令，起初民气很激昂，但不久因为母别其子，妇别其夫，物价高涨，儿童防德国飞机来袭统移乡下去。一般人民眼看到伦敦、列物浦纸醉金迷笙歌太平的世界，一刹那间就要变成德国飞机轰炸的目的物，于是不到两星期民气就消沉下来。所以等到张伯伦从明兴得到和平回来，英国人民如释重负，甚至感激流涕，而大英国的威信如何，在所不顾了！法国威根将军说，德国这样狂妄自大，着实可恶，而其人民之能万众一心，公而忘私，却值得法国人之钦佩与模仿的。所以做领袖的人物，不但要有专门技术，清醒头脑，而且要肯吃苦，能牺牲一己，以卫护大众与国家的利益。中国现在的情形，很类似十九世纪初期的德意志。德意志自从大腓特烈（Frederick the Great）为国王以后，渐有国家的观念。不久法国拿破仑当国，自从〈1766〉〔1799〕—1810年十余年间侵略德意志，得寸进尺，不但尽割莱茵河以西之地，并且蚕食至于易北河以西沿海一带尽归法国之版图。爱国志士如费希德（Fichte）等，大声疾呼，改良德国教育制度，废除奴籍，整顿考试制度，卒能于短期间造成富强统一之德意志。费希德在其告德意志民众的演说中有云：“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他人，没〈人〉〔有〕上帝，没有其他可能〔的〕种种力量，能够拯救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拯救，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诸位，现在我们若要拯救我们的中华民国，亦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培养我们的力量来拯救我们的祖国。这才是诸位到浙江大学来的共同使命。

(1939年)7月16日 星期日 晨81° 午90° 晚83° 上午晴。下午阴。五点发风，远处阵雨。晚微雨数点，即止。

十二届毕业典礼，共毕业六十一人。……晨六点半起。八点至文庙。今日在文庙图书馆举行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毕业典礼，到来宾雷宾南、宜山县长杨盟、第四中央军校李厚征及杨燊荣(欣)、县党部李主任等。九点举行典礼。首由余报[告]，勸勉学生以出校后须有正确之人生[观]，为名为利均有弊窦，只知为社会服务、不顾名利而自然可得成功。所谓成功亦非名利兼收。古人有不惜牺牲生命而保存其志节、主义，虽身死而志行则亦为成功，如诸葛武侯，中山先生亦即其例也。最后以王文成公答陆文静书所云：“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再次重申求是精神的办学理念，勸勉学生出校后须有正确之人生观，为名为利均有弊窦，只知为社会服务、不顾名利而自然可得成功。所谓成功并非名利兼收。古人有不惜牺牲生命而保存其志节、主义，虽身死而志行则亦为成功，诸葛武侯、中山先生即此例也。最后以王文成公《与陆静元书》所云“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阐明浙大求是精神之精义。

3. 出校后须有正确之人生观¹

(1939年7月16日)

在国家艰苦抗战全民激昂动员之中，学校经过无数颠沛流离而在此地举行毕业典礼，因之我们的仪式不拟有所铺张，但其意义则较之过去更为重大。诸位毕业同学在浙大求学，于兹四年，追随学校播迁由浙东建德，赣南泰和而达广西宜山，真是奔波千里。现在诸君十之八九即将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31期(1939年8月4日)“演讲”栏，系在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演讲时间和篇名见于作者当日日记。

离开学校，依古人临别赠言的先例，谨述感想所及，为诸位将来之参考。

一般人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学得专门之智识与技能，以为将来个人到社会中，从事谋生立业之基础，而为国家着眼，则系造就领袖人才，领导群众以发展事业。但据个人观察，大学毕业生如欲为国家造福，则单求一点智识与技能，尚非最重要的目标；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必须确定，方能使社会事业有格外的成功。诸君在校四年，所接触者多为师长与同学，无尔诈我虞的猜忌。但毕业以后一入社会，则情形大不相同。社会人物，则形形色色，有好有坏，或才智过人而神经过敏，或勇于任事而器量狭小，甚至勾心斗角，混淆黑白，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如果每个人没有一个确定的人生观作为行己立业的指南，则将如一片扁舟，徜徉乎大海，如无舵以驾驭之，必致随波逐流，不可收拾。

诸君一入社会，首先要解决的是衣食住问题，在在需要金钱。若冷眼观察社会，好像钱是万能的，各种享受的东西工具，非钱莫办。钱而且可以攫高位，握大权，甚至左右一国以及全世界的外交和政治。怪不得无论世界那一国，每个人入世以后，他的成功和失败，是往往以他赚钱能力的大小来权衡来估计的，这在西洋各国尤其如此。在美国最成功的人，如洛基斐尔、毛尔根等，统是拥有巨资的人。目前在美国，尽有许多富翁，一方面贩卖钢铁、煤油、飞机予日本，以从事轰炸中国后方手无寸铁的妇孺，赚资数千万，而一方面则又捐款若干万予礼拜堂，因而被一般庸俗人目为最忠实的基督教徒，同时也是社会上最体面的商人。如果每个人对于成功的看法都作如是观，以利为义，则均将变成为富不仁，故以赚钱为目的，则无论什么无耻的勾当都可以做到。如此种观点一日不改，则人类之腐败、残杀，即将永无底止的一天。

一般爱惜体面的人，以名誉第二生命，这是比孳孳为利的已高人一等了。《论语》里有一句话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大家就以为君子亦是爱名。王阳明先生解释得好，以为疾没世而名不称的“称”应读去声，所谓“大名之下，其实难副，声闻过人，君子耻之”之意。目前社会人士往往谬采虚声，在报章杂志多发表文章就可成大名，而埋头苦干的人反默默无闻。因之有多少人，就并不实事求是，只一味标榜，像烘云

托月以渲染自己的名誉，而实际则并无事业可言，所谓称不称，即指此种人而言。在中国有很多办事业、作研究的人，值得赞扬称颂的，而在社会上反无籍籍名。即在粤汉路在敌人轰炸下之维持交通，湘桂路工程建筑的迅速，少数化学工业研究室里的结果，统为欧美人士所称道的，而在国内反因报纸上缺乏宣传，就很少人晓得。本来，闻誉而喜、闻毁而闷亦是人之常情，不过专为求名，在人生观上确是错误。人生目的如为社会服务，则事业的成功，即是个人的成功。现在我国在历史上是为最艰苦的时期，但同时却是青年有史以来最难得的报国机会。我们此后为国家服务，自然最好能直接与抗战有关，否则至少亦得间接与抗战有关。抗战之终结，或尚有若干年，而在此时期中，吾人为了抗战多吃一分的苦，就是抗战以后，在我们的回忆中，可以多得一分快慰。吾人的使命无论如何卑微，力量如何薄弱，只要我们的工作与抗战有关，我们的心力尽了，我们自己就得到了安慰。从国家的立场说，她费了许多人力与财力来创办大学，也就得到了收获。

立定主见在社会上做事，一个人的职业自然赖有专门技能，但尤贵能应用思想。何者为重要，何者为次要，何者为真理，何者为半真理，何者为错误，择其尤善而于自己素性素习最近者以之从事。“足食足兵”是重要的，但是“民无信不立”，信义的重要还要超出足食足兵。换言之，心理建设往往较物质建设尤为重要。若是我们要办一个工厂或一个公司，我们计划不能着眼小者而遗其大者。中国社会上常有一种传说，以为中国政界非常腐败，凡做官的没有不贪污，因之父戒其子师戒其门弟子，以不入政界为高尚。我国贪官污吏确是不少，但是也有不少很廉洁而能干的政界人物，所以说政界是贪污的渊藪是半真理而非真理。目前交通机关认为最头痛的是汽车夫之管理，以为汽车夫专事走私赌博并嗜酒与鸦片，且时予主管机关要挟。实际上在目前各机关之司机，环境既极恶劣，起居无定，睡眠不足，故欲汽车夫行为之改良，必先改善汽车夫之环境，实际汽车夫之大部亦皆忠诚良好之国民。回溯在“一·二八”沪战时，曾有汽车夫将日本军火连人带车开入黄浦江之壮举。贪官污吏之养成，亦是环境为之。近有自安南来者，谓法国税关官吏无

一不受苞苴，上海之敌国税收官员亦然。抗战以前，上海公共租界电车上之售票人，大多数均公然作弊，而且要求乘车者与之通同作弊。其理由是售票人所占之便宜，得诸外国人所开之公司，而非得诸乘电车者。实际电车公司以获利为目的，如售票人舞弊而公司不赚钱时，势不得不增加票价以为补偿，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贪官污吏之心理正与上海电车卖票者相同，以为侵蚀公款并非吸取民脂民膏。近来教育部为救济沦陷区域青年起见，在各国立大学设有贷金制度，使无家可归接济断绝之学生，仍得继续求学，立意本甚善。但苟不严密执行，易滋流弊。有家本小康，其父母不愿子女求贷金，而子女要求贷金者；亦有学生本人本可自给不愿求贷金，而其同学为之冒名代求贷者。凡此皆无非欲占公家之一份便宜，但即此一念，若不防微杜渐，任其推而广之，即足以养成无数之贪官污吏。

所以吾人一入社会，便当立定主意，假想一个吾人理想中之模范人物，照样做去。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这几句话，每个青年应为主臬。像诸葛武侯这样六出祁山，有志未竟；孙中山先生去世之日，军权政权均尚握于北洋军阀之手。诸葛武侯和中山先生，在事业上言，可称为失败，而其精神，可历千百年而愈益光明。古今中外之科学家、文学家以及政治家，往往为主义奋斗，终其身贫无立锥之地，甚至囚虏屠戮，毫不反悔，虽一时身败名裂，而不久其主义卒能大行于世。所以吾人决不能以一时之荣辱，而更变吾人的主张。历史上在宜山亦出了不少人物，外省人来官斯土者，亦不下数百人，但如今统泯没无闻，只剩了黄山谷尚有祠堂和衣冠冢，可称俎豆千秋，这不但是因为他的诗文可以传诸不朽，而〔且〕是因为他的气节，经老死放逐而仍能坚苦卓绝的缘故。总之所贵乎大学毕业生者，在乎其能有独立的人生观，能应用自己的思想，以解决对付一切问题，决不会盲从，或是人云亦云。阳明先生说道：“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又道：“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

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与陆静元书》）浙大之前身为求是书院，希望诸位离校以后，莫忘了母校“求是”的精神。

三、西迁期间的读书笔记

西迁期间，竺可桢在颠沛流离的战时状态中，每抵达一地，首先借阅府志、县志，如《严州府志》《泰和县志》《广西通志》，了解当地的人文史地情况；相对安定后就在图书馆阅读最新的中外书籍期刊，特别关注教育、人文思想和有关日本的议题，思考办学的方针。

（1937年）11月29日 星期一〔建德〕下午阅《严州府志》，知建德之名始于三国孙吴，而严州则始于唐朝。此志系光绪八年版，去年十月间重印，最早之志为绍兴年间印，已不传矣。今志系康熙廿二年郡守任君所辑云。

11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阅《严州府志·人物篇》，严州六县，即建德、淳安、遂安、寿昌、分水、桐庐，因宋名睦州，故称六睦。以人材论，淳安称首，遂安次之，而建德尚屈居第三也。淳安方姓、遂安毛姓皆大族，人材辈出。建德城内有牌坊甚多，系明代建，大抵完好，如严州中学与府衙间之俞稷、俞夔兄弟牌坊，系嘉靖时人。夔曾为布政使，宸濠之乱多保障功，历官江西、湖南诸省。尝建塔于卯巽二峰，称南北二高峰以培文运。其弟稷，曾为河南道御史，著有《西台奏疏》。又府前街有牌坊以表彰毛一瓚，遂安人，万历壬辰进士。又毛一公，遂安人，万历己丑进士，授汉阳推官，升南光禄寺少卿。至清代则有毛际可，亦遂安人，顺治戊戌进士，为《严州府志》总编，通籍五十年无一刺入公门，著有《春秋三传考异》、《松皋文集》、《黔游日记》等等。

12月8日 星期三 唐孟浩然《宿桐庐江》诗：“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

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严州府志·艺文》卷廿六，范仲淹五言绝句有六首，潇洒楼诗：“潇洒桐庐郡，公余午睡浓。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诗〔中〕郡以桐庐名，但实在乌龙山下云。其二：“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使君无一事，心与白云空。”又朱晦菴《题方塘》：“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子所云确有科学理想。苏东坡满江红钓台词：“不作三公，归来钓，桐庐江侧。刘文叔，眼青不改，古人头白，风节倘能关社稷，云台何必图颜色。使阿瞒临死尚称臣，伊谁力。登钓台，初相识，渔竿老，羊裘窄，除江山风月，更谁消得。烟雨一竿双桨急，转头不分青山隔。叹鼻端，不省利名膺，京华客。”

补记：“关于日寇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间事），梅汝写的文登全国政协印行《文史资料选辑》第22卷（辑），1961年10月出版pp.16—36。1937年日寇攻破南京是在12月13号，首先进城是第六师团谷寿夫所率领的。以后六个礼拜就是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时期。这是世界法西斯暴行仅次于纳粹德国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人而且大肆强奸，所有妇女强奸后又被杀死。谷寿夫是敌人的魔鬼头头。而松井石根是当时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也是攻打南京的最高统帅。他是负最高直接负责的人。松井石根所以被列为甲级战犯，而谷寿夫则列为乙级战犯。屠杀最大一次是在12月18日，在下关草鞋峡举行的。倭寇将从南京逃出而被拘于幕府山男女老幼共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全部机枪密扫射而死，事后以煤油焚化。南京还出现有好几处万人坑。日本〔人〕而且以杀人多少作为游戏比赛。杀到100个就登紫〔荆〕〔金〕山拜天皇万岁。日本《广宣报》并为之披露，日本政府反以为耀武扬威。据远东法庭估计，单南京屠杀二十多万人（一说三十五万人，见P35），被强奸妇女二万多。战后松井石根被列为甲级战犯，他是远东国际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审）受审28个日本首要战犯之一。于1946年5月3日开始受审，于1948年8月宣判。判绞刑者7人，有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

武滕章、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另有重光葵、东乡茂德判有期徒刑。其余 16 人如田俊六、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白鸟敏夫等均无期徒刑。松冈洋右（外交长）和永野修身（海相）二人病死于狱中。绞刑于 1948 年 12 月 23 日黎明执行。谷寿夫是乙级战犯，引渡到南京处死的。

（1938 年）2 月 16 日 星期三〔吉安〕阅清宋宗元著《新智囊》。清初苏门孙奇逢常有语曰：“人生系恋者过去，最冀望者未来，最悠忽者现在。”

3 月 10 日 星期四〔泰和〕晚阅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一月份 105 页，有保护牙齿法。保护牙齿六法：（1）每日吃牛奶二杯；（2）吃橘子或番茄汁；（3）晒太阳或吃鱼肝油；（4）不要多吃糖；（5）一日刷牙三次；（6）每半年看牙医。

3 月 11 日 星期五〔泰和〕《泰和县志》：吉安在明代科甲鼎盛，自洪武迄明季世，进士共九百余人。进士拜相者九人，尚书卅人，会元九人，但杨文贞、刘槎翁皆非进士。据郭子章著《吉安贡举考》。

4 月 4 日 星期一〔泰和〕接南昌扫叶山房寄来《江西通志》，系光绪六年重修。《江西通志》在“选举”条下，知江西进士十四府中，自宋以来均推吉水。明洪武迄正统吉安常占 1/2 至 1/3，远超于其他各府。至嘉靖、万历，南昌已足与吉安并驾齐驱。至顺治犹占第一位。康熙以后逐渐衰落，降为第三四位，次于南昌、建昌、抚州、瑞州、九江矣。泰和更甚，昔年每科泰和必有进士，至乾隆卅一年姚颐后迄光绪初年仅七人，即每〈卅年〉〔十六年〕一人而已。

4 月 5 日 星期二〔泰和〕五点至遐观楼。阅新来之报纸，知英美两国虽均有抵制日货之事，但均阳奉阴违。C.I.O.（Committe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工业组织委员会）主张单抵制日本之制造品，英国外〔交〕部暗示人民勿抵〔制〕日货。安望其能有成效耶。

5 月 10 日 星期二〔泰和〕晚阅《知识之路》一书，关于数学部分，昔幼年在唐山有人告以数学上一趣题，证明锐角等于直角，

处处有理，但不解其中错误何在，今阅 Henderson 书，乃知由图之不精密也。

5月12日 星期四〔泰和〕晚阅各种杂志。April Atlantic Monthly《大西洋月刊》Mary Hamilton “J. Ramsay MacDonald”《詹·麦克唐纳》文，知其系一 Pacifist 和平主义者，欧战时受人唾骂。民十年以后顿成工党领袖。民廿年叛党成立〔内〕阁，是年“九一八”之后，亦以氏之主张不抵抗，使美国 Stimson 无法与英合作云。Living Age April, 1938 转载 Far Eastern Review《远东评论》“Japan Will not Collapse”《日本不会失败》文，谓日本迄今战费已筹至七十万万，较之中日之战二万万，日俄之战十四万万何霄壤。但欧战时各国所用战费等于全国富量 National Wealth 百分〔之〕四十六，或全国进款百分之八十一，或每年存款之五倍。日本在民十九，国富为一千一百万万元，百分〔之〕四十六则有五百〔五十〕〔零六〕万万。如每年战费以一百卅八万万元，可支持四年。且日本借战事以增进重工业，未始非福云云。April 2, N.Y.Nation《国家》Japan Faces New China《日本面对新中国》，本年一月日本进口较去年减少 30%，出口减 12%。去年三月至十二月，金子运美凡八万四千万，超出全国 Reserve 储备，物价增 9%，生活费增 10%。

5月13日 星期五〔泰和〕晚阅陈逸民所〔寄〕之《教育通讯》，内载本年四月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之抗战建国纲领。关于《教育纲领》如下：（一）注重国民道德，提高科学研究与扩充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以应抗战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四）训练妇女。此外，尚有《实施方案纲要》，其方针为：（一）三育并进；（二）文武合一；（三）农村与工业并重；（四）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五）对于固有之文化，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整理；（六）家庭与学校教育之联系；（七）自然科学迎头赶上；（八）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九）教育之普及。而其办法则有实行导师制与中学以上学校一律采军事管理，设立最高学术审议机关等。

5月14日 星期六〔泰和〕听马一浮讲“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之说，谓《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盖《春秋》讲名分，而《易》讲象数。自然科学均以数学为依归，其所量者不外乎数目 Number、数量 Quantity、时间与空间，故自然科学之不能逃于象数之外，其理亦甚明显。惜马君所言过于简单，未足尽其底蕴。陈立夫近在《教育通讯》亦主张《易》为自然科学之祖，且谓金、木、水、火、土为五种运动，金则结晶，故向内力；木向上，向外力；火则向上；水则向下；土归平衡。其言殆多误会矣。

5月17日 星期二〔泰和〕阅广东中山大学教育学系〔〕著《战时之大学教育》，其书攻击目前大学之政策而赞扬一般学生，似有取好于学生之意，其心可诛，但其中攻击大学之处亦极中肯綮，目前大学之保守旧有政策，固不相宜也。

5月18日 星期三〔泰和〕阅《教育通讯》第一期，陈东原《教育的新时代》中引朱晦庵“问渠那得清如许，赖有源头活水来”。又谓教育之功在变化气质，确是透辟之论。

5月21日 星期六〔泰和〕下午三点至图书馆。见 *Nation*《国家》所载《美国赠于侵略者之礼物》。谓美国在不断的送给礼物与日本，如去年九月间日本汽油将绝，美国售与二千五百万 gal.，至十一月间又源源供给。若英、美、俄各国能停止供给，则日本之战争乃于短期间内即不能不结束矣。

5月27日 星期五〔泰和〕晚阅 *May Reader's Digest*。其中有医生 Emerson 文讲卫生。谓卫生四大要素，即（1）空气与阳光；（2）适当之饭食；（3）相当运动；（4）足够的睡眠。S. H. Roberts *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希特勒筑起的大厦》书，在此有一〈缩〉〔索〕引，谓 H 之弊在于无直言之人可与之近。国家社会党之主义为 *Weltanschauung* 信条，主要事实为 *Blood & Soil*，分世界为二大种，即 Aryan 雅利安人与非 Aryan 是也。党中专以清党为能事，即 *Black Guard* 是也。H 之意欲收回失地非武力不行。

Dictum of Nazi 纳粹格言：To serve Hitler is to serve Germany, to serve Germany is to serve God.

6月22日 星期三〔泰和〕阅朱子《近思录》，其《格物穷理》一章有：“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物皆知？程子（叔）答曰：怎得便会贯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此即科学上所谓 Inductive Reasoning 归纳推理。又问：“如何是近思？”曰：“以类而推。”所谓以类而推，即是今之 Deductive Reasoning 演绎推理。又曰“学者须先要会疑”，又谓“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察即是 Observation，即观测也。

8月26日 星期五〔泰和〕在 Asia《亚细亚》杂志上见 Pearl Buck 赛珍珠与 J. O. B. Bland 述中国之未来文，Bland 向来即仇视中国，谓中国人之劣根性为贪污，非受治于异族，此劣根性不能改云。

10月8日 星期六〔宜山〕阅庆远中学借来之《广西通志》，知在唐庆远称为宜州，人口不过三千余而已。元代至二万六千，明万历又增至八万余，目今则宜山一县已有二十五〔万〕人矣。宜山文风极不振。明代曾出一冯俊，比阳明先生略早，曾官浙江、两广、四川，官至右副都御史，墓在九龙山北麓。宋、明以来，官宜州者有宋黄山谷、赵抃、冯京及张自明。

10月29日 星期六〔宜山〕晚阅《王文成公全书》。或问知行合一于阳明先生，答曰，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二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去不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行了。

10月30日 星期日〔宜山〕晚阅《阳明先生全集》。阳明先生〔生〕讲“知行合一”，谓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须要澈根澈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何等简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此阳明先生《南赣乡约》格言也。

10月31日 星期一〔宜山〕《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

下，阳明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病。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穷去格物，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是劳思成疾。遂相叹圣贤是做不得的。及在夷中三年，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11月3日 星期四〔宜山〕晚阅阳明先生《全书》，知在南赣日常作《南赣乡约》，于每月望日召集约中人劝善惩恶，及行“十家牌法”。先将各家门面小牌挨审的实，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为某官吏，或生员，或当某差役，习某技艺，作某生理，或过某房出赘，或有某残疾，及户籍、田粮等项。十家编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留县，以备查考。及遇勾摄及差调等项，按册处分，更无耽闪漏脱，一县之事如视诸掌。每十家令挨报甲〔内平日〕习为偷窃者，官府为置舍旧图新簿，记其姓名，姑弗追论旧恶，果能改化者，为除其名，如此则奸伪无所容，而盗贼亦可息矣。

11月26日 星期六〔宜山〕阅邱椿（大年）著《中国教育简史》，登在《教育通讯》上。谓周秦时代孔子门人宰我、子贡、子夏等为客观派，颜渊与曾参为内省派，互为消长。荀子为客观派的代表，而孟子则为内省派的代表。自汉迄唐为中期，客观派综合黄老之学说，以董仲舒为中坚，盛行一时。唐末有李翱创复性之说，渐有趋内省派之势。宋代周濂溪、张载创理学，而内省派乃盛。其中混有不少禅学。二程继之，继为朱熹、陆九渊。陆更为唯心之最纯者。至明阳明光大陆学，及清则客观派又复兴为考据之学云云。其说颇有足取。

12月8日 星期四〔宜山〕阅《新民族》二卷十九、二十期中张昌圻著《国难的病源》，文中批评儒教，谓其缺点为两，一则专重复古，二则以家族为中心。前者使人不谋进步，没出息；后者则使人趋于自私自利之一途，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全是明哲保身。

[此]一段话，〈此〉正与余相合。马一浮讲学问固然渊博，但其复古精神太过，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以为人为非，而为己〔为〕是，则谬矣。

（1939年）1月5日 星期四〔重庆〕中膳后阅 *China Journal*，见一节涉及法皇 Louis 鲁意十四送教士六人至中国。康熙患疟，教士进金鸡纳而愈，以是得信任。又据魏学仁云，日人入南京时大事屠杀奸淫。美国人某以远镜摄得照片，制成影片若干，成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king* 《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一片，其底子现在上海 Bishop Roberts 处，而日本司令某遂以此而撤职云。

1月17日 星期二 阅去年八月 *Reader's Digest* 有 Paul de Kruif 《我们能消灭疟疾吗？》一文，中述金鸡那只能医有疟之人，而不能阻疟疾之散布。1925年德国医生发现扑疟母星 Plasmoquine，此药能杀有性时代的疟菌，但不能杀无性的，故能阻止由人身传至蚊子，而不能〔治〕疟。殆1932年又发明阿涤平 Atebrine 能杀无性疟菌，此药之效用在医药上与 Salvarsan 洒尔佛散即 606 之医梅毒及 Insulin 胰岛素之医糖尿病 Diabetes 同一有效，久吃亦无大害，但使人面暂时作黄色。每天三片，五天服后即能杀身体无性之疟菌。又谓全球因此疾病而死者年三百万。蚊子只有一种 *Anopheles* 按蚊传染此病云。

1月24日 星期二 阅昆明出版之《教育与科学》及《西南边疆》月刊，均为创刊，后者有凌纯声《孟定，滇边一个瘴区的地理研究》。自浙大迁桂，十、十一两个月中患疟者已达146，其中恶性者占百分之七十七。十二月、一月新染者尚接踵而起，合共不下二百起，每一家中几于必有病之人，其严重性可知。而云南孟定之疟更为猖獗，云南人有“穷走夷方急走厂”之谚，就是说，非到穷极无聊遂到夷方瘴乡去。云南人说，瘴有〈瘴〉母虾蟆瘴、螃蟹瘴、蚂蟥瘴等。云南思茅之人口因疟而减少至三分之一，其害曾为不浅矣。

2月16日 星期四 阅新到之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December 2, 1938 《哈佛大学同学会公报》（1938年12月2日），Fairbank 费正

清著 *America's Place in the Far East* 《美国在远东之地位》，谓美国万不能随英国在远东惟利是图政策，应以正义人道为前提而竭力予中国以帮助；谓日本之屠戮中国人民，其罪恶千万倍于德国之驱逐犹太人，真所谓先得我心也。故寄予洽周一阅，以备作一短文登该杂志。

4月19日 星期四 晚阅 E. A. Hooton *Apes, Men and Morons* 《猿、人类与疯子》，Putnam, 1937。最后一章（p. 283）谓黄种恐系人类中之最后发现，亦〈最〉从数方面看来最进步的一种，有大量之脑袋、眉柱不突出、高颊颧骨、低鼻子、唇中等、额尖突、方颚、发深蓝黑色、眼深色、发直而粗，身上毛少云云。

4月21日 星期五 阅二月份 *Reader's Digest*，内有关于 Death to the Killer 一文，谓肺炎每年在美死人上十万，其患者死亡率达 25%—30%，且肺炎共有卅二种之多。最近英国 May and Baker 药房 Dr. L. E. H. Whitby 试验 Sulfanilamide 磺胺至第 693 种始有效，名之曰 Pyridine 吡啶，减少死亡率至 8%，且价极廉，为 1910 年 Paul Ehrlich 发明 606 Salvarsan 之后最大发现云云。

4月24日 星期一 晚阅 Aldous Huxley *End and Means* 《目的与手段》第十二章关于教育一章及第五、六两章。关于教育方面，Huxley 主张 labored，谓工程师不但须知其专门并须知其影响于社会，因目前一种技术之改进往往可以影响及于全球，如 viscose fiber 纤维之发明足以使日本农民破产；铝 alloy 合金发明，与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之征服、与西班牙之内战有关是也。同时学文理者应习一种手艺。又谓文学之所以有教育价值，以其足为人之表率，如德之 Goethe 歌德之维特，Shakespeare 莎士比亚之 Hamlet 哈姆雷特与《三国志》之关羽、诸葛亮是也。又谓基督教从来不教人入慈善之行业，故专以杀人为事之兵器厂主人，只要每星期上礼拜堂亦可做良善之教徒。又谓专制魔王用种种宣传以迷惑，以后甚或用药品以作麻醉剂，如 scopolamine & chloral 莨菪碱和三氯乙醛足以使人易信仰。又谓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初期自由贸易为极盛时代，欧战以后各国逐渐即各自为谋高筑税率以防外货之输入，以是有所谓五

年十年计划，其目的即在战争矣。各国竞谋自足，欲在此时谋和平只有能自给自卫，即广西之“三自”政策也。科学之进步必能使每个大国足以自给，自给即可避免战争。日本、德、意三国之所以不能自给，在其拼命增加军器之故。

5月10日 星期三 阅 *Turner Personal Hygiene* 关于营养一章。谓多病之人最重视健康，人体65%为氧，18%为碳，10%为氢，3%为氮，2%为氯云。每日排水约四磅。所谓 *Glycogen* 乃动物身上之 *Starch*，在筋肉上占1%，*Acidosis* 酸汁过多，由于脂肪之不全养化。钙在人身上需之使筋肉能伸缩而神经不致过敏，磷使血能凝结，铁能使细胞活动，碘则使消化进行无碍，此四种矿质身上不可缺乏云云。

5月16日 星期二 阅《经世》半月刊38期湖南大学教员朱皆平《抗战神圣论》，颇多卓越之见解。谓英文之 *Religion* 翻作“宗教”以后，将其内容重要一部分抹杀，这一部就是生命与真神之联通性，以致我们的认识极为浅薄，以为宗教只是迷信或神秘的东西，但是我国历史上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却是少数富于宗教性的人云云。这正是我今天写信给允敏所说的话，我并举玄奘和爬泰山的小脚老太婆为例。我又说抗战是神圣的，我们用不着问〔抗〕战的结果如何，正如我们不必问我们的生命结果如何一样。虽结果是必败也得抗战下去，好像我们结果总是一死，但人们决不因此而自杀。将抗战和人己的生命不可须臾离，那就是神圣。又说文天祥的物质文明虽是毁去，却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火花，无穷尽的燃烧着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又说我们切不要自外，以为人家的父兄子女被杀害、人家的母女姊妹被奸淫是他们的不幸而是我们的幸运，不特此种幸运为时至短、极不可靠，且此心一发即如佛教徒所说，将坠入畜生道中。又谓抗战神圣的认识有待于国人宗教性的启发。所谓宗教性包含有认罪、归宿与永生三种原素，认罪的心理在中国可说完全没有，就犯了刑戮也不归罪自己，不说家庭失教便说环境不好，罪孽深〔重〕四个字只见之于认闻上作为孝子客气

之谈，实际国家弄到这个田地，谁不是罪孽深重云。又说宗教有一特点就是崇拜者常觉得有一种不可抗的伟大力量，所谓全知全能存在着而觉得自己渺小〔小〕可怜，非向神祈祷，便陷于无依无靠之境云云。

5月17日 星期三 阅 *Turner Personal Hygiene* 关于心脏一章。谓自未生以前以于心脏无一刻休息，而每日所做工作即所 pump 之血液达十吨，因人之血液约占人身重量7%，约十磅左右，而每卅秒钟血液即可循环一次，一 cu. mm. [即 mm³] 血中有红血球约五百万、白血球六千云。又谓 Insulin 胰岛素乃 Pancreas 即胰所制，如胰不能制 Insulin 即不能利用糖类而生糖尿症 Diabetes。

11月23日 星期四 阅《教育通讯》二卷四十二期陈科美《教育与民族性》一文，谓中华民族之根本之特性为反应能力之坚强与消极，如恢复健康能力之大与忍受能力之强，心灵方面有折衷与调和之力量，至于由于适应环境而起之附属特性则有容忍性、保守性、中和性与实现性，所谓实现性即“行乐须及时”、“人生不满百，难为千载忧”、“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日在《教育通讯》上阅陈科美《教育与民族性》一文指出：民族性有根本特性，实际不可变。与教育所形成的附属特性，比较容易改变〔的〕，其说根据 *Le Bon Psychology of Peoples*。陈因之指出中华民族的永久特性为适应环境力之强，而附属特性如保守、中和等则为暂时的，可知中华民族实为青年民族，以其能适应环境也，至于保守性系受环境之关系。

11月24日 星期五 谓中华民族如欲生存于此世界，必须改造其特性，使由被动而改为自动，消极而改为积极。其附属特性如容忍应改为坚忍性，从小就教儿童不畏艰难，养成一种奋斗的兴趣。保守性改为创造性，由创造中得到人生乐趣。中和性改为诚毅性，使有刚果的信念，有独立不移之精神，有此信念则不致于汉奸如毛。把实现性充分的社会化，养成人的同情性，不致养成自私自利的习惯，如对家畜不加以任意伤害等。关于以上诸点，与余意见完全相合，可谓先得我心者矣。

四、西迁期间的重要校务会议

（1938年）11月19日 星期六〔宜山〕七点余至乐群社公祭蒋百里，由委员长蒋派军训部次长黄琪翔为主祭，陪祭者岑兆熊、谢婴白、陈县长及余。……三点开校务会议，报告迁移经过及新生考取情形（计已发表者已达六百余人之多），及师范学院之成立等。次马裕蕃报告廿八年度之预算，计实支六十三万余元，师范学院不在内，若浙省每月补助费不给，则每月经费只三万七千，而薪俸、工资两项达三万五千元云。次及防空问题。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校歌请马一浮制。最后讨论迁移问题。

（一）第19次和第20次校务会议：确定“求是”校训和校歌

竺可桢校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制定的“求是”校训，是结合求是书院的历史和他本人在哈佛的经历，结合王阳明“知行合一”“良知”之说和哈佛大学的校训 Veritas（真理）而确立的。他希望以此激励师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求是”的优良传统，贯彻治学的精义。

浙大迁至宜山后，局势越发艰难，浙大又面临迁移问题。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召集学生讲王阳明“知行合一”“良知”之说，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奋发进取。11月19日下午召开第19次校务会议，竺可桢提出，并经校务委员会成员一致通过，确定“求是”为浙大校训。第20次校务会议上，讨论校歌问题，校歌由著名国学家马一浮作词，国立中央音乐学院应尚能教授谱曲，获得通过，这开启了浙大历史的新篇章。



第 19 次校务会议¹

第 19 次校务会议签名 1938 年 11 月 19 日：竺可桢（校长）、梅光迪（文理学院副院长、外文系主任）、郑宗海（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黄翼（教育系教授）、孟宪承（师范学院教授）、张绍忠（浙大特种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文理学院副院长，物理系主任）、吴钟伟（土木系主任）、蔡堡（生物系主任、教授）、李寿恒（工学院院长、化工系主任）、舒鸿（体育部主任）、夏济宇（列席、浙大军训教官）、马裕蕃（列席、浙大会计主任）、顾莹（蚕桑系主任）、冯言安（园艺系主任）、蔡邦华（病虫害系教授）、陈鸿逵（病虫害系主任）、梁庆椿（农经系主任）、周厚复（化学系主任）、张其昀（史地系主任）、孙逢吉（农学院教授）、郭斌酥（中文系主任）、卢守耕（农学院院长）、杨耀德（电机系教授）。



第 20 次校务会议

第 20 次校务会议签名 1938 年 12 月 8 日：竺可桢（校长）、卢守耕（农学院院长）、张其昀〔史地系主任，王庸代（浙大图书馆负责人）〕、储润科（化学系教授）、费珏（政治经济学教授）、孟宪承（师范学院教授）、郭斌酥（浙大中文系主任）、郑宗海（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蔡堡（生物系主任、教授）、顾莹（又名顾青虹，蚕桑系主任）、陈鸿逵（病虫害系主任）、廖文毅（化工系教授）、杨守珍（农化系主任）、周厚复（化学系主任）、王季梁

1 第 19、20 次校务会议相关图文由浙江大学西迁宜山纪念馆提供。

（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周厚复代）、王国松（电机系主任）、吴钟伟（土木工程系主任）、陈建功（数学系教授）、梅光迪（文理学院副院长、外文系主任）、章用（数学系教授）、夏济宇（列席、浙大军训教官）、张绍忠（浙大特种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文理学院副院长，物理系主任）、冯言安（园艺系主任）、蔡邦华（病虫害系教授）、李寿恒（工学院院长、化工系主任）、张闻骏（浙大机械系主任）、黄中（又名黄君理，土木工程系教授）。

（二）1939 年浙大的校务会议

1939 年一年之内共开了 9 次校务会议（第 21—29 次），为浙大历史上所罕见，说明时局之紧张。出席校务会议的教授成员通常为 24—32 人不等，但前后人员变动达 48 人¹。竺可桢在日记中感叹写下：“近来教职员亦纷纷离去。古人有言：‘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到紧急关头方知谁是谁。”

1 月 20 日 星期五 至校三点开校务会议。余报告赴川、滇、黔之经过。次晓峰报告视察黔中校址。次讨论迁移问题，决定目前宜山照常进行建筑，迁黔之事暂不提。建筑委员会吴馥初报告。次迪生临时提议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与理学院，讨论许久后，大多数通过，以下学年开始。

2 月 4 日 星期六 三点召开行政谈话会。到晓沧、乔年、亦秋、刚复、迪生、鲁珍诸人。得教部电，不准浙省设战时大学，并寄协款；但浙大须至浙江招生一次。决请晓沧与叔谅赴浙省设一年级分校。新生中本学期如有五分之二不及格，下学期即入补习班。……七点半至湖广会馆召集一年级全体学生谈话，述浙大校训“求是”的精神与大学新生应有的使命。

2 月 7 日 星期二 三点开校务会议。讨论炸后校中整理问题。……费香曾、冯言安诸人均主张继续停课，另行物色房屋，疏散上课。讨论甚久，困难在于校舍问题。结果分校为农、工、文理师范、一年级四部，由九人组织校舍委员会，设计疏散。决于明日复课，上课时间由五十分钟减至四十分钟，上午十点至下午二点半

1 参蔡恒胜《我的求是之行——重走浙大西迁路》中第 21 次—29 次校务会议人员出席次数统计表。

无课。此外并组织课程调整委员会，二年级学生由校拨二千五百元、教职员捐月薪十分之一救济。

2月8日 星期三 三点开校务委员会，到雷宾南、刚复、亦秋、馥初、冯言安、张孟闻、晓沧诸[人]。决于明晨如天佳，同往东小江边视察。

2月17日 星期五 三点开校务会议，决定迁移校址至小龙乡之莫村与坝头村；恢复特种教育委员会；组织七人委员修订校中章则；教授出席校、院务会议；由全体教授、副教授推选十人定训导组织，与行政学制并列。

2月22日 星期三 下午三点召开行政会议，讨论学校迁移问题。……余谓如教育部能发给迁移费之一部而能觅得较佳之地点，自然可以再迁。

4月8日 星期六 八点开校务会议。到卅人，决定迁校，拟定云南建水，即日筹备。

4月11日 星期二 两点继续开星期六未开完之校务会议。

4月19日 星期三 四点半开迁校委员会，到梁庆椿、冯言安、沈鲁珍、张孟闻、程耀椿、张晓峰、吴馥初及各院院长，议决派梅迪生赴渝与教部接洽迁移事，如迁滇不成，则依照原议移黔之湄潭及赤水等地。

5月10日 星期三 三点开校务会议，讨论提早结束学期。依原定在七月二十之后结束，余以七月间天气过热，不合于卫生，且学生宿舍过坏，故不得不提早结束。一般欲回沪或浙江之教员赞成是说，而物理、化学、生物三系则以实验不能结束反对之，荃谋反对尤烈。后以折衷办法，大考提前于六月廿六举行，七月间凡不能结束之课程继续三星期，在上午上课，下午休息。

6月2日 星期五 午后四点开迁校委员会，迪生报告去渝之经过情形，以大体而论，赞成湄潭，桐梓专员刘千俊极赞成湄潭。

6月5日 星期一 三点半，至校开校务会议，由迪生报告赴渝、黔接洽经过情形。

7月16日 星期日 今日在文庙图书馆举行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毕业典礼，到来宾雷宾南、宜山县长杨盟、第四中央军校李厚征及杨燊荣（欣）、县党部李主任等。九点举行典礼。首由余报〔告〕，勸勉学生以出校后须有正确之人生〔观〕，为名为利均有弊害，只知为社会服务、不顾名利而自然可得成功。所谓成功亦非名利兼收。古人有不惜牺牲生命而保存其志节、主义，虽身死而志行则亦为成功，如诸葛武侯，中山先生亦即其例也。最后以王文成公答陆文静书所云：“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又刚复代教务长报告，谓本届毕业生仅六十一人，其中女生八人，四年前入学时则有三倍于此之数。毕业证书发给时工学院由马文农接受，文理学院由纪纫容，农学院由郑蘅，郑、纪二人皆女生也。

10月16日 星期一 十点作纪念周，余报告。初述校中状况，谓暑期中不幸讲师陈大慈及学生俞锡南、李秩西等三人〔病故〕。次述职教员中之变动，今年更张最多。教务长郑晓沧（宗海）因病留浙东，以张荃谋（绍忠）继；总务〔长〕沈鲁珍（思珩）辞，以贺壮予¹（熙）继；训导长新聘姜伯韩（琦），不日来校。此外，文理分院以梅迪生、胡刚复为院长；工学院李乔年（寿恒）辞，李振吾²（熙谋）继；农学院卢亦秋（守耕）辞，蔡邦华继；师范学院拟以艾伟（险舟）、王季梁（璉）二人中择一选任，教部尚未复。教员中辞职者有刘弘度（永济）、陈嘉、沈同洽、Mrs. Beauclair、王以中（庸）、贺昌群、蔡作屏（堡）、蒋天鹤、唐凤图、毛启爽、毛燕誉、张逸樵（闻骏）、金秉时、徐右渔、万一、朱亮臣、廖文毅、冯言安、顾莹、孟宪承等等。新聘者有余坤珊、刘之植（节）、张肇骞³、王师羲、侯家

1 贺壮予（1887—1948），字熙。时任浙大总务长。

2 李熙谋（1896—1975），字振吾，时任浙大工学院院长。

3 张肇骞（1900—1972），号冠超。植物分类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浙大生物系教授。

煦、叶允竞、黄人杰、刘馥英、蒋芸生、陈立¹、李相勛²、凌纯声、李凤荪、黄希周、沈尚贤、邴承铨、薛声岳、陈楚珩等等。次述及余川行经过、川南工业开发情形，并希望校中对于广西本地有所贡献。

11月21日 星期二 下午开本届第一次校务会议，到廿八人，至晚九点一刻散会。

11月28日 星期二 四点开临时校务会议，到会员卅二人，讨论应付时局问题，议决迁校，立即筹备。由校派筹备委员会七人，余派定张晓峰、吴馥初、梁庆椿、贺壮予、胡刚复、李振吾、蔡邦华七人，由委员会定紧急处置办法，于敌人侵入武鸣、宾阳线时实行。通知各系将图书、仪器分为紧急与不紧急两部，不紧急者先行起运。对于学生自由停课表示痛心，嘱训导长纠正。直谈至十一点始散。

11月29日 星期三 六点开迁校委员会，到晓峰、邦华、刚复、振吾、壮予、庆椿、馥初，及余与马裕蕃，余主席。决定派晓峰、振吾二人至贵州独山、都匀、瓮安等等地方，觅得150间房屋可为暂避之所，二人有全权决定。派刚复至长安、三江、合江等地，探运行李之路线。教职员家属及女教职员、女生由学校派车运送至相当地点，由黔公路局接送。

12月5日 星期二 五点开行政会议及迁校委员联席会，到刚复、邦华、劲夫、梁庆椿、洽周、伯韩、苓谋、壮予、馥初、振公、诚忘、季梁诸人。

12月7日 星期四 晚五点开迁校委员会及行政会议联席会议，决定旧杂志及重要仪器雇利通公司车运黔。

12月12日 星期二（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发布1823号“训令”，责令湄潭县政府“仰即预为预备”教室宿舍，切实协助浙大迁往湄潭。同日，浙大迁校委员会、行政会议联席会议决定舒鸿等为

1 陈立（1902—2004），字卓如，湖南平江人。心理学家。时任浙大文学院教授。

2 李相勛（1902—1971），教育学教授。

六寨临时办事处主持人，储润科为一年级代理主任。）¹

12月23日 星期六 晚开迁校委员会及行政会议联席会议，决定请刚复、振吾、邦华三人为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即日赴遵。又吴中记依照原合同建筑十七座教室。

12月28日 星期四 五点开行政会议迁校委员会谈话会，决定向部请款为运费，计仪器、书籍廿五万，教职员津贴二万，学生四万五千，合315,000元。

五、西迁黔北的先行准备

（一）竺可桢考察校址

随着时局愈发紧张，竺可桢于1939年2月22日召开行政会议，讨论学校迁移问题。2月23日，借赴重庆出席全国教育会议及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之机，到贵阳、遵义、昆明等地考察校址。竺可桢选校址，优先考虑环境幽美，物价低廉，维持生活较易，特别是能安心办学，进行科学研究。虽然大部分教授都是留学归国，战前生活优越，习惯于城市较好的生活条件，但城市目标大，日机轰炸多，即使没有轰炸，警报一响也得逃往郊外或躲入防空洞，人心不稳。所以，竺可桢倾向于将浙大迁往湄潭，并多次赴湄潭进行实地考察。

（1939年）2月5日 星期日（上午十一时许，日寇飞机十八架以浙大为目标对宜山实施轰炸，落弹118枚，致标营大门、办公室、新建成的礼堂、农场对门新造茅屋顶教室一所以及二年级学生宿舍一所被烧毁，学生122人失去全部或部分行李。所幸浙大师生均安，仅三例轻伤。）²

2月22日 星期三 下午三点召开行政会议，讨论学校迁移问题。……余谓如教育部能发给迁移费之一部而能觅得较佳之地点，

1 括号内容参李杭春《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1936—1949》。

2 括号内容参李杭春《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1936—1949》。

自然可以再迁。次决定疏散各部地点，工学院在乌山尾霸头以西，一年〔级〕自马山荡至下润，文理在中润、莫村，农学院在洞口。

2月23日 星期四（竺可桢校长偕与张其昀赴重庆出席全国教育会议及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之机，去贵阳、遵义、昆明等地考察校址，3月27日返回宜山。）¹

2月25日 星期六 遇皮作琮与技术室主任宋麟生。宋曾为公路局长，且系本省人，渠劝浙大移遵义东一百公里之湄潭。据云其地二三月后可通公路，米粮极廉，且有公路可通思南，以水运入川，并有华姓之大屋云云，此间警察局局长陈世贤即湄潭人，县长为严溥泉云。

2月26日 星期日 余与晓峰至河南路红石街九号周寄梅寓，……据周云，……余询之湄潭如何，渠颇赞成，但主张速迁，迟则运输成问题矣。……出偕晓峰至警察局，晤局长陈世贤不值，至一分所晤其弟陈世哲，湄潭人，谓其地出产甚丰，肉每元可七八斤，鸡蛋每元100个，米二三元一担。有湄潭中学，校长冉牟生号渭若，武昌高师毕业生。县长严溥泉，曾为江阴县长。湄中有学生300余人。其地有水多鱼云云。

2月27日 星期一〔贵阳〕晤周寄梅及朱霁青。周云，如浙大赴湄潭，省府可设合作金库及卫生站。据朱云，湄潭卫生状况并无恶劣之报告，料想尚好云。

2月28日 星期二〔贵阳—遵义〕上午，王克仁来，因昨宋麟生之介，谓瓮安地近平越，且多粮食，故托王赴瓮安及湄潭二地视察，余约其于十号后在遵义相会。……晤其校长傅廷栋（号梦秋），由一国文教员胡家益在校接谈，知为胡家健之妹。未几傅校长来。据云，该校有学生三百人，女多于男，因最近始改初中，本为女中。出至县署晤刘慕曾县长，乃湘潭人。谓全县人口六十万，贵州第一县也，但田赋仅四万五千元。米价每百斤合五元，猪肉每元八斤。女中膳费月四元五角。遵义无电灯，建筑不佳。

1 括号内容参李杭春《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1936—1949》。

6月9日 星期五 偕（张）孟闻、（胡）刚复经独山、贵阳、遵义，赴湄潭就校址堪定作实地考察。

6月14日 星期三 由溪水到湄潭 沿途所经均系石灰岩层，树木尚不少，多柏、枫等，其树均瘦长，与江浙不同。〈马路〉入湄潭境后马路较宽，计十公尺，大部已可通车。湄潭河中有小瀑布颇多。

七点十分至湄潭，即到县府，由县长严浦泉及秘书王君招待。余等四人即住县政府。据严县长云，湄潭有人口十六万，城内一千一百户，教育经费年三万，县立中学有五百人，校长冉君。

6月15日 星期四 在湄潭 晨阴。晨六点起。七点在县长处偕刚复、孟闻、夏雨屏及王秘书、杨指挥、党部秘书等早餐。餐后由湄潭中学冉牟生校长及严浦泉县长偕往至北门外，先至禹王庙，由此过七星桥，绕道至福龙寺，经旧平桥魏姓宅往唐、贺二姓祠堂，向南至冯氏宅，由此经火焰山再至西门，经旧平桥往南至万寿宫，宫外有地十亩，可作操场之用。由此至观音洞中膳。此洞又名清虚洞，内极凉，有乾隆十五年碑，述湄潭县之成立在于万历二十八年，首任县长为杨玉柱。观音洞称八景中之最佳者。

膳后二点又偕县长及冉校长等由原路回城，入南门，至朝贺寺及文庙、男子小学及关王庙等处看屋宇。遇湄松（松桃）公路吴段长及西南建筑公司总经理吴运庚，知湄潭至遵义之公路于九、十〔月〕间始可通车。湄潭方面有桥梁七座待筑，遵义尚全无路面也。

三点半回至县署。应湄潭各界廿一团体欢迎大会，严县长主席，到湄中学生等四五百人。余与刚复、孟闻均有演讲。五点散，拍照。稍息后六点偕湄潭中学应各界招宴。今日天热，而余又伤风，颇难过。在席间遇严持强、周丽中（二人均曾为团长）、杨岳（县中首富杨翰中之弟）等等。八点半回署，由孟闻约冉牟生校长及庶务谈建筑价目。今日所看者共有房子270间。

（二）浙大西迁遵义、湄潭

浙大西迁贵州的决定，是将近一年调研和考察的结果。1939年11

月 24 日南宁陷落，宜山危急。11 月 28 日，竺可桢主持召开临时校务会议，讨论时局问题，议决迁校，成立迁校筹备委员会，由张其昀、吴钟伟、梁庆椿、贺壮予、胡刚复、李振吾、蔡邦华七人组成。派张其昀、李振吾二人至贵州独山、都匀、瓮安等地，觅暂避之所。派胡刚复至长安、三江、合江等地，探运行李之路线。12 月 5 日行政会议及迁校委员联席会议上做了最后决定，议决教职员分别迁都匀、独山、遵义、湄潭。12 月 12 日和 14 日开会，派舒鸿等为六寨临时办事处主持人，胡建人代理一年级主任，并派许侠武前往墨冲，以墨冲或瓮安为一年级集中地点。12 月 23 日开迁校委员会及行政会议联席会议，决定请胡刚复（理学院院长）、李振吾（工学院院长）、蔡邦华（农学院院长）三人为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即日赴遵。

（1939 年）11 月 28 日 四点开临时校务会议，到会员卅二人，讨论应付时局问题，议决迁校，立即筹备。由校派筹备委员会七人，余派定张晓峰、吴馥初、梁庆椿、贺壮予、胡刚复、李振吾、蔡邦华七人，由委员会定紧急处置办法，于敌人侵入武鸣、宾阳线时实行。

11 月 29 日 星期三 六点开迁校委员会，到晓峰、邦华、刚复、振吾、壮予、庆椿、馥初，及余与马裕蕃¹，余主席。决定派晓峰、振吾二人至贵州独山、都匀、瓮安等等地方，觅得 150 间房屋可为暂避之所，二人有全权决定。派刚复至长安、三江、合江等地，探运行李之路线。教职员家属及女教职员、女生由学校派车运送至相当地点，由黔公路局接送。

12 月 3 日 星期日 因涂长望²希望武汉测候所与浙大同入黔。余谓浙大往黔何处尚未定，故不能应允。

12 月 5 日 星期二 五点开行政会议及迁校委员联席会议，到

1 马裕蕃，时任浙大会计室主任。

2 涂长望（1906—1962），湖北武汉人。气象学家。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研究员。

刚复、邦华、劲夫、梁庆椿、洽周、伯韩¹、苓谋、壮予、馥初、振公、诚忘、季梁²诸人。议决教职员月薪在100元以下者，迁遵义、湄潭单身给津贴40元，带眷80元；迁都匀、独山单身10元，带眷20元。男生步行者，贷金生各给廿元（湄、遵）与十元（独、匀），其余学生亦可请特贷金。女生有学校车送，贷金生免费，非贷金生公路局半价。职员押送仪〔器〕每人给150元水运，押车则免费送达地点。教员薪水在100元以下者得预支十二月份薪水。课程于本周内告一段落，下周起另排课程表。

12月10日 星期日 开迁眷委员会，到蔡邦华、陈鸿逵、赵〔 〕、钱琢如³、孙祥治⁴诸人，推蔡邦华为主席。大部眷属均已迁都匀、独山，留者只24家而已。……函李乔年，请其在墨冲筹备一年级教室，并约馥初、亦秋诸人为之助，并请陈鸿逵于明日送眷去都匀之便，嘱其在都匀师范设立办事处。

12月11日 星期一 接振吾、屠达⁵、晓峰等长电及函，知渠等在贵阳亦得宾阳、武鸣失落〔消息〕，并有二日宜山被炸消息，乃长安被炸之误传也。振吾等于十日去湄潭。同时接蔡作屏来函，谓遵义有屋足容浙大，因师范学校可以迁移而子弹库亦可让出云云。湄潭则已有中央机关，尚余之屋甚少。而湄潭县长严溥泉则来函要校中派人前往接洽。

十点作纪念周，余作简单报告，谓一年级已定暂在墨冲，预期于一个月后能开课，并谓本星期起概属自由上课。二、三、四年级已上二个月之课，上礼拜告一段落，而一年级新生则尚未上过课，故不得不从速觅定点。二、三、四〔年级〕拟在遵义或湄潭。

12月12日 晚五点开迁校委员、行政会议联席会议，到苓谋、邦华、劲夫等诸人。报告派舒鸿等为六寨临时办事处主持人，胡建

1 姜琦（1885—1951），字伯韩。时任浙大训导长。

2 王璉（1888—1966），字季梁。时任浙大师范学院院长、教授。

3 钱宝琮（1892—1974），字琢如，浙江嘉兴人。数学教育家和数学史家。时任数学系教授。

4 孙祥治，时任浙大文书组主任。

5 屠达，字耀明。时任工学院教授。

人为代理一年级主任，并决派许侠武前往墨冲。

12月14日 五点开行政会议、建筑委员会谈话会，决以墨冲或瓮安为一年级集中地点，请胡建人不日赴黔。事务许侠武今日已动身。

12月16日 晚五点开行政会议、迁校委员联席会议，决定一年级在宜山上临时课。

12月23日 晚开迁校委员会及行政会议联席会议，决定请刚复、振吾、邦华三人为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即日赴遵。

(1940年)1月7日 星期日 阅蔡邦华来函，知青岩师范屋教厅已允让，故一年级即可往。

1月9日 星期二 接姜伯韩等自贵阳来电，知立夫部长已抵黔，迁校事已答允。但剑修抵贵阳后坚决要一年级至遵义，故姜伯韩、季梁等联名来电主张放弃青岩乡村师范。余复电嘱弗放弃。……五点开行政会议迁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余偕刚复于日内赴贵阳转遵义。

第三部分 浙大的遵湄办学

(1940 年 2 月—1946 年 6 月)

浙大师生抵达遵义、湄潭，标志着浙大结束了颠沛流离的迁徙生涯，开始进入相对安定的遵湄办学时期。有人说，遵湄办学时期是浙大的黄金时代。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在教学和科研上都大有进步。当时浙江大学的数学系和生物系在全国有很高声誉，物理系、化工系、化学系、史地系和电机工程系也很有名。农学院培育出了水稻、小麦、杂交油菜等7个良种和9个优良果树品种，在湄潭成立了农业推广部，对当地农业和茶叶的发展做出显著的贡献，一直惠及今日。浙大的学生在学业竞赛和公费留学生选拔中常常名列前茅，浙大的教授在科研成果评奖中的得奖名额和在中央研究院担任评议员的名额也处于各大学前列。浙大在遵义、湄潭期间不但教学成果突出，而且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物理系王淦昌¹教授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刊于国际著名杂志《物理评论》61卷97期1942年），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生物系贝时璋²教授关于实验生物的研究，谈家桢³教授关于基因遗传的研究，罗宗洛⁴教授关于微量元素和生长素对植物生长影响的研究，蔡邦华⁵教授关于

1 王淦昌（1907—1998），江苏常熟人。核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2 贝时璋（1903—2009），浙江镇海人。生物学家。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浙大生物系主任。

3 谈家桢（1909—2008），浙江宁波人。遗传学家。1980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浙大生物系教授。

4 罗宗洛（1898—1978），浙江黄岩人。植物生理学家。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浙大生物系教授。

5 蔡邦华（1902—1983），江苏溧阳人。昆虫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浙大农学院院长。

昆虫分类学的研究，数学系苏步青¹教授关于射影微分几何和仿射微分几何的研究，陈建功²教授关于三角级数论和复变函数论的研究，史地系张荫麟³教授所著《中国史纲》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⁴此外，在文科、工科、农科等方面培养了很多人才，取得的成果也不少。根据1943年《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在农学院学术报告会上提交的论文就多达85余篇之多⁵。罗登义教授通过对贵州多种水果蔬菜的研究，发现刺梨的维生素C含量尤其丰富，名叫“罗登义果”的贵州名果，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史地系七年中培养研究生29人，毕业5届，共21人，由教育部颁发硕士学位的有9人。编《遵义新志》，编制遵义附近五万分之一土地利用图，在国内属创举。在遵义发现锰矿，是对地方的一种贡献。工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人数居各院首位，遵义工学院的实验室包括了电机系、化工系、土木系及机械系主要课程的实验，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毕业出来的学生为我国的机械、电机、航空和基础建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据统计，在遵湄时期的浙江大学学习的学生或任教的老师，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50余位之多。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博士也曾在湄潭学习过一年。1944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考察中国许多大学后，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又说中国的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可以和西方的牛津、剑桥、哈佛媲美。1946年复员回杭时，浙大已经发展为文、理、工、农、师、法、医7个学院、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180余人，在校学生2243人。浙江大学声誉日隆，成为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

1 苏步青（1902—2003），浙江温州人。数学家。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浙大数学系主任。

2 陈建功（1893—1971），字业成，浙江绍兴人。数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浙大数学系教授。

3 张荫麟（1905—1942），广东东莞人。历史学家。时任浙大史地系教授。

4 参《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5 农业成果可参阅蔡邦华《国立浙江大学最近三年来之设施与研究概况》。



竺可桢（摄于 1940 年）

一、遵湄办学的过程

（一）竺可桢抵达贵州，筹备办学

竺可桢校长于 1940 年 1 月 12 日离开宜山，1 月 13 日晚抵达贵阳，与教育部长陈立夫商讨浙大迁黔的费用。1 月 16 日自贵阳至遵义，与筹备委员会商议办学事宜。

（1940 年）1 月 12 日 星期五 [宜山—独山]

| 时间 | 地点 | 距离 | 高度 |
|-------------|----|-----|-------|
| 8：05 | 宜山 | 0 | 120m |
| 11：00—11：45 | 河池 | 101 | 225 |
| 13：30 | 南丹 | | 660m |
| 15：00—15：26 | 六寨 | 208 | 860m |
| 16：34 | 上司 | | 960m |
| 18：00 | 独山 | 282 | 1010m |

1月13日 星期六 晨自独山出发，晚宿贵阳招待所。

今晚陈立夫部长在省党部招待贵州教育界同人。七点，余等至党部大礼堂，时方入席。季梁、邦华、建人、剑修均在此相遇，并晤立夫及士选、教育厅厅长张志韩及大夏大学欧元怀等。席间与立夫谈迁校问题，渠对于浙大迁校需款至卅一万之多颇为惊异。余谓只要能设法有车辆，则费可省至二分之一。膳后立夫演讲，欧、张二人答辞。

| 时间 | 地点 | 距离 | 高度 |
|-------|-------|------|-------|
| 8：00 | 独山 | 980m | 282km |
| 10：00 | 都匀（到） | 780m | 344 |
| 13：20 | 都匀（离） | 820m | 344 |
| 14：45 | 马场坪 | 920 | 397 |
| 15：50 | 贵定 | 1040 | 437 |
| 17：10 | 龙里 | 1120 | 478 |
| 18：10 | 贵阳 | 1120 | 512km |

1月16日 星期二 自贵阳至遵义 十二点一刻由招待所出发，乘四号〔车〕赴遵义，……五点抵遵义。至环球旅馆，遇晓峰、振吾、屠达诸人。据晓峰云，知立夫于中午过此，即赴遵义师范，全城士绅欢迎。立夫即谓此屋甚佳，可让与浙大，而遵师则可迁至梧村。士绅胡宪之等均表赞同。余疑此乃刘县长慕曾之主张也。

1月17日 星期三 在遵义 八点半偕振吾、屠达、剑修等至新新早餐，并约刚复、季梁、邦华诸〔人〕偕同察勘屠君所租定之房屋。先至北街邮政局，计三楼，每层三间，后面连庇可作教室十三四间。对面易宅亦可出租。次至江公祠，现办一小学，有学生三百人。此处建筑甚佳，且居高瞰下，可望全城。左邻为民众教育馆，旁有岩洞。下山至何家大宅，现租作戏园，可住学生三百数十人。相近有周公馆，可作圉。附近尚有民房可租。由此过中正桥入老城，沿城墙至经纬司，有一宅可作女生宿舍。折入城中县立小学，稍息，遂至遵义师范。该校校长万勉之？不在。共有八个教室兼礼

堂、办公室及寝室，于浙大一年级颇适用。浙大设办公室于此。最初晓峰等初至此，县长刘慕曾即有浙大应以遵师为根据地之主张。及屠达来此，遵师学生即迫令浙大办事处撤消，因恐浙大有鹊巢鸠占之嫌。经屠达解释并保证而止。昨立夫来（大概系受刘县长之暗示），对县士绅在遵师演讲，主张遵师以屋让浙大，而浙大担任梧村修理费给与遵师。

1月19日 与振吾、刚复等商榷，嘱渠等偕剑修、季梁、邦华等于日内赴湄潭视察。

1月25日 星期四 乘公路局姚思濂局长车赴青岩，百川、建人同行。自贵阳至青岩31公里。10：30到青岩。先至真武宫，由张名德、倪振群二人引导视察教室。现因保育院陈维坤带领学生数十住真武宫内，坚不肯让。数次欲以万寿宫与赵公专祠屋与乡师之慈云〔寺〕对调，余前次来青岩时即不允。因慈云寺教厅已允拨女师附小，由张志韩情让与浙大，且该二地不能住浙大三百学生，管理亦不便，故拒绝之。

一点至天津第一馆中膳。膳后晤中大商科毕业生刘文煊，系青岩刘处长家人也。2：36由青岩出发回。3：30至招待所。

1月30日 星期二 在遵义 三点至寰球召集会议，到振吾、蔡邦华、刚复、晓峰、季梁、剑修、屠耀明诸人。……决定二月廿二上课，电知宜山，并在滇川黔垣登报广告。

2月2日 星期五 晚得贵阳电，知都匀仪器十辆已到贵阳，女生已自宜山出发。

开筹备委员会，到振吾、邦华、刚复、晓峰、剑修、屠耀明及陆子桐，决定于阴历年后即派人前往湄潭。

2月3日 星期六 寄电与吴主〔席〕达铨，谓浙大决移湄潭，请其设法令湄遵公路早日筑就。又函教部报告在青岩与遵义开课日期。函湄潭严浦泉县长，嘱其觅一百余家住宅，为浙大移入湄潭之用。又令设觅工人运仪器由遵义至湄潭。十一点半晤陈剑修，请其为主导师。十二点回。……此次遵义地方人士虽云竭诚欢迎浙大

来遵，尽力觅屋，县长犹力言彼可负责，而实际竟无一处公所可拨。何家巷柏氏大宅本做戏园，出租与穷苦之家数十人，每年所得不过二百元，尚且不能收得，而租与浙大则年得 1200 元。兼之破户人家均须由浙大做恶人来驱逐，而修理费五千房东全不肯认。现做办公室之江公祠亦不能出让，必须另租民房与以修理，而晓峰、振吾、剑修诸君尚以为遵义人士真是竭诚欢迎，此真受骗不知中其术。吾则以遵义直无一顾之价值也。

2 月 10 日 星期六 三点开筹备委员会，到晓峰、振吾、刚复、屠耀明、陆子桐¹、季梁、邦华诸人。适刘慕曾县长来，遂将校舍事托彼，渠允于后日召集全城士绅商讨。决定星期一余与刚复、邦华、亦秋诸人出发，乘马赴湄潭，并留农学院助教一人在彼留守。

2 月 11 日 星期日 陆子桐、屠耀明来，知昨贵阳电话谓柳州紧急，宜山教员均已抵六寨，待车去接。女生已启程，但有一车在南丹抛锚。都匀方面无车去接，教职员不能动身。余即电液体燃料委员会，嘱再售汽油 300 gallon，以备交贵州公路局派车去都匀与六寨。

又朱穆伯与郭洽周来。得苕谋电，知桂局转紧，车辆难设法，嘱由筑派车往接仪器。

2 月 12 日 星期一 今日本拟偕邦华、亦秋、刚复去湄潭，但以桂局紧张而留宜山尚有七百余箱之仪器，其中甲、乙（重要而急需者）310 箱，丙、丁两种 413 箱尚未携出，故余思往贵阳办理运输事宜，因此去湄潭之议作罢。

（二）何时在贵州遵义、青岩开始上课？

浙大迁遵义后，于 1940 年 2 月 26 日正式上课。2 月 28 日行政会议决定本学年之学历四年级于 8 月中结束，二、三年级于 8 月底结束，一年级于 9 月底结束。

1 陆子桐（1901—1976），浙江绍兴人。时任浙大总务处事务课员。

2月18日 星期日 在贵阳至青岩 八点偕劲夫、明水¹、彭百川²乘四号车出发赴青岩。途过花溪，见中正公园近已开放。十六号为此间苗人跳舞之期，观者甚众。又因防空学校行毕业典礼，故一年级同事与学生均曾来此云。九点至青岩，即至真武宫，介绍刘明水与纪纫容，嘱交代女生指导事。青岩一年级于九日上课，以真武宫为教室、图书馆、办公室，慈云寺为宿舍，共住280人。现学生到者已361人，其中女生33人。女生宿舍另租民房。物理实验室以一百元一月租彭姓三层楼。金工工场用方言讲习所即圆通寺屋。

二点召集全体教职员会议，到会者卅人。决定招收先修班生二十名，膳宿自理，不给贷金。新生（一年级）于三月八日必须到校。本学年暂定于八月底结束。

王师羲³来，知渠与苕谋各押一车来。自宜山至筑各费2600元，贵出二倍。

2月19日 星期一 贵阳回遵义 余乃至江公祠。阅来往信件，并与蔡邦华及李振吾谈日来此间房屋情形，知廿二号决可开课。学生到者逾四百，教职员八十余人。据吴士选来函，知教育部呈行政院浙大迁移费为十四万元。彭百川与姜伯韩二人均来函辞职。

2月22日 星期四 浙大二、三、四年级在遵义上课。余等寓所自水峒街三号移至碓窝井九号。

2月26日 星期一 马裕蕃、戴绍霆及张苕谋来谈，渠等均于前昨两日到此。……

三点开系主任会议，决定本学年八月底结束。（浙大迁遵义后，即于二月二十六日正式上课。）⁴

2月28日 星期三 下午三点开行政会议，通过本学年之学历。四年级于八月中结束，二、三年级于八月底，一年级于九月底结束。

1 刘明水，时任浙大一年级女生宿舍管理员。

2 彭百川（1896—1953），教育学博士。时任浙大青岩分校一年级主任。

3 王师羲，时任浙大土木工程系教授。

4 括号内容参《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48期。

（三）农学院先迁入，在湄潭恢复上课

教务长张绍忠、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和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在 1940 年 3 月对湄潭进行实地考察。竺可桢校长于 5 月 6 日携胡刚复、蔡邦华、贺壮予、胡建人和舒鸿到湄潭进行三天访问，与湄潭县长严浦泉、遵义县长刘慕曾及地方士绅等落实浙大迁湄具体事宜。5 月 25 日、28 日和 29 日农学院师生分批从遵义赴湄潭，并于 6 月 10 日恢复上课。

4 月 5 日 星期五 北碚 据荃谋来函云，渠与邦华、刚复、亦秋等赴湄潭，十五出发，廿五回遵义。谓该处有地六百方，但全校需 1600，故尚差一千方。但附近 20 公里外有永兴镇，有空屋 200 间亦可用，永兴镇乃贵州四大镇之一也云云。¹

5 月 6 日 星期一〔遵义—湄潭〕今日本只约校中壮予、建人、舒鸿与邦华及刘。以路新成，而所带铺盖不少，乃不乘小车而乘大车，由蒋伯青开往。因是乘车者人乃骤增，计有刚复、胡宪之及县署汤科长、胡君、王君等等。九点始开车。五点半至湄潭，车直开至县城。老平桥已折，只有木桥。晚严浦泉县长招待，并遇杨千夫、何科长及谌科长。

5 月 7 日 星期二 湄潭 七点偕邦华、刚复在县署早餐，同餐者十余人。八点半由冉懋森、杨千夫、田孔皆、何介三等偕同至湄潭参观。同往者刚复、邦华、舒厚信、贺壮予、胡建人及刘慕曾、胡宪之诸人。由湄县中〔街〕即武庙至文庙，现有县党部、民教馆在内，至男小、火药局、财神庙、万天宫、理幽寺、城隍庙，并至天主堂稍息，遇此间司铎戴参化。出至朝贺寺。由此出南民门至万寿宫，参观茶叶公司与农业改进所。遇刘淦芝，为阐明制茶之程序，曰堆叶、卷叶、发酵、烘火、筛叶。本年系创办年，故出叶不多。共用万斤青叶，制茶叶二千三百斤之数。以红茶与龙井及眉珍为多云。出，经老平桥，经贺氏宗祠、大营盘山脉，由北门回城。经七

1 另可参蔡恒胜《我的求是之行——重走浙大西迁路》，3 月 22 日湄潭浙大校址协助委员会会议（湄档案 012—3—001），4 月 11 日张绍忠、胡刚复和蔡邦华给湄潭方面感谢信（湄档案 012—1—001•009•011）。

星桥至玉皇阁，遇卢温甫、曾广琮、尹世勋、许鉴明等。测候所已于四月一日起恢复工作。今日气压687耗，可知此间高度总在800（湄潭）公尺左右也。

一点回至县署。中膳后三点偕刚复、邦华、壮予、建人及舒厚信出东门至山上，又折至北门玉皇观，转至西门至禹王宫。六点回城。七点晚膳在县署，适有边远农村工作团人员来〔募〕捐〈款〉。余捐廿元，为五九纪念周之用。膳后开湄潭浙大迁移协助委员会，到冉懋森、田孔皆、杨干夫、严持强、何介三、卢炯然（冯开宗、何德明）。由严浦泉主席，卢炯然记录。余及刚复、邦华、厚信、壮予、建人列席。议决：（1）湄潭中学与实验学〔校〕合并，由严县长征求地方人士意见后呈厅；（2）由协助委员会觅住宅250间，造册，交浙大分配；（3）贫民住宅在公共房屋须迁移者，给与迁移费每户卅元；（4）县党部让出文庙至城隍庙，给迁移费五百元；（5）民教馆迁移费二百元，救济院二百廿元。

5月8日 星期三 由湄潭回遵义 温甫谈及湄潭物价米每斗（34斤）二元七八，肉每斤四角，蛋一元三十余枚，较遵义为廉。在县署午餐后，余等在县署前拍数照。严县长并将所乘马交刚复一骑，自西门跑至南门，来回二次。于9：05始别严浦泉、杨干夫、何介三、田孔皆等，乘原来国5446黔字车出发。余与胡宪之同坐司机蒋伯青旁，刚复等坐车，刘慕曾又带若干〔人〕回遵义，仓库主任王佛艇及区长王席珍、张科长、董区长亦同回，又加青岩卫生事务所浙江海宁人倪女士。



竺可桢与严浦泉、刘慕曾等在湄潭县政府门前留影（摄于1940年5月8日）。¹

前排立者左起：×××，王佛艇、张杰孙、竺可桢、刘慕曾、胡宪之、严浦泉

车上四人左起：蔡邦华、贺壮予、舒鸿、胡建人

（王佛艇，遵义仓库主任；张杰孙，遵义县政府科长；刘慕曾，遵义县长；胡宪之，遵义士绅；严浦泉，湄潭县长；蔡邦华，昆虫学家，浙大农学院院长；贺壮予，浙大总务长，化学系教授；舒鸿，浙大体育部主任；胡建人，浙大教育系副教授。）

5月18日 星期六 偕刚复至校，遇建人，谈及湄潭校舍问题，以为八训处若一占校，湄潭城厢之校舍断难让出。故不如将一年级或农学院先行迁去。一年级学生四百五六十人（连先修班），农学院134人，差可应付矣。

5月23日 星期四 五点至新亚旅馆晤严浦泉。六点半在平津中国饭店约严晚膳，到林汝瑶、蔡邦华、张荇谋、壮予、刚复、诚忘、振公等。据严云，八训处定二十六号迁湄潭，浙大如欲占有文庙等处，必须先往。故定于廿五日学生（农院）徒步往湄，建人则明日即启行。

5月24日 星期五 胡建人、刘学志、钱日坤等乘车赴湄潭。原拟令建人于十六七号即赴湄潭，而建人必欲带汪同祖赴湄，遂致

1 照片及文字说明参樊洪业、李玉海编著《竺可桢的抗战年代：竺藏照片考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

稽延至一星期之久。而在此时间第八补训〔处〕已奉到军政部可以迁湄之命令，即拟着手迁移矣。

二点半开全体农学院教授会议，到约卅人，讲师、副教授亦到。讨论迁移湄潭问题，最困难者厥惟课程，以农化系为最，故杨守珍¹不主迁移，而徐季丹²则又主张全体皆去。此外，四年级问题亦困难，因四年级只二个月即须毕业，且此时须作论文也。讨论直至六点，结果定学生明日出发，因八训处定廿六即发动也。八点偕壮予与邦华至何家巷膳厅召集学生谈话，到农学院学生百余人，至九点余。余先退。

5月25日 星期六 七点余邦华来谈迁湄潭。农学院学生今日有廿二人偕林汝瑶³乘车往湄潭，拟至三〔都〕〔渡〕关后车即开回，以备明日再开送学生。而第一批学生即自三渡关行二十五公里赴湄潭，预期于明日下午即可到湄潭矣。农化系二、三、四年级拟暂留遵义。林等于上午十点出发。

5月26日 星期日（晚）八点回。遇蔡邦华，谈及农院迁湄潭事。

5月27日 星期一 二点至校。偕邦华至丝绸会馆，晤第八补训处处长陈勉吾。因晨得建人函，知廿四出发，因路难行，并临时须铺石修桥，故当晚宿离虾子〔场〕十八里之子潮沟地方。翌日开老母顶，车不能过，乃宿兴隆场，知八补训处副处长及排连长四五十人已于廿四到湄潭。午间又得昨日出发农学院同学函，知渠等已于廿六晚抵湄潭，占据文庙矣。故不得不与陈勉吾作一接洽。余等至陈处后，渠即谓已得蒋委员长电，令弗去湄潭。故此事乃告一段落矣。

5月28日 星期二 因农四学生不愿往湄潭，昨已派代表来谈，今日又接长函。余又提出讨论。结果农学院教员既不能分开，只有学生随往之一途。其中有特殊困难者另行设法。八点散。回。今日

1 杨守珍，时任浙大农化系主任、教授。

2 徐季丹（1898—1954），时任浙大农艺系教授。

3 林汝瑶（1901—1976），时任浙大园艺系讲师。

又有一批农学院学生廿二人偕张恢志¹前往湄潭。路仍难行，只能至虾子场为止。

5月29日 星期三 今日第三批农院二、三年级学生出发。……林汝瑶来，知今日自湄潭来。在虾子场遇校车，乘之而回。据云全路不能通车。八补训处人已退回遵义。

6月4日 星期二 由贵阳至遵义 未几邦华及林汝瑶来谈，知林将偕汪大同等于明日去湄潭，教授、助教将于六、七、八诸日往，而女生则于八日往，四年级农院学生仍不愿迁往，颇成问题云。

6月6日 星期四 邦华来，知四年级不愿迁湄。余约刘守绩来，责以前次四年级生允如教授不能分，则必迁湄，何以如今又食言。据刘云，彼本人亦愿往湄，但多数学生以去湄为蔡院长之主张，教授本有四年级不必去湄之说，故犹豫。余允明日十二点半召集农四学生谈话。

6月7日 星期五 十一点半召集农四学生谈话，〈余〉〔以〕渠等尚欲留遵义也。到三十余人，余为解释迁湄之经过，以及各教员均主张农院二、三、四除农化〔系〕外全体迁湄之事实，而四年级学生仍以为令四年级迁湄乃邦华个人之主张，大是误会，不知其中有何其他原因也。

6月8日 星期六 又陈鸿逵²及彭谦³来，知农学院四年级生经余昨下午谈话后仍议决不往湄潭。少数学生虽愿往，但以大多数议决通过，不得不坚持。但经陈鸿逵从中斡旋，知学生难以下台，愿为转达学生方面欲留熊同和⁴、陈鸿逵、石桦⁵、梁庆椿、孙念慈⁶等五人至月底，且须留书籍仪器。此明是闹意气之事。因二、三年〔级〕从学校之命迁往湄潭，不能令彼等长此旷课也。故余只允念慈、鸿逵

1 章恢志（1911—1991），浙江永嘉人。时任浙大园艺系讲师。张系误写。

2 陈鸿逵（1900—2008），广东新会人。植物病理学家。时任浙大病虫害系主任、教授。

3 彭谦，时任浙大农化系教授。

4 熊同和，时任浙大园艺系副教授。

5 石桦，时任浙大农学院农经系副教授。

6 孙逢吉，字念慈。时任浙大农艺系教授。

二人留至二十号，而四年级全体学生亦一律须于二十号以前往湄潭。

6月17日 星期一 诚忘初自湄潭回，知农学院二、三年级已于十号在湄潭复课。

（四）一年级迁永兴，理学院及师范学院理组陆续迁湄

农学院迁往湄潭后，9月19日召开各院、系主任会议，议决下学期一年级迁永兴、生物系迁湄潭。一年级新生于1940年11月底迁至永兴，29日开课。理学院生物系迁往湄潭。而理学院其他部分和师范学院理组则在1941年6月至11月陆续迁湄。

9月19日 星期四 三点至柿花园一号开有关各系、院主任会议，到各院院长及壮予、香曾、乔年、吴润苍¹、杨守珍、谈家桢、张晓峰、郭洽周、黄羽仪诸人。议决下学期一年级移永兴，但二、三、四年级文、理、师范不能分离，故非在一起留遵义或迁湄潭不可，二者之中权其较为便当者。决议仍留遵义，惟生物系迁湄潭。在一个月中必须在遵义设法租150〔人之〕宿舍及136张双人床。²

10月1日 星期二 四点开行政谈话会，决定请振吾赴青岩料理一年级结束事。据振公报告，谓于一个月短期内欲在遵义办理二三百人增添之住宿已困难，所幸在车站附近有新屋将成未成者出租，十六大间，房租月250元。而桌、椅、床待制须四千元之谱。最困难者厥为运输问题。因青岩校具仪器有六箱，学生、教职员五百余人，而由遵义往湄潭亦有仪器八十箱，教职员眷属行李五六车，此为最困难之问题。

10月6日 星期日 在湄潭 八点半偕建人、季梁、迪生及冉蔚若乘车赴永兴，二十六分钟即抵永兴场。往万寿宫及两湖会馆，前者修理已达大半，大门及九皇阁之图书室均修好。大门本系后门，

1 吴耕民（1896—1991），字润苍，浙江余姚人。园艺学家。时任浙大园艺系主任、教授。

2 另参陆昌友执笔《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记略》：同日，竺校长致函省教育厅，告之一年级和先修班即将从青岩迁出，请派员对青岩校址接收。

因门前有大操场，环境较佳，不如前门市场之喧闹，故改之。万寿宫除图书馆、四教室、膳厅外，可住学生三百人。楚馆住学生一百卅人外，可有二教室。财神庙则作实验〔室〕。故大致有420人可容纳。目前所派新生564人，若打一八折，亦只460左右而已。

七区第一联保主任张美洁来，在江西会馆（即万寿宫）中膳。膳后前商会会长李金成、罗祥文及永兴纱号经理赵树云来。余托彼等以二事，一则五百学生来自遵义，至永兴人可步行，行李须挑。拟利用由永兴担纱至遵义之回空挑夫。据赵云渠行每逢场后（永兴二、七逢场），即派本地挑夫数十人于三、八两日赴遵，三站三日可到，逢一、六可回。去遵义每夫十四元，系在遵义石柜台和成纺号交货。回时挑夫徒手，故价可廉。余允以每夫九元（三元一站）。但希望其致函与和成之经理童用成。其二点则拟在江西馆后租地二十亩，作为勤工俭读学生之用以作菜园，俾一可以工读，而以一面可以得廉价之菜也。罗祥文、张美洁允与地主商之。四点半由永兴场出发回湄。

10月14日 星期一 苕谋偕润科来，嘱润科任一年级主任事，像建人既兼实验中学主任，又兼筹备处主任。

12月1日 星期日 晨钱琢如来。据云永兴一年级廿九开课。

12月11日 星期三 六点半召集一年级谈话，到四百四五十人。余告诫同学以浙大过去学风以诚、勤、俭三字。谓师生一向以诚相见，老师均极认真，故功课甚忙，而家境大抵清苦，故能耐劳而俭朴。最后告以编级考试于学生方面有益无害，劝彼等弗坚持。且储主任及教授已考虑再三，决不变更主张。如再不考，即解散亦所不惜。计费时约二十分钟。

十点召集在永兴一年级教职员谈话会，到琢如、润科、阮季侯、祝廉先、费特生、高尚志、许侠武等三十余人。议决关于编级考试未举行前决不开课，令学生于明日向各教授声明愿受试，否则除名。即推祝、钱、储三人草出布〔告〕，由祝廉先主笔，措辞极为和平。

（五）浙大迁湄决策过程，形成遵义主校区和湄潭分部两校区

竺可桢校长两次考察湄潭，重点考虑环境、物价、交通和生活条件，学生能否安心学习，教师能否安心教学和进行学术研究。1940年6月22日第32次校务会议几乎全体通过，浙大迁往湄潭。11月1日浙江大学新学期分别在遵义、湄潭正式开学。11月29日浙大一年级在永兴开课。1941年6月7日第99次行政谈话会，决定下学年除机械、电机、土木二年级留遵义外，其他专业二年级迁湄潭，理学院及师范学院理组三、四年级亦迁湄潭。文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组留遵义。形成浙江大学遵义主校区和湄潭分部校区。

5月9日 星期四 壮予、建人¹，决请建人赴湄潭为筹备主任。

5月10日 星期五（三点在何家巷开行政会议，讨论湄潭迁移问题、防空设备问题。分开后门，筑防空壕，装电话及演习水龙等四项。）²

6月10日 星期一（农学院正式迁入湄潭，开始上课。）³

6月22日 星期六 三点至江公祠。开第卅二次校务会议，决定：改行政会议为行政谈话会，大学迁移湄潭。此二事费三小时。次讨论教职员待遇问题，时已七点半，乃晚膳。膳后继续讨论。为教员薪给问题讨论几二小时。决计讲师140元起薪，助教七十元起薪。直至十一点始散。计开会七小时，而吃饭一小时尚不在内也。迁移湄潭，文学院郭洽周、缪彦威⁴、陈剑修⁵及周载之⁶（理）〔反对〕，而此四人均未到过湄潭。而许多人均以下半年不能迁移为言。余几次说明，谓现在须决定者为迁湄与否是永久计划，如决定后即可逐步

1 胡家健（1903—2001），字建人，安徽绩溪人。教育家。时任浙大教育系教授。

2 括号内容参陆昌友执笔《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记略》。

3 括号内容参陆昌友执笔《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记略》。

4 缪钺（1904—1995），字彦威。时任浙大中文系副教授。

5 陈剑修，心理学家。时任浙大教育系系主任兼浙大主任导师。

6 周厚复（1902—1970），字载之。有机化学家。时任浙大化学系主任。

办去，非谓下半年决迁湄潭也。结果由费香曾¹提议决迁湄潭，几于全体通过，而当初发言之郭、周诸人则皆反对迁湄潭者也。

8月10日 星期六 今日开建筑委员会，决定在玉皇观（湄潭北门外）旁造宿舍四幢，每幢容144人，七开间，二层楼，每间容12人，走廊放前面，由曾子泉打图样。另造膳厅及女生宿舍一幢，并请刚复作一永久校舍计划。今日函储润科，嘱就一年级主任事。

8月14日 星期三（竺可桢校长致函贵州省教育厅，告之原定暑期迁移湄潭新址，前借遵义师范校舍当即交还。但因湄潭校舍建设工料两缺，迁校尚需时日，所用师范校舍一部分，仍需继续借用。）²

8月15日 星期四 至柿花园一号教职员俱乐部开校务会议，因到者不及法定人数，故改谈话会。余首先报告校舍，招新生，及彭百川、姜伯韩辞职问题，及费香曾之任训导长。次及经费方面，近教部拨三十万四千作为添办电机、机械双班之用。次讨论来年学历，决定十一月一日开学，四日开课，下年七月十二放假。次张蔭谋报告本届毕业生可毕业者116人，尚有教育邬仲卿、数学郑锡兆、土木周邦立以学分不足不能毕业。此外机械沈承书以成绩过差自愿以借读生资格毕业，史地赵和铃亦有问题。尚有论文未交或考卷未阅者若干人。又蔡邦华报告湄潭筹备近况。

9月3日 星期二 九点开行政谈话会，到振吾、邦华、迪生、刚复、季梁、香曾及壮予诸人，讨论学校经费状况。本年四月份全校教职员月薪只三万三千元（连青岩而龙泉不在内），但至八月增至四万七千元。现每月经费只五万三千元（尚有六千增班费只可抵龙泉分校，尚嫌不足），故只余四千元，适足以付校工工资而已。每月办公费总在一万二三千元，不在内。至于运费与仪器书籍购置费更谈不到矣。本年增办电机、机械二班后，可增六万元，每月五千元

1 费巩（1905—1945），字香曾，江苏吴江人。时任浙大政治经济学教授，后接姜琦任训导长近一年，并兼主任导师。

2 括号内容参陆昌友执笔《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记略》。

之数，亦属杯水车薪，故下年度非大增预算不可。其次则谈及湄潭建筑问题。

9月6日 星期五 四点今日湄潭第一期校舍投标开标，同时遵义次东门外工学院工厂亦开标。计到各院长、三处处长与建筑委员会。

9月10日 星期二 遵义湄潭公路今日通车。

9月12日 星期四 至何家巷。与建人、刚复、曾子泉三人商后，与贵阳建筑公司订湄潭建筑第一期草约。计男生宿舍四所，女生宿舍一所，共洋八万六千余，于订草约后二星期开工。开工后六十晴天完成二座宿舍，一百晴天完成全部，即付与洋一万元。待合同订成已十一点，即偕刚复、建人与香曾三人乘车出发。一路极为平顺，青神桥与王家坝桥均已修好，计74公里。于一点到湄潭。途中柏树叶已红，田中稻黄可割。路尚佳，惟弯曲甚多，而坡度亦不甚佳。

抵湄潭县城后，即见西门内之文庙上写“浙江大学”字样，颇为醒目。遇邦华、壮予诸人。文庙内现前进住女生，中进为职员膳厅及办公室、医务室，三进为校长办公室、图与测量队。后为大殿，最后住工友。中膳后，偕梁庆椿、香曾、壮予、邦华、建人等先至财神庙。此处现为农院实验室及教职员住家眷之用，将来拟为教室，可作十二个教室。次至梵天宫，现男生住此，可住一百二三十人，现只八十人，故觉舒适。此间空气清新，地方高敞，胜于何家巷多矣。次至理幽寺，已为县党部，其前进之城隍庙则为商会、民众教育馆等等，原均在文庙，由文庙移来者。自此至朝贺寺，拟作为单身教职〔员〕住室，可住二十人之谱。

9月13日 星期五 七点半偕汪大同、建人、刚复、香曾等五人乘1935号校车赴永兴，计共二十公里。在中途流河旁之葡萄井略停，其水极清冽，下有气泡，渐上渐大，形如葡萄，故名。八点即至永兴场。今日适逢赶场日（二、七赶场），余等到尚早，故人尚不多。迨中午则人拥挤不堪，即至江西会馆浙大办事处。遇教官黄靖

及朱兆泉二人。时正有木匠二十余人在彼赶工修理，预期于一个月可以修竣，住学生三百人，并做饭厅与圉。此外，则尚〔有〕三楚会馆可以住一百五十人。江西会馆之旁有区公所，区长（第七区）刘瑞伯索价700作为修理费始肯让。余与建人与刘晤面后即至财神庙，此处可为实验室。至于教室，则须在南华宫，但现为区党部所占（原为女小），余等未入内。尚有四川会馆亦可商让。木凳桌椅已由建人委附近各保制造，十月间可以竣事。此处黄靖及朱兆泉经胡建人与汪大同之监督，均能尽力做去。

9月14日 星期六〔湄潭〕晤杨端楷县长，其人较严浦泉年轻，而说话不及严之肯负责任。关于湄中合并问题……七点与学生谈话。余谈约四十分钟，次由刚复、香曾各讲二十分钟之谱。余讲迁湄潭之经过，及此后迁移之次序及计划。首文理师范，次工学院，最后一年级。然后说及在此间安定后，一应研究，二应作推广工作，与地方人士要能合作。最后谈及合作社与圉借书问题。九点请梁庆椿、蔡邦华、建人、刚复谈，至十一点半散。

9月15日 星期日（下午一点，偕壮予、建人、刚复、邦华前往湄潭县政府，列席“浙大迁移协助委员会”由杨端楷县长主持召开的“湄中与浙大合并”会议，议决由浙大租塔坪山下学田及湄潭中学合办等事宜。）¹

10月5日 星期六〔遵义—湄潭〕偕迪生、季梁、彬彬乘1935号车赴湄潭。

未十一点即至湄潭。晤蔡邦华、胡建人，未几华寿言、张济时、冉蔚若均来。十二点中膳。膳后偕建人至中学，知湄潭中学于一号始接收并合于实验中学，现定七号报到，十三、四注册。十一一起湄中旧生编级考试，十五起上课。教员多已请就，惟数、理、化及体育、音乐、劳作乏人。拟请农院助教兼教。湄中旧教员无一留者，湄中学生607人，此次愿编级者预料不过四百人左右，共七班。初中二、三各春、秋两班，一年级春季三班，再加新招之实中初一、

1 括号内容参陆昌友执笔《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记略》。

高一各一班。湄中旧有县经费全部贮存，作为将来恢复湄中之基金。惟省府津贴每月六百元，则由实中应用。原有校址尚可应用，惟设备则绝无仅有而已。现新招实中学生已到二人，由遵义步行而来者。

三点偕建人、蔚若、迪生、季梁、杨守珍等赴玉皇观新宿舍，见男生宿舍四座之地址已排定。所收地计刘吉阶及杨姓、明姓地约四十亩。树木到者已千余根。最近来桁条一千二百根，直径四五寸，木价每根二角，工价三角，故每根只五角而已。而包工估价每根总在三元。此桁条来自一区，需四天下水。每人以五根木连在一起，顺流而下，故每工实只四角而已。至于较大之料，直径一尺者，每根六角，而运输之工价视地之远近而定。

10月7日 星期一（国立浙江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湄潭中学校址开学。）¹

10月14日 苕谋偕润科来，嘱润科任一年级主任事，像建人既兼实验中学主任，又兼筹备处主任。

10月15日 星期二（青岩一年级学生400余人，因车辆缺乏，于今日启程，步行来遵义，第一日宿贵阳，第二日宿扎佐，第三日宿息烽，第四日宿乌江渡，第五日宿新站，第六日抵遵义。浙大为之分别致函贵州省政府、贵阳、息烽、遵义等县政府，沿途妥为保护，予以便利：同时，在北大路〔今延安路〕口汽车站附近租得民房一幢，设立学生第三宿舍。）²

10月18日 星期五（湄潭永兴一年级新生开始注册入学，储润科就任永兴分部一年级主任。）³

11月1日 星期五（浙江大学新学期分别在遵义、湄潭正式开学。）⁴

11月29日 星期五（浙大一年级在永兴开课。）⁵

1 括号内容参陆昌友执笔《浙江大学遵湄日程记录》。

2 括号内容参陆昌友执笔《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记略》。

3 括号内容参陆昌友执笔《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记略》。

4 括号内容参陆昌友执笔《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记略》。

5 括号内容参陆昌友执笔《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记略》。

12月14日 星期六 三点至柿花园一号开校务会议。今日因讨论校舍迁移问题，故到者特多。上学期曾议决校舍以集中湄潭为原则，但近来有文、工二学院教授以遵义已可安居，不愿再事迁徙，且各人经济状况均极困难，更不愿再动。余不愿以贯彻个人之理想而使大家破产，故将此议案重新提出。开会如仪后，由余报〔告〕学校经费及建筑问题。次马裕蕃报告经费数目。张荃谋报告学生人数，到校者湄潭、永兴、遵义人数1335人，截至十二月十七日止，尚有新生（理院）六七十人未到。已到之1335人中有女生124人。以院分，则文学院97人，理学院147人，工学院605人，农学院200人，师范院144人。次周克英报告图书馆状况，谓抗战后离校教员所携去书籍计达400本，即从去年七月到本年十月间全校所购书籍尚不达此数也。报告毕，讨论迁移问题，自四点至十点。以大概而论，文、工二院欲留遵，理、农主张迁湄。说话最多者有剑修、晓峰、洽周。钟韩¹主留遵，刚复、朱正元²、邦华、建人主迁湄。因郑重起见，暂不表决。

（1941）年6月7日 星期六 三点在碓窝井寓中开行政谈话会，决定下学年助教以100元起，教授最高加至420元。校中每月亏负〈月〉三四万元，薪水一加则又须加一万元一月之亏负也。决定下学年二年级迁湄潭，除电机、机械、土木二年级来遵义，理院及师范理组三、四年〔级〕去湄潭。

6月20日 星期五 四点开行政谈话会，讨论四年级统考问题，现贵阳医学院、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均已先后〔 〕。中央大学，据厦千来函，亦定二十起总考。而本校学生尚未接到中大复电，故仍取观望态度。次谈及迁移问题，余主张理学院三、四年级留遵，二年〔级〕集中湄潭，与刚复言语中发生冲突。六点〔散〕，心中大不怿。

10月18日 星期六 知化学系三、四年级生因刚复之意已移湄潭。

1 钱钟韩（1911—2002），时任工学院机械系主任。

2 朱正元（1900—1985），字善培，江苏南京人。物理教育家。时任浙大物理系教授、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

10月26日 星期日 八点至柿花园一号参与化学、化工、农化、理化〔指师范学院理化系〕四系主任会议，讨论化学系三、四年级是否迁湄潭及化学药品、仪器支配问题。

到王葆仁¹、李乔年、杨守珍及王季梁，列席者赵凤涛及士楷。因王葆仁之坚持，化〔学〕系三、四年级仍回湄潭。

（六）1941年年底浙大教职员及学生人数²

1941年年底浙大报教育部人数统计：

教员 229 人（女子 21 人），计教授 81 人，副教授 26 人，讲师 42 人，助教 78 人，兼任者 1 人。以院别分：文学院 43 人，理学院 63 人，工学院 49 人，农学院 44 人，师范学院 12 人。

职员 143 人（女子 16 人），计校长室 3 人，教务处 24 人，训导处 25 人，总务处 65 人，主计 14 人，技术 12 人。

学生共 105〔？〕人（女子 93 人），一年级不在内，龙泉除外 1048 人。以年级分：四年级 254 人，三年级 373 人，二年级 406 人。以院别分：文学院 95 人，理学院 126 人，工学院 485 人，农学院 202 人，师范学院 140 人。

二、遵湄时期的案件

（一）滕维藻、潘家苏案及其他

1942 年 1 月 16 日，浙大部分学生受西南联大的倒孔运动的影响，在遵义发起了游行。竺可桢为防止学生与警方冲突，出面劝导。事后一面告诫学生，一面至警备司令部解释，事件得以解决。竺可桢对滕维藻、潘家苏案，深入调查，发现湄潭党部叶道明有意诬害后，竭力营救。派蔡邦华带函去贵阳面见吴鼎昌主席。亲赴重庆晤调查统计局局长徐恩曾，

1 王葆仁（1907—1986），字爱予，江苏扬州人。高分子化学家。1980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浙大化学系主任。

2 参《竺可桢全集》第 8 卷第 239 页，1941 年读书笔记。

谈滕维藻、潘家苏二人问题。1942年2月21日，遵义警备司令部拘捕浙大国文系四年级学生何友谅和史地系三年级学生王蕙，指为共产党，不久即解赴贵阳党部。竺可桢于5月24日去贵阳看王、何二人。不久，王、何二人被押赴重庆五云山。竺可桢于1943年春去五云山看他们时，只见到了王蕙，未见到何友谅。王蕙被释放后转学到复旦大学，何友谅却不知下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获知何友谅已被杀害。竺可桢作为校长对学生非常爱护，被学生誉为“浙大保姆”。

1月15日 星期四 子夜十二点三刻振公来报告，学生明晨将游行，为驱孔祥熙事。

1月16日 星期五 晨六点起，即至子弹库。时陈庸声¹、张苍谋、振公、大同²已到，季梁、迪生、振吾亦来，商谈阻止学生游行事。以此事为西南联大所发起，而教部已来电阻止也。当决定如通知警备司令以武力制止未始不可，但难免不发生冲突，故决计出以劝导方式。令大同至专员公署见高文伯，嘱兵警维持秩序。七点，余等至何家巷劝阻，晓峰尤诚恳解释。余晓谕以守法，不听，自七点半至九点半无结果。余适得步兵学校张卓电话，知渠于前夕返，乃赴步校嘱军警弗与学生冲突。十一点回。至中正桥见一人被警捉去，但旋即释。三点开行政谈话会，决定告诫学生，并将刘纫兰、张由椿、俞宗稷、邵全声记大过。邵以已记二次须开除。女生谢福小过一次。四点至警备司令部开会，初颇严重，经余解释始晓然。

1月17日 星期六 中午学〔生〕吴继宗来，谓学生二百余人签名挽留余辞职，因渠等知余已电部也。余切嘱不得开会，且学生亦不能挽留余辞职。……

十六日学生游行所发传单攻孔，谓飞机去港接洋狗，而吴稚晖全家、胡宗南、王儒堂、王宠惠、郭复初均不得出。全系谣言也。

1月18日 星期日 此次驱孔运动左派学生活动者，遵义陈天

1 陈庸声，时任浙大公共科目社会学讲师。

2 汪同祖，字大同。时任浙大外国语文学系副教授。

保、董维宁、陈立、陈海鸣、王天心，湄潭张秋芳、李学应、钱念屹、滕维藻¹及教员黄川谷、潘家苏。接到联大苏生（希旗）之信者为刘玉钊，制油墨发传单者伍学勤。又黄川谷常得共产党大批接济云云。

1月19日 星期一 十点半至庆华戏园纪念周，……余训斥学生星期五游行举动，大意谓大学之尊严由于学生能自治，德国为一例。学生不能安分守己，必召军警干涉，且述所发传单中关于吴稚晖全家自杀、王宠惠、胡宗南、郭复初在港被拘之无稽。训勉学生务须保守秩序，奉公守法，以求是为精神。

1月22日 星期四 下午高专员来，知湄潭反动标语已在南门外滕维藻、潘家苏²寓中搜得油印底稿，高询余如何处理。余谓危害民国举动，学校不能为之保障，故今晚或须捉人。据大同云，建人电话谓滕声辩以叶道明藉调查人口为名入内搜查，将印刷品带来，指为搜出之件，但来搜者不只叶一人而已。开行政谈话会，至六点回。

1月23日 星期五 八点半往水岙街十四号高专员寓，知在公署。至县公署与文伯谈滕维藻、潘家苏寓中被抄出传单事。高以三传单示予，均系反蒋倒孔者。第一次宣言系述香港飞机带狗事；第二次阐述第一次之宣言；第三次宣言则赞扬永兴开大会，而骂湄潭自治会者。潘等寓中所搜得乃第二次宣言稿，其时彼二人是否逮捕尚不知。余回校。大同告余，始知潘与滕均移入校内，遂使交人之责在校，余乃不得不赴湄一行。十一点半回。中膳。一点偕晓峰、振公二人乘宝兴车出发。三点半至湄潭。邦华、刚复、建人等在农场相候，即至农场聚谈，又到孙斯大、梁庆椿。决定今晚由余与庆椿、邦华偕潘、滕二人回遵，后以汽车灯黑不果。

1月24日 星期六 由湄潭返遵义 偕邦华、庆椿、滕维藻、

1 滕维藻（1917—2008），江苏阜宁人。经济学家。时为浙大农经系学生。被释放后于1942年毕业，考入西南联大研究院南开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46年后在南开大学任教，1981—1986年任南开大学校长，1982—1983年代理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2 潘家苏，时任浙大农经系助教。

潘家苏、钟道赞、华仲麟来遵义。

晨六点起。七点余早餐。八点嘱孙斯大召发反动传单嫌疑人潘家苏、滕维藻二人来，与刚复、邦华、晓峰、振公、庆椿等讯问。潘、滕二人详告廿一晚县府保警队相学楷秘书、王斌、叶道明前往南门外中山南路60号搜查之详情。当时在箱内检出未开封，而钢笔书写送永兴函四通，内有二、三次反动标语十数张，又在床边得二次油印底稿一张，均非彼等所有，而叶道明有意诬害，暗中插入者去云。

九点半，余偕梁、蔡二先生及潘家苏、滕维藻二人乘校小车由湄潭出发。十二点抵遵义校本部。在校中膳后，知教部所派钟道赞督学、华仲麟秘书已到专员公署，即偕梁、蔡二先生至署。钟、华二人之来，原拟视察游行除孔之经过，但目前问题改成解决潘、滕二人问题。余等述潘、滕二人被搜经过。未几湄潭县相秘书来，报告廿一晚之搜查情形，谓寄永兴四封传单乃在一皮箱内取出，且其上尚有一箱，决非叶道明所能为，此与潘等所言不符，相已将搜出朱维藩、长河等信带来。

1月25日 星期日 偕大同至专员公署，适庆椿、邦华亦来。渠等二人偕高文伯乘校车至“首都”，接钟道赞、华仲麟赴湄潭查发反动传单案。……晤潘家苏、滕维藻，告以昨〔与〕高接洽经过，并嘱如传单确出彼等手，以自首为妙。

1月26日 星期一 九点钟督学、华秘书来，渠对于湄潭反动传单亦有疑问，即（一）调查户口何必要如此大队人马，自必事前有线索，但何以不言明；（二）叶道明既与浙大向有嫌隙，何以县长派渠前往。……

钟督学要此次风潮主使人名，遵义方面余开陈天保、陈海鸣、王天心、王蕙，湄潭刘玉钊、金德椿、金孟武、钱念杞、张秋芳，后汪大同君又加李学应、伍学勤、顾源、汪丽泉、窦祖麟、梁鹗等名。余素来不主株连，只处分轨外行动。陈海鸣等虽自首并未加处分。此事将待部中来函再说。请蔡院长送潘家苏、滕维藻至专员公

署晤高，谈一小时。高将彼等送留警备司令部，谓系责任关系云。

1月27日 星期二 一点半至桃源山警备司令部晤张参谋长，不值。由钟参谋引至别室，与潘家苏、滕维藻各谈片刻。余告以我方求公平之审判，并有充分时期之搜集证据。……

七点晓峰、振公来，晓峰以叔谅函相示，知委座对于除孔运动颇为震怒，以是引起对于浙大、联大之注意。振公以孙念慈在县党〔部〕所假信封见示，与在潘家苏寓中所搜之四信封甚相似。

1月28日 星期三 晨九点至专员公署晤高文伯，渠保证审问潘、滕二人不用私刑，同时给学校以充分时间搜集证据，至于遵义本部如逮捕学生，必事先与余一商。余欲视前次相秘书所交之信封，以与昨振公交来孙念慈在县党部所取之信封相核对。据高云，已送往桃源山警备司令部。余又至山上，张参谋长又不在，晤钟参谋。待半小时后，余将装传单之四信封详加检视，并将大小、式样记下。适有警报，时约十一点，余与潘家苏谈数语即回寓。与县党部信封相较，大小形式如出一辙，遂决定湄潭之传单为叶道明所发。但尚不足以服人，因将以浙大购同样信封以陷害叶也。按县党部信封下半及右边潮湿，而放传单之四信封亦如此。

1月29日 星期四 请邦华夫妇及小丽在寓中膳。据邦华云，相秘书告钟督学，谓湄潭十八晚之枪声乃系叶道明所放云。又可知此事之复杂矣。

午后三点开行政谈话会，到润科、邦华、振吾、荃谋、晓峰、振公、士楷、大同、季梁等等，决定为潘、滕二人事电吴主席、教部陈部长，嘱关照警备司令〔部〕郑重审决。

1月30日 星期五 午后二点张叔达得蒋委员长关于学校纪律须严加整饬电。……张卓以委员长检电印刷分送，云：“特急，步兵学校张教育长，叙密。浙大学风不良，内部份子复杂，最近竟在遵义游行示威，并在湄潭南岸张贴标语诬蔑中央，破坏抗战。此种越轨举动，必为反动份子所主使。以后该校学生之行动，应由步校政治部负责，秘密监察，并设法时与该校当局切实联系互助，对于该

校军训教官，亦应在平时由步校每月定期召集会报、研究与切实指导。如该地附近各校学生，再有游行及不轨行动或发生风潮，须与地方政府协力，并用军事管理学生，有随时处置一切之准备，以安定后方之秩序为要。浙校近情如何希即查复（中正）。 ”

1月31日 星期六 二点至柿花园一号开校务会议，到代表卅二人。余与张教务长、胡总务长、张训导长及一年级储主任报告后，即讨论提案：（一）龙泉分校不办三年级，（二）教职员生活设法改善，（三）请蔡邦华院长明赴筑见吴达铨主席，令警备司令部与潘、滕二人以充分时间审决。

2月1日 星期日 作函与吴主席达铨，请蔡院长带往贵阳，以校中所发电报恐受检查，且为警备司令部所扣也。十一点回。邦华于十点半去筑，目的在延期判决滕、潘二人。余请其觅一律师顾问。

2月5日 星期四 蔡院长自贵阳回，知曾晤吴达铨主席，谓可保证潘、滕二人无重罪系狱或释放了事。对于省党部，省府亦有磨擦，刘秘书尤愤慨云云。

2月6日 星期五 高尚志自永兴来，报告永兴学生对于反孔之举动，知校方以导师劝阻，未发生游行。并派青年团于晚间查贴标语之人，因之外间有浙大学生持枪贴标语之谣言。尚志并带来叶道明十七号致渠函，信封后亦书“明晨请面交”五字，与孙逢吉寄尚志函如出一辙，均为叶之手笔。此可为传单系叶所取而放于潘之屋内以嫁祸于潘〔之证〕。因在房内搜出之四封与孙念慈寄尚志之信封有同样水迹，且此项水迹干后始开信封，故不能认为有意事后所造。

2月7日 星期六 中午至水垌街十四号晤高专员，余告以反动传单系叶道明陷害潘、滕二人，余已得铁证，因孙念慈致高尚志函之信封有叶道明亲笔所书“明晨请面交”五字也。高意以为此事先将学生释放，然后叶由党部自己检举为最好云。

2月18日 星期三 寄立夫、骝先、布雷函（为潘、滕二人事）。

2月21日 星期六 遵 八点半至校。周勤文来，为询何友谅与王蕙被捕事。十点至警备司令部，胡搏九与高文伯已先在，谈及

王蕙、何友谅被捕事。据〔云〕系因遵义特务总机关接贵阳总机关来电，指明拘捕四人送筑究办。据胡云，系陈天保、陈海鸣、何友谅与王蕙。但何与王天心同住，前晚王寓被搜，适王去湄潭，次日何乃被捕。昨余函警备司令，嘱以后不得至校捕人，如王蕙事。故高遂向余索陈海鸣、陈天保，现陈天保既因被开除而出走离校，余允交陈海鸣。中膳〔时〕由陈庸声召陈海鸣来。同时偕晓峰晤高文伯，商可否将陈海鸣留校察看，高不允，遂回寓。

3月2日 星期一 中膳后至桃源洞警备司令部晤潘家苏、滕维藻，并由钟参谋之介绍晤军法官侯发瑞。

4月9日 星期四 重庆 晤调查统计局局长徐恩曾，谈及潘家苏、滕维藻二人问题。据云，发传单事认为证据不足，而思想方面亦乏确证，但以地方党部之不了故，以不回遵义为是。余告以潘乃助教，在渝、在遵作事原无分别，但滕为四年级生，上学期未考，故如欲其不牺牲学业，则本月底必须回。……下午二点约潘家苏、滕维藻二人来谈。

4月19日 星期日 渝 上午九点至中一支路《中央周刊》社附近德园，晤滕维藻与潘家苏二人。今日为第三次，经警察之指导使得抵其地。

4月26日 星期日 渝 膳后余至中一路支路德园晤滕维藻、潘家苏，约滕于星期二同往。

4月27日 星期一 九点缪培基来谈，约滕维藻及余于十点至川东师范中央调查统计局晤熊东皋科长。缪仍咬定潘、滕与发传单有关，似受黄宇人之影响，如是则所谓王蕙自承共党妇运主任，何友谅自承为遵义共党书记长，可靠至如何地步不可知。十点至生生花园晤毅侯。回。至调查统计局晤熊东皋科长，熊谓缪培基辑告全凭省党部之主张，故与熊之报告不合。由缪拟一保单，余签字其上，即保证滕在校期间无错误行动，随传随到，而滕则另签不为共党利用字条。

4月28日 星期二 松坎 晨五点余起。偕滕维藻早餐后，别

叔永、企孙、梁方仲诸人乘车过江。

4月30日 星期四 与苓谋商定准滕维藻补考，但本学期已过一半，不能再入学。

5月24日 星期日〔贵阳〕十一点至省党部见何友谅、王蕙，渠等身体尚佳，似较在校为佳，不久将赴重庆受训云。

5月29日 星期五 遵 下午二点半至校。赵元卜来谈，谓何友谅、王蕙之登报声明脱离共党关系由于迫胁。余谓渠二人乃共党则确系事实。六点在柿花园一号请张卓、张一能等。

8月24日 星期一 农经学生滕维藻来谈，渠已毕业，拟赴南开考经济研究所。当中央统计调查局熊科长东皋及徐恩曾局长由余保释滕维藻来遵义时，余担保其在遵义之行为方能回校。现滕既毕业，余之责任可告一结束矣。滕之父亲与叔父适自盐城来函道谢，于今日下午到，滕维藻则于明日下午赴渝矣。

（1943年）5月20日 星期四 北碚 六点十分至车站。北碚车原定6:30开，但至6:40尚未见车到，而山上已悬一球，知日机已出动。两路口车站秩序即大乱。成都客最多，开车时间无一定，乘满即开。而北碚、青木关车则不依时开，一闻有警报，拥挤不堪，若闻飞机声，必闯大祸。张姓仆原在购票，闻警不告而去。七点有机报。余于途中遇陈可忠，偕至教部防空洞。七点半解除。回聚兴村偕一仆至两路口，至九点余始开，余初无座位，十二点至青木关始得座位。原定在小湾下车，至兴隆场看王蕙、何友谅，但以为时过迟未果。一点余至北碚。

5月29日 星期六 沙坪坝 余在小湾站下车，往探王蕙、何友谅。问站旁人，知战时青年训练团距站七八华里之遥。余徒步往，自八点二十分走起向东南行，为一石板路，至一石桥，名群力桥，则已为五云山矣。训练团在五云寨。余上寨觅队长陈上川，即召王蕙来谈约半小时。王蕙告余以被捕经过，谓系反孔为主因，并以湖南学生杨姓失金戒子事而结私仇。至贵阳后，何友谅因被打三次而招供，逼写自承共党等。王蕙并曾指出陈天保、王天心、吴恕三、

庄自强、庞曾漱、周仲奇之女为同党。其中陈、王指为共党，于心无愧，惟吴恕三等均系揣度云耳。渠现急欲离团，陈上川亦谓其（王蕙）不久可以出团，但望陈立夫能去一信。何友谅以逃越一次，二日即重被捕，故监视尚严。方被放出，编入第三队，但不能见客，故余颇失望。下山时已十点半。有警报，闻飞机声，十二点解除。在小湾中膳。一点半再坐车至青木关。在站见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人加手铐者来，余为之泪下。

8月18日 星期三 遵 接王蕙来函，知已于本月十二出团，住黄桷埡堡。王蕙为飞机带狗案、驱孔案，被省党部所拘已一年半，损失与所受打击不少。同被拘陈海鸣已早放释。何友谅尚拘禁于兴隆场青年团。王天心与陈天保则逃匿无踪。湄潭方面所拘滕维藻早已入南开研究所，潘家苏在渝任事矣。

（二）费巩案

费巩¹（1905—1945），原名费福熊，字寒铁，后字香曾，江苏吴江人。192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1928年赴法，1929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1931年毕业。1933年秋，任浙江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抗日战争期间随浙大西迁。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以非国民党员身份任浙江大学训导长，1941年1月去职。时常发表政论文章，如1943年撰写《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评论政局。1945年3月5日，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失踪，成为当时轰动大西南的“费巩事件”。竺可桢为此多方奔走，竭力追寻查找下落²，未果。对于“费巩案”的线索，竺可桢都一一记录在日记中，但最后此案件不了了之。1946年1月，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要求中包括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费巩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1978年9月5日，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

1 费巩，出身吴中世家，父亲费树蔚曾任清末肃政厅肃政使，母亲是湖南巡抚吴大征的女儿，夫人袁惠泉是袁世凯的孙女。

2 1945年3月14日至1952年年底，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及香曾共175次。此处只摘引部分内容。

（1940年）8月12日 星期一 十点至播声电影园作纪念周。今日费香曾就训导长职，纪念周时，即请香曾演讲。渠发表“对于训导之意见”约半小时。

（“本校训导长姜伯韩先生已辞职离校，在新训导长尚未莅校之前，请本校教授费香曾先生以教授资格兼摄训导长。又教育系主任兼本校主任导师陈剑修先生辞主任导师兼职，即请费先生兼任主任导师。费先生一向对于训育问题富有兴趣，且留英多年，身受导师制之训练，对导师制之研究更为深切，实为最适当之人选。希望费先生今后能将导师制在本校彻底推行。费先生此次以教授资格出任训导长，仍支教授原薪，并不愿减少授课钟点，热忱殊堪钦佩。惟本人希望费先生授课钟点能减少至最低限度，应有充分之时间为本校训育方面树立一基础也。”）¹

8月15日 星期四 至柿花园一号教职员俱乐部开校务会议，因到者不及法定人数，故改谈话会。余首先报告校舍，招新生，及彭百川、姜伯韩辞职问题，及费香曾之任训导长。

10月21日 星期一〔由〕歌乐山回重庆 作函与振吾、苕谋，知费香曾又在设法倒苕谋。因姜伯韩、贺壮予已去，遂欲倒张也。此自系苕谋之见解，但壮予之去确因费故，而伯韩恨费亦刺骨，此君如此玩政治手腕，真出人意表也。

12月1日 星期日 二点费香曾来谈训导事。渠知姜伯韩在行都批评浙大训导事，遂欲早日辞职。余告以教部亦有示意，余属意晓峰，拟与一谈。

（1941年）1月24日 星期五 遵义 今日解决训导与总务问题。训导主任因香曾非党员，故教部不愿其久居此位，必须另觅人。与振公、振吾、晓峰磋商数回后，决请彼三人为训导委员会，名义上以晓峰为训导长，实际则三人负责，有若干照例办公，振公多做一点。

（1945年）1月19日 星期五 遵 中午约费香曾中膳。渠将

1 括号内容参《竺可桢全集》第2卷，《在第二十次总理纪念周上的报告》。

于明日去渝，为休假。

2月22日 星期四 渝 上午费香曾、郑涵清、冯泽芳来。

3月5日 星期一〔重庆〕费巩今晨在千厮码头失踪。

3月14日 星期三 渝 晚中央组织部之于震天¹来，知费香曾忽于去北碚路上失踪。缘香曾于四日晚入城，拟坐轮至北碚复旦，曾去看汤元吉，后住邵全声²处。次晨邵偕香曾至轮上，邵提行李上轮，再登，香曾已不见。邵挈行李到处觅香曾，卒未见香曾。故于疑其签字于《新华日报》之宣言主张³各党派联席会议有关。据香曾告汤，则华林、卢于道、朱鹤年等之报上声明并未签名加入，由人冒名，实出于强迫。故香曾如被特务机关于闭禁，则性命殊可忧。此时政府大唱民主，而竟有类似 Gestapo 盖世太保之机构，真可叹！

3月15日 星期四 渝 出至五四坊二号晤汤元吉，告以费香曾自五号起失踪事。四号晚香曾尚去汤寓不值，宿于邵全声处。

3月16日 星期五〔重庆〕邵全声、孙振堃、晓沧及汤元吉先后来，商谈费香曾失踪事。邵为送香曾上船之人。据云，四日晚，香曾宿于林森路309号二楼郭希寅副官（乃邵之友人）〔处〕，与邵同住。晨三点即起，与邵至千厮门趸船。行李已放趸船贮藏室，邵人贮藏室取行李，回头已不见香曾。未几趸船门开，在轮上亦遍觅不见。打电话至复旦，知其未到校。趸船与岸有短浮桥，但水深不过二三尺，不能溺人，故除为特务机关所捕外无其他可能。余嘱晓沧与叔谅一商，再去看立夫。余拟觅程沧波与骝先。

3月17日 星期六〔重庆〕中膳后罗凤超及汤元吉来。二点偕至监察院晤程沧波，询香曾消息。知今晨章友三尚有电话询来，问香曾有无着落。余等均猜香曾为特务所捕。三点至两路口行政院善后总署晤高文伯，托探香曾，知已询叶秀峰，谓不知其事。今晨

1 于震天，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时在国民党中央组部工作。

2 邵全声，浙大外文系学生，因两次大过被开除。

3 指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郭沫若、洪深、马寅初、张申府、柳亚子等数百名著名知识分子在这份进言上签名，向执政的国民党要求召集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等。

叔谅来，亦谓侍从室各方面亦未有报告。

3月19日 星期一〔重庆〕外语系毕业生宋超群来询香曾事，余嘱其招邵全声来谈话。……章友三来，谈香曾失踪事。友三已由北碚发稿登《中央》及《大公》两报，以孟闻等主张。余谓如此则将落入政党之手，故主张撤回不登。友三赞成，即电话复旦办事处临江门川盐三里十号（电话42025）。……至六十六号（上清寺）中央机器厂晤柳君，知黄任之已将钱新之、杜月笙等探查香曾之踪迹。

3月20日 星期二 渝 五点偕汤元吉与罗凤超二人往康庄一号晤齐世英（铁生），托其觅费香曾之下落。

3月21日 星期三 渝 与章友三同谒卫戍司令王缙绪，由王亲自接见。余告以费香曾失踪事，并将公函交去，嘱其澈查。渠谓中央统计调查局与军委会统计调查局均近来不拿政治犯，同时亦无名之尸体发现。渠允交一罗姓稽察澈查其事。余等出。余即入城至五四路五四坊晤汤元吉，则郭志嵩与罗凤超已先在。

十二点，余与汤、罗二人至警察局之检缉大队晤其队长李姓。据云昨已接到上峰报告，已询中统局、军统局，谓均无其人，疑为香曾所入党内小组织所为。余等告以香曾并未加入小组织，并将公函交去。……

厉德寅、程沧波先后来。邵全声偕柳君来。余详询香曾失踪详情，并询其同住郭副官为谁。余嘱邵今晚往晤汤厂长及章友三¹（临江路川盐三里十号复旦办事处），并嘱其明日晤卫戍司令王缙绪（治先？）。

3月23日 星期五 晓沧与罗凤超来，知香曾之兄费福焘已来渝。

3月27日 星期二〔重庆〕六点至生产局晤咏霓，谈及费香曾事，渠以为应报告委员长。

3月28日 星期三〔重庆〕九章、宝堃、仲济、子竞、立夫相继来谈至晚膳后。罗凤超来，据云高文伯又与叶秀峰谈，似略有

1 章益（1901—1986），字友三。时任复旦大学校长。

线索，疑香曾仍为中央调查统计局所闭禁也。

今日《大公晚报》载费巩失踪消息。

3月29日 星期四〔重庆〕八点半费福焘¹来，偕至康庄一号晤次仲与齐铁生，托铁生设法觅香曾之下落。据福焘云，已略有线索，疑中央统计局所为，而铁生则以为中统局近来不捕人。

4月1日 星期日〔重庆〕膳后费福焘（盛伯）来。又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顾建中来。据顾谓，决非中统局所捕，香曾或为奸人所算，但盛伯疑军统局所为。

4月2日 星期一 在重庆十点至上清寺六十六号，与费盛伯谈香曾事，迄今仍无着落，徒焦急而已。余推想为政府特务机关所捕，因香曾倔强不能放。

4月11日 星期三 北碚回重庆 据费盛伯报告，谢力中²于香曾失踪次日回铜梁高级机械学校，渠留渝甚久，谓系浙大故。中央调查统计局疑其与此事有关，将以卫戍司令命押逮之。

4月12日 星期四 重庆 晚膳后朱骝先来，与谈香曾事。

4月13日 星期五〔重庆〕偕章友三同往见卫戍司令王缙绪。王不在，由参谋长郝家骏（铁骅）代见。询以香曾下落，渠以查询香曾案卷见示，则访查邵全声颇详，但未得着落。……

三点至陶园晤沧波及盛伯，商谈香曾事。

4月14日 星期六 重庆 盛伯来，据云今日途遇军统局漱庐之王新衡³，谓香曾事一星期后必可水落石出云，不知是否推脱之辞耳。

4月15日 星期日 重庆 余与布雷谈费香曾事，布雷以为特务方面未捕曾。余告布雷，年青人欲批评亦未可厚非，若批评政府者皆目为共产，则不啻为丛驱雀也。布雷又告余，谓在青年团评议会席上蒋主席曾表示党不应在大学活动云云。

1 费福焘（1904—1963），字盛伯，费巩之兄。192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28年赴瑞士半工半读。时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负责筹建中央机器厂，并担任代理总经理。

2 谢力中，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时任职铜梁高级机械学校。

3 王新衡（1908—1987），浙江慈溪人。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同学，时任军统局头目。

4月16日 星期一 重庆 知三月四日于震天曾至六十六号，时邵全声正为香曾打铺盖。但香曾当时定五日住客栈，不住邵全声处，不知以后何以变。又知邵全声求婚之人即胡品清，邵系于飞机载狗案内开除者。昨布雷云，邵全声已有供辞，谓香曾常骂他，故衔之，因起谋害之意，其言不可信。但何以香曾失踪，邵秘而不告，直至于震天由复旦同学报告于十四日晓得后，始于十五日来余处报告。且又先告左舜生，其情节殊可疑也。

4月17日 星期二 重庆 九点半费盛伯来，偕至陶园晤沧波。据盛伯云，谢力中方面线索查无实据，而庞曾漱之丈夫高昌瑞曾三度晤盛伯，嘱其暂弗回，并谓如须发传单登报，则各事均已预备。庞之挚友陈天保为扰乱治安被浙大开除，与邵全声同时，而邵已自供推香曾落水，则此中自不无线索可寻矣。

4月19日 星期四 綦江 机□吴作和¹不在。吴，即交香曾签字于《新华日报》文化界宣言上者。

4月24日 星期二 遵义 二点至校开行政谈话会，到蔺谋、洽周、劲夫、王欲为、直侯诸人。余报告在渝开会经过，并谈及香曾失踪与綦江202师李家镐等五人被扣事。

4月29日 星期日 遵义 十点至经历司〔街〕十号尊生寓谈香曾事，到教授会代表顾谷宜、钱钟韩、王驾吾、王劲夫。已先由尊生起一稿呈部，请限期澈查。由全体教授名义，当改为签名征求同意，具名为教授等—某某若干。本拟以代电方式登各报，余主张送新闻，遂作为新闻投稿。说明各教授已上呈文与部中，因恐在五中全会时必引起舆论界注目而成为抨击政府之一种工具也。但若阻止教授表示亦非办法，因人孰无情，十年相处之友人一旦杳然无消息毫不为意？故不能不有此呈文耳。

4月30日 星期一 遇朱祖祥。渠谓过鑫先、吴志华等已飞印转〔美〕，又谓潘际垵²云香曾闭禁在漱庐，有被害之说，而邵全声因

1 吴作和，浙大毕业生。时任职于三溪电气冶炼厂。

2 潘际垵（1919—2000），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即入上海《大公报》担任编辑和记者，笔名唐琼。

受拷打自承谋害香曾。此乃共产党一派之说法也。

5月2日 星期三 遵义 布雷电否认上月廿四《新华日报》香曾被害消息。

5月5日 星期六 八点半至社会服务处晤周思汉（彧文），谈及香曾失踪事。

5月9日 星期三 湄潭 偕周思汉来文庙，约各系主任及院长等谈话，至十点散。席间余报告香曾失踪经过。

5月11日 星期五 湄潭至永兴 三点召集一年级全体教职员谈话，报告余在渝经过及经费状况与香曾失踪事。

5月18日 星期五 遵义 Mr.Schreibe 偕沈醉、潘景翔来。沈为卫戍司令少将，高级参谋。潘系联络，英文讲得不错。Lester Schreibe 系 Evanston, III. 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人，在 Northwestern 毕业（1937）。习心理，在警署作侦察工作，如 Lie detector 之类。据云费香曾迄无下落，邵全声则供词先后矛盾，故不能不来校稽查邵之为人。余将邵在此三年半之成绩交与，并告以曾为大考补考作弊记大过二次，小过二次，且怙恶不悛，卒于1942年开除，即驱孔罢课事。邵对 Schreibe 说，其开除单由于驱孔，不说作弊情事。……

二点至校。沈醉等又来。余约张君川、缪彦威及谢幼伟与之谈，至四点半始告别。Schreibe 等均觉满意，但香曾之下落不可知。据沈醉云，蒋主席极关心，最近《大公报》与《中央日报》均载卫戍司令王缙绪对记者谈香曾安全，不可靠。而谢文治自重庆来电，谓不久可以释放，更不可靠。

5月23日 星期三 遵义 作函与叔谅，主张以邵全声交法院，因邵在卫戍司令部已羁押达二月之久也。……

六点半又至柿花园召集学生代表及理事谈话，……最后谈香曾问题。

5月27日 星期日 遵义 八点半晤洽周，偕同絜非、洽周至何家巷二号、三号教室自治会发起之香曾怀念会，上并有“民主团结”等字样，显系左派份子所为。

6月7日 星期四 得费盛伯函，知香曾事最近之将来或有眉目云。

8月19日 星期日 三点至柿花园一号，开遵教授会议，到四十人左右，尊生主席。讨论迁校问题，议定第一学期在此结束，并要余去重庆再函政府营救香曾等各项。

9月14日 星期五 湄潭 八点半至数学研究所开校务会议第四十七次。……

次则临行以前不能不忆及从杭州同来之黄羽仪及张荫麟均已物故，而香曾则仍然失踪，不能不为留念。

9月22日 星期六〔重庆〕遇邵力子，谓香曾现在磁器口军政部第一〈资〉〔制〕造铝厂附近西式民房云云。

9月27日 星期四 渝 九点晤费盛伯于牛角沱六六号。据云邵全声被押后，卫戍司令初加以刑罚，以水灌鼻，并将其放入污秽之牢狱。中央机器厂之柳昌学有一次往晤卫戍司令侦察长罗君，无意中遇邵全声，询之，知渠之自供为其推落入水，乃因卫戍司令之逼供。后经戴雨农亲自提询，始以实告。戴嘱优待，故得移至石灰寺稽察处。柳之所以赴稽察处，乃因陈雪白与另一人均以香曾事被禁而来。现闻邵已在警察局云。又谓据一杨良瓚报告，谓有一林姓者方自磁器口训练所与香曾同房间之某君传言，谓在磁器口制铝厂旁一洋房内。盛伯去三次，均未有所获。又有人报告，谓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所办合川某地云，似皆捕风捉影之谈。

下午四点，余乘车至油寺街参政会，到黄任之、程沧波、章友三、冷御秋、香曾之姨夫汪旭初、盛伯及友人蔡君（承新，中国银行上海副经理）、杭立武，讨论一小时。任之主张立即由余与友三具名呈蒋主席澈查，盛伯登报悬赏二百万，若无效则〔 〕个月内为香曾开追悼会。当场冷御秋及蔡均主张延迟一个月再说追悼会事，因恐于香曾不利。故定下月卅一日再开会。

10月1日 星期一 重庆 早餐后晤费盛伯，余劝其以费母之名悬赏一百万元觅人，因费盛伯意欲以章友三及余同登广告也。余

昨已与叔谅谈，若一二个月内香曾行踪不明，势必重庆任之等为发起开追悼〔会〕，而各校亦随之。

10月11日 星期四 重庆 八点半至牛角沱下车，即至六六号晤费盛伯及柳昌学。据盛伯云，香曾已有较的确之消息，缘蔡承新已晤到一见及与香曾同闭禁于兴隆场之萨空了。现萨已到昆明，改名易姓云。章友三所预备呈委员长文与盛伯悬赏登报事均将暂缓办理云。

12月3日 星期一 遵义 余与洽周至社会服务处，与任东伯谈半小时。余述及香曾事，以为此时政府如有此人，急应释放。

12月27日 星期四 又据振公云，邝衡叔近接费福焘来函，知近得确息，谓香曾确在渝近郊，甚受优待云云。

(1946年)2月14日 星期四 遵义 余索香曾之妹王守竞夫人(费令仪)函一阅，其中有云友人曾在渝郊亲见香曾，谓尚优待云云。但近来黄任之复信与陈鸿逵与黄尊生，谓据邵力子云香曾无下落，则可谓忧虑。又袁希文在渝于年初来信，谓消息不佳，则香曾恐已不在人世矣。

2月17日 星期日 遵义 余至柿花园一号开教授会，关于香曾失踪，拟再上书委员长。

2月23日 星期六 重庆 十二点晤费盛伯，知香曾无消息，且据共产党陆定一云，有人报告，香曾被捉后曾加严刑，于三月十号左右即埋尸灭口云云。

2月24日 星期日 重庆 叔谅谈及香曾事，谓沈钧儒(衡山)、黄任之于政治协商会曾提出质问，布雷答以特务不知有此人，可由家属依法诉诸卫戍司令云。

2月28日 星期四 重庆 九点至观音岩卫戍司令部晤王缙绪，询香曾事。王开军事会议，由其副官处处长余君代见。余与友三、觉予询香曾下落，余〔君〕不甚了了，且将邵全声与谢力中合为一人。但谓此事原系卫戍司令交稽查处罗处长办理，后已将此事交与侍从室，即目前国民政府军事处第六组办理，由俞济时管辖。总之

不外推委而已。……

贵州省府谢耿民、李定宇及杨子惠来。杨谈，知浙大廿五号在遵为东北事游行，谓无关于香曾之标语。余询以香曾下落，据云系三角恋爱，被学生推入江中。乃指邵全声与胡品清一段故事也。

3月5日 星期二 松坎至遵义 今日系香曾失踪周年。

3月6日 星期三 遵义 羽仪太太来，询香曾消息。余告以费福焘以其仆人之报告，谓香曾在中美所，故欲设法营救，余恐其又为捕风捉影之谈耳。

3月25日 星期一 遵义 接邵全声父亲邵西镐函，述香曾失踪经过与邵全声之关〔系〕，并抄邵全声在浙大作函回家述香曾如何优待，并称其为最有希望之学生，香曾之失踪决非邵所谋害。邵函中〔香〕曾有男生惟邵生为最有志气，女生中唯胡为最有学问（指胡品清），此实可疑。因邵固钟情于胡，而胡不喜之，且香曾对于学生均极优待（惟青年团学生除外），则邵之言不免过实。但香曾如被害，殆非邵之所为，则可断言。余两次函王缙绪均不得复，当与布雷一谈。营救亦非易事耳！

4月9日 星期二〔重庆〕九点费盛伯来，偕乘车至校场口石灰寺重庆卫戍司令稽察处晤罗稽察长，不值，尹科长亦不在。晤涂秘书与袁科长。涂（杜），浙江人。袁，湖南人。询香曾事，渠等均不知下落。对于邵全声，则渠已详加询问，供辞先后大抵符合。惟三月五日晨邵全声为香曾取行李，自第一码头至第二码头时，途径略有疑问。余认为此点并不重要，乃召邵全声来。邵面容颇丰满。余首告以其父亲已有函来，渠即饮泣。余亦不能忍，出泪。据邵云，渠于去年三月廿九日自余寓聚兴村廿二号出后未一小时，即被卫戍司令〔部〕所捕，失去自由，以迄于今。四月九日侦缉大队用冷水四盆，去衣，以水灌鼻，邵遂自承杀香曾。至廿二号有人告邵以行将枪毙，嘱指定一人收尸。后经戴雨农亲询问渠六次香曾是否为邵所杀，邵均自承。戴不信，邵乃告以实情后，〈用〉〔由〕中美所美国心理学家（此人到过遵义）用测验方法再审，断定香曾非邵所杀，遂

移至稽察处。现渠惟望移交法庭。余告以已有函致王缙绪司令，主张移交法庭，而袁、杜二人谓卫戍司令〔部〕亦有此准备云。因十一点有约，余遂偕盛伯出。

4月17日 星期三 沙坪坝至重庆 余至牛角沱六十六号晤费盛伯。据云渠近得汪旭初报告，谓香曾被捉，系三民主义青年团主使，而中央调查统计局将其致死。去年四五月间机器厂职员柳昌学得居觉生之女婿徐乐陶¹与钱学榘²二人之报告，谓系中统局所为，且人无下落。柳即打电报与昆明费福焘，因此徐乐陶被监禁两个月之久，以其岳父之营救得免。钱以周至柔营救得免。而香曾不见前，某公又曾请客，则蛛丝马迹不无可疑矣。十点回。盛伯以桢与友三上委员长书交来，已在渠处耽搁半年，其中日月全须改正矣。

4月19日 星期五 渝 并至生产局晤翁咏霓。余告以今日浙大生物系毕业生徐学峥告余事。徐，临海人，与邵全声为同乡，近曾得邵父亲函去看邵全声。据徐云，去年四五月间，即有一特务亲告徐，谓三月五日此特务即拉香曾至汽车上疾驰而去，香曾怒骂特务，遂被杀。可知乃军统局所为矣。咏霓闻之，亦为愕然。

8月10日 星期六〔杭州〕史地系毕业生沈自敏来，他在联大史地研究所任事。据说闻一多之死，乃政府早有计划。适龙三为人所不齿，政府因将谋刺事委之于龙三，可谓一箭双雕。但西南形势并不稳定，云南土司势力甚大，中原一旦有事，有土崩瓦解之势。沈为学生时代素有左派之目，与闻一多颇接近，所言是否事实不可知。但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近又不谈，令人不无疑虑，较费香曾事尤惨。沈谓费孝通亦极激昂云云。

1 徐乐陶，司法院院长居正之女婿。

2 钱学榘，钱学森堂弟。1931年考入浙大，后转交通大学与钱学森同读机械，1936年与堂兄同考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在航空委员会下属的飞机发动机厂任总工程师。他的儿子钱永健曾获诺贝尔化学奖。

三、遵湄时期的读书笔记

竺可桢在遵湄时期相对和平的环境下，阅读了大量书刊，《读者文摘》《自然》《科学》等杂志几乎每期必看，有不少精彩的读书笔记。因实在太多，不能逐一列出，现仅摘录 1943 年 1—3 月日记中的读书笔记，从列出的书名及竺可桢的评论，就可看出他对各种问题广泛的兴趣，上至天文地理、国家大政，下至风土人情、俚语掌故，他特别关注古今中外的科学名著及有关教育的文章。

（1943 年）1 月 8 日 星期五 阅董士廉《心算术》，颇饶兴趣，虽无高深学理，但确乎实用。……

阅去年十一月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M.W.Childs 《天气为战争工具》一文。……

晚阅蔚光著《西域古气候》及《巴江夜雨》二文。

1 月 10 日 星期日 上午阅 *Pacific Affairs* 期刊。

1 月 13 日 星期三 阅美国各界在 1927 年所举行牛顿二百周逝世纪念刊，系科学史所印行，中有 Campbell《牛顿对于天文物理之贡献》、Miller《牛顿对于光学之贡献》、Birkhoff《牛顿与相对论》、Cajori《牛顿万有引力之发表何以延迟廿年之故》。按最后一文甚饶兴趣，盖在 1666 年牛顿在剑桥大学为学生时，对于万有引力已有端倪，但直至 1686 年始发表，此其故有二种猜测：（一）根据 Henry Pemberton 在 1728 之记录，谓当 Principia《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三版将出版时，P 与牛顿常见面，时 1726，为牛顿死之前一年。P 谓牛顿之记忆力已大坏。但牛顿曾谓，当渠计算地心吸力至月球时，其所取地球之体积，系根据当时普通水平所通用 60 哩为一度（地心一秒加速率应为 13.24，与 16.1 feet/sec.，相差 18%），故与地球加速率不合，遂置之。直至 1671 年，Picard 量地得每度为 69.1 哩，此说最普通，如《大英百科全书》、英国天文学家 Dyson、诗人 Alf.Noyes 及美国 Splendor of Heaven《星空壮观》均引之。但 R.T.Glazebrook、

H.N.Turner 及 G.C.Adams 则以为不然。

因在牛顿时，早知一度等于六十哩为不可靠。如荷兰 Snell 于 1617 年实测得每度 66.91 哩，英国 Richard Norwool 以夏至日高在伦敦与 York 之差得 $2^{\circ} 23'$ 。得每度 69.5 是在 1635 年。即古代之推算，如 Strabo 79.6，Eratosthenes 78.9 哩，阿拉伯人 Alazer 69.58 [哩]，均大于 60 哩，唯 Ptolemy 计算 56.8。惟此等推算，因各人估计古代尺之长短而有不同，但牛顿对于 Snell 与 Norwool 之数必有所闻无疑。如取 Norwool 数，则相差仅 3% 而已。牛顿之所 [以] 迟迟不发表者，乃由于一个难决之问题：即吸力与距离之正方作反比，对于天体如月亮虽可应用，而对于地面上之事物，因其距离甚近是否可应用？如 Principia Book III Prop.8 证明，牛顿于证明此点如 Book I 75、76 两节所云，乃始恍然于此理之能普遍应用，乃能成为万有引力之定律也。且牛顿在 1686 年与 Halley 哈雷函中可知，在 1685 年始恍然于此。按欲知地球吸月之力，必须先知：（甲）月之公转周期，（乙）月地相距倍于地球半径数，（丙）地球半径，（丁）地心力加速度。设 OA 为月绕地 [球] 每秒行路，则 NA 为月亮下降之数。

$$ON^2 = AN \times NA', \quad ON = \text{arc } OA, \quad NA' = 2 \times \text{Moon's}$$

$$\text{distance} = 478,000 \text{ miles}$$

（甲）等于廿七天又三二，（乙）等于六十倍（约数），（丙）等于三千九百六十三哩（赤道径），（丁）每秒十六点一英尺

$$(NA = \frac{478000 \times 31416}{27.32 \times 24 \times 3600} \times 3600 = 16.1 \text{ per sec.}).$$

1 月 14 日 星期四 晚间阅《时与潮》四卷六期 Peffer 著《日本的真面目》，论日本人民均同意于军阀之侵略中国，他们不愿和美国开战，但他们均要统制中国，雄霸东亚。这一点我是觉得很对的。

1 月 16 日 星期六 阅蔚光作《西藏高原四周之雨量》及《西藏高原上各地气压之变化》二文。上文根据 Kindon Ward 《西藏的一个植物搜集者》一书。……

下午阅王德基《汉中盆地之气候》，划汉中为温暖冬干山间高型

盆地气候，乃依据柯本与费师曼二氏之气候区域而再为更正者。但此类分法仍不能指出汉〔中〕区域之特点。……

晚阅《地理学报》八卷。李旭旦著《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谓长江黄河之分水岭在甘肃与四川之间，颇难划界。

1月22日 星期五 阅James G.Frazer 弗雷泽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旧约全书中的民间传说》第一卷关于古代洪水部份。……

晚阅卢温甫所著《中国界面说纲要》（一）中国冬季气团界面与气旋。谓湘赣二省之多风暴，由于冷面遇地形崎岖，则坡度增，切力亦增，故气旋易于形成。暖面反是（根据Sverre Petterssen 彼得森）。但山过高或山岳区辽阔，则界面反衰弱云云。

1月23日 星期六 阅赵敏求译Lattimore 著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中国之中亚边疆》，美国地理学会研究报告21种。

1月25日 阅Lattimore 著《中国之边疆》。

1月27日 星期三 阅新到美国期刊，去年十二月七日之 *Time* 周刊。内述及十中全会，题为Rice, Salt & not History，批评该会除统制盐、米价格外，毫无成绩。

1月28日 星期四 下午在中美文化协会阅去年七月《大西洋》杂志及十月份《亚洲》。见Victor 著《战后之英国》，谓英国经济情形即使同盟国胜而轴心败，亦必大受影响。

1月29日 星期五 今日将Lattimore.《中国之边疆》一书阅竣，中午交还蒋廷黻。余在所购赵敏求译本上作一余个人对于本书书评。

午后至中美文化协会阅新到之报。见其中有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新共和杂志》，中有Michael Straight 斯特雷特著《即救中国》，谓中国已靠陆军与戴笠之特务工作以维持。其人对于中国情形似不熟悉。又去年七月《大西洋杂志》有G.B.Conant 科南特关于青年动员一文，谓美国每年有一百二十万青年到入大学之年龄，但平常只20%能入大学。……

今日购得歌德著、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系民廿二年出版，去年重印者。第四十四页有云：一个人不为自己的热情，〔不〕

为自己的要求，只为金钱、名誉或别的，在替他人工作什么的，永远是个蠢夫。

1月30日 星期六 至中美文化协会阅 *Harper's Magazine* Julian Haxley 赫胥黎 “On Living In a Revolution”。……至中美基金会阅报，并至求精〔中学〕阅去年七月至十月 *Scientific Monthly*。

2月5日 星期五 阅十月份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L. I. Dublin “How many years will you live ? ” 《你能活几年？》

2月9日 星期二 尚有新到 *Reader's Digest* 两本，已阅竣，今日还去。

2月26日 星期五 晚阅《世界学生月刊》，乃杭立武等所主持者。一卷九期有陈俊《武大在嘉定》一文，行文极流利而叙述详尽，使阅者能知武大之一般：教授人选、设备与学生之活动。十期有李絜非之《浙大近况》，则大嫌简略，阅后仍不能得一概要。又九期有《中国之科学研究事业》一文，述数理化、地质、生物、心理、医学、工程、农学、社会、人类、考古、历史、语言等。对于李仲揆之于地质、林可胜之于生理尤极赞扬，对于天文、气象、地理几未提一字，生物学叙述最详。浙大方面提及苏步青、黄翼与罗宗洛、谈家桢，但未及贝时璋、何增禄。大概而论，尚称平允，但遗漏亦不少。化学、农学尤简略。此文虽不写著者姓名，但可推想而知为汪戡哉无疑，因英庚款曾于两年前派渠视察各校。渠在浙大仅留数小时，安能尽知浙大人物？但同时浙大理、化二系研究空气之差，亦是事实。物理方面何增禄与王淦昌二人对于光学与理论物理实均极有根底，惜无机缘发展耳。

2月27日 星期六 阅 André Maurois 莫洛亚《法国之悲剧》。

3月4日 星期四 阅谢义炳著《贵阳之天气与气候》。

3月6日 星期六 今日阅 Borel 博雷尔著《空间与时间》，系对于相对论之浅近解释。序论题为“自牛顿至爱因斯坦”，述空间与时间的测量。……

第一章讲几何学与地球之形状。谓赤道半径约 6300 公里，两极

直径短 21 公里。最初以实验证明者乃法国天文学家 Richer, 1672 年至开阳发现钟摆需缩短 4mm, 始能于一秒钟来往一次。牛顿解释, 由于地球自转使两极平扁。十八世纪时法国科学院乃派人北至 Lapland, 南至 Equador 量经度。此时决定以子午线四千万分之一为公尺, 为万国制 C.G.S. 之起源, 但为便利起[见], 普通以巴黎白金制标准公尺为准, 各国均制有标准尺, 其精密程度可至 $\frac{1}{1000}$ mm。换言之, 不能小至小数点下第七位。一个小数位之增加, 常足以科学上新发现之前趋。第二章讲天文学上之时与空, 谓天文学上有优越的轴与优越的时 Privileged axis and P.chronology。优越的时即恒星时, 优越的轴即穿过太阳系重心之轴。前者未必常而不变, 如日月生潮即可延长恒星日。在此处必须引用光之速度, 因出现于吾人眼帘前之事物视光速而定, 同时恒星位置彼此有移动, 实增困难而为相对论之中心问题 (p.78)。

3 月 7 日 星期日 阅 Borel 著《时间与空间》第三章, 题“抽象几何与地图”。

3 月 8 日 星期一 晚阅 Borel 著《空间与时间》第五章“光速之测定量”。

3 月 9 日 星期二 阅十二月份 *Reader's Digest*, 其中有 Wythe William 关于 Goebbels will fool us again 文。

3 月 10 日 星期三 阅 Emile Borel 著《空间与时间》。……

《空间与时间》之第六章讲狭义相对论, 谓 special theory 即狭义的相对论, 与广义 general theory 不同。因后者完全为数学, 而前者之创立乃所以解释 Michelson 迈克耳孙与 Morley 莫雷之 ether drift 以太漂移试验之失败而来。一般士、民往往为由相对论所发生之奇妙事件而怪异。

3 月 12 日 星期五 晚阅 *Reader's Digest*。

3 月 14 日 星期日 阅《读书通讯》六十期胡适之《中国思想史纲要》, 译自去年十月 *Asia* 杂志。谓中国思想史可分三时期, 各约一千年。

3月16日 星期二 阅 *Endeavor* 杂志中有 Spencer Jones 著《太阳之距离》一文，亦已译登《科学世界》十一卷六期中，谓太阳之距离为天文学之基本量尺，最近 Jones 测定为九千二百〇〇五千哩〔即 9200.5 万哩〕。所差至多不过九千哩。

3月17日 星期三 晚阅 *Endeavor* 杂志，其中有关于 Vitamin 一文。谓〔维生素〕A 为 nicotinic acid 烟酸，治 pellagra 糙皮病；B 为 aneurin 硫胺素，治 beriberi 脚气病；C 为 ascorbic acid 抗坏血酸，治 scurvy 坏血病；D 为 calciferol 钙化醇，治 ricket 佝偻病；E 为 tocopherol 生育酚，治生产。

3月18日 星期四 午后阅崔朝庆著《中国人之宇宙观》第二章：盖天、浑天、宣夜。

3月19日 星期五 晚阅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其中地理上错误极多。如第四、五两回，曹操刺杀董卓不遂，欲逃往谯郡，路经中牟为关士所获。县长陈宫释之，与之偕逃。行三日至成皋荥阳（应向东而反向西），至吕伯奢家，因误会杀了吕伯奢。曹操到陈留，寻见父亲。又第六回，刘、关、张战吕布后，迁都长安，汜水关与虎牢关已先后降于诸侯，孙坚且飞奔洛阳，而董卓行至荥阳，嘱吕布断后，又与曹操追兵相战。按荥阳即成皋，乃洛阳之东。第十回、第十一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吕温侯濮阳破曹操。时曹操在兖州，其父隐居琅琊，操派泰山太守应劭往琅琊取父曹嵩来兖州，路过徐州，为太守手下张闳所杀（以上第十回事）。按琅琊在山东，去兖何必经徐州？曹操遂为雪父仇而南下，直至徐州城下。后吕布攻入，故允刘玄德之请，与徐州守陶谦和而北向时，吕布已在兖州。陈宫告吕布云：“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险，可伏精兵万人。操兵闻失兖州，必倍道而进，一击可擒。”按泰山在兖州之北约一百里。曹操自徐州来，何必过泰山？〔补注：按当时兖州府治不在今之济宁府，恐在今日济南以北。〕又第六回孙坚至洛阳，见紫微垣中白气漫漫，坚叹曰，帝星不明，贼臣乱国，万民涂炭，京城一空云。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借风，三江口周郎纵火，是皆迷信之谈。

3月20日 星期六 读陆放翁《老学庵笔记》。……

阅 Levy 著《近世科学》。

3月21日 星期日、3月22日 星期一 阅《近代科学》。

3月26日 星期五 阅梁任公《饮冰室文集》卷十，有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

阅委员长著《中国之命运》共八章，209页。

四、李约瑟两访浙大

1944年，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李约瑟博士，于4月和10月两次访问浙大，他评价浙江大学是与在昆明的著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齐名的学术机构。竺可桢在日记里也提及：“见十二月十六日《贵州日报》载尼德汉〔李约瑟〕Needham回英国以后在中国大学委员会讲演，赞扬我国科学家，并谓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云云。”但竺可桢日记从未提及李约瑟誉浙大为“东方剑桥”的文字。

（1944年）1月3日 星期一 北碚 晚阅李约瑟 Needham 著《国际科学合作》一文，系氏在华演讲，已译登《时事新报》，下期《科学》将转载。首述在华科学英美与中国合作之情形，如 microfilm 缩微胶卷与购书籍与药品之类，谓氏已送出三十三次单子购物。次则报告中国科学工作，氏在 *Nature* 《自然》已寄文六篇，并寄中国刊物至外国。谓中国疫苗英美军人亦用，所制无线电部份亦佳，可以供英美〔陆〕〔空〕军用。〔述〕专家之交换。谓金陵大学“大麦王”之发现，使美国农业大受益。第二节述中国抗战时期未能利用科学。由于纯粹科学家恐入歧途，因政府侧重在应用科学，实际此理并不尽然。第三节讲以后科学国际合作，赞成于国际救济委员会 Internat. Relief & Rehabit. Com. 之下成立科学合作机关。结语谓世界各国均应认清，在国事大计应谋之于科学家。

3月5日 星期日 遵 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二月间在中华

农学会演讲，其中述及题为“中西之科学与农业”，谓世人只知以维他命B治脚气病，世人只知系日人于1897年发现，但元代1250年胡锡徽（译音）已说菜蔬、果子可治脚气病云。

3月13日 星期一 渝 晚阅李约瑟二月间在中国农学会之讲演及Nathaniel Peffer “Our distorted view of China”《吾人对中国的歪曲观点》文。

4月10日 星期一 遵 十点半李约瑟偕其秘书黄兴宗来。黄，厦门大学毕业，闽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年四十二，为剑桥大学之生物化学Reader¹，能说俄、波、法、德诸国语言，对于中文亦能写能读。对于中国对于科学之贡献尤感兴趣。曾在美国斯坦福、加州、耶卢各大学为教授。曾著下列诸书：（1）*Science, Religion, Reality*《科学、宗教、实在》，（2）*Man, a Machine*《人是机器》，（3）*The Sceptical Biologist*《怀疑的生物学家》，*Chemical Embryology*《化学胚胎学》，（4）*Adventure before Birth*《出生前的冒险》，等等。其〔来〕中国乃由英国外交部British Council of Cultural Relations英国文化协会之代表组织Sino 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中英科学合作处。其夫人亦为生物学家，已到中国。氏定明日即去贵阳，转闽、浙，回途将在遵、湄停一星期云云。在社会服务处中膳。三点请李约瑟讲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in Peace & War和平与战争中的国际科学合作。谈一小时余，至四点半散会，由劲夫陪同，参观工学院实验室。六点半在教职员俱乐部晚〔膳〕，到迪生、劲夫、荇谋、洽周、振公、直侯、尊生、坤珊、傲南、羽仪、钟韩、耀德、馥初、乔年及曹君（梁厦之公子）。膳后请李约瑟谈话，述其来中国后工作之经过。余询其是否能带入若干维他命D之精，即新发明之calciferol维生素D₂，此物贵州需要尤急，以冬秋各月太阳光极缺乏，湄潭过去三个月中只有七天是终日没有片云的。渠允转达。谈至十点散会。

4月11日 星期二 遵 晨五点半起。七点至社会服务处送李

1 经询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馆长John P. C. Moffett, Reader 等同于助理教授或高级讲师。

约瑟赴贵阳，到苕谋、劲夫与洽周。服务处以张鸣岗赴渝而胡颂翰辞职，故各事推不动。晨间始卖面、卖茶，而李约瑟又不喜吃面，故饮汤而已。作函与晓峰及顾振军，嘱其设法觅地理教员，并能在美国购办维他命 D 精 calciferol，为学生中生肺病者治疗之用。

8月8日 星期二 遵 接晓沧、舒鸿、张孟超、孙祁、莫衡函
寄学志、季梁、增禄函 香曾函 李约瑟电

10月16日 星期一 湄 与晓沧谈，知筹备招待李约瑟尚无头绪。

中膳后二点开科学社年会筹备委员会，到晓沧、季梁、陈鸿逵（代邦华）、何增禄¹（代刚复）及朱善培。以本年十月廿五为科学社卅周年纪念，故各地社友会均举行年会于此时。但以廿二为星期日，可到会者较多，故决定湄潭于廿日、廿一两天举行。暂时定廿日晨大会，推余主席，下午读论文，晚演讲。廿一日上午社务报告，下午演讲。如李约瑟十七八可到，则请李演讲。此外，钱琢如亦预备讲“中国古代对于数学之贡献”。次讨论招待李约瑟膳宿问题。余与晓沧及季梁、善培偕至南门外卫生院晤杜宗光，适孙宗彭亦在。卫生院内之房间较小而适于住人，比文庙之大而无当者为好。故决计以卫生院为李及随从三人之住宿处，并请孙稚荪²觅一李姓厨子。

10月19日 星期四 湄 开行政谈话会，讨论招待李约瑟 Joseph Needham、玉皇观筑路及房租等事。

10月22日 星期日 湄回遵 六点偕允敏至社会服务处，晤李约瑟夫妇（Joseph Needham 及夫人）与剑桥动物学 Lecturer Picken 讲师毕丹耀、翻译曹君。未几，迪生夫妇及洽周亦来。谈片刻，即在社会服务处晚餐。餐后八点回。

10月23日 星期一 回湄 晨五点起。七点别允敏、松儿至校。作函一通后，即乘中英文化科学馆车偕 L. E. R. Picken、曹天钦赴社会服务处。时正八点，李约瑟方起。九点偕李约瑟及其夫人

1 何增禄（1898—1979），浙江诸暨人。物理学家。时任浙大物理系主任。

2 孙宗彭（1895—1972），字稚荪，江苏无锡人。时任浙大理学院药学、生理学教授。

Dorothy 与 Picken、曹君，五人同至大众餐厅早餐。吃蒸笼饺子，甜者一百余元、咸者八十元，又水晶包子十元一个，鸡蛋约二十个。共吃 660 元左右，可称贵矣。

九点半出发。天气尚好，未雨，但路上仍多泥。车行初亦好，到最后常抛锚，以酒精管常被塞住也。二点四十分始到〔湄潭〕，即至卫生院，李约瑟甚满意。进中餐后已四点。偕刚复、晓沧等至文庙，遂至川主庙梵天宫看化学室，到张其偕、王爱予诸人。

六点晤梅于“湄江”。六点半回卫生院晚餐，约李约瑟夫妇、Picken、曹天钦及贝时璋、舒厚信、杜宗光、晓沧及季梁、刚复、鸿逵诸人，决定两日来之日程。八点回。

10 月 24 日 星期二 湄 英兵登陆 Nicobar 岛。英、美、中、苏承认 De Gaulle 戴高乐政府。蒋委员长号召知识青年从军。Joseph Needham 李约瑟 “Science and Democracy”。Lawrence Picken “Wartime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England”。Joseph Needham “中西科学史之比较”。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训 “Nullius in Verba (On the words of no man) Royal Society founded” 没有任何人的话是最终的真理 (1664)，此与王阳明之说相似。

晨六点起。上午九点请李约瑟 Dr. Joseph Needham 在学生膳厅演讲“科学与民主”，到教职员、学生约四百人。余首述中英科学合作馆 Sino—British Science Corporation Office 之目的在于：(一) 供给专题资料，(二) 供给专题意见，(三) 供给专题用药品及仪器，(四) 供给科学文献，(五) 介绍外国人之科学论文登载于中国，(六) 介绍中国科学论文至外国，(七) 中西科学家通讯，(八) 在国外发表中国科学现状，(九) 对于建设新工业及购置设备供给中国政府意见，(十) 交换学生。介绍毕，李约瑟演讲。首述科学与战争之关系，次及纳粹之失败由于民主国国防科〔学〕之迎头赶上，足以证明科学决不为暴虐专制者所利用。次述及科学之兴起在近代，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及商业之兴盛有关。商人即中等阶级造成资本主义，推翻封建制度，在中国尚未臻此阶段。末谓俄国社会主义之成

功，已予人以先导。俄国所用于科学之经费，十倍于欧美其他国家（以国家收入作比例）。而近廿年来俄国对于土壤、地质及胚胎学均有显著之进步，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并非反科学云云。演讲时由晓沧翻译。讲毕，余致谢后，李等赴生物系，余与学生又谈半小时。二点在农场进中餐，除李约瑟夫妇外，有本校教授二十余人。

下午三点半在十五号教室请 Picken 讲“英国战时农业研究”。谓近三年来，英国生物学家均用力研究增加生产，如将猪、鸡等均不大规模饲养，而专注重牛。如将刍草中之蛋白质加碘，则牛奶量可增三分之一。如刍草用轻养钠〔氢氧化钠〕NaOH，则可除去 lignin 木质素，而易于消化。割刍以不待草之开花而用人工迅速烘干，则蛋白质尤多。如以母牛 oestrus cycle 发情周期初期之 hormone 激素〔〕加于未受精之母牛皮下，则虽未交配，母牛亦能出奶，可得平常母牛奶 50%。如以牝马之 hormone 为 serum 血清苗打入受胎之母牛，则一胎可以得二小牛。又谓以 sulpha 药可以治牛之乳房病 mastitis 乳腺炎，以 vaccine 牛痘苗可以治牛之堕胎传染病 contagious abortion。晚膳时文晖来。

八点在文庙大成殿请李约瑟讲 Observation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as compared with the West 中西科学史之比较。余首先介绍并读 The University Bureau of the British Empire 英国大学局来函。次李讲。首述中国儒教注重人伦，不谈天然，与道教不同，故炼丹术源于道教。至宋儒始有科学精神，以其兼佛、道也。次述中国对于炼丹、营养化学及数学上之贡献，不亚于他国。但近世科学之不能兴起，由于环境，即四个 inhibitory factors 抑制因素，为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后二者乃由中国之无商人阶级。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故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与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天气方面，因雨量无一定，故不得不有灌溉制度。因此，地主尽为一国之王所吞并，而〔官僚〕封建制度 bureaucratic feudalism 不可消灭，商人无由兴起云云。讲约一小时余，次讨论。余谓如近世科学作实验科学解，则中国人之不喜用手，亦一原因。晓沧谓《史

记》、《前汉书》〔之〕“货殖传”中对于商人竭力排斥，其时中国方脱离封建帝皇，恶商人势力倾人主，遂排斥之，以崇尚儒术，提高士大夫地位，而此辈亦遂高自位置，遂使商工阶级一蹶不振。季梁讲中国炼丹术起源，于《前汉书》中有之。魏伯阳之《参同契》、葛洪《抱朴子》及六朝梁陶弘景，皆为著名人物。所用术语等，与阿拉伯、西欧全同。琢如谓中国科学之所不兴，由于学以致用为目的，且无综合抽象之科学，不用 deductive 演绎方法，更无归纳法。刚复最后起言，时已十一点。散。

10月25日 星期三 湄 中国科学社卅周年纪念。钱宝琮¹“中国数学史之特点”。

晨六点起。九点在文庙大成殿开科学社年会，到刚复、晓沧、李约瑟等社员卅九人。社友会会长刚复主席致词。余报告科学社过去历史及社务卅分钟。次李约瑟致〔词〕，谓中英科学合作馆与印度加尔各塔 Centre Relation Office 中央联络局、伦敦外〔交〕部 British Council (Cultural Division) 英国文化协会及经济部 Ministry of Production、华盛顿之 British Central Scientific Office 英国中央科学局，以及驻苏、法二国英大使馆均有关系。渠下月回国，二月回，希望能成为国际科学合作局云云。次 Picken 讲数语。最后请钱琢如讲“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一小时余。十二点半散。

琢如首述《墨子·经上》有数学上之定义，如“平，等高也”、“圆中一心，等长也”。汉张苍善律历，耿寿昌能商功利。秦汉以前算书不可考，最早为刘徽注《九章算术》，出版于 263 AD，其中有方田、粟米、步广（有开立方术）、盈不足（代数一次方）、方程（许多未知数）等章。自方田等名称，可知其为自秦以前所传遗。尚有勾股一章，中有求圆周率术，以三十二边形求之，可得 3.1416，此在当时早于欧西。但所用均系应用，而乏理论。稍后有张邱建之算鸡术（大鸡三钱一只，小鸡一钱三只，以二十钱买卅只，问大小各若干）及孙子（以三除多二，以五除多三，以七除多二，其数为何）

1 钱宝琮，时任永兴分部一年级主任。

之整数论 indeterminate method。祖冲缀术，始算圆周率至小数八位，3.14159255〔至〕3.14159257〔之间〕。其书中并有以类似 Homer's method 解决三次方程式方法，此乃为造黄河堤时知长宽高以算容积用者。一般而论，中国数学全为应用，鲜有原理。以应用问题而论，胜于同时西洋。至于隋唐以前，中国数学完全独立，绝非假自印度或阿拉伯。相反，印度数学颇有假自中国之确证。如圆周率逐步推进，印度与中国同，但时代较后，其圆周率与求积术，均抄袭刘徽。Pythagoras 定律之证明，中国自出心裁，与希腊不同，而印度相同于中国。张邱建之数鸡术，亦见于印度。印度数学家最早者为 Aryahata，纪元后五世纪时。次 Brahmagupta，528〔应为 598—约 655〕时人。但隋唐以后，如《开元占经》中，以·代位置，及以后宋代所用之 0，用歌诀（如丹元子《步天歌》）等，则受印度影响者也云云。

午后读论文共三十余篇。Dorothy Needham “The mechanism of muscle contraction”《肌肉收缩之机制》。晚校中请膳。

10 月 26 日 星期四 自廿四至廿六，美日海空军在 Mindanao 棉兰老岛及 Cebu 宿务左近大战。美报载日已惨重战败，沉航空母舰。美航舰 Princeton 号沉没。美兵在 Samar 萨马岛登陆。治脚气病见元忽思慧《饮膳正要》。

晨六点起。近日连三天，每晨必大雨，日出后即止，终日阴。李约瑟定今日回，后以生物方面可看之论文甚多，故再留一天。昨已看毕，今日上午观数学、物理。Picken 观农学院其他部份。下午如天佳往郊〔外〕游览，天雨请李约瑟讲生物或胚胎。科学社年会论文，昨读生物方面卅余篇，今晨读物理、数学方面。晚间余讲“二十八宿”。据昨李约瑟云，昔人以为脚气病可用菜蔬治疗，即维他命 B，乃 1898 年日本一海军军官发明。但在中国元代御膳忽思慧著《饮膳正要》一书中已有提及。氏又谓朱恒璧曾著文述《本草纲目》（李时珍）中有十二种药，科学上已证明有用云。生物系姚鑫之研究，亦为 induction 及 ergoringer 问题，与李约瑟相似云。按《人名大

字典》载：忽思慧，元仁宗延佑间为饮膳太医，尝取诸《本草》集成一书，名为《饮膳正要》。

下午晤硕民、汤元吉。午后李约瑟等参观农化。四点半在生物系与各生物教授讨论生物化学等问题。李本定今晨即回遵义转重庆，后以此间可看之工作甚多，故遂延后日廿八走。刚复将同往重庆。

七点在大成殿，余讲“二十八宿之起源”约一小时半。今日余觉精神不佳，因在湄坐板凳过久，遂患痔，故反不及上次在遵讲演之有精神。讲毕，琢如、季梁略有讨论。琢如以为中国之十二次根本系岁星周，因十二次如星纪、元枵等首见于《左传》，而传中岁在星纪而淫于元枵，岁为岁星无疑。但余则谓先有岁（从步从戌）而后有岁星。朱雀分为鹑首、鹑火、鹑尾，全为四象，分为十二次之征。且十二次起于星纪，则以周正子〔月〕冬至日在斗、牵牛也。晚梅来。

叶维法《国民营养改善论》，《东方杂志》四十卷廿三期 p.41，卅四年。维他命 B。日本海军的勃兴与营养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自 1878—1883 年，平均每年脚气病患者占海军全人数 1/3，后经军医官泰加几氏调遣军舰航行海外作大规模试验，倡导改良膳食，致脚气病绝迹云云。

接朱骝先函 刘次箫函

寄邵英多函 吴藻溪函 骝先、次箫函（推仲揆、正之及孟和）

10 月 27 日 星期五 湄 美、英、苏、中承认义〔意大利〕国政府。倭寇离桂林只四十里，桂南至桂平西南蒙圩。飞弹在英伦炸坏房子四十万所，伤人一万四千，死人八千云。《曾国藩传》。

晨六点起。今日附中胡哲敷接事，朱善培移交。八点晤汤厂长元吉，告以今日不能去遵。托晓沧带箱子一只回家，信一封交俞心湛。九点在大成殿开讨论会，到生物、物理、化学同事卅余人。余主席，Needham 夫妇及 Picken 均到。首介绍 Picken 讲近来生物物理 biophysics 之进步情〔况〕。氏讲半小时，述以 X 光及 polarized microscope 偏光显微镜以显示细胞之组织，从而述 polymer chemistry

聚合物化学，而多组分子合成之大分子组织情形，连带讲人造橡皮及〔 〕时之变动等等问题。陈鸿逵、季梁、刚复、绪宝、淦昌、家桢、爱予、姚鑫等均提出问题，直谈至十二点。

余自上次回遵，未一日又返，迄不能休息，故觉疲乏如感冒。中膳后卧半小时亦不能成寐。二点至“湄江”晤梅及季梁夫妇。偕季梁夫妇至茶场与其余同人汇集，往观音洞。到李约瑟夫妇、Picken、陈鸿逵、茶场李君、谈家桢、王爱予、孙稚荪、舒厚信、刚复、增禄、吴长春、仲崇信¹、江希明²夫妇等二十余人。校中预备柿子、栗子及茶，谈至五点余始回。据李约瑟〔夫人〕Dr. Dorothy Needham云，剑桥大学有两学院为女子学院，其人数不得超过五百人，即全校十之一。女子不得受学位，但用 B.S 理学士等名于其姓名后。牛津大学已取消此项限制云。Picken 方自剑桥来，知飞炸弹之可怕，以其每个一吨，无论昼夜均可来，晴雨无阻，在三百码以内玻璃窗全碎云。六点晚膳。杜乐道来。又卢守耕来谈。

何贻焜编《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民廿六年初版。P.319《致彭雪琴书》：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又《原才篇》：风俗之厚薄也，系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P.38 容闳《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1867 年文正公定捻匪至南京就两江总督任，注意于亲创之江南制造厂，文正见之大乐。余复劝其设立兵工学校，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之云云。

10 月 28 日 星期六 由湄返遵 晨六点起。亦秋来。八点偕贝时璋至卫生院晤李约瑟夫妇。李等行李均已准备待行。曹天钦患感冒已数〔天〕，故上车时渠坐车前，余与 Picken 及李约瑟夫人坐

1 仲崇信（1908—2008），山东黄县人。植物生态学家。时任浙大生物系教授。

2 江希明（1913—1990），江苏灌云人。动物生理学家。时任浙大生物系副教授。

车中。八点三刻启行，与舒厚信、贝时璋等告别。李对于杜宗光院长尤感谢不止，谓愿寄医书与彼。沿途均雨不止。Picken 等对于山上红叶均极欣赏，渠对于植物学之造诣亦高。至虾子场后又频频抛锚，至青神桥钢板又断，直至一点半始到遵义。途中余询 Picken 以 British Council 英国文化协会情形。据云，属于外交部，但专管文化部份，如科学只管纯粹科学，即应用科学亦由 Ministry of Production 管理。在欧美均有 office 办事处，但事先必得政府同意云。至于 Science Advisory Comm. 科学顾问委员会则与此无关云。抵社会服务处，幸晓沧已在此相接，即定一、二、三号房间，并为曹天钦觅医生。二点余在“大众”中膳后，迪生夫妇来，即请渠等陪同往外语班讲演。因李约瑟欲参观史地〔系〕，故余至校后即嘱温甫通知李絜非与左之。

余与振公接洽后，即至杨柳街四号晤尊生、香曾，知今日晚点主。六点半至大众商场晚餐。约刘梦锡、李约瑟等晚膳，到迪生夫妇及劲夫、Picken 与 Dorothy Needham。知李约瑟视察史地系尚满意，渠对地图及徐霞客三百周年纪念事甚注意。

八点别李约瑟，至羽仪家，为羽仪之神主点主。余幼时曾闻余大哥常为之，回时得一点心盒，余犹能记忆。余为题主则为第一次，并有晓沧为左襄题，尊生为右襄题。点主三次，初用墨笔，次朱笔，三墨笔，约需十五分钟。九点回。

接美国大使 Gauss, Clarence E. 高思函 马小波函 丁庶为、徐冠

10月29日 星期日 遵 晨五点醒。六点即起。八点至社会服务处，送别李约瑟夫妇、曹天钦及 Picken。回至办公室。作函与高文伯，嘱通知桐梓招待〔所〕为李约瑟定房间。

10月31日 星期二 遵 甘地提出建立印度三项计划：（一）教育印度文盲，（二）提高劳工生活，（三）建立学生民族意识。

晨六点起。八点至校。上午阅来往文件。卢温甫来，以所制气候图一百余幅相示，包含日照、霜日、雷雨等，至有价值。惜李约瑟来时未交彼一阅，彼必愿带往英伦为之出版也。

11月1日 星期三 遵 寄 C. A. Nichols,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Biography, 296 Broadway N. Y. C. 美国大使高思 Ambassador Clarence E. Gauss、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函。

11月13日 星期一 遵 寄金宝善、舒鸿、孙稚荪、李约瑟函

12月18日 星期一 遵 Needham 在英国赞美中国科学家。美国供给中国药品与汽车。

晨六点半起。八点作纪念周，请蔡金涛¹讲“单位标准”。……见十二月十六日《贵州日报》载尼德汉〔李约瑟〕Needham 回英国以后在中国大学委员会讲演，赞扬我国科学家，并谓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云云。

五、遵湄时期的校务会议

浙大校务会议参加人员包括校长、各院院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以及各系系主任，每年还要选举公推 10—12 名教授、副教授参加。竺可桢曾言：“浙大之精神焉，‘求是’二字，向来以研究学术为重，校务则向由教授会主持，此乃浙大之民主。本人亦崇信民主精义，故一切校务，以依校务会议之决定而执行。”² 遵湄时期共召开 19 次校务会议（第 30—48 次）。笔者从竺可桢日记中摘录了每次会议的内容，可看出竺可桢的民主办校精神，也可了解浙大西迁团队的主要代表人物。

（1939 年）11 月 13 日 星期四 校务会议教员公推代表十人，已选出，计费香曾七票，顾谷宜、徐季旦、杨耀德³、缪彦威、储润科、陈建功、胡建人等七人各四票，此外三票者六人，以舒鸿、钱琢如当选。

（1940 年）4 月 27 日 星期六 二点在江公祠开到遵义后第一

1 蔡金涛（1908—1996），电讯工程学家。1980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浙大工学院教授。

2 参《竺可桢全集》第 2 卷，《欧美考察归来在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要点》。

3 杨耀德（1898—1986），江苏松江人。电机工程学家。时任浙大电机系教授。

次校务会议。首由余及教务、总务、训导及彭百川报告毕，讨论教员待遇问题及行政会议之组织、行政会之章则。票选五人委员拟草章程。五人为费香曾、张晓峰、李振吾、梅迪生、吴馥初。最后讨论学生学分不及格至 2/5 是否应照例退学问题。

5 月 17 日 星期五 二点至江公祠。开校务会议，直待至三点始克开会。通过三十年度预算，计一百四十万元。计俸给五十六万，办公费十二万五千，购置费二万六千，营造费三十万，学术研究费三十万五千元，特别费八万四千元。而二十八年度总预〔算〕为六十三万六千，本年为七十九万元。通过《浙江大学组织大纲》。

6 月 22 日 星期六 三点至江公祠。开第卅二次校务会议，决定：改行政会议为行政谈话会，大学迁移湄潭。此二事费三小时。次讨论教职员待遇问题，时已七点半，乃晚膳。膳后继续讨论。为教员薪给问题讨论几二小时。决计讲师 140 元起薪，助教七十元起薪。直至十一点始散。计开会七小时，而吃饭一小时尚不在内也。迁移湄潭，文学院郭洽周、缪彦威、陈剑修及周载之（理）〔反对〕，而此四人均未到过湄潭。而许多人均以下半年不能迁移为言。余几次说明，谓现在须决定者为迁湄与否是永久计划，如决定后即可逐步办去，非谓下半年决迁湄潭也。结果由费香曾提议决迁湄潭，几于余体通过，而当初发言之郭、周诸人则皆反对迁湄潭者也。

8 月 15 日 星期四 至柿花园一号教职员俱乐部开校务会议，因到者不及法定人数，故改谈话会。余首先报告校舍，招新生，及彭百川、姜伯韩辞职问题，及费香曾之任训导长。次及经费方面，近教部拨三十万四千作为添办电机、机械双班之用。次讨论来年学历，决定十一月一日开学，四日开课，下年七月十二放假。次张蔭谋报告本届毕业生可毕业者 116 人，尚有教育邬仲卿、数学郑锡兆、土木周邦立以学分不足不能毕业。此外机械沈承书以成绩过差自愿以借读生资格毕业，史地赵和铃亦有问题。尚有论文未交或考卷未阅者若干人。又蔡邦华报告湄潭筹备近况。

12 月 14 日 星期六 三点至柿花园一号开校务会议。今日因

讨论校舍迁移问题，故到者特多。上学期曾议决校舍以集中湄潭为原则，但近来有文、工二学院教授以遵义已可安居，不愿再事迁徙，且各人经济状况均极困难，更不愿再动。余不愿以贯彻个人之理想而使大家破产，故将此议案重新提出。开会如仪后，由余报〔告〕学校经费及建筑问题。次马裕蕃报告经费数目。张荇谋报告学生人数，到校者湄潭、永兴、遵义人数 1335 人，截至十二月十七日止，尚有新生（理院）六七十人未到。已到之 1335 人中有女生 124 人。以院分，则文学院 97 人，理学院 147 人，工学院 605 人，农学院 200 人，师范院 144 人。次周克英报告图书馆状况，谓抗战后离校教员所携去书籍计达 400 本，即从去年七月到本年十月间全校所购书籍尚不达此数也。报告毕，讨论迁移问题，自四点至十点。以大概而论，文、工二院欲留遵，理、农主张迁湄。说话最多者有剑修、晓峰、洽周。钟韩主留遵，刚复、朱正元、邦华、建人主迁湄。因郑重起见，暂不表决。

第 30 学年度国立浙江大学校务会议出席人员由校长、五院三长、一年级主任和选举推选的教授、副教授代表共 39 人组成：

校长竺可桢、教务长张绍忠、训导长张其昀、总务长胡家健、
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院长胡刚复、
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师范学院院长王璉、
一年级主任储润科、会计主任吴静山

系主任郭斌龢、苏步青、何增禄、王葆仁、罗宗洛、王国松、
李寿恒、吴钟伟、钱锺韩、卢守耕、吴耕民、杨守珍、陈鸿逵、夏
振铎、李相勖、（梁庆椿）吴文辉（下接任农经系主任）

黄翼、杨耀德、顾谷宜、陈建功、孙逢吉、诸葛麒、涂长望¹、叶
良辅、沈尚贤、钱宝琮、王师羲、彭谦（教授、副教授代表 12 人）

上学期共 38 人，法定人数三分之二为 25 人。下学期加李相勖，共

1 涂长望，时任浙大史地系教授。

39 人，三分之二为 26 人。

后补三人：万一、祝文白、朱正元。¹

11 月 27 日 星期四（校务会议教授代表开票，计黄羽仪、诸葛振公、涂长望、左之、顾谷宜、钱琢如、陈建功、杨耀德、王师羲、沈尚贤、孙逢吉、彭谦等十二人当选。）²

（1941 年）2 月 1 日 星期六 遵义 下午三点在柿花园一号开校务会议。余报告校舍问题，次讨论本年预算问题。因长望发言谓大部行政费均落腰包，使余大不怿，明知长望所指乃事务处诸人，如姚卓文、胡凤初走私中饱等事，但亦无实据。余即起而责问，经解释始散。

4 月 26 日 星期六 遵义 二点至柿花园一号教职员俱乐部开校务会议，连湄潭诸人共到三十三人。首报告，计余及张荇谋教务长、张晓峰训导长、王喜荪（伊曾）总务长、预算委员会李振吾。次即讨论湄潭新校舍如何支配案，自四点起讨论至七点半，无结果。晚餐后，八点余又提出讨论，至十一点余无结果。李振吾一年级迁湄潭案三次表决，第一次赞成 15、反对 14，第二次赞成 15、反对 16，第三次各 16 票，至此因时迟散会。

6 月 21 日 星期六 遵 二点半至柿花园一号开校务会议，到蔡邦华、陈家祥（代）等三十余人。首由余报告经费竭蹶状况，入不敷出，自一月至四月每月四万元，收入月十四万元，支出月廿万元，故拟向部追加预算八十万元。次及囤购粮食与制校歌、学生近来成绩之坏等各项报告。次荇谋报告统考与学业竞试等事，此外振吾代表预算委员会、储润科均略有报告。决定下年学历，今年十月五日开学，十三开课，七月五日放假。八点半晚膳。膳后继续讨论预算委员会，至十点散。

1 参蔡恒胜《我的求是之行——重走浙大西迁路》第 82—108 页，浙江大学冯骏先生提供的浙大西迁校务会议历次记录和签名的影印件。

2 括号内容参陆昌友执笔《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记略》。

（1942年）1月31日 星期六 遵 二点至柿花园一号开校务会议，到代表卅二人。余与张教务长、胡总务长、张训导长及一年级储主任报告后，即讨论提案：（一）龙泉分校不办三年级，（二）教职员生活设法改善，（三）请蔡邦华院长明赴筑见吴达铨主席，令警备司令部与潘、滕二人以充分时间审决。九点散。

今日校务会议报告总务方面，胡建人说明办公费，单讲义依照现时价目须年十七万至廿五万元，蜡纸每月六十筒，即一万八千元，讲义月发六万张，又灯油月一万四千元，煤炭五千元。全校学生1408人，龙泉除外，本届毕业十一人。

7月12日 星期日 遵 二点至柿花园一号洗浴。并开卅九届校务会议，到卅九人（卅六人为过半数），通过成立研究院及本届毕业生一百七十七人名单，其中140人之成绩已完全。讨论章则修改事颇久。七点晚膳。散。

第32学年度校务会议出席人员由校长、五院三长、研究院长、一年级主任和选举推选的教授代表共40人组成名单：

校长竺可桢、教务长张绍忠、训导长郭斌龢、总务长谢家玉、
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院长胡刚复、
工学院院长王国松、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师范学院院长王璉、
研究院院长郑宗海、一年级主任钱宝琮、会计主任吴静山

系主任叶良辅、苏步青、何增禄、王葆仁、贝时璋、李寿恒、
吴钟伟、万一、卢守耕、吴耕民、杨守珍、陈鸿逵、夏振铎、吴文
辉、朱正元

余坤珊、黄翼、杨耀德、费玗、诸葛麒、储润科、顾谷宜、陈
建功、孙逢吉、王焕镛、钱钟韩、沈尚贤。（教授、副教授代表
12人）

后补：胡家健、黄尊生、舒鸿

列席：附中校长胡家健

共计 39 人，列席 1 人。法定人数五分之三为 24 人。¹

(1943 年) 2 月 20 日 星期六 午后二点开四十次校务会议，到三十六人。首由余报告半年来经过，提出分校是否办三年级与永兴一年级迁湄问题，次谈及中央改善待遇办法。教职员校工人数，教部已决心限制，并报告办〔法〕。次报告本年概算数，最后讲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经过。次教务长张荇谋报告，总务长谢家玉及会计吴静山报告卅一年度办公费。一、二、三，三个月平均四万八千元，而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平均十四万八千元，增加三倍，即可显示通货膨胀。至于总务方面是否有浪费之处，亦是问题。关于龙泉分校，议决下学年不办三年级。次讨论提案（一）设立校务分会，在湄遵二处分别举行，每月一次。讨论约二小时，始通过。次讨论改善教员待遇案，因本年预算如维持原薪与原办公费，即无余款。故决设立节约委员会，推选黄羽仪、钱钟韩、胡刚复、沈尚贤、王劲夫、杨守珍、余坤珊七人为委员，并通过增薪开源等决定，时已九点。

2 月 21 日 星期日 遵 八点半至柿花园一号开校务会议。今日自晨至晚，开至一天之久，九点半始足法定人数。此次会议，全体卅九人中，只李相勖因学生反对教员事不到，王爱予因病后未复元未到外，余到会。今日讨论预算案。本年预算四百零六万，除附中十万、分校七十二万外，只余三百二十四万，即每月廿七万。而目前薪俸工资，如不再加，已至十万。办公费去年一、二、三〔月〕各四万八千，而十、十一、十二各月平均十四万八千。如仍以去年十、十一、十二各月之数，则为十五〔万〕左右，再加改善待〔遇〕之二成研究津贴，已达 27 万元之数矣。故本年不足之数总在每月十万至十六〔万〕之间。会中推定五院院长、三处处长及一年级与会计主任及校长为预算委员会。次讨论建筑款一万元以上者须经校务会议通过，及组织聘任委员〔会〕等。

1 参蔡恒胜《我的求是之行——重走浙大西迁路》第 82—108 页，浙江大学冯骏先生提供的浙大西迁校务会议历次记录和签名的影印件。

午后洗浴之后，三点继续开会。决议设立招生委员会案等等。最后通过民国廿九〔年〕章则修改委员〔会〕拟提出而迄无时提出之《浙大校务会议规则修改草案》及《校务会议议事细则修改草案》。又临时动议增设政治经济系及物理〔系〕发电机十万元案，均通过原则。惟设委员会调查附中案未通过。时已七点半。散会。晚膳。抗战以前，浙大教授对于校务会议漠不关心，故开会时常不能足法定人数。近来因生计关系，各觉有切肤之痛，故渐渐认有开会之必要。而同时对于学校，亦认为余已休戚相关，此则不得不认为一种进步也。

（4月10日第41次校务会议，竺校长缺席〔去重庆〕遵义和湄潭分别召开会议，遵义部分出席会员16人，湄潭部分出席会员18人。）¹

7月6日 星期二 遵 二点半至柿花园一号开校务会议，到卅三四人。首余及荃谋、洽周、高学洵、钱琢如之报告。又会计吴静山报告经济状况，知去年经常〔费〕收付两抵，相差甚微。亏负约四万五千元，但有收入三万元，足资弥补。去年米贴收支均一百六十二万元。贷金收一百〇八万，支一百〇六万。工读收支各十一万四千。但生活津贴支出六十五万，收只五十一万，亏十四万元。卅二年经常〔费〕每月（连添班二万四千，先修班二千）二十九万六千（中学年十万、分校月六万在外）。自一至五月收一百四十一万，而支用一百三十九万，尚有账目十万，两可相抵。但单旅费一项计十二万，可知旅费所占成分之大，乃各院向筑渝购物及新聘教员之旅费也。此外透支利息年须七八万元。五个月中米贴收支均为八十二万；贷金收八十四万，付约六十万；生活津贴收十八万，付为四十五万，相差二十七万云。

次讨论提案，定下学年上课每学期各十八周，毕业生中化工赵元卜等四人须补材料力学，史地系十余人须补经济与哲学概论。乙

1 括号内容参《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120期（1943年6月10日），遵义部分由梅光迪代校长主持，湄潭部分由胡刚复主持，分别讨论了有关事项。

种奖助金决照原单分，校不再支配（单见五月十三日记）。次讨论自八月起加研究津贴及本届遵义招生诸问题。通过〈院〉〔校〕务会议章程。时已十一点。临时朱正元又动议讨论五十五万临时费支配问题。余事先已报告，此五十五万以五万为医药购置，卅万为遵义建筑，十万为湄潭建筑，十万为各系设备，经各人讨论，迄无结果。至十一点三刻散会。

11月13日 星期六 下午三点开校务〔会〕议，行礼如仪后，由余及荃谋、振公（代洽周）、直侯、晓沧、琢如报〔告〕，经二小时之久。次讨论提案，有核定本年一百六十二万追加预算案，计设备四十八万，医药八万一千，低薪职员十二万一千，分校廿万，中学四万，抵亏负六十万，加二成薪十万元，结果交预算委员会。此外尚有机系提增加设备费十万元案、印行学则案（迪生提）、设立教务会议常务委员会案（香曾提）、整理各种委员会案（羽仪提）。讨论终结已九点三刻，散会。今日到去三十三人。当时有余坤珊、沈尚贤等提议，于追加预算项下提出四十万加教职员八成薪水，未通过。以季梁、馥初、念慈、鸿逵等以设备费不可全无也。

11月14日 星期日 遵 八点至柿花园一号继续开会（校务会议），讨论农场租金及出产列入预算案、补助教职员煤水案及下届校务会议在湄潭举行案。最后沈尚贤对于二十万元教职员住宅建筑费中以十万元为湄江饭店押租表示异议一节，以无人赞〈动〉〔助〕不能成立议案。散会已十二点半。

第33学年度校务会议出席会员由校长、五院三长、研究院长、一年级主任和选举推选的教授代表共40人组成名单：

校长竺可桢、教务长张绍忠、训导长郭斌龢、总务长高学洵代、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院长王国松、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师范学院院长王璉、研究院院长郑宗海、一年级主任储润科、会计吴静山、系主任李絮非代、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孙宗彭、李寿恒、

吴钟伟、易鼎新、卢守耕、吴耕民、杨守珍、陈鸿逵、夏振铎、吴文辉、朱正元

费巩、陈建功、黄尊生、杨耀德、顾谷宜、叶良辅、诸葛麒、余坤珊、钱宝琮、钱钟韩、王焕镛、舒鸿、罗登义（教授、副教授代表 13 人）

列席：附中校长胡哲敷

共计会员 40 人，列席 1 人。法定人数五分之三为 24 人。¹

5 月 9 日 星期二 遵 午后二点至柿花园一号开校务会议（四十四次），通过本年暑假毕业生共 349 人，其中师 33、文 30、理 41、工 176、农 79 人，均需于大考成绩齐全后始得毕业。其中有四十四人已应征为译员。教育部来文推选校务委员五人为财政稽核委员，余有当然委员二人，即校长与总务长。即选出王劲夫、羽仪、香曾、润科与钟韩为委员，杨耀德、余坤珊为候补。最后通过大学组织、校务会议规程及议事细则等。

10 月 31 日 星期二 四点开行政谈话会，……最后检票选举校务会议教授代表，计选费香曾 39 票，杨耀德 36 票，陈建功、余坤珊²、黄尊生各 33，次为钱钟韩³、钱琢如、顾谷宜⁴、叶左之、罗登义⁵、舒鸿、诸葛麒、王焕镛⁶等十三人次多数，胡哲敷、沈文辅各十八票。

12 月 2 日 星期六 遵 下午三点开校务会议，到四十余人，湄潭来者廿一人，惟步青与亦秋未来。余报告经费及添班经过后，张荇谋报告到校人数，计 1658 人，男生 1432，女生 226 人。四年级

1 参蔡恒胜《我的求是之行——重走浙大西迁路》第 82—108 页，浙江大学冯骏先生提供的浙大西迁校务会议历次记录和签名的影印件。

2 余坤珊（1904—1956），江苏江宁人。时任浙大外国文学系主任。

3 钱钟韩（1911—2002），江苏无锡人。热工自动化学家。1980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浙大机械系教授。

4 顾谷宜（1904—1966），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时任浙大史地系教授。

5 罗登义（1906—2000），贵州贵阳人。农业生物化学家。时任浙大农化系教授。

6 王驾吾（1900—1982），名焕镛，江苏南通人。文史学家。时任浙大中国文学系教授。

389, 三年级 385, 二年级 385, 一年级 420。各院分配: 文 120 人, 理 210 人, 工 815 人, 农 274 人, 师范 157, 研究院 50, 先修[班] 32 人。以地点分: 遵义 757, 湄 435, 永 420 人。尚有附中四百余人, 故学生达二千余。次讨论应付时局问题, 决定组遵、湄、永三地临时校务会议。计遵为余、梅、王、郭、高、吾舜文、钱钟韩与张荇谋九人, 湄潭郑、王、胡、蔡、舒、王爱予、江希明、胡哲敷、王淦昌九人, 永兴储、钱、高尚志、费特生、丁绪宝五人。对于迁移地点暂不决定, 大概以湄潭、绥阳、仁怀三地为目的。决派孙怀慈与刘之远赴仁怀, 傅梦秋与钱钟韩赴绥阳。晚膳时约绥阳县长韩续初来谈。知遵义离绥阳 90 华里, 通公路, 惟贵州大学已先定就房屋。浙大如往, 须至旺草云。七点晚膳。八点三刻继续开会。因王福春曾至正安, 知其地不产米且多盗, 故决计不往。散会已十二点。

12 月 15 日 星期五 遵 九点开临时校务会议, 决定收留贵州大学农、工二学院学生四年级毕业班四十人在浙大结束本学期。余报告应变费政府共允拨一千八百万元, 拟以一部发垫十一、十二两个月之追加生活补助费, 每月约需一百万元之数。

(1945 年) 6 月 2 日 星期六 遵义 二点至校。在心理实验室¹开校务会议, 到四十人。王淦昌委托卢鹤绂²、储润科托高尚志、贝时璋托江希明代表出席。初次到会者尚有沈文辅、舒鸿、胡哲敷诸人。行礼如仪后, 首由余报告约二十分钟。次教务长荇谋报告, 知本届毕业生大学 282 人, 研究院 22 人, 去各大学 46, 研究生 1 人。下学年学历定上学期九月十日至一月十九日, 春季学期二月十八至六月廿九, 此二案均通过。次洽周报告训导, 知本学年从军学生共 137 人, 超出中央所定额 70 名, 达一倍。译员去年三月与本年四月两批亦 137 人。次会计吴静山报告, 知本年一至四月校中经常[费]亏空二百六十万元, 故幸得增倍预算。次讨论提案。(1) 研究院章则四

1 据校务会议记录签名册, 地点为柿花园一号。

2 卢鹤绂(1914—1997), 字合夫, 山东掖县人。核物理学家。1980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浙大物理系教授。

条通过。(2)教员升格委员会，照部定，推定张蔭谋（主席）、黄尊生、陈建功、杨耀德、陈鸿逵、陈立六位。(3)选定建筑委员，票数最多为吴馥初、胡刚复、蔡邦华、王劲夫四人，连同校长、总务长与会计。(4)选举经济稽核委员会，票数最多为杨耀德、黄尊生、余坤珊、钱宝琮、吴耕民五人，加当然委员校长与总务长。(5)改校庆纪念日，自八月一日改为四月一日。(6)确定教导方针，此案讨论最久。余作结论，即：(a)立法宜简而宽，执法速而严；(b)提倡学[]空气；(c)有功必赏，有过必罚；(d)实行指导；(e)壁报照现有方针；(f)罢课者严惩。八点散会。

9月14日 星期五 湄潭 八点半至数学研究所开校务会议第四十七次。九点开会，到四十人左右，振公、洽周、迪生均以病告假。余举行仪式后即读上届纪录，报告校务会议选举结果，杨耀德(48)、钱琢如(44)、陈建功(43)、黄尊生(39)、叶左之(39)、顾倬南(35)、余坤珊(37)、诸葛振公(33)、孙逢吉(32)、江希明(31)、王爱予(30)、王淦昌(30)、王驾吾(27)、胡哲敷(27)，次多数陈卓如(24)、苏元复¹(22)、舒鸿(22)、祝廉先²(19)、萧辅³(19)。今日候补委员亦列席。

首由余报告，述胜利临头，本月二十号教部召集会议讨论复员，故余须提出召集校务会议。次述龙泉方面已派人去杭州，惟交通工具缺乏，何日启行毫无把握。次则临行以前不能不忆及从杭州同来之黄羽仪及张荫麟均已物故，而香曾则仍然失踪，不能不为留念。并述以后办学之方针，法学院势必设立，将来须成3000—3800人之大学。成绩不能降低，而教授人才、设备与房子实为发达学校最要条件云云。蔭谋报告现遵义已到校学生553人，湄潭299人，共852人。新生尚未到，预期150人。次家玉报告教职除中学外，大口1455人，小口303人。书籍仪器遵700，湄750，永50箱，共

1 苏元复(1910—1991)，浙江海宁人。化学工程学家。1980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浙大化工系教授。

2 祝廉先(1884—1968)，时任浙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

3 萧辅(1905—1968)，时任浙大农学院农艺系教授。

1500 箱 150 吨。行李书籍属个人者 2000 件，约五十吨。人与随身行李亦算 200 吨，共需 400 吨，需车 170 辆。至海棠溪要酒精 11, 600gal., 回途不算。添做木箱一千, @25,000 元, 要二万五千元。需二百吨轮二只到杭。以上共需洋三万万至五万万。杭州房子以 2000 学生计, 须一千方; 二十五系、五研究所, 每所 100 方, 三千方。共四千方。十万元一方, 共四万万元。2000 学生、廿四系木器一万万二千万元 (胡估校舍十二万万、木器八万万元)。

次讨论提案, 校址无决定, 暂在旧址上课。上课第一学期至本年十二月底止, 第二学期临时再定。增进全人福利计五点: (1) 回家途中供给旅费膳宿, (2) 拨衣、住二项救济费, (3) 拨 300—500 美金为购书费, (4) 请款建教职员住宅, (5) 临行前发三个月薪津作预支。员工停职者另发遣散费。成立复员委员会, 以校长为主席, 共十三人, 另设湄、永、遵三处分委员会, 以校长、胡院长、储主任组织其各别分会。校产如有出售, 由分会核准呈校长许可后行之。六点散会, 计开会九小时。中午时拍一照。晚八点回。

(1946 年) 2 月 20 日 星期三 遵义 开校务会议 (四十八次)。

十一点开研究院院务会议, 到吴文晖、贝时璋、卢庆骏、张晓峰、李乔年、张萆谋、王劲夫、陈鸿逵等。决定本届应毕业之学生九人, 史蔡钟伦, 化工岑卓卿、陈希浩、陈南阳, 农经金能旺、左国金、汪经方。本年卅四年研究院经费八十二万元, 分配如下: 〈如〉史地部十五万元, 数学部十二万元, 生物部十八万元, 化工部二十万元及农经部十七万元。并讨论本年招生问题。

二点至柿花园开校务会议, 到四十余人。先报告上次纪录, 为迪生过世志哀一分钟。次余报告。谢赓报告会计年度收支情形, 卅四年收国家经、临各费三万七千万元, 经常费收支两抵, 尚余二百多万元, 详情见油印报告。次讨论提案。有派定校舍委员会案, 决定各院一人, 总务一人, 并余与季讷组织之, 共九人, 决定杭州校舍。设立医学院、哲学系、森林系、畜牧兽医学系、体育系、艺术系等, 均以部拨适当经费为条件, 通过。张晓峰提议设立常务委员,

交委员会审查，提下届校务会议报告。七点晚餐后洗浴。八点半重开。讨论一年级生分院但不分系别案，通过。教授七年休假案，交预算及聘任委员会。及本校图书集中一处迁校后实行案，通过。临时提出者有教授七年以上死亡后其子女得享受公费案，通过。临时易鼎新提议讨论东北案，推定黄尊生、王驾吾、郭洽周三人起草作宣言。时已十一点，散会。今日下午拍一照。

六、遵湄时期的重要讲话和办学思想

遵湄时期被称为浙江大学的黄金时代，大师云集，人才辈出，教学、科研成果累累。1946年复员回杭时，浙大已经发展为文、理、工、农、师、法、医7个学院、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约200人，在校学生2000余人¹。遵湄时期的成功办学，使浙大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湄办学靠什么取得成功？靠的是竺可桢的胆识、魄力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竺可桢强调大学之最大目标是求真理，这可以说是理知的，亦可以说是道德的。

（1940年）2月12日 星期一 7：50 纪念周，行礼如仪。余演讲题为“革命与科学”，谓天文学地球绕日之发明引起十六七世纪欧洲之思想革命，而有此思想革命，欧洲继起研究科学者益多。1764年Watt瓦特发明蒸汽机，遂引起十八九世纪工业之革命。科学与革〔命〕均有“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义。凡与真理相背，〔与〕全民利益相冲突者皆非科学与反革命。〔科学与革命〕二者且均出于爱。Bruno布鲁诺之死，以其爱真理胜于其性命。中山先生之所毕生致

1 依据1946年浙大教师名册，复员回杭后在浙大工作的人员，与从贵州回来前的有些差别。因一部分人从贵州回来后并没有回浙大工作，而到其他学校去了。此名单里也有一些并未在贵州工作过。现把各系教授、副教授人数列于下：园艺5、农化3、蚕桑5、农艺6、病虫害4、农经6、公共4、森林2；理学院院部：1、化学9、生物13、物理9、数学8；理化5、师范教育9；外国文学12、中国文学7、史地16；土木8、电机8、机械10、化工8、航空3；公共科目13。还有些教授不明系别，暂不统计在内。据此统计，有教授、副教授174人。

力于革命，由于其爱中华民族。人溺如己溺，故不得不加以援手。并引蒋百里《国防论》中谓“牺牲为量爱之寒暑表”云云。

1. 科学与革命¹

(1940年2月12日)

主席，陆军大学诸位同学：

“科学与革命”在未讲二者关系之前，得先解释何谓科学，何谓革命？

科学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别，又有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别，有狭义的科学和广义的科学之分。从广义言之，一切分门别类的事物统可名之曰科学，但从狭义言之，所谓科学实只限于自然科学，或是所谓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甚至于教育、心理（地理）之类，还不能算是科学。无论哪种科学，他的真正目标是在求真理真知真识，所谓真知灼见。宋代朱子所谓“致知格物”这个“知”，就是所谓真知。在我国古代学者中间，朱晦庵是很科学的。希腊的学者梭格拉底（Socrates）以求真知为他的使命，他努力要造成一种爱真理求真知的风气，他也可以说是泰西第一个科学家。

革命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言之，就是革新个人的行为道德，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曾国藩年少时本是一土豪劣绅，到北京以后，经倭艮峰和几位先进的切磋，才变成了有清一代的人材。抗战以来也有不少的实例，如张自忠将军本已做了汉奸，但不久就翻然觉悟而奋勇抗敌。广而言之，则社会国家以及全世界均可有革命。这种革命或是物质上的，或是精神上、思想上的。十八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就是前者，而十六七世纪的泰西思想革命就是后者。

科学与革命是互相为因果的。在十六世纪以前是欧洲的黑暗时代，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据作者收藏手稿整理编录。原稿在篇名旁标注“（民廿九年二月十二日在陆大纪念周演讲）”。陆军大学在遵义，作者当日日记中记有本次演讲事。

那时神权膨胀，教皇之力大于君主。当时以为世界一切统是上帝于七天之内造成，地球是在天下之中〔心〕，欧洲南部的地中海是地球之中〔心〕，罗马又在地中海之中〔心〕，所以一切均以罗马为中心。太阳绕地球而行是天经地义，毫没有疑问的。到了十六世纪末，Copernicus 已经从天文学上的观察断定此说之非，可是他就不敢发表。罗马教士 Bruno 因为〔宣传〕地球绕太阳〔说〕，被活活烧死。年已七十岁的 Galileo 至于下狱。但是，教皇权威虽可以生杀予夺，而一般研究天文的人们仍继续不绝地寻求真理。如 Kepler、Newton 等继续研究，结果真理大明，因此造成思想上的大革命，使人人知道世界并非上帝所造，而地球并不是在世界之中〔心〕。这思想上的革命引起科学的发达，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物理、化学上各类的发明，均奠基此时。到了 1764 年，瓦特（Watt）发明蒸汽机，各种近代工业开始萌芽，于是又造成了十八九世纪工业革命。从前要人造的东西，现在处处可用机器。再拿简单的一例，〔缝〕针从前一个人只能做一二支，单针的孔孔就不容易钻出来。现在造针用机器，一个人可以制数千以至数万，每人所做的不过很简单的一部分工作而已。机器发明以后，从前的家庭工业一变而为大规模的企业，从前躬耕而食、织布而衣的社会变为分工合作的社会。所以从天文学上的 Galileo、Copernicus、Kepler 和 Newton 的研究引起了十六七世纪欧洲思想的革命，从思想的革命又引起十八世纪物理学上的发明，从这发明又引起了十九世纪初叶的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所谓机器时代。科学的发明时时引起我们衣食住〔行〕或是思想上的变动。举一个例子，以通讯工具而言，三百年前，当明末的时候，崇祯帝吊死煤山，这消息传到南京，化了一个多月工夫。现在则无线电一秒钟可以走三十万公里，加上拍电报的时间，也只须数分钟而已。再就交通而论，十九世纪初叶，拿破仑征俄国败退，从莫斯科逃回巴黎，费了五十几天，而现在直线三千公里，以飞机飞行十小时可达。即此一端，已足以见科学对于吾人衣食住行之革命程度。

科学和革命，有一相〔同〕的点，就在于事事要日日在革新，所谓“又日新，日日新”。科学的精神是在求真理，无论〈如何〉于我们宝贵的

理想或是传统的计划，假使一旦我们晓得是错误的话，我们得立刻改过来，文过饰非不是科学精神。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时候，那时物理学上权威 Lord Kelvin 曾经讲过物理学上定律差不多我们大体统晓得了，后人的事业不过做些拾遗补缺的工作。那时候，“物质不灭”“原子不变”之说，以为是牢不可破的。即如我起初读化学的时候，教科书上开宗明义就说 An atom is indivisible，但是经 Roentgen X 光的发明，Curie 镭的发明，物理学上就起了革命。到了如今物理学上新发明年年均有，从前老的定例，如 Newton 地心吸力定例均须改正（相对论），原子不但可以分，而且可以变动，甚至由物质变成力量，这力量非常之大，一小杯的空气原子，如有方法把他打碎，可以发出力量等于数百吨的煤，所以有人说，一小杯空气可以推动一只邮船经过太平洋。足见科学是日日求新，川流不息。

革命的精神也是一样。我们从“革命”两个字就可以晓得，革命也得自日日新，又日新，川流不息的。革，是革新、改革的意思；命，就是命运；革命，就是改革我们的命运。中国人最信仰的是命运。农夫靠天吃饭，环境恶劣不去奋斗而怨命运不好，因此算命先生到处通行。在南京的时候，有不少大人先生们统到善堂去扶品，去问吉凶祸福，甚至于做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黄河出险要合龙的时候要去请大仙。这就是最不科学而最不合乎科学精神的。科学的精神是在求真理，而革命的目的是为谋人民或社会的幸福（至少〔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凡是学科学的人并非每个人统是在求真理或是在谋幸福。德国的科学家捏造耶稣是条顿人。日本的人类学家欲证明日本人是白种人。这种只能称之为御用科学家或是八股派的科学家。他的目的不是求真理而在骗饭吃。算是改革，不能算革命。譬如在遵义，二百年以前于地方最有裨益的有一位长官，他是山东的陈玉璠。遵义从前没有柞蚕，到了乾隆六年，遵义知府从山东传入柞蚕。到了乾隆八年就有八百多万茧子，一直到光绪至民国初年，每年农民收入多时二三百万元，少亦数十万元。照遵义知府说，遵义之所以富甲贵州以此。这陈太守到了遵义短短数年工夫，可谓造成了生计上的革命。但改革未必尽好。1840 年〔至今〕刚巧一百年以前，英国人强卖鸦片，造成了鸦片之战，从此烟毒弥漫全国，而尤以贵

州、云南、四川三省为甚，到如今言之痛心。贵州虽厉行禁烟，而烟籍人士尚占很大数目。这种习惯的养成是不是革命？这是反革命。能革除这类习惯就是革命。

科学是求真理，革命是求幸福，二者并行不背。要达这两种目的，统需要伟大的爱，即孙中山先生所谓忠孝仁爱的“爱”字。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家 Bruno 为什么情愿烧死在十字架，Kepler 和 Copernicus 为什么情愿贫苦终身而不愿相信地在天之中〔心〕呢？就是他们爱真理。孙中山先生一生革命，有一次他的信徒邵元冲先生问他终身有没有嗜好。他想了想才说道：“我没有旁的嗜好，我惟一的嗜好就是革命。”中山先生四十年奔走革命，冒万死以赴之，为什么呢？就是他爱我们中华民族，所以他不惜牺牲一切。贵校前任代理校长蒋百里有言道（在《国防论》第七篇“美术与宗教”里），爱量之大小〔是〕不可测度的，而牺牲精神却正是爱量之寒暑表。古来的英雄、大革命家、大科学家统有伟大爱的表示，这从他们牺牲精神可以看出来。

8月16日 星期五 浙大毕业典礼。……

高文伯专员及孔福民县长均到。我校招待有苕谋、壮予、香曾、邦华、振吾、迪生、刚复、季梁、诚忘等。八点举行典礼。行礼如仪后，首由余致辞半小时，“论欧战给予吾人之教训”。次苕谋报告，计本届117人，计80平均分者23人，电机汤兰九、冯绍昌，化工徐嘉森，土木周存国、吴廷琿、赵人龙、胡传扬，机械史汝楫、任传丰、来虔等，外语范文涛、李水娟、王文珏、周瑞华，史地沈玉昌、戎文芝、王爱云，数学白正国、程民德，物理曹莹龄，农化吴志华，植病王铨茂，农经李秀云。此外乙等78人，丙等16人云。尚有去冬毕业生朱芬芬、华巽、丁普生等十人。待成绩齐全能毕业者三人。次给授证书，各院代表领受。

2. 论欧战给于吾人之教训¹

(1940年8月16日)

浙江大学正式成立于民国十六年，迄今虽仅一十三载；但追溯至杭州求是书院之创立，则已有四十四年之历史。创立以来，学校虽饱经忧患；但困苦艰难，未有逾于本届毕业同学入学后四年中所经历者。自抗战军与本校由浙而赣，而桂，而黔，时将三载，路经一千六百公里。二十六年度毕业典礼尚在杭州举行，二十七年度在泰和，二十八年度在宜山，本年度则在遵义。但望最后胜利终属于我，下届毕业典礼又能回杭州举行。在抗战以前，毕业同学每届毕业时，有失业之忧；但在抗战时期，各项建设，质量上都蓬勃地发展，处处都要大批的人才来参加，故最近一二年的毕业同学，都有供不应求之概。这一方面可见在抗战时期，国家需要人才之切，从另一方面讲，诸君现在到社会去服务，责任的确特别地重大，需要格外努力。所谓“大学”，《礼记·大学》篇第一节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子把“在亲民”定为“在新民”，汉学家颇有以为不妥者。因为古代的大学，本质虽是贵族的，但也容纳庶民的优秀子弟。这样，贵族的子弟与庶民的子弟共聚一堂，互相接触，使贵族的子弟对于庶民的生活，有亲切的了解，以为他们将来从政的一种准备。现在的大学，不分地域，不分贵贱，不论贫富，各种家庭的子弟都有，与“亲民”之义更合。以前有人批评国内的大学为贵族化，因校舍院是崇楼高阁，画栋雕梁，而内部设备又是十足洋化，学生过惯了舒服的学校生活，连自己家庭生活都过不惯，更不必说到“亲民”或深入民间的话。但今日的情形已大异，大学学生物质方面的享受，已远不如前了。本校素尚朴质，在杭州时，校舍本不佳，但现在更简陋万分。我们现在的享受，虽尚较一般的平民为优，但已渐渐地愈趋愈近了。同时我们走了这许多地方，耳闻目睹，对于他们的生活，也渐渐地愈能深切地了解。所以我们一方面在颠沛流离，一方面却在更进一层地亲民。这本身便是一种很可宝贵的教育，在平时是不易获得的，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摘自《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56期（1940年8月24日）“本校举行第十三届毕业典礼纪盛”。系在浙大第十三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篇名据作者当日日记的记述而拟。

深望诸君能本古人“先觉觉后觉”及“民溺我溺”之义，倍加努力。本校一再播迁，诸君辛苦备尝，今日仍能行毕业典礼，原是一种很不容易的事。所谓毕业，实在说来，是学校课业已完毕，而社会服务作事的经验却从此开始，故英文名毕业为 Commencement。清朝袁子才有两句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诸君此后当时时处处地利用时间，作进一步的研究，利用机会作进一层的观察，即待人接物之微，亦应虚心体会。这样，学识日丰，经验日富，将来便可临事不乱不惧了。荀子说：“君子耻不能，不耻不见用”，到彼时诸君如有很好的机会便可当大任，立大业，于国于民，能尽最大的贡献了。其次，诸君应明利义之辨，要把抗建的大业看得透彻，切不可妄自菲薄。我们要知道，学土木工程的能造一条有价值的公路或铁路，和亲上前线去杀敌的一样与国家有益，其他学教育、经济、政治等等的，能忠勤于自己的事业，在抗战时期，与直接去制造飞机大炮同样地重要。所以诸君此次毕业后，出外就业，第一该权衡事业的轻重缓急及自己的能力，切不可斤斤于待遇之厚薄及物质享受之有无。年青的人，目光应远大，要有英勇前进无畏的精神，处处应以国家社会为念。中国的前途，端在自力更生，依赖旁人，总不如靠自己。诸君服务社会，直接负起抗战建国的使命，耐劳苦，忠职守，循次顺序，不急不恼，自奋自勉。这次欧洲大战，给与我们不少的教训。自从本年六月，德兵入巴黎，法国屈服以后，上次欧战中法国名将贝当毅然出来组织政府，收拾残局。有人问贝当这次法国失败的原因，他道法国这次的败北，是由于兵士不足，军械不精，外援不来；而根本缺点，种因甚远，乃由一九一八年胜德以后，朝野上下，一致晏安奢淫，只顾取乐不愿吃苦所致。贝当的话，正是国人的当头棒喝。古人有言：“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从艰劳困苦的环境中去磨练，然后能成一个完善的人。在这个大转变的时候，务望诸君格外谨慎，格外努力；并祝前途无限，于人于己，都有极大的成功！

（1941年）4月10日 星期四 重庆 晚阅 Bernal 贝尔纳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Science* 《科学的社会功能》，批评日本之科学工作为 pedantic, over-elaborate without imagination, uncritical and in accurate 学究式、过分细

致而无想象力、无批判性且不准确。

5月9日 星期五 遵 晚 训导处及自然科学社遵义分社合办科学近况讲演，第一讲余在何家巷讲“近代科学之精神”。

余首引 Bernal 贝尔纳 *Social Functions of Science* 《科学的社会功能》书中关于近世科学在中国之段。氏谓以中国谨严之态度、忍耐之精神、中庸之德性，将来对于科学之贡献决不在西洋之下云云。余乃述西洋近世科学之兴起及科学之方法，而注重于科学之精神。谓科学之精神在于不顾利害以求真理，祛除成见以就理智，及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最后引 Poincaré 语，谓“科学活动目的在求真理，惟求真理，斯值得科学家之努力。此种力量首当用以减轻人生之痛苦，虽系消极作用，世界若毁灭，则人类必能解脱。但科学家之所以欲解除人生衣食之顾虑者，在于使人人有多余之时间足以审思熟虑真理耳。”查 P 氏死于 1912 年，时第一次欧洲大战之前。近卅年来经过二次大战，科学之结果用之于增加人之痛苦者良多。氏若有知，不知作何感想？我国人素信中庸之道，若近世科学能发扬于中国，则世界情形必不致如目前之扰攘矣。

5月22日 星期四 遵 阅 Bernal 贝尔纳《科学对于社会之机能》一书，谓科学发达之初即在其能利用厚生，而战争尤利赖之，如 Galileo 伽利略原为 Pavia 帕维亚大学军事学教授（p.168），而 Leonardo da Vinci 达·芬奇则以能制枪炮见重于意大利之诸侯 Duke of Milan 米兰大公。法国化学之鼻祖 Lavoisier 拉瓦锡为法国兵工厂职员。又英国大部科学研究之款用于战事有关者，如毒气研究之款多于医药卫生云云。

6月6日 星期五 遵 晚 阅 Bernal 著《科学之社会应用》。谓英国入大学人数不过全体青年 1.9%，德国 3.9%，法国 4.3%，俄国 5.2%，美国 15%。中国如以青年男女在 19—22 岁作全体人口百分之五计，则为二千万人，而大学生不过二万人，则千分之一而已。

《思想与时代》社和《思想与时代》

《思想与时代》由钱穆、朱光潜、贺麟、张荫麟、郭斌龢、张其昀组成的《思想与时代》社编辑出版，与浙大史地部文科研究所合作进行研究工作。竺可桢极为重视，投稿三篇重要文章：一为创刊号首篇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二为第24期的《科学与社会》，三为第34期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浙大学人也发表不少重要文章。

（1941年）6月14日 星期六 晓峰来谈《思想与时代》社之组织。此社乃为蒋总裁所授意，其目的在于根据三民主义以讨论有关之学术与思想。基本社员六人，即钱宾四（穆）、朱光潜、贺麟、张荫麟、郭洽周、张晓峰六人。主要任务在于刊行《思想与时代》月刊及丛刊，与浙大文科研究所合作进行研究工作。月刊定七月起发行，每月由总裁拨七千五百元作事业费，其中2500为出版费，1500元为稿费，编辑研究2000，与史地部合作研究1500元。据晓峰云，拟设边疆、气象、南洋、东北四研究计划，补助文科研究所之不足云。

7月6日 星期日 今日在家缮写《近代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文。……

晚作《近代科学之精神与方法》文，直至深晚。

7月7日 星期一 将昨草缮之《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重阅一过，并加上一小段。此文全长六千字，交允敏阅后，请其寄与晓峰，以便登入《思想与时代》第一期。

8月7日 星期四 晓峰交来第一期《思想与时代》之目录中余著《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文稿，觉其文字太欠润色，而余以限于时间，许多生硬地方，有时间则应加以纠正。

10月19日 星期日 晓峰出布雷、钱宾四函相示，知布雷对于《思想与时代》每文必读，且对于晓峰著《中国古代教育家》一文已集专刊，由委员长为之印行签署矣。

（1942年）6月3日 星期三 晨阅吴其昌著关于安南、暹罗、缅甸一文，登《思想与时代》九期。

11月29日 星期日 晨 阅《思想与时代》中冯友兰《天地境界》一文。谓万物皆备于我，方为同天境界云。

(1943年)1月23日 星期六 张荫麟又在《思想与时代》上著一文，均为委员长所见而有褒扬之议。

2月19日 星期五 适晓峰去美国，美国政府催于三月动身，故《思想与时代》事将由钱暂时主编云。

2月28日 星期日 晓峰定三月十五去渝转往美国。渠欲由《思想与时代》社主持，在美国出一英文月刊，以介绍中国思想。余颇然其说。

6月18日 星期五 晚 阅《科学与近代思想》稿，此稿由俞心湛抄录，拟登《思想与时代》，并改名为《科学与社会》。

11月6日 星期六 今日晤谢幼伟，请其担任此事，渠虽勉允……

(1944年)2月25日 星期五 阅《思想与时代》十一期中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谓有三点：(一)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兴趣远在纯粹活动之上，实践的价值压倒观见的价值，而西洋人相反。所谓实际的活动即是“正德利用厚生”，《左传》之所谓三不朽是也。中国人把道德放在一切价值之上，但同时亦重视利用厚生。许多人以为西洋近二三百年来在利用厚生上有惊心动魄的成就，认定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文明，而中国人之所以落后，由于不重功利，这是大错。正惟西方人不把实际的活动放在纯粹的活动之上，所以西方人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亚理士多德的《伦理学》以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的观玩。《大学》的至善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国人说“好德如好色”，西人说“爱知爱天”。纯粹科学在西方形成甚早，而中国古代未曾出现。没有发达的纯粹科学，也决不会有高明的实用发明。(二)个人对家族义务、权利观念不同。(三)中国文化是内陆的、农业的、静的，西洋是海洋的、商业的、动的。

6月16日 星期五 昨林昭将稿《二十八宿考》交来后，昨晚、

今晨将其重阅一过，可称最后修改稿。即交与絜非，在《思想与时代》付印。此文承土木系三年级生林昭费时抄录，余心甚感之。林且极细心，曾改正原稿中数〔处〕。

8月3日 星期四 晚阅《思想与时代》卅一、二期中全增祐著《清代幕僚制度论》。结论谓幕友制远承古代辟掾选吏之遗风，萌芽于明中叶而完成于清初，因学与政脱节之故。习幕素重实际体会方面，故在学成出而佐治之际，易于切合实际情形。绍兴人多以游幕为业者，因其人具有精深谨严之遗传因素，再有其环境因素之衬托云云。又谓章氏世籍会稽之道墟。以吾所知，终清之世，道墟之章以游幕为业者，历有人焉。故知史学之子孙，虽其不能使之成史学家，然其才必有以自见，如道墟诸章是也。又谓自明嘉靖知府汤绍恩兴修水利，山阴、会稽、萧山三邑方数百里间，只知有水利，不知有水患云。

10月8日 星期日 阅《思想与时代》缪彦威著《六朝人之言谈》。谓春秋时以周音为雅言，故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即今之官话。至六朝《颜氏家训》，谓音韵锋出，各有土风……推而量之，惟金陵与洛下耳。张籍《永嘉行》曰：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魏晋以来，音韵学兴，故重读字之正确，人知双声叠韵，重声调之美。《南史·张敷传》谓与人别，执其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

（1945年）4月29日 星期日 阅洽周在《思想与时代》所著《人治与法治》一文，与余明日纪念周所欲讲法律与道德意颇相合。在此乱世，道德日益堕落，大学应为社会树立风气作中流砥柱。芝加哥大学校长 Hutchins 曾谓“大学乃为领导社会以树立人类理想之园地，吾人得尽全力以保护培植”。中西道德虽视若不同，中国讲刻苦，外国人讲享受，但是享受之目的在于乐，而乐之趣味各人所感大不相同。如 Thoreau 梭罗所云，The person who can enjoy his own thought is a rich man 能以其思想自乐者乃富翁也。此与颜回“一簞食，一瓢饮，人不胜忧，而回不改乐”者正同。《论语》：“齐景公有马千

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民到今称之。”这是讲人格之价值高于金钱。西洋亦如此。即孔子对于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亿则屡中。回也其庶乎，屡空”。于子贡不无微词，但并不痛恶，不深疾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又何加？”曰：“教之。”可知富国利民并不与孔子之说相违。（以下见卅日日记）

4月30日 星期一 法治与人治，洽周先生于近出一期《思想与时代》言之甚详。在民主时代，在科学昌明时代，法治为目前最需要之精〔神〕。大学为领导社会之团体，应以身作则。法律有未然善者可以修改，不能目无法纪，以便利自己为前提，此即与民主精神大相违背。

6月16日 星期六 阅《思想与时代》缪彦威著《荀子》及谢幼伟《论道德之判断》。

8月14日 星期二 张荫麟《从政治形态看世界的前途》，《思想与时代》第三期。现在世界政治形态有二个相反的类型，借用墨子的名词称之为上同的政治和下比的政治。上同的政治以国家为最后目的，以国家的发展为一绝对的价值，个人只是国家发展的工具。个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就在其对于国家的发展和供献。为国家的发展，他得牺牲一切。下比的政治以个人为最后目的，以个人的幸福为一绝对的价值，国家存在的理由就在其为保持和增进大多数国民的最大幸福的工具。上同政治本质上是战斗的政治，他在若干点上的〔……〕适宜于战时，但同时他要靠战争来维持。上同政治要把人当作纯粹的工具，但人性要求他自身被看作一目的，而非工具。康德认为道德根本原则之一义是把每个人当作一种目的，而不当作一种工具，这有不刊的真理。下比国家在战略上因不是少数人所发动，所以失去先发制人的作用，但利于久战，因上同国家争本以求胜，不胜则倦，倦则悔生。

谢幼伟《怀黑德 A.N.Whitehead 论教育》。文化乃思想之活动，乃美及情感之感受，此与零星之知识无关，纯然博闻之人乃地球上

最无用之人。彼等之专门知识，将为彼等出发之据点，而彼等之文化，则将引导彼等达于深入如哲学〔之〕崇高、如艺术之境界。所谓通才教育，乃柏拉图之理想教育，此种教育曾鼓励艺术之发展，曾培养无所为而为之好奇精〔神〕，而为科学之发源；曾为人类维持其心灵之尊严以应付物质势力，而此一尊严则为要求思想之自由。“The aim of education & other essays”，p.71。但此种教育病在重脑而不重手，重思想而不重行动，或重心灵而不重物质。思想家所以需要常说常写者，即在以写说之行动而刺激其思想力。所谓专才教育或技术教育，其主要任务注重手工之技巧，注重眼与手之协调的行动，注重建设历程中之控制的判断。吾人之于知识不当讳言其有用，无用之知识为死知识。氏又主张学校不授过多之课目，于所授课目须透澈。氏又谓获得智慧之惟一途径为自由，获得知识之途径在纪律。

8月15日 星期三 郭洽周《现代生活与社会理想》，《思想与时代》第一期。希腊人乃科学与技术之创造者……科学之目的在寻求宇宙之合理解释，扩张知识领域以求宇宙之合理解释，扩充知识领域以谋文明之进步。发明原子论之德谟克里都云：“我宁愿发现一科学事实，不愿为波斯大帝。”又曰人生乐趣不在身体，不在财货，而在于正义与丰富之智慧。安那若哥拉（500—428B.C.）说：“生自可乐，因有生吾人始能观察天象与宇宙之全秩序也。”柏拉图于《法律》一书中云：“法律典章不应居于知识之上，使理知而为法律典章之仆臣，实是罪恶。理知者固当君临一切者也……”希腊人以为科学研究诚为人类极高尚之活动，惟为实际利益而应用之则殊可鄙。但较近世视科学为利藪，一若科学价值全在实用者犹觉略胜一筹也。

10月5日 星期五 李约瑟约欲余嘱人翻译前登《思想与时代》上《二十八宿起源之地点与时代》文。

11月26日 星期一 缪钺《论欧阳永叔治学之精神》（《思想与时代》四十期）。“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惟恐遗之也。如司马迁之《史记》是矣”（《文忠集》

卷43)。又疑《周礼》之书不可靠，谓“六官之属略见于经者五万余人”，“王畿千里之地”何以给之。又自秦以后历代多用秦制，鲜有用周礼者。夫立法垂制，将以遗后，如难行或不可行，岂可信为圣人之作。又谓《系辞》之说八卦，既谓“八卦出于河图”，又谓“包牺仰观俯察以作八卦”，又谓“卦出于蓍”，三说相乖，故知其非一人之言，尤不可以为圣人之作。

3. 科学之方法与精神¹

(1941年5月9日)

在新近出版英国裴纳 Bernal (编者注：现译为贝尔纳) 著《科学在社会上之功用》一本书里，有一章专讲各国科学发达的现况。讲到中国，他说：“在最近几年来，中国在科学上才有独立的贡献。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中国是全球三四个伟大文化中心之一，而且以艺术和政治论，常为这几个文化中心最进步的一个。但何以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不首见之于中国，而反见之于西欧呢？这是很饶兴趣的一个问题。”继续他又说：“中国文化的背景加以略微的改造，可成为非常良好科学工作的园地。以中国人治学谨严的态度，忍耐的习惯，中庸的德性，可以预期中国将来对于科学的贡献，决不在欧美之下。”^[1]这段话好像太恭维中国了。对于历史之事实，裴纳赞扬中国并未超出实在情形，这是吾人当仁不让，居之无愧的。但是近代科学必能在中国有远大的前程吗？要回答这问题，就不能不回溯近代科学在西洋发达的历史，和其精神与方法。

近代科学的起源，在西洋亦不过三百年前的事。在十六世纪以前，一部《圣经》和亚理士多德的著作，控制了欧洲人的一切行动与思想。这时候欧洲的人生观，以为宇宙内一切乃上帝所创造，人为万物之灵，地球在宇宙之中，日月五星及恒河沙数的星宿，统绕地球而行。凡是怀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系在浙江大学训导处与自然科学社遵义分社合办的“科学近况讲演”中的第一讲讲稿（当时拟题为《近代科学之精神》），后刊于《思想时代》1期（1941年8月1日）1—7页。其节选文以《科学家应取的态度》为题，刊于《科学画报》8卷4期。后又收入《科学概论新篇》（正中书局，1948年2月）及《现代学术文化概论》（华夏图书公司，1948年3月）二书。编者作了参校。演讲时间见于作者当日日记。

疑这类人生观，以及违背《圣经》和亚理士多德之主张者，就是大逆不道。从纪元二世纪以迄十六世纪，“地球为万物中枢说”成了牢不可破的信仰，无人敢置一词。直到十六世纪初，波兰人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一五四一〉〔一五四三〕）始创了“日为中枢”说。当时宗教和神权势力弥漫全欧，哥白尼《天体的运动》这部书，到他去世才敢出版，但哥白尼并没确实证据可以打破地球为万物中枢的学说，他断定地球绕太阳而行，是一种推想，一种理论。推翻“地球为万物中枢”的学说，掀起欧洲思想界革命，全靠十六七世纪几位先知先觉的科学家。其中最重要的四位，是开白儿（John Kepler, 1571—1630）（编者注：现译为开普勒），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编者注：现译为培根），伽列里（G. Galileo, 1564—1642）（编者注：现译为伽利略）和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

在叙述上面几位科学先驱的工作以前，不得不一讲近世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方法，就是科学上推论事物的分类。亚理士多德分推论为三类，就是（一）从个别推论到个别。如说这物有重量，就推想到那物也有重量，这称类推法。（二）从个别推论到普遍。如说这物有重量，那物也有重量，就推论到所有对象统有重量，这称归纳法。（三）从普遍推论到个别。假如我们断定凡物统有重量，就推论到某一物亦必有重量。这称演绎法。这三种推论中，第一种用不着多少理智，而第二、三种却因为有概括的观念，必须用理智。高等动物如猫狗之类，和年幼的小孩，统能类推，但不能演绎或归纳，这期间的分别，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已经指示我们了^{〔2〕}。科学方法可说只限于归纳法与演绎法。以大概而论，数学上用的多是演绎法。而实验科学如化学、生理等所用的多是归纳法。二加二等于四，二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统是显而易明的原则。从这原则可以推论到个别的事物。亚理士多德和千余年来他的信徒，均应用演绎法以推论一切，这种方法一推论到数目字以外天然复杂现象即有困难。如亚理士多德以为天空星球皆为天使，必能运动不息而循正轨，惟运行于圆周上，始能循环不息。从上两项原则，因得结论所有星辰的轨道必为正圆的圆周^{〔3〕}。亚理士多德的信

徒断定日月五星等各循一正圆圆周以绕地球，就是从这样演绎法推论得来的。最初主张用归纳法的人，要算法兰司·倍根。他并主张观测以外加以有系统的试验，详尽的纪录，梓行出版，以公诸世，此即倍根之所谓新法（*Novum Organum*）。倍根虽提倡归纳和试验，但他自身并未实用。首先用归纳法来证明亚理士多德错误的，是开白儿。他的老师泰哥倍来（*Tycho Brahe*）（编者注：现译为第谷）在丹麦和波兰天文台尽毕生之力，测定星辰的位置。泰哥倍来死后，开白儿继续他老师的工作。从他们师生三十多年所观测火星的位置，决定火星的轨道，决非为正圆而为椭圆。太阳并不在轨道中心，而在椭圆焦点之一。这才使开白儿怀疑亚理士多德权威的不足恃，而成为哥白尼“日为中枢”说的信徒，开白儿的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不久也就成立了。

同时在当时科学的发源地意大利，伽列里正用自造的望远镜以视察天体，发现了木星之外有四座卫星和金星之有盈亏朔望，与古代传统学说，全不相符。他在比萨塔上的试验，更是哄动一时的。据亚理士多德的学说，凡事物自空中落下，重大者速，而轻微者缓。伽列里的试验，证明了一磅重的铅球和一百磅重的铅球，从一百七十九呎高的塔顶落下，是同时到达地面的。伽列里的实验不但证明了亚理士多德的错误，而且发现物体下降时之加速度是有一定规例的。这类收获完全是归纳法和应用实验的成效。牛顿更进一步，在一六八二年将开白儿的行星运行三条定律和伽列里的动力定律综合起来，成立了万有引力的定律^[4]。亚理士多德许多学说之不足信，和地球为万物中枢学说之不能成立，到此已无可疑义了。二千年来传统思想的遗毒，到此应可一扫而空。不过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样，要收效果必得要相当年代。从哥白尼的《天体的运行》一书问世（〈一五四一〉〔一五四三年〕），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成立，中间经过了〈一百四十一〉〔一百三十九〕年。欧洲人的宇宙观可说到此才拨云雾而见青天，近世科学的基础亦于此时奠定了。

近世科学又称归纳科学（*inductive science*），或实验科学，但是科学家从事工作，演绎法与归纳法必得并用。有许多结果，一定要用演绎法才能得出来。譬如讲到日蚀的预告吧，从归纳法我们可以断定一个不

透明的物体，走到一无光体与一有光体之间，则无光体上必将投有黑影。但是几百年以前天文学家就可以算出民国卅年九月廿一中午左右，我国沿海从福建福鼎一直到西北兰州、西宁这一条线上，统可以见到日全蚀，那是要应用演绎法算出来的。又如开白几何以能知火星轨道非正圆而为椭圆，牛顿何以能从开白儿的三条定律来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这都是从演绎法得来的^[5]。相反，数学上有许多简单方程式，如甲加乙等于乙加甲，须得用归纳法来证明的^[6]。从此可以晓得近世科学，须是归纳演绎二法并用，才能收相得益彰之效。至于有计划的实验，是归纳法最有效的工具，而为我们中国所没有的。实验和单纯的观测法不同。单纯的观测是要靠天然的机缘。譬如日全蚀，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从明嘉靖廿年（西历一五四一年）以来，到如今没有见过，四百年来，本年是破天荒儿第一遭。若是全靠天然的机遇的话，天文学家要等四百年之久，不然就得跑遍全球，但至多也不过隔二三年才见到一次。天文学家往往跋涉数千里以求得几分钟的观测，遇到日全蚀的时候，刚巧阴翳蔽日，废然而返，这是常有的事。自从前数年李侯（B.Loyt）发明了冠层器（coronagraph）（编者注：现译为日冕仪）后，日全蚀可以用人工制造了^[7]。人为的实验，不特可以将时间次数随意增加，而且整个环境亦可以操诸吾人之手。譬如要证明疟疾是蚊子传带来的，我们一定要控制环境，使我们不但能确定所有生疟疾的人统曾经某一种疟蚊咬过，而且要晓得疟蚊所带的〈微菌〉〔寄生虫〕，从蚊子身上传到人身血液中的循环、发育的步骤，和对于病人生理上的影响。惟其这样，才能断定病的来源，对症下药。自从十九世纪中叶魄司徒（Louis Pasteur）（编者注：现译为帕斯德）、柯息（Robert Koch）（编者注：现译为科克）几位微菌学专家把几种重要的传染病祸根弄清以后，接着李斯德发明消毒方法，以及近三四十年来人造药品的发现，欧美人口的死亡率大为减退。美国人在华盛顿时代平均寿命三十六岁，一八五〇年为四十岁，一九〇〇年四十八岁，到一九四〇年便增到六十五岁。英法德各国近百余年来平均寿命亦有同样的增进。若是我们相信寿长是一种幸福的事，那这就是实验科学对于人类幸福最显著效果之一了。

但是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乎在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8]。了解得科学精神是在蕲求真理，吾人也可悬揣科学家应该取的态度了。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这三种态度，我们又可用几位科学先进的立身行己来证明的。

在十六七世纪地球为万物中枢学说之被推翻，是经过一番激烈的论战，牺牲了多少志士仁人，才能成功的。西历一六〇〇年勃鲁纳（Bruno）（编者注：现译为布鲁诺）因为公然承认哥白尼太阳为中枢的学说，而被烧死于十字架上，即其一例。伽列里为了撰著《两种宇宙观的论战》一书偏袒了哥白尼学说，而被罗马教皇囚禁于福禄林，卒以古稀之年，失明而死^[9]。开白儿相信太阳为中枢之说，终身贫乏，死无立锥之地。这是近代科学先驱探求真理的代价。这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和我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很相类似。认定了革命对象以后，百折不挠，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种求真的精神，明代王阳明先生亦曾剴切言之。他说道：“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10]他与陆元静的信里，又曾说道：“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此即凡事以理智为依归之精神也。但阳明先生既有此种科学精神，而何以对于近世科学无一贡献呢？这是因为他把致知格物的办法，完全弄错了。换言之，就是他没有懂得科学方法。他曾说：“众人只说格物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用去。我着实曾用过工夫。初年与钱友同论作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力至于三日，便致劳成疾。当初说是他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

得其理，七日亦以劳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11〕}从现在看来，不懂实验科学的技巧，专凭空想是格不出物来的。但是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比，则方法易于传受，而精神则不可易得。阳明先生若生于今世，则岂独能格竹子之物而已。

科学家的态度一方面是不畏强御，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但同时也武断，不凭主观，一无成见，所以有虚怀若谷的模样。世称为化学鼻祖的濮尔（Robert Boyle）说他真确能知道的东西，可说是绝无仅有^{〔12〕}。有人问牛顿，他在科学上的发明那一件最有价值。他答道在自然界中，他好像是一个小孩，在海滨偶然拾得一块晶莹好看的石片，在他自己固欣赏不释手，在大自然界，不过是沧海的一粟而已。但是有若干科学家的态度，并不是那么虚心。十九世纪末叶英国物理学家的权威凯尔文（Lord Kelvin）就是一个例。在那时凯尔文与其侪辈以为物理学上重要的理论与事实统已大体发现了，以后物理学家的的工作，不过是做点搜残补缺而已。他自认为生平杰作《地球年龄》^{〔13〕}这篇论文里，他以太阳辐射的力量，来估计太阳和地球的年龄，若是太阳里面发热的力量和煤一样强，地球的年龄至多也不得过四千万年。当时地质学家以海水所含的盐分和地面上水成岩的厚度来估计，生物学家以动植物进化的缓速作估计，统以为地球年龄非数万万年不为功。凯尔文很武断的把他们的论断加以蔑视。到了一八九五年伦琴（Rontgen）（编者注：现译为伦琴）发现了X光线，一八九八年居里夫人（Madame Curie）发现了镭，不久物理学上大放光明，新发明之事实迄今不绝。据近来物理学家的估计，原子的能力，若能利用的话，要比同量的煤大五百万倍。所以地球的年龄可以尽量的延长，而凯尔文的估计不得不认为错误了。

妄自尊大的心理，在科学未昌明时代，那是为各民族所同具的。我们自称为中华，而把四邻的民族，称为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从虫从犬，统是鄙视的意思。欧西罗马人亦有这类轻视傲慢的态度。到如今欧洲民族中尚存有斯拉夫（Slav）、塞比雅（Serbia）（编者注：现译为塞尔维亚）等名称，这在古代文化先进的民族藐视后知后觉的民族，夜郎自大，并不足怪。但在人类学已经昌明的今日，竟尚有人埋没了科学的事实，创

为优等民族的学说，如德国纳粹领导下所提倡的诺提种学说，而若干科学家尚起而附和之，则是大背科学精神了。

科学家的态度，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丝毫不能苟且。近代科学工作，尤贵细密，以期精益求精，〈以〉〔与〕我国向来文人读书不求甚解、无病亦作呻吟的态度却相反。这于我国古代科学之所以不能发达，很有关系的。如以诗而论，诗人之但求字句之工，不求事实之正确，我国向来司空见惯不以为奇。如杜工部《古柏行》“孔明庙前有〈古〉〔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想来杜甫生平不曾用过量尺。又唐人钱起诗“二月黄莺飞上林”，唐代首都在长安，黄莺是一种候鸟，至少要阴历四月底才到长安，这句诗里的景色，无疑是杜撰的。唐诗如此，现代的诗何尝不如此。诗固然要工，但伟大的作品，无论是诗文、音乐或是雕刻，必须真善美三者兼具。法国科学家邦开莱（Henri Poincaré）（编者注：现译为庞加莱）说道“惟有真才是美”。照这样的标准看来，明清两代的八股文没有一篇可称美的。我国八股遗毒害人不浅，到如今地方政府做户口农产的调查，各机关的地图测量，往往是向壁虚造，敷衍法令，犹是明清做八股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消灭，近代科学在中国决无生存之理。试看西洋科学家态度何等谨严，开白儿的怀疑亚理士多德，只在火星轨道不为正圆而为椭圆，在中国素来就没有这种分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六六五年已胸有成竹了。可是因为那时地球经纬度测量的错误，以为每度只有六十英里，因此他估计地球直径只有三千四百三十六哩，而地球吸引月亮之力〔所生的加速度¹〕，只有每分钟十三呎九，而非理想上应有的每分钟十六呎，所以他就不敢发表。直等到一六八二年法国人毕卡（Picard）（编者注：现译为皮卡德）测定地球上一度的距离为六十九哩一，使牛顿所估计地球吸月亮之力正与其理想相吻合，他才敢把万有引力的定律公诸于世^[14]。所幸近年来教育注重理工，受了科学训练洗礼的人们，已经慢慢地转移风尚。各大学研究院科学作品固希望其多，而尤希望其能精。因惟有这样，才能消灭我们固有的八股习气；亦惟有这样，才能树立真正的科学精神。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所生的加速度”几字依据《科学概论新篇》所载补充。

邦开莱在他的《科学之基础》一书里有这样一番话^[15]：“科学事业之目的在于求真理。只有求真理，才值得科学家的一番努力。当然我们应该拼命去解脱人生的痛苦，但解脱痛苦是消极的，世界若是灭亡，不是我们的痛苦统解脱了么？科学家之所以欲人人衣暖食饱者，无非欲使人能有闲工夫去审思熟虑，以求真理耳。”邦开莱于民国初年去世了，迄今三十年，两经欧洲大战，科学的发明，使欧亚两洲不在战线上的人也饱尝了颠沛流离逃避轰炸的痛苦。邦开莱如能复活于今，不知作何感想。香港大学工程教授司密斯氏近在《远东工程杂志》上著文谓：“言念将来，中国人爱好和平与崇尚学术之风气不致改变，则在中国科学与工程之发达，不特能惠及一国，亦且大有造于世界”^[16]云云。其所期望于吾人者正与裴纳相似。爱好和平为中国人之特性，而科学愈发达，则战争愈狰狞可怕，愈使世界不得不实现和平。如何能使将来的世界，一方面近代科学仍能继续发达，而一方面却又可实现和平，这是目前极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亦是我们中国应该有特殊的贡献的一个问题。

〔1〕J.D.Bernal, F.R.S.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Science,”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ondon, 1938 pp.209—210.

〔2〕“Lectures on the Method of Science” Lecture 1.Thomas Case, Scientific Method as a Mental Operation, pp.1 — 3, Oxford 1906.

〔3〕同上第八页。

〔4〕Harvey—Gibson, 2000 years of Science, pp.28 — 32, Black, 1931.

〔5〕Thomas Case, Loc.cit, pp.14 — 18.

〔6〕Henri Poincaré, The Foundation of Science, p.40.

〔7〕Harlow Shapley, New Tools and New Researches,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ed Harvard Clubs, 1940, p.171.

〔8〕“Lectures on the Method of Science” Lecture 2.F.Gotch On Sme Aspects of Scientific Method, p.27, Oxford 1906.

〔9〕Harvey—Gibson, Loc.cit.p.32.

〔10〕见阳明先生《答罗整庵书》。

〔11〕见阳明先生全集《黄以方录问答》。

〔12〕F.Gotch, Loc.cit.

- [13] J.J.Thomson, *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Cambridge 1936.
 [14] Harvey—Gibson, *Loc.cit.*pp.36—37.
 [15] Henri Poincaré, *Loc. cit.*, p.205.
 [16] C.A.M—Smith. “Inventions and Natural Resources of Asia” *Far Eastern Engineer*
 January 1941, p.19.

4. 科学与社会¹

(1943年4月2日)

绪言

科学可以左右一个社会的环境，同时一个社会的环境也可以影响科学的存亡盛衰。记得十五六年前，国际联盟派了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杰凡等四人到中国来调查教育，他们回去以后，制成一个报告，提出了许多改良中国教育的意见，其中有一点值得国人注意的。他们的大意是这样：中国一般人有一种误解，以为西方的近代文化，完全由科学而产生的，所以中国只要把西洋的科学搬到中国来，中国的社会就可以近代化了。不知道这是本末倒置，倒是西洋近代的社会环境产生了近世科学。这几句话实是我国提倡科学的人应该要牢记在心上的。科学好比是树上的一朵花，时代的思潮好比是泥土下的根，而社会情况好比是四周环境。一定要气候湿润，土壤膏腴，树木方能根深蒂固，枝叶繁茂，一到阳春，便能花朵怒放。把一朵鲜花插在泥土里固然一会儿就要萎谢，就是把一枝果树连根拔起，栽在干燥的沙漠，或寒冱北极，也是不能生长的。我们要晓得，科学非有适当环境不能发达，只要看一看中国古代和希腊、罗马，为什么不能产生近世科学，而欧洲到了十六七世纪，科学忽然应运而生就可知道了。

(甲) 中国古代不能产生科学的原因

胡适之先生在他写的《中国思想史纲》(登在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份美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系在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的演讲词。初以《科学与现代思想》为题，刊于由该训练班编印的《科学概论》(1943年6月)15—30页。后经修改，又以《科学与社会》为题，刊于《思想与时代》月刊24期(1943年7月1日)，并收入《科学概论新篇》(正中书局，1948年2月)。以《思想与时代》载文入编。演讲时间见于作者当日日记。

国 Asia 月刊）里面，把中国思想史分为三个时期，各约一千年。自周初到秦汉之交为第一时期，称上古期；自秦汉之交至五代为中古期，亦为道教佛教兴盛时期；自两宋迄清为近古期。上古时期又称为古典时代，这时代的遗产是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和自由精神三点。中经六朝隋唐佛教的洪流，韩昌黎首先发难，指摘佛教之背谬，乃造成宋代理智主义的复活。中兴健将朱晦庵就说：“致知在格物”，“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可是因为对于自然本身没有实验及处理的方法和技术，终致于这种科学的理想，并没有能产生自然科学。但他的精神却渐渐在历史及哲学的研究中被觉察出来了。过去三百年对经典历史著作的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可以凭借历史的证据及演绎的推论法，去扫除一切的主观见解和传统的权威。照适之先生这一番议论，我们中国的思想有了人文主义，就可以不受神秘的束缚。有了唯理或理智主义，就可以客观的眼光来探讨事物。再加以自由的精神，那末这种思想的遗传环境，于自然科学的发达最相宜了，何以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后，两千年来我国科学并无长足的进步呢？

据个人的愚见，以为这有三个原因：（一）两汉以来，阴阳五行神秘说，迷信之深入人心；（二）数字与度量之不正确；（三）士大夫阶级以劳力为苦，不肯动手，因之缺乏实验。

（一）阴阳五行说 阴阳五行之起源，梁任公先生已有详细的考据。他说阴阳二字，在孔子以前不相连属。如《诗经》、《书经》、《仪礼》及《易·卦爻》均无阴阳二字相连。《易·系辞》中始将“阴阳”合而言之。如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阴阳之义配日月”，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但《易·系辞》不出孔子手，即出孔子手亦不过是一种二元哲学论，毫无神秘意义。“五行”二字初见于经传者在《尚书·甘誓》“有扈氏威武五行，怠弃三正”，《洪范》“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盐，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后世愚儒乃将

凡百事物，均纳入于五行中，与原来《洪范》区分物质为五类，已失本意。《老子》、《论语》、《孟子》均不见五行，惟《左传》昭二十五年记郑子太叔与晋赵简子问答，有“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之说，但《左传》真伪可疑，梁任公认为非子产语。五行说之有组织而极怪诞者，首见于《吕览》，《小戴礼记》采为月令，《淮南子》又采之，将一年之四季分配于五行。春木，夏火，秋金，冬水，所余之土，插入于夏秋之交。于是五方东南西北中，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声宫商角徵羽，五味辛酸盐苦甘，五谷黍稷稻麦菽，五畜马牛羊犬豕，五脏心肝脾肺肾，均一一支配于五行之中。五行阴阳之传说，虽于《洪范》、《左传》已见其端倪，而传播此邪说者，实为邹衍、董仲舒与刘向等。《史记》称“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旨》，以阴阳家与儒、道、名、墨、法各家并列，其势力之大可知。《汉书·艺文志》所载书凡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而阴阳家书乃占一千三百余篇，约十分之一。至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其中祖述阴阳家之言殆居半数，一时经学家皆从风而靡。从此祲祥灾异之迷信，深中于士大夫云云。按希腊古代哲人亦分物质为四类：即水、火、土、气，其说与《洪范》相似。四者之中以火最有势力，以其急速的能改变他种物质。直至十七世纪，欧洲人们仍以火为重要物质，凡五金钻石之能发光者，以为其中含有火也。硫黄能烧，以其含火独多。此种观念虽有同样错误，但并不如中国之普遍而惑人心。在中国到目今五行阴阳说尚是根深蒂固。不但风水、算命、卜课，甚至与死生有关之医药亦受其影响。一般人之生活行动，婚丧建筑无一不受阴阳五行说之支配。适之先生所谓人文主义与理智主义于中国一般社会影响，反不及阴阳五行说之盛行。曾文正公称为有清一代顶开明的人物，但从他的家书里，就可以看出来他的举止行动，如搬家、嫁娶、医病等多受了阴阳五行说的支配。即今日知识阶级中迷信扶乩卜课者，正不乏其人，则安能望科学之兴起。

（二）数字与度量之不正确 科学之基本工具为数字，欲求数目精确，必须有精密之度量。我国古代观察事物，但求粗合，不求精微。如古人论人之高矮计尺不计寸。汉王充在当时称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作《论

衡》，蔡邕视为秘宝，在当时可称为百科全书。王充的眼光亦高人一等，不囿于世俗的见解，所以有《问孔》、《刺孟》等篇。但他所讲的数字，就幼稚得可笑。他讲到当时中国的面积，说东西五千里，南北五千里，五五是二万五千里。一位大名鼎鼎汉朝有数的博学家，他的数学程度，不如目今的小学生。就是我们古代数学书籍，他的数字也极不精确。《周髀算经》相传是周公作的，但其书名不见于《汉书·艺文志》、《晋书·艺文志》，而首见于《隋书·艺文志》，大概系两汉人所著。讲到量天之高，谓“测天之高，先立八尺之竿，测夏至日中日影之长。其长在周都为一尺六寸。自周都向南行千里，日影一尺五寸。自周都向北行千里，日影一尺七寸。每千里差一寸，故求从太阳直下无影处，至日影长六尺处之距离，以比例推之，得六万里。依勾三股四弦五之关系，由此知日高八万里。日附于天，故天高亦八万里”云云。按夏至中午晷影一尺六寸，其纬度约为三十四度四十六分，与东周洛都相近。但影差一寸，纬度只差四十一分，约合七十四公里。无论当时里丈尺寸比较现在为短，但决不能差至千里，其数字实在笼统。即书中计算圆周，以径一周三为率，亦不精密。希腊伊拉托司忒尼以类似方法，不过当地球是圆的，即是应用浑天说而不用盖天说，量得地球的大小，与目今所知数目相差不远。纪元前二世纪，埃及的托尔美〔托勒密〕应用月球的距离，求得太阳的距离是五百万英里，虽是失之太小，但比《周髀算经》就精密得多了。要晓得，地球的大小与太阳和地球的距离，是宇宙空间基本的量尺，这两数目弄错了，天文学是很难有进步的。而《周髀算经》影差一寸、地差千里之说，与日高八万里之说，一直相传到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土始行打破，无怪乎中国古代天文学之难有进步了。至于文学家和诗人之只求字句之工，不管事实，更是司空见惯。唐张继《枫桥夜泊》的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永叔已经批评过，说“句则佳矣，其奈夜半非敲钟之时何”。陆放翁《老学庵笔记》，谓参寥诗有句“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有人云，五月非荷花盛时，不当云无数满汀洲。廉仲宣〔疑为“廉仲宣”〕答道，一定要说五月才算得好句，六月临平山下路，就不是好诗了。似此种歪曲事实以牵就字句，削足适

履，是一脉相传的坏习惯。这种习惯，到如今还是盛行着。在西人本来有句话，说“数目字不能说谎”，但在中国数目字随便可以任意上下。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上人口统计，便晓得数目到处在使我们恍惚于迷途之中。我们从《文献通考》、《续通考》和《皇朝通考》里，可以检得西汉末年中国人口已是五千九百万人，唐天宝时减至五千三百九十万，到宋真宗时只一千九百万。在明成祖时已有六千六百万人，但明神宗时又降至五千一百六十万。到清康熙五十年只有二千四百万，但乾隆十四年一跃而至一万七千七百万，十八年二万八千四百万人。道光二十六年已有四万三千万，而目今仍只算四万八千万。乾隆时户口之所以突增，乃因康熙五十一年有上谕“人丁永不加赋”的缘故。而且户的口数，各时代不同，西汉以一户为四·八口，东汉为五·二口，唐代五·八口，但南宋绍兴时一户只一·五口。这种数字的不精确，到如今还存在。即如民国三十一年河南旱灾，是近年来一桩极大的灾荒。中央已拨了一万零八百万元赈款，各处亦在募款放赈。但是赈灾虽已闹了半年多，而究竟有多少灾民，并没有确实的统计。税收机关说是三百万人，省政府报告五百万人，三民主义青年团调查得七百万人，而美国通讯社估计一千一百万人，这实在是相差太远了。在这种数字不精确的环境下，社会科学难有立足的余地。就是把西洋的科学搬进来了，不旋踵也会变质，会衰退。试举一个例，科学必须有数字的根据，而各种表是量度数字的工具，所以各种仪器机械统须用表。一架汽车里就有许多表，如电表、油表、温度表和里程表。但中国汽车夫最不欢迎这类表，所以新车到后，不久车里的表就统坏了。汽车夫情愿为了缺一加仑油而抛锚于路上，或是温度高到机件被烧，而决不去看一看表。至于公路上所定行车速度限制，司机完全是用直觉来断定，而决不靠表。车子载重的限度，只要车中能容，无论客货，多多益善。所以汽车到了中国，虽可以说把中国相当的近代化了，但是不重视数字的中国社会也把汽车中国化了。

（三）实验精神 古代一向传统观念以劳心为高尚，以劳力为苦，所以叫劳工为苦力。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观念与古代希腊相似。希腊人对于美术、哲学、天文、数学统有相当的贡献，但是

不能产生近代科学或实验科学，最大原因是希腊用奴隶制。和中国士大夫阶级一样，希腊的知识阶级不肯动手亲身去实验。中国素称士大夫为读书人，俗语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雅人雅事，读书人还可以做。像诸葛武侯躬耕垅亩，弄得手足胼胝，士大夫阶级中极少有的事。所以读书人一定要养指甲长至数寸，以表示手之高贵，除掉翻书写字吃饭以外，极不轻易运用。这种观念未打破以前，实验科学无法滋生。中国对于世界文化四件大贡献，纸、排字、火药和指南针，统不是正统的士大夫阶级所发明的。这几种东西在发明以前，必得去用手来称量，来试验才行。但要我们的士大夫来配和药品，和工人一样，就有损威严。甚至用以观察事物之眼睛，亦未尽量应用。通天地人三者为之儒，既能不出户知天下，那末宇宙间的星象总应该是知识阶级所留心之事。但从秦汉以后，甚至天象方面，除非为了个人的祸福，皇朝的兴衰以外，极少注意到。我们只要一检历代星官的数目，就可以知道。《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所载凡七百八十三星；《晋书·天文志》载一千四百六十四星；自《隋书·天文志》迄宋郑樵《通志》，所载星数几全与《晋书·天文志》同。可见两汉以后，连观测方面亦不注重，只注意到阴阳祸福与捕风捉影之谣言了。如梁武帝时童谣“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做皇帝的人便赤足向殿下跑了几周。晋时月犯少微，主于名士不利，当时戴逵享大名，自以为必死，但竟无恙，所以戴逵有求死不得之苦。自汉迄明清，天文观测只注意到休咎祸福一方面。而近世科学的产生，只不特要观测自然，以过去绳未来，而且要把人为的方法，来在实验室中将自然重演出来，然后一次两次以至数百千次，把他细细分析，一个个因数来试验，然后来下断语。譬如火星走近斗宿，应该每隔十五六年一次，我们只要查一查历史上有没有每隔十五六年皇帝要蒙尘一次的事，就可知“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说之不可靠了。但是十五六年的周期还是太长，而且星球的运行很复杂，每次未必能位置完全相同，所以必须用人为的实验方为精确。牛顿万有引力原理的成立，本是依据地球吸引地面上的物质和吸引二十四万英里以外的月球有相同的加速度这一点而来。这原理成立以后，虽可以解释天文上种种事

实，如赤道上时钟的钟摆何以要比在巴黎短四〇公厘，三公斤重的物质何以到了赤道要减少十公分，以及太阳系内各行星的运行。不过并没有能把这个原理引到实验里来详细观察一下。直至万有引力定例发现以后一百多年，恺文狄书于一七九八年发明了扭转天秤（torsion balance），我们方能随意称量地面各个物质之吸力，才晓得高山顶上的一块石头比同一块石头在山底下时要轻一点，始把万有引力用实验来证明了。朱晦庵虽讲“致知而格物”，虽说“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也”，但是应用起来就有困难。他所谓“致知”，他所谓“用力”，就变了空想，并不是手眼并用，亲身的体验。无怪乎王阳明去“格”竹子的“物”，坐了七天七夜，竹子的物不能格，而反病倒了。

（乙）欧洲近代科学之兴起与其对于社会之影响

一个人物无论如何伟大，一种运动无论如何风靡，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而可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欧洲近代科学之兴起，有人归功于牛顿和加利略、刻卜勒几位科学家。牛顿确可称为空前杰出的一位大科学家，他奠定了近世科学的基础，他发明的万有引力定律、运动定律及微积分到如今三百余年，仍不失为近世科学的栋梁柱石。但是要了解牛顿之何以能在十七世纪应运而生，不先不后，这不能不推想到那时代已经成熟，所以有水到渠成的形势。

（一）十六七世纪时代欧洲之社会环境以及其对于科学之需要 在十五六世纪时代有两桩事情和近世科学很有关系的。一是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以后麦哲伦之环绕全球，引起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荷兰、英、法与南北美洲、印度的通商。一是望远镜的发明，使加利略于一六〇九年在天文镜中看到木星的大卫星。欧美及欧亚的通航贸易，一方面使欧洲的中下级社会，就是工商阶级渐渐富庶，足与世袭之贵族相抗衡，封建社会没落而农工商之知识提高。同时，为了航海，为了海外殖民，有各种精巧技术的需求。如驾驶船只，必须有精密之罗盘针以及关于航海的各种工具。商业繁盛所须资本骤增，货币不足应用，乃有大量采掘五金矿产之必要。要开矿，就得具备冶金的知识。掘矿至相当深度，坑中地下水之如何吸收，非用良好之抽水机不行。西

人有句话，说“需要为发明之母”。因时代之风尚，一六〇〇年吉尔白有磁电之研究，一六〇一年柏德（Della Perta）发明抽水机，一六二五年德特莱发明焦炭以熔铁，哲学家司宾诺刹（一六三二—一六七七）磨镜子以为航海望远之用，数学家笛卡儿（一五九六—一六五七）之发明解析几何与定炮弹之位置有关。足知十六七世纪欧洲的社会已有许多问题急切的待科学来解决，而工商阶级的抬头，使劳力的人亦可有闲暇来动手作实验。同时欧洲二千年以来亚理士多德、托拉美传下来种种宇宙结构的谬说，亦于此时推翻。神权的迷信，宗教的威力，渐渐减除。这种思想的改变，这种迷信的祛除，在当时是经过很热烈的辩论，凶恶的争斗，残酷的牺牲，始克成功。据亚理士多德的学说，地球在宇宙之中，而日月五星是绕地而行的。基督教徒就根据这种谬论，以创立中世纪时的一番宇宙观，以为人是天之骄子，而教皇乃是代替天主在世上行使职权的。亚理士多德的言论，在当时视为金科玉律。他说天空只应有七曜。而加利略于天文镜中却发现木星的四个卫星，也只才证明了亚理士多德经典与事实不符。虽当时尚有不少人，尤其是教会方面为亚理士多德辩护，如意大利天文学家施西（Francisco Sizzi），说人首只有七窍，地下只有七金，天上只应有七纬。但是此种类似阴阳五行说论调，在望远镜发现以后，已如旭日高升后之燭火，暗然无光了。欧洲思想从此脱离了亚理士多德经典之羁绊，而起了一种革命。此时欧洲天文学的观测亦远较中国古代为精密。亚理士多德日月五星绕地运行说之所以被推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十六世纪丹麦天文学家白莱（Tycho Brahe），尽了二十余年之力，观测火星位置。死后他的弟子刻卜勒根据其老师的记录，绘成图表。照亚理士多德说，火星应该绕地球，而且所有行星轨道统是正圆。因为惟有正圆才完美，岂有天上的东西会不完美的呢？但依刻卜勒用了苦心所画的图上，不但火星是在绕着太阳走，而且所走的路线却是一个椭圆，而非正圆。火星轨道的偏心是0.093，换言之，就是火星离日最大距离和平均距离相差不过平均距离十之一。若使在中国古代，这类精微的分别，一定会被忽略的。刻卜勒就依据火星和旁的行星的运行，定了三条有名的定律，首见之于他著的《新天文学》，亦是在一六〇九年出

版。所以在牛顿未出世以前，欧洲本有类似阴阳五行的邪说，已被打倒了，数目的观测已有相当精密了。而当时因为贸易的繁盛，已有工程与科学技术的需求，人们已得了一种量度的习惯（measuring habit），实验的精神，所以近代科学之兴起，岂偶然之事。

（二）牛顿之崛起 牛顿一向被人称为自然科学家，但他对于科学的应用是很注意的。在一六六九年，当他剑桥大学毕业未久，他的朋友埃司顿（Francis Aston）要去欧洲游历的时候，牛顿写信给他，劝他沿途注意船只之驾驶与航行，到欧洲各国须留心察看炮垒之结构与建筑，注意各国之天赋产物，尤其是矿产之分布与多寡，以及锻冶之法。在波希米应考察以水银炼金之法，到荷兰要学习制造玻璃，与荷兰人如何保护船只使不腐烂，以及在大洋中以钟表定经度之方法。埃司顿比牛顿年纪还轻些，牛顿指导他在游历时应留心的问题，统是那时候所急待解决的问题，或是需用孔急的方法，而是牛顿所不能忘怀的。牛顿对于科学上三个最大贡献，是万有引力原则之成立，微积分之发明，与夫白光之能由三棱镜分析为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若非牛顿出世，这三种事实在当时的欧洲亦必被旁的科学家所发现，但时期或将延缓而已。望远镜之制造，使人们注意到玻璃之性质，故白色光之可分为七色，迟早总必被人所发觉。在牛顿以前，加利略已证明物质坠地其速度逐渐增加，但与物质之轻重无关。且证明物质在一平面上运行，如无阻力以遏止之，则将循一定之速度以前进。此即牛顿之运动定律第一条也。同时刻卜勒之著名三条定律问世，将太阳系内行星之运行，厘定为简单之规则。刻卜勒之第三条定律，与牛顿之第二条运动定律合之即可得万有引力定律。牛顿之伟大，即在于将刻卜勒、加利略已经发现之事实，更简单化、普遍化。昔之仅能应用于行星运行者，今乃推广而可应用于百万事物间，无论其大小远近。昔之须用三条独立之定律者，今则一以贯之。欲应用牛顿运动定律第二条，即以在空中移动物质每一秒钟之位置，以定其加速度，实有微分法之必要。故微分法之应运而生，亦非偶然。实际微积分法与万有引力定律谁先发现之问题，在当时均有极热烈之争执。因德国之莱布尼兹同时亦发现微积分方法，而牛顿之友人霍克曾在牛顿发表万有引

力原理以前，将二物相吸与其距离之平方作反比之意见报告于英国皇家学会也。昔人有云，英雄所见略同，以英雄乃时势所造成，时势同则英雄之见解与造诣亦相同也。

（三）近二百年来科学之进步及其对于社会之影响 牛顿去世迄今垂二百一十余年，在此二百余年中，科学之猛进非牛顿之所料及，而二十世纪科学尤有长足之进展。在数理方面，一九〇五年爱因斯坦之相对论与一九〇六年蒲郎克之量子论二大发现，均为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之产物。相对论不但修正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解释其所不能解释之疑问，如水星近日点移行不合规则等问题，且使空间与时间打成一片，质与能打成一片，使人们之宇宙观豁然开朗。而量子论则影响到渺小之宇宙。此两种理论加以近十年来之量子力学，打破了从前机械式之宇宙观，其对于思想上之革命，正和十六七世纪时代刻卜勒之行星运行定律，及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同一重要。同时在科学应用方面，二十世纪初叶几年中，亦有惊人的发见。如马可尼传递无线电横渡大西洋（自康华尔至纽芬兰），美国赖忒兄弟用飞机飞行六百英尺，内燃机（diesel oil engine）之出产，电炉应用于熔铁，及大规模铝之生产，统是二十世纪初年的事。不久，电灯、电话、汽车，均大量的应用。乡村的交通，城市的繁荣，人们娱乐的方法，职业的种类，大为改观，而人们的思想当然亦随之改变。小而言之，如时间问题，在科学未昌明时代，优哉游哉，从容不迫的度日子。从秦汉一直到一百年以前，因为没有良好的交通工具，并无急速旅行或传递的方法。明末崇祯吊死于煤山的消息，于一个月以后才达到南京。到如今则日本人进攻卢沟桥或珍珠港的新闻，不旋踵而遍传于各国的报纸上。所以昔人之从容不迫者，今日不能不仓促从事。要乘火车的人，就觉得轮船走得慢，想坐飞机的人还嫌汽车费时间多。因为交通速度的增加，人们对于空间与时间观念就不相同。昔日重洋，今日庭户。昔人论时论刻，今则论分论秒矣。可知科学进步，使一般人对于时间的观念亦大加精密。大而言之，则吾人之人生观亦受影响。自〈一五三〇〉〔一五四三〕年哥白尼创为地球绕日之说，经刻卜勒、加利略之证明，从前地球为宇宙之中心，人类为上帝所创造之说，已不能立足。人类之尊严受了一个打击。到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物种由来》书行世，说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亦是由猿猴类相似的动

物慢慢进化而来的，于是人类的尊严又受了一重打击。近代世界又称机器世界，一套机器支配着多数人的生活，威胁着多数人的生命，生杀予夺操之机器，人成为机器的奴隶，这是对于人类尊严的第三重打击。说者遂谓“科学进步的境界，使人类陷于卑贱感的深渊之中。如马克思以唯物解释历史，解释人生。希特勒贱视大众，憎恶妇女，视任何人为机器，为工具，为奴隶。这两种哲学，虽如冰炭水火，但有一个共同之点，他们都鄙夷基于人性的自由主义，因此就有主张当此时期我们应该唤回人类的自尊心，提高人的因素。”（见《大公报》本年三月三十一号社论）这番议论实在只看到科学影响近代思想的片面。科学的目标是在求真理。真理所在，虽蹈危履险以赴之，亦所不释。从前地球为天体之主宰、人类为上帝之骄子之说，乃妄自夸大之主张，犹如我国闭关自守时代之鄙视西洋一样的缺乏事实根据，迟早总必被推翻，无可惋惜。但中国文化自有他存在的价值，自海禁大开以后，只有日益显明。正好像人为万物之灵，自科学昌明以后，更能彰彰昭著。地下的煤，生成之后数千万年蕴藏不动，人类始设法燃烧之，使发光变热，已非其他生物所能。而近世科学，更利用以发电，使黑夜光耀如同白日，炎夏不热，严冬不寒。变成无线电，则万里之外可以覩面，可以对谈。电力更可以去尘、唱戏、算账，甚至上飞天空，下掘地道。若使古人复生，到欧美通都大邑去游历一下，必疑为仙宫而非凡境。从前听天由命的观念，已经变成科学万能的观念。在科学昌明的国家，水旱灾荒与瘟疫几绝迹了。近世科学之能改造环境，操纵环境，甚至于创造环境，其能力之伟大，应该增进人类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目前的困难，在于人类能假手于近代科学以驾驭环境，但却不能驾驭人类自己，这就是人类的最大危机。这种危机，在第一次欧洲大战以前已存在着。可惜凡尔赛订定和约的几位政治家，统以旧眼光看新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之不能避免了。近十余年来英美科学家已觉悟到科学在社会之应用，有事先计划之必要。一九三二年英国《自然》周刊就出面主张研究科学的社会化。不久英国科学促进会就成立了“科学与社会及国际关系”这一股。在目前社会环境下，科学方法和态度未能完全应用到经济和政治上去，从下面二位科学家的言论可以知其一斑。英国科学促进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英国开第一次联合大会时，美国名地理学家鲍曼出席演讲，

他的题目是《科学与社会新发展》。他说：“我们统信赖科学的进步，但遇到科学所发现的事实与我们社会团体利害相冲突时，我们往往不惜否认之。科学的训练，应该给我们以公正的态度，但在现阶段的社会环境中，这是极困难的一件事。遇到与人有争执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极难持平。我们的同情心对于不相干的人们，就非常薄弱。我们用种种设想，使所持的理论有利于我们而有害于对方。”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威廉·勃拉格在民国二十三年所著《科学，友乎？敌乎？》一篇文里，更明白的指出科学与社会环境的矛盾。这文是赫胥黎《科学研究与社会需要》一本书的序言。他道：“科学应该是能高瞻远瞩而无国界的，但是科学的结果，若应用到商业贸易上去，立刻就发生毛病。俗语说道，‘商标一进门，和平立刻就跳出窗外去了。’但像我们这样以贸易制造立国的国家，如何能避免与人竞争呢？”对于勃拉格所提出的问题，赫胥黎的书里并没有一个好的解答。最近英国出版拉魏（Hyman Levy）著的《近世科学》这部书里，有这样一段话：“人类本为世界万物中之一分子，受种种自然的限制，事事须听命于天。到了科学昌明以后，人类乃能操纵自然。欲计划此类操纵之力量，而使之入于正轨，实为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过程。为了将来社会的安宁和发展，而牺牲个别的利益，眼前的利益，实足以代表近代人类进化的新发展。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昌明，使人类的道德开始向一个新的方向开展着。有害于社会大众的即是犯罪，以此定是非之新标准，乃为目今社会所急需”云云（见第八章）。拉魏氏所说，限于人与人所组织的社会，而国际方面，近世科学使新道德标准之确立更有必要。我国向所谓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观念，在科学昌明以后，实为国际上必须树立的一种新道德标准，不然，则人类必趋于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之一途。

《大学生与抗战建国》演讲及其主要观点

在抗日的烽火中，竺可桢为教导大学生努力学习，担当抗战建国的重任，做了《大学生与抗战建国》的演讲并发表在《星期评论》第39期。该文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为“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去是一个失策”。“从国家着想，抗战工作固极切要，而建国责任尤为重大”。所以中央政府从头即决定了维持高等教育，强调“战时教育即

平时教育”的理论。“这次抗战是全民抗战，是以正义人道来抵抗横暴武力的战争，青年们生当其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学生为将来社会之领袖，国家的柱石，理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方不愧为全国青年之表率。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杀敌，则他们应如何奋身图报，努力上进，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们”。他提出，“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一个大学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在于能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于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潜力不是别的，就是运用个人的思想，正确而敏捷。惟能运用思想，所以事变之来，也能处之泰然，应付裕如。即在技术方面，如研究高深理论、改进机器构造等，不特于专门科学必须具有很深的造诣，也必须有很缜密周详的思虑才行。要能够作缜密周详的思虑，必须先几种基本科学方面经过老师宿儒一番严格的训练。若是一个大学单从事于零星专门知识的传授，既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又无科学方法的训练，则其学生之思想即难收到融会贯通之效。”

（1941年）7月13日 星期日 今日举行浙江大学第十四届毕业典礼，应毕业生一百六十人。……

八点半开始举行典礼。余报告，勸学生以建国事业大于抗战。谓前次欧洲大战，余适在美国为学生，1917年美国加入欧战，是年哈佛大学毕业生加入海陆空军者90%以上。抗战一年半，全班〔？〕640人中，死者180余人，占28%。并以程婴、公孙杵臼事相比，谓建国事业如程婴之保赵氏婴儿赵武，即赵孟。次荇谋报告，授凭。来宾高文伯、孙必仁演说。教职员代表李振吾演说。

7月29日 星期二 遵 今日因为《星期评论》社作文，故未往校，乃四月前在重庆时答应刘英士者。英士来函催，故赶作此文。题为“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乃本年毕业典礼时所讲，乃加以修正者。

7月30日 星期三〔遵义—贵阳〕将《大学生与抗战建国》

一文交与俞心潜缮抄，并囑振公作函与刘英士，将该文寄登《星期评论》。

11月17日 星期一 湄 八点作纪念周并开学典礼，余主席，到一百六十余人。……余首讲“大学生与抗战建国”，次请苓谋与季梁讲演，最后润科报告。

11月30日 星期日 接《星期评论》卅九期（内有余著《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一文）

5. 大学生与抗战建国¹

（1941年10月10日）

当民国六年欧战正到紧急关头，英法联军声嘶力竭，美国加入战争的时候，笔者正在美国某一大学做一个学生，亲眼看见美国学生一天少似一天，留校的学生也都武装起来，预备东征。原来的电机实验室改作临时无线电训练班，原来的学生宿舍住满了穿深蓝色水手衣服的士兵。民国六年那班六百多个学生，毕业后加入海陆空军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只留下些眼睛近视，牙齿不良，或是两足不能远行的人们去避免兵役。全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横渡大西洋，直接参加战役。到民国七年十一月战事结束，这民六抗战年毕业班的学生，死亡于炮火、飞机和前方所染疫病的人，占了全班人数百分之二十八。到如今，这二百数十人的照片还是挂在笔者母校礼拜堂的一个墙角上，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品。这无非是举一个例。当时美国其他大学的情形也相仿佛，英德各国大学生，因为抗战时期更久，所以牺牲更大。

上次大战时英美各大学学生的参战情形，似正可与我国这次抗战时候各大学的情形作一对照。在抗战第一年，国内人士很多主张办理战时教育应该与平时教育完全不同，甚至有提议停办高等教育，创立短期训练班，以使大学学生可以参加战时工作的。幸而我们的中央政府从头即决定了维持高等教育，直至前年春天开全国教育会议的时候，“战时教育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100期特大号及《星期评论》第39期（1941年10月24日）。

即平时教育”的理论，由于我们领袖的倡导，已变成了全国一致的主张。近两三年各国立大学毕业生统通供不应求，事浮于人，这才证明了在战时维持大学、维持高等教育，实是高瞻远瞩的良谟。

第一次大战时，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去是一个失策，到了战后才深深地感觉到。有许多英国的学者相信上次战时英国最大的损失便是牛津大学物理学助教莫士莱（Henry G.Moseley 1887—1915）的战死于土耳其加列波里之役。莫士莱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已创立了各原子X光光带和其原子数间关系的不朽事业。到如今，原子数又名莫士莱数。他战死的时候，年仅二十八岁。若再假以二三十年的寿命，他的贡献不难超越十九世纪的凯尔文或麦克斯威。英国人到如今还痛定思痛，所以在第二次大战开始的时候，牛津大学校长哈里法克斯在其《告学生书》里边，就劝学有专长的学生留在后方。美国这次虽则尚未参战，但从本年七月一日起，凡年满二十一岁的全国青年男子统须征抽入伍，惟有在大学里习化学、化工、土木、矿冶、机械、电机的学生，因为国防的需要得免抽调，其他习农、医各科和物理、地质、气象等等学科的人亦得免役。这个办法就可免除许多攻习专门技术的青年前往从军。美国大学生的人数，约占全国可入大学年龄人口总数百分之十五；英国占百分之三；在中国则不过千分之一。单从国防的需要着想，中国大学生也不应该大批派往前线。

从国家着想，抗战工作固极切要，而建国责任尤为重大。春秋时候，晋国赵朔为屠岸贾所害，赵氏遗腹一儿，几乎不免。朔的食客公孙杵臼和程婴二人商量保孤之策，杵臼对婴道：“尔为其难，我为其易。”杵臼乃抱他人儿入山中，程婴诬告于屠岸贾，袭杀之。婴匿赵孤于他处，得免于难。日后赵孤长大，即是赵孟，和婴定计诛屠岸贾，卒报父兄之仇，而程婴亦即自杀以报公孙杵臼。我们以此例彼，现在前线做着抗战工作的好像是公孙杵臼，而在将来负起建国大任的则似程婴。现时的大学生在后方虽无洋房可住，鱼肉可吃，但总能够饱食暖衣，许多学生且可不费父兄一钱，而得享受高等教育，比之前方在枪林弹雨中忍冻挨饥，呻吟于沟壑，暴露于原野的将士们，真有天渊之别。这次抗战是全民抗战，

是以正义人道来抵抗横暴武力的战争，青年们生当其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学生为将来社会之领袖，国家的柱石，理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方不愧为全国青年之表率。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杀敌，则他们应如何奋身图报，努力上进，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们，方不愧为今日之程婴。

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忧不足惧，惟有一般领袖缺乏清新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意志，则其覆国灭种将不旋踵，而且是无可救药的一种病。近二十年来法国各界领袖的放纵自私，英国政党首领的苟安姑息，酿成了养痍貽患噬脐莫及的局势，这是我们的殷鉴。抗战以前，国人常欢喜以一个大学和一个工厂相比，大学毕业生好像工厂的出品，毕业生乏出路，犹之货品不能销售；毕业生技术优良，刻苦耐劳，好比货色价廉物美。但二者之间有一根本不同的地方，一般人可未曾见到。这就是工厂的出品，无论是一把剃刀，或是一只時計，它出厂的时候也就是它最锋利最精密的时候，而大学毕业生却不这样。它应该像一把剃刀，愈用愈锋利，而且不会生锈；像一枚時計，愈走愈精确，而且不会半途抛锚。一个大学〈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在于能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于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潜力不是别的，就是运用个人的思想，正确而敏捷。惟能运用思想，所以事变之来，也能处之泰然，应付裕如。即在技术方面，如研究高深理论、改进机器构造等，不特于专门科学必须具有很深的造诣，也必须有很缜密周详的思虑才行。要能够作缜密周详的思虑，必须先几种基本科学方面经过老师宿儒一番严格的训练。若是一个大学单从事于零星专门知识的传授，既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又无科学方法的训练，则其学生之思想即难收到融会贯通之效。目前在校大学生之思想，幼稚与混乱，无可讳言。这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若是将来建国重任真正要靠现时大学生来负担的话，这个缺点是每个办理大学教育的人急当猛省而予以改良的一件事。

(1942年)7月2日 星期四 遵 第十五届毕业典礼在县党部礼堂举行。……

余演讲，题为“抗战建国与研究”。首述自古战术、战略之无变更，但武器即战具则大有进步，以近年为然。此次大战，名为内燃机之战，在1903年飞机引擎只12马力，卅年后增至900H.P. 马力，时Hitler希特勒方上台，1939至1500H.P.，去年已达2000。速度最初30mi/hr 英里/小时，现则400mi/h。时间最初仅59”，后增至三四小时，现则可至二十小时。次论Louis Pasteur 巴斯德之贡献，其在鸡瘟、牛瘟与啤酒所得利益，据Huxley 赫胥黎谓已超出普法战争五十万万法郎之赔款。继则谈及生理、生物、优生等科学之应注重，将来人类之改进可以利赖，如张献忠之嗜杀，吕雉之妒嫉，皆系一种可医之心病。讲三十分钟。

(1943年)7月8日 星期四 遵 九点 至县党部举行毕业典礼，是为浙大十六届典礼。学生可毕业者210人，应毕业而成绩不全者115人，其中极少数已离，一部在湄潭未来。今日到党部行礼之学生只一百人左右。……九点廿分举行典礼。余述抗战及战后的大学，引黄龙先著(《大公报》六月廿八、[廿]九二天)《十年教育计划》文，谓依总裁《中国之命运》，经济建设十年所需高等专门人材计五十万人。自民元至民卅二年所造就者只十二万人，而目前在校之大学专门生共只六万，毕业生每年只九千人。故欲于十年后达五十万高等专门人材数，势非增加五倍大学人数不可。浙大自民廿七年至今已增五倍。是年毕业生65人，今年355。该时(在泰和)全校只三百七十余人，现则计二千学生矣。分校不在内，亦达一千六百人。但国家需求尚须增加五六倍，至全校人数达一万至一万二千人。抗战时期，人力物力两难，抗战后，仪器设备方有办法。在泰和时，有教授、助教130人，现则连龙泉260，故学生增六倍，教员只增二倍。全国现在大学为教员者计约九千人，再加九千，势非大量派遣留学生与扩充研究院不行。

6. 校歌为一校精神之所附丽¹

（1941年11月17日）

本校渴望有校歌者，积四年之久，后得马一浮先生制词，以陈义过高，更请其另作校歌释词一篇。然词高难谱，直至今春始获国立音乐院代制歌谱焉。考校歌为一校精神之所附丽，其有严肃性可知，故学生必善歌之，即至卒業离校，二三校友晤对时，亦可于引吭唱和中，依稀前事，永忆弗谖也。次之，则为空军服役之事，事涉报国，同学勿弗后人。其三，湄地环境特佳，尤以运动场为最，至希同学日必从事运动，而注意于康健之道。至于学舍之命名为仁、义、礼、智、信者，盖为沿用杭州时之旧称，以维护其历史性，而诸字涵义俱深，尤富于中国传统之精神与美德，诸同学必予以身体而力行之。

7. 大学之使命²

（1942年9月28日）

遵义总校本学期以文工两院学生集中，多所增加，本部教授，多所调动，并分别介绍新聘教授。设备方面，自缅甸抢运入口美金所预购之外货百余箱，属诸浙大者过半。

大学之使命有三：其一，希望造就完人。完人必具智仁勇三达德，而涵濡于六艺之中。仁者爱人，故其上者必其有所成仁，而忠恕次之。欧美大学教育之缺点，斯为道德教育之疏忽，礼貌虽小节，谦虚虽小德，而弥具真义，必其发乎衷。其二，学有专长，而于大学中植其基。大学学生对各项基本知识，固应多所明了，欧美大学真正专门功课无多，而德国大学，必修课程甚少。中国教育制度，仿自美国，今美国大学已多所改良，而中国仍因陈莫变，驯至支离破碎，浪费心力。歌德读书驳杂，以赫德尔勉其详诵《莎士比亚集》，而有所成就。巴斯德初攻化学，以国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摘自《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02期（1941年12月10日）“校闻·湄潭本校第一次总理纪念周 竺校长训话”中的有关报道。篇名为编者所加。

2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摘自《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12期（1942年10月10日）“校闻·三十一年度第一学期本校一二两次纪念周纪事”中有关报道。篇名为编者所加。

难而研究微生物学，皆以专而有所成。其三，养成自己能思想之人，而勿薪教师逐字释义。思想同与肌肉，多予训练，并能发达。歌德深服拿破仑，以其视天下无难事，用兵深思，合于精密之学。

8. 抗战及战后的大学¹

（1943年7月8日）

本届毕业人数为十六届中最多之一班，凡三百五十五人，几五六倍于战前，盖坐于国家之需求，领袖眼光之远大。然此数字尤不足以应社会之需求，则以建国方在伊始也。领袖于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称及经济建设，以总理之实业计划为依归，书中对于人数之分配，有详尽之规画，谓共需五十万人，而于十年中培成之。惟依以往速率，四十二年中，不过培成专才十二万人，今则年不过九千人，以是知每大学尚须较今增加五六倍而后可。依数目上所示，全国现有在校大学生六万人，六倍之为三十六万〔人〕，此数或以为多，然中国今为四大强国之一，其他三强国之大学生，英美占万分之七十二，英属占万分之十三，苏联占万分之十七，中国大学生若达三十六万之数，亦不过才占万分之九耳。办如此之大学，自多困难，如图仪之不足，教师之缺乏，但在战后，则可取材异国，假自英美。孙中山先生已于第一次大战中，远见及此，故设备一切，应无问题。而人才则诚困难，留学生固不失为办法，但仍须扩充各研究院，由中央研究院之会报中，可见各校研究院成绩之一斑。而亦以见全国作研究者之綦少。为作育大学教育之人才，势必将全国研究院扩充至五六倍至十倍，则是大学方面不能不立为设法，而三十六万大学生之培成，须十五万众一年〔？〕，比诸美邦，仍多不及，盖为世界第一等国，乃不得不尔。

本届毕业同学出校后之责任至大，一人须负六人职责，乃势不可能，但须各人尽其最大之努力。兹称及一点，所任工作与所在地点颇有关系，东北之失，论者责诸少数人，实则全社会应负其咎。十五年前之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摘自《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21期（1943年7月10日）“校闻·毕业典礼志盛”，系在第十六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词节录。篇名见于作者当日日记。

大学毕业生，多留家乡供职，而视东北为荒僻，但日本于日俄战后，即视东北为其仓库，一年中投资逾二三万万。自以武力强占后，已增筑公路三千公里，而东省一切生产，皆占全国之首要部分，是抗战胜利后，我人如何接收斯项繁重之工作。本校学生三之一为浙籍，五〔分〕之一为苏籍，胜利后不能回苏杭，再享天堂之福，盖斯地今已不啻阿鼻地狱。十五年前之毕业生，已铸成大错，今后不容再误。该地虽非亲历，然一翻阅英美人所写文章，即可以规知该地之为如何需求人才，尤非力求将重工业基础建好，不足以言富强也。

（1944年）7月1日 星期六 遵 浙江大学第十七届毕业典礼，演讲“反攻时期之大学教育”。……

十七届浙大毕业典礼九点开始举行。除已应征为译员者四十八人而外，尚应有三百余人。其中有一百五十余人因尚有功课须补外，可毕业者145人。计文学院七人，理学院八人，工院81人，农院40人，师范九人。……

余演说约卅分钟，题为“反攻时期之大学教育”，述委员长元旦告民众书，谓本年为反攻年。现过去一个月中，地中海战场同盟军已占领罗马（六日），西欧同盟军于六日在诺曼第半岛上岸，于月底占 Cherbourg 半岛。东欧俄兵于月底占 Vitebsk 白俄重镇。太平洋上十九日美兵在 Saipan 岛上登陆。滇缅道上科希马日兵已打退，十二日我兵占有龙陵，廿六日占孟拱。十六日美国重轰炸机轰九州八幡。六月可称为同盟国反攻最有结果的一个月。所可惜的只是粤汉路上日兵于一个月中由岳阳侵至衡阳。在此国家危急之秋，大学尚能安然举行毕业实是幸事。但在大学言大学，反攻时期大学教育之方针，实有检讨之需要。过去七年国家政策，战时大学教育与平时并无重大变化，这是因我国大学生数目较各国比例远小。如美国人口与在大学学生数〔比〕为1/125，瑞1/387，法1/481，德1/604，意1/808，英1/1013，而中国约万分之一。而中国七年来大学生得以免役，实非偶然。但在反攻时期，由国家需要、国际观展、国民道德

三方着想，均非重加考虑此大学方针不可。

（一）国家需要。抗战初期，我们是注重在守，机械缺乏。此时注重在于步兵能保持战线即行，且有素加训练之精兵，足以卫国。现将反守为攻，机械化部队与飞机必须压倒敌人，始足言攻。凡此皆非训练无教育之农民所能为事。如跳伞兵、飞机员均须有清醒之头脑、专门知识，故非有相当教育不可。且战事初起，抗战与后方建设并重，故过去大学生出路极好。现则工厂已多不能维持，技术人员已达饱和点，故知识青年可以从军，其情形正如美国。美国抗战之初亦以工厂缺技工，农田缺农夫，故技工与农夫可以缓役。自本年三月中罗斯福在美国新闻记者席上发表，海陆现正搜罗壮丁，无孔不入。问题是军事与工业之需要孰急。目前美国兵器生产已至最高峰，而海陆军尚未足额，故嗣后青年均须入海陆军。当晚动员委员会即命令嗣后自18—25岁之青年，不得再以工业上之需要而缓役。农业上亦有同样情形。故自七月一日起，目前能缓役者有二十五万人将被调入队。原因由于两年来战术完全改观，由机械化部队战争而变成步兵、空军与机械化队三者混合制之战争。从前步兵被用以保守，目前用以进攻。步兵现以 antitankgun 反坦克炮可以当先锋，故其死亡率甚大。每月美国招兵不足额者，自去年起月十万人，年一百二十万人。而步兵选择极严，年稍长，体格稍差，即不能入选。故美国不能不有此缓役令之更动。吾国在现时状况之下，实有更改之需求。

（二）国际舆论。自美国派大批飞机人员及陆军军官来我国，即发表不少意见，以为有若干工作为我国人士所能干者，何劳彼万里之奔驰而来，如看护兵、电机师等等。彼等均不了解中国大学何以尚在此囤积如许之青年。美国近来华之某教授并明白表示，中国学制必须改革，以应战时之需要。谓即使牺牲四分之一之大学生于疆场，而能使国家独立，失土恢复，民族自由，则亦值得，不然则失败以后更有何建设可言。近来有人谓美国军事教官与翻译员经过某地，见一批衣衫褴褛之壮丁被绳索连系于过市。教官问翻译员此

系何种人氏。翻译员以颜面攸关，答是一批俘虏。此虽可蒙蔽一时，岂不是对同盟应有之词令。《论语》所谓：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乡里行乎哉。

（三）国民道德。大学生应是异日国家领袖。国家危急之秋，理应身先士卒，不能避难就易。四十余年以前，张之洞、刘坤一于八国联军入京时宣告独立，藉以保全东南半壁。中日之战，一般人民根本不知有战争。目前战争在各国均称为全民战争，而我国则前方士卒均来自农家，而知识阶级子弟入伍为兵者绝无仅有。故参战各国惟中国非全民战争，而为半身不遂之战。好像以一手反系而另一手击人情形。故今日之无枪阶级，实与四十年前刘坤一、张之洞等相类，等于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知识阶级既自命为领袖阶层，理应冒锋镝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今反退处于安全之地，纵前线士兵不来责备，何以能扪心而无愧乎？凡此三端，皆使今日反攻时期大学教育政策有重新考虑之必要也。

下一段须加入演稿中。

或者以为在英美各国兵士受最优等之待遇，为粮食佳者，衣服之美者，药品之最优良者，均尽先供给与士兵。而在我国则入伍壮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病无医药。在后方旅行，英美士兵受各方之欢迎尊重，而我国则到处受人奚落。如此安得不使人裹足不愿当兵，使为人父母不肯送其子弟从军。不知惟其我们上流社会以及知识阶级不愿其子弟〔从军〕，遂使我们的兵士受人奚落。试问现在简任官之子弟有几人从军，大学教授子弟，高薪俸收入甚丰之工商企业家，各地士绅，有几人使其子弟从〔军〕？惟其中上级社会不使其子弟从军，遂使士兵之待遇不为一般人所重视。若使中上社会统能使其子弟入伍，自然各方面统将力谋士兵改良生活，而国内舆论亦将拥护士兵待遇改良运动，而不致如目前之漠不关心矣。

9. 反攻时期之大学教育¹

(1944年7月1日)

今年是同盟国的反攻年，过去三个月各战场的形势，证明这预言的正确性。在欧洲东战场苏联大兵已压东普鲁士边境；西欧盟军已解放巴黎；义〔意大利〕境德军先后放弃了罗马、比萨和佛罗伦萨诸重镇。在太平洋和亚洲战场上，倭寇也正在步步退缩；马里亚纳群岛美国海军在塞班和关岛登了陆；缅北密芝那、孟拱已被盟军克复；我军渡过怒江，攻入龙陵、腾冲；敌兵从印度科希马退走，过了印缅边界。惟有湘江流域，敌寇深入可虑，所谓困兽犹斗，料想我军事当局高瞻远瞩，早已洞烛奸谋，使鬼蜮伎俩无所施展，我们固可不必为杞人之忧。但是一旦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亚东方面，英美盟军于海上空间虽可畅行无阻，陆上反攻仍须以我国将士为主干。过去抗战七年，我国高等教育，对于军事绝少直接贡献，值此反攻时期，大学教育应如何与军事配合，以取得胜利？胜利以后，又须如何谋划肩负复兴建设的重任，实有检讨之需要。

过去国家政策，战时大学教育与平时大学教育初无二致。专门以上学校之数量与学生比较战前有增无减。这在参战各国中，是一种特色。战前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得出路，战后反而求过于供，这就证明了大学教育虽在战时，也并非为奢侈品。因为我国抗战基地西南西北各省交通工业本均落后，故大学生在后方经营建设，和前方将士执干戈以卫社稷，同一重要。况且以人口作比例，中国大学生在校人数，比欧美各国相差悬殊。美国每一百二十五人中一人，法国四百八十一比一，德国六百零二比一，义大利八百零八比一，英吉利约一千人中得一人，而我国则万人中才得一人。在抗战初期，与兵役毫无妨碍，但是到了目前反攻时期，情形又是不同，此可从三方面来讲。

(一) 从抗战建国需要上着想 在抗战最初五年，大学毕业生求过于供的现象最为显著；但到最近两年求供已足相应，有若干科目并且有供过于求之势。预期在抗战未结束以前，这种趋势不会改变。这是因为后

¹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系在浙江大学第十七届毕业生典礼上的讲演，刊于《大公报》（1944年9月8日，重庆）第三版。讲演时间见于作者当日日记。

方实业的不景气，和各种企业所需人才已到了饱和点的缘故。美国也有同样情形。在抗战初起时，美国因为兵工企业需要很多技术人才，所以大量技术人员统免了兵役，但到了去年下半年，兵工产量已达到最高峰，能容的技术人员也达顶点，所以今年三月间罗斯福总统在招待美国新闻记者席上就发表了兵役对于壮丁将有绝对优先权之议论，以后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再不能以技术上之需要而免役了。同时我们前方需要兵士的知识程度，在反攻时期也和过去不同。在过去我们因为缺乏重炮、机械化部队和飞机，只好着着退守。到了滇缅路打通，盟国海军、空军能控制东亚沿海的时候，不但重兵器可源源而来，它的使用非目不识丁的农夫可以于短期内训练，使能得心应手，就是无线电的操纵，各种精细通讯网的组织，医药卫生常识的应用，工兵机械的使用，统非有大量知识青年加入军队不可。要训练这班青年，专门学校和大学是可以作一臂之助，而且是责无旁贷的。

就是战后建国的重任和目前大学教育是否能配合起来，亦成一个问题。抗战胜利以后，东四省和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了，这是极可喜的事。但是我们要接收东北的铁道、矿场、林业、渔业，台湾的糖业、茶业，技术人员固嫌不够分配，管理人员的问题更为严重。目前大学生毕业以后，有集中在几个大城如重庆、昆明、桂林等的趋势，若不严格执行大学公费贷金生毕业以后服务地点须由政府支配，深恐一旦胜利临头，人人将以苏杭为天堂，京沽为乐土，而视黑龙江和台湾为化外，为畏途。同时地域观念必须打破。我国如欲建立重工业，如欲自立于世界列强之林必须以东四省为建国基点。战后网罗全国有作为、有操守、肯牺牲而学有专长之青年开发东北，则建国乃有必成的希望。

（二）从国际合作上着想 这次盟军在各战场并肩作战，要谋胜利，必须建立在和衷共济，协力同心的合作上。自从大批美国军官及英美教授专家络绎到达我国以后，有许多友邦人士不明了为什么在这国家危如垒卵，民族生命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的大学中学还要“囤积”大量合格于入伍的青年；许多工作，我们知识青年可以优为之而不为，偏要从西半球运送美国青年来抵这个缺，他们真大惑不解。有一位美国教授，在

他回国以前，发了一封公开的信，给中国友人说道：“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和民权，虽牺牲全体大学毕业生四分之一的生命，亦是值得的。若说知识青年须荷战后建国的重任，但如抗战失败了，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类批评无论是否中肯，也是很值得我们反省的。他又说：“中国若要做一个战胜国，她的大学必须立刻建设在抗战基础上，来训练成千成万军队所需要的飞机师、无线电报务员、炮手、译员、工兵等等。”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他已经发表的演讲中，也很怪中国大学里许多理工教授们不能为战争尽力。美国麻省理工专科学校教授们正在研究与军事有关的理工问题有二百种之多，据该校校长康伯顿本年六月间的广播，知道理工大学毕业生为现役军人者有五千六百之多，少将阶级以上的，在海军有二十五人，陆军六十九人。第一次率领美机轰炸日本的杜立特将军，就是该校毕业生。这不过举一个例来代表英美大学在战时如何为国家民族在争生存和自由。本年《七七告民众书》中说道：“国人要自反自省，凡是靠人成事的决不能有真正独立的资格，凡是坐享其成的必受淘汰无疑。”英美的大学正在为抗战而努力，而奋斗，相形之下，岂不是我们的大学尚在靠人成事，尚想坐享其成？

（三）从国民道德上着想 这次世界大战，称为全民战争。旁的国家无论是轴心国或同盟国，都是群策群力，全体动员了；惟有我们的知识阶级，尚少投笔从戎，仍多取袖手旁观的态度。知识青年既为将来社会之领袖阶层，在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理应冒锋镝，身先士卒，出生入死于枪林炮火之中，方不愧为顶天立地之男儿。今乃退处后方安全之地，纵前方士兵不来责备，扪心自问，亦自有愧。过去数年暑假，政府发动大学生宣传兵役，这是极难收效的事。古语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大学生要宣传兵役最好是自己去当兵。有人以为欧美各国士兵受最优等的待遇，食品、衣服、药品之最佳者优先供给士兵，出外旅行，受各方士女之重视优礼。在我国眼看见入伍的壮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病无医药，所以不能怪知识阶级不愿当兵了。不晓得这种看法是因果倒置。我国的士大夫，即所谓知识分子，传统的是一个特殊阶级。抗战以前，尤其是江浙一带，家家有纳税的义务，唯有士大夫阶级往往是一地

方的巨绅，拥地最多，而他可以不纳税，地方政府亦决不敢去催他纳税。到了抗战以后，士绅把子弟送入学校，就可以缓征入伍。到如今，后方有不少中学是为了士大夫子弟逃避兵役而欣欣向荣。若是每一个士绅，每一个大学教授，每一个荐任以上的公务员，有一两个子弟在军中服务，那末我们社会的舆论对于士兵的待遇，对于他们的衣食住行和卫生医药，决不会像现在那样漠不关心了。我们的士绅们平时有田产可以不纳税，战时有子弟可以不入伍，这种习惯若不铲除，不但我们不配列于四强之一，也不配称为一个民主国家。所以为国民道德着想，我们很应该奖励大学生去入伍，而大学本身也应该去做抗战的工作。

总之，抗战已到了反攻时期，大学的使命也与平时不同，急切的需要与军事配合，以求达到抗战胜利的目标。抗战结束以后，大学即须恢复常态，使他有学术自由的空气。抗战以后，我国办理大学的方针，应加以郑重考虑，这也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1945年）5月7日 星期一 八点 至湘江大戏园作纪念周。因地上潮湿，兼之余之题目为“法律与道德”，学生明知是一种教训，故到者不多，约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左右（遵义现有学生五百余人）。余述法律、道德均根据人情，但一则由权力之强制，一则由良心之强制而已。述二者均依环境而更易。如日本与英国之有Primogeniture长子继承权，由于岛国地少。西藏一妻多夫不以奇，以僧侣之多是也。中西道德标准虽有不同，但大致则一，即以男女与金钱二事可以为证矣。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诸生在校尤应切记，异日逢有作弊之机会是否能涅而不缁、磨而不磷，此乃现代教育之试金石也。

10. 道德与法律¹

(1945年5月7日)

际此民主声浪高涨之时，道德与法律不能不有新估价。二者皆依据人情而来，西洋重法治，中国重人治。人治以道德为重，道德以良心为制裁，而法律则以权力为制裁。现代国家，法治实属必要，法治与科学同为积累而成，中国艺术、哲学、文学不及科学之进步，即因不达其旨之故。金钱、男女二问题，中西看法虽不同，然道德观念则一。

抗战八年，道德堕落殊甚，大学生应作中流砥柱，改易风俗。²

(1945年)7月1日 星期日 遵义 行十八届毕业典礼，文院18人，理院21人，工院133人，农50名，师42名，共264名。……

余首作报告，述大学生之责任。谓美国每一百人有十六人系大专学校毕业生，俄国五人，英国二人。而中国则自民国元年迄于卅二年，专门以上学生毕业者仅十二万人，即今亦不过十四五万。故需二千人中始有一人，可知责任之重大。近贵阳人口统计三十三万人中，专科以上占2.4%，但大学生在贵州集中贵阳，贵阳人口为全省五六十分之一，故以全省论，实亦不过二千分之一也。责任之重大如此，如分析之，又可分为两重，即一专门人材之责任与国民之责任是也。

次张荃谋报告本届毕业人数，连从军及翻译人员共三百七十余，在校者264人。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摘自《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23期（1945年5月16日）“校闻·国父纪念周讲辞汇志”。篇名为编者所加。

2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作者日记中记当日讲话内容有“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诸生在校尤应切记，异日逢有作弊之机会是否能涅而不缁，磨而不磷，此乃现代教育之试金石也”。

11. 大学生之责任¹

（1945年7月1日）

（在第十八届浙大毕业典礼之演讲，卅四年七月一日，在社会服务处。）

诸位来宾，同仁，同学：本届毕业同学行将离母校。离开学校以前诸位是受教育，国家每年要费一二十万金一个人（学生）培植你们。离开学校以后，你们就得要为社会服务了。中国大学生较之他国为少，所以你们责任格外重大。如美国每100人有16个人是大学毕业生，俄国五人，英国二人（依 Bernal 贝尔纳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之统计），我们则不过二千分之一。依教育部统计，自民元年至卅二年，专门以上毕业生只十二万人（依黄龙先卅三年夏在《大公报》上所发表之论文），加上民元以前及卅三四年（除去死亡），最多不会超过十六万人，所以尚不过全人口三千分之一。郑康成谓“才德过千人为俊”，则诸君皆今日之俊杰也。

诸君之责任可分为两方面言之。一方面，诸君学有专长，毕业以后，各尽其所能，以供献于国家。抗战时候如此，抗战以后亦如此。在民廿九年八九月间，英国 Dunkirk 撤退大军以后，德国大量轰炸。那时英国守军有训练者只一军 Division 之众，飞机不过千架。那时 R.A.F. 英皇家空军能将德国轰炸机击退，邱吉尔所谓“Never there was in history so many owed so many to so few”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这样少的人做出这样多功绩的。而 R.A.F. 制胜之重要因素，即为 Radar 雷达之发明。发明人乃一物理工程师 Robert Watson—Watt。抗战全赖坦克、飞机与汽车，随处需要橡皮。美国、苏联全部橡皮得自南洋，苏联自1939—1941二年之间，美国18个月，费生物、化学家及工程师之力解决人造橡皮，抗战即能自给。俄国物理学家 Kapitza 发现低价制养气法，不但解决飞机上所需的 O₂，而且煤矿中可以藉此不劳掘挖，可以将煤变成气，Underground gasification of coal 煤之地下气化，以制造 NH₃，（制肥料与炸药）、Methyl Alcohol 甲醇（制橡皮）及熔铁炉中之气（Reducing Agent 还原剂）。不但

¹ 本文出自1945年7月1日竺可桢日记。

著名科学家有所供献，即一般初出茅庐的理工人材亦大量需要。如英国抗战以前只有 3000 Physics 家，包括中学教师（物理）在内，每年各大学毕业只 200 人。而战事，如无线电、潜水艇侦察、内燃机等等，均需物理人材。故战时大学训练物理每年毕业生增至 1200 人，至今其中 2/3 在军队中工作，1/3 在工厂中工作（Lawrence Bragg 在 Association of British Scientific Workers 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演讲）。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百姓之穷，战时、建国到处需人。在遵义，吾人举目社会上应改进之事正多。譬如此间枇杷只是一张皮包了一粒骨，每个学园艺果木的人应当自己负责起来，把他改良。此外，如人民衣着的褴褛，农夫依天吃饭，不讲卫生，以蚤虱之多，识字之少。所谓范文正公当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此是诸位份内的事，责无旁贷的。

诸位除掉了是一个专门有训练的人，为一个教员、学士、电机工程师、生物学家、果树专家而外，同时亦是一个国民，所以在〈只〉〔这〕一方面你们既是大学生，亦有比普通人民较大的责任。在现代世界，你们得认清三点：（1）知先后。军事第一，是我们现在的口号，此在战时各国皆然，夺取胜利。邱吉尔与罗斯福在三年前奎北克会议的时候，他们决定一桩重要的事就是先击败德国，再打日本，无论此原则是否合理，但同时打败二强敌是不能的，所以必得要分先后。抗战如此，建国如此，我们不能不分最要与次要的。譬如苏联在抗战前以集体农场 Combine 中小麦蚀耗之大，Academy of Science 集 14 个 Institute 之力，化了一年工夫把这问题解决了。小而言之，一个学校、一家公司，甚至一个人的作事、读书，统要有先后，然后能计划。《大学》里头一章就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2）明公私。在抗战时候道德堕落，这是古今中外一律的事。但若赏罚严明，公私有别，则道德就不致十分堕落。就如英国抗战时期谁也不能发国难财。近来报上所载我国贪污之案层见迭出，甚至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齐、直接税局局长高秉坊、中央银行业务局长这类人也竟监守自盗，舞弊上千万。诸君看了报自然莫不痛心。但是诸位要晓得，在有一个时期这类作弊的人也是和诸君一样从大学刚毕业、极清白纯粹的大学生。因为贪污之层见迭出，所以一般人

以为官是做不得的，财是不能发的，这可大错了。做公务员就是官，我们就希望顶好人材、顶廉洁的知识阶级去做官，惟有这样，公家的事才能办得好。中国那么穷，我们就希望大家绞脑汁来做发明、办工厂、开农场，去发大财。惟有这样，国才能富，民才能强。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做官、能发财，但不希望你〔们〕因为做了官再去发财。为做官而发财，是没有不贪污的。美国务卿 E.D.Stettinius 辞掉了 100,000〔元〕收入的美国钢铁厂经理，而去担任年薪 15,000 元的副国务卿，并且把所有各大公司的公司股票统统脱手。英国邱吉尔从前做财相的时候，第一桩事亦是把他所有的股票售去（而我们过去做部长的往往兼了许多公司和银行的董事长，这是所谓瓜田李下，要不得的）。惟有公私分明而后，贪污才能绝迹。（3）辨是非。浙大过去的校训是“求是”。我们应该只知是非，不管利害。此话说来容易，要实行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了。你们在出校门以前恐怕已经觉得是非和利害有时会冲突的。譬如你要就业，你本已答〔应〕一个中学去教书，聘约也签了，旅费也收了，你要动身的时候，你忽然接到一个公司的邀请，要你去当副工程师，不但薪水丰，而且出路好、朋友多。你是不是会立刻改弃已成之约，借口说母亲病重，或是身体不好要到重庆去呢？到那时候你们是否尚能把是非的观念放在利害的观念上面呢？君子、小人之别只在此一念之别。近世科学之能发扬到如目今现状，就是因为先哲 Bruno 布鲁诺、Galileo 伽利略等不避艰险，与中世纪宗教恶势力奋斗成功的。我们学术界事事落人之后，而史学尚足有表现亦是。古代的太史能不避斧钺，秉笔直书。春秋时候崔子杀掉齐庄公，齐太史就书“崔杼弑其君”。崔子杀太史，其弟继起而被杀者二人，但齐国太史均起而直书，使崔子没有办法。这种只顾是非、不顾利害的精神是每个浙大毕业生应具有的。

8月25日 星期六 开始讲演。岑卓卿为主席。余讲题为“战后之大学教育”。余先提出三个问题，即（1）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2）道德之价值是否高于知识，（3）国家与人民孰为重要。关于（1），孔孟之教认人性本善，故《大学》讲正心诚意，《孟子》讲大

人能赤子之心，阳明讲致良知。耶教认人最初即有罪恶（贺麟《基督教与政治》，《思想与时代》29期）。中国法家认性恶，如李斯、韩非、荀卿主张严刑法。英国 Hobbes（日记七月廿三日）。但卢梭、福禄培尔认人性本善（日记八月六日），至杜威始信人性非善亦非恶。关于（2），中国向来重道德，希腊人重理知（张荫麟《中西文化之异同》，《思想与时代》第十一期）。关于（3），集权国家以国家为重，如苏联是，墨子所谓上同；民主国家以人民为重，墨子所谓下比（看日记八月十四日）。对于上揭的三个问题，中外哲学出发点不同。耶苏与孔子意见于三点的主张以人民为重。第一点相反，第三点中西相反。耶、孔二者尚有不同之点，即由二人背景不同。耶苏门徒均为下等社会，且当时犹太人早已为罗马所征服，故富于革命精神，叫人要以服务为目的。孔子所教者乃知识阶级，传统的维持旧势力，封建势力浓厚，言必称尧舜。孔子所讲以理知，耶苏以情感。中国教育要改良，必得铲除旧习惯。罗素所讲的贪污、乏同情心与懦弱，统由于农业社会封建势力而来，必得用教育来铲除。真理的薪求必须与正德厚生利用处于同样重要地位，庶几我们社会能有进步，教育能有改良云云。

8月22日 星期三 遵义 今日暑期演讲会轮到余演讲，题目“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我已将稿子大部写好，所以讲时倒反拘束。听众座满，约一百人左右。余讲七十余分钟，自九点至十点余。

12.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¹

（1945年8月22日）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个问题，近两年来很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但国人有许多议论发表，即欧美人士亦注意到这个问题。各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原为作者1945年8月22日浙江大学暑期演讲会上之演讲稿（此前曾于1945年3月26日在重庆中央大学作过以《中国古代何以不能产生近代科学》为题的演讲），刊于《科学》28卷3期（1946年4月）137—141页。演讲时间见于作者当日日记。

人的意见虽有不同，但归纳起来，大多数统以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没有这种能力，而是由于我国历史上环境不适宜的缘故。在《科学与技术》期刊上，陈立先生《我国科学不发达之心理分析》一文里的结论是：“中国科学之不发达，我曾溯源于（一）拟人思想的泛生论，（二）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三）没有逻辑，（四）没有分工，（五）客观与主观的混淆，（六）理智的不诚实等等。但这一切我都指出，系反映着客观社会的组织。在宗法阶段的社会，便只有宗法社会的思想。”^{注一} 去年浙江大学夏令讲习会，钱宝琮先生《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演说里有这样几句话：“我国历史上亦曾提倡过科学，而科学所以不为人重视者，实因中国人太重实用。如历法之应用早已发明。对于地圆之说，亦早知之。然因不再继续研究其原理，以致自然科学不能继续发展。而外国人则注重实用之外，尚能继续研究由无用而至有用，故自然科学能大有发展。为什么我国民族太注重实用呢？实由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使然。中国为大陆文化，人多以农业为主，只希望能自给自足之经济。”^{注二} 同样，中英科学合作馆，英国李约瑟博士，在民三十三年湄潭举行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演讲里，亦以为近世科学之不能产生于中国，乃以囿于环境，即地理上，气候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四种阻力。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向来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和西方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气候方面，亦以大陆性甚强，所以水旱灾患容易发生，不得不有大规模的灌溉制度，而官僚化封建势力遂无以扫除。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秦朝以来，官僚士大夫专政阶段停留甚长，社会生产少有进展，造成商人阶级的没落，使中产阶级人民无由抬头，初期资本主义无由发展。而近世科学则与资本主义同将产生^{注三}。抗战前数年，德籍犹太人维特福格尔（K.A.Wittfogel）在他的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中，有一段专讲“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注四}。他开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半封建主义的欧洲，在经营规模并不大于中华帝国，甚至往往小于中华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完成了许多的科学发明和贡献。这一切显然是表示了初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特征，狂热地催促小资产阶级去积蓄势力的环境下所完成

的。拉狄克^{注五}曾经指出欧洲产业革命以前的西欧社会关系，和中国的这种关系有某种根本的差别。若不承认这种见解，则中国环境既和欧洲产业革命以前的环境一样，那为什么不引起了科学的萌芽和科学的发展呢？”对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除了历史科学、语言科学和哲学而外，中国只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得到了真正科学上的成就。而就整个情形看来，那和工业生产的形成有关的自然科学，不过停滞于搜集经验法则的水准罢了。……汉代或汉代以前的中国，为什么在数学上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假定这些科学的产生，是建筑在各种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水利工程上的社会秩序需要上，那末只有这个时代才是这些科学的成立时期吧？”接着他说：“中国思想家们的智力，并没有用在那可以形成机械学体系的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面，并没有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根本的紧急任务。这个远东大国的根本智能，集中到了其他的课题，即农业秩序所产生的，及直接和农业秩序有关的，或在观念上反映着农业秩序的各种课题。”他的结论是：“他们在这里还不能够从亚细亚社会和欧洲社会的关联中，检讨亚细亚社会为什么不能以解体过程中的欧洲中世纪的半封建主义那样的方法和程度，去推进大规模的工业经营。我们仅仅确认这个事实，即是精密的自然科学的停滞，是和这种工业上的停滞互相平行的。……中国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以只有贫弱的发达，并非由于偶然，而是那些妨碍自然科学发达的障碍所必然造成的结果。”上述四位作者对于本问题的结论，统归根到中国旧社会之不适宜于产生自然科学。钱宝琮、李约瑟和维特福格尔三位先生一致主张是农业社会的制度在作梗，陈立先生的意见是由于宗法社会的组织。两者的意见实是二而一。因为宗法社会只有以农业为经济核心时才能维持，才能发展。据京都大学教授森谷克己的意见，宗法社会的功能是，（一）祭祀祖宗，（二）逢年逢节时合族的聚餐，（三）亲族的丧服，（四）同宗不婚的习惯，而最重要的是（五）他的经济功能，——即古时所谓“兄弟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于宗，不足则资于宗”，一族内财产之有无相通办法^{注六}。森谷克己又说：“在中国原始的姓之社会的诸职能，在宗法下是很多保存着的。在这里就出现了中国社会进化之一特性。”农民安土重迁，可以和邻县邻

村的人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容易保持宗法社会制度。到了工商业逐渐发达，天下之大，随处可为家庭，宗法社会的制度，即无以维持。《吕氏春秋·尚农》篇对于这点说得很透彻：“民农则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德。”人民到皆有远志无有居德的时候，宗法社会决难维持了。

我们若承认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之所以不发达，是由于中国社会农业势力之伟大，和工商业之不发达，接着就发生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能保持这种压倒的势力如此之久？英国拉斯基教授说：“政治哲学必须以历史哲学为基础。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治史者各有各的观点。类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或者以为出于天命，或一种不可阻抑的势力，如黑格尔即作如此观；或者以为由于天气之变动，如热带宜于独裁，温带宜于民主；亦有把历史当作几个伟大人物的成功或失败事业史观者。……但是经济生产方法的改进，最足以左右一切历史上的变动。”^{注七} 拉斯基又说：“历史上变动最快的时代，亦就是经济生产方法变动最大的时代；历史上稳定的时代，亦即是经济生产方法比较固定的时代。”^{注八} 他而且举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二十世纪初叶几个时期作为欧洲生产方法变动最大时期，亦是思想最灿烂时期。我们从经济生产的观点来研究欧洲近世科学之兴起，方能了解十六七世纪欧洲科学之进步，决非偶然之事。一般人以为近世科学起源于伽利略、牛顿几个伟大杰出人才，实是大误。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欧工商业大为活跃。海洋中船只之驾驶，需要专门工程知识；贸易繁盛，金币不足应付，矿冶迅速发展，而开矿时又发生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在十五世纪末，欧洲已有了十六种机器为矿中去水的用途。航行发达，望远镜与罗盘针之制造日趋于精密。经纬之测定，又要天文知识。到1660年左右，英国有一班学者，专门为了好奇心所驱使，来集会讨论研究一切事物，自宇宙以迄虫鱼。这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起头。英国皇家学会之所以成立于十七世纪中叶，亦非偶然之事。因当时富商巨贾之特兴，造成了一个有闲阶级，时常往来旅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孳孳为

利，而是为求知心所驱使。这实〔在〕〔为〕近世科学之开端^{注九}。

我们了解了近代科学和社会进化的关系，再来看我国历史上是否有一个时代可以奖励工商业的发达，初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中产阶级能起而与专制封建势力相抗衡，如同十六七世纪欧洲新兴势力之与封建宗教相奋斗呢？历览二三千年我国历史，只有在战国到西汉中叶一个时期有此可能性，而这个时期亦是中国思想史、科学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马乘风《中国经济史》里说道：“因为战国时代之经济发展，所以随之以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亦均活跃异常。在中国文化史上来看，除了近代欧化势力东渐以外，几乎找不出一个时代，能够与战国之百家怒鸣万壑奔流相比。”^{注十}张荫麟《中国史纲》中亦说：“自从春秋以来，交通日渐发达，商业日渐进步，商人阶级在社会日占势力。儒家法家虽统主张加以严厉裁制，——但汉代统一中国后，一方面废除关口和桥梁通过税，一方面开放山泽，听人民垦殖，给工商业以发展的机会。此时牛耕逐渐推行，加以政府的放任，蓬勃之气象，为此后直至海通以前，我国工商界没有超出过的。”^{注十一}在汉代文景二帝时候，商人的势力最大，当时富商往往也是大地主，专川泽之利，管山川之饶，他们的生活，据晁错说：“农必文绣，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遨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縠。”继文景而君临帝国的汉武是一位好大喜功的人。自从他即位后二年，即派张骞去西域。从建元六年到元狩元年，十六年间，专力排击匈奴，计九次出塞，所斩获人数在十五万人以上，把河西走廊改设武威、酒泉二郡。从元狩四年到太初五年，十七年中，又把南越、朝鲜、西南夷收为郡县。汉武开拓疆域，论时间与范围统是空前的。^{注十二}与西欧相此，这正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辟了广大殖民地，使工商业大可发展。据张荫麟云“张骞使西域以后，各国继续报聘，为郡国英豪或市井无赖辟了新的出路。”照理论讲，文景之世商人势力既如此庞大，而接续汉武又开拓疆域，使工商业更有用武之地，那末初期资本主义就应该产生，而近代科学亦应该见萌芽了。但历史告诉我们，事实并不如此。这其原因又何在呢？

地理的环境是有关关系的，若是西域不是一片荒漠，而是一块沃土，如欧洲的乌克兰或是茫茫大海如大西洋，那大概我们历史上的发展就要大不相同。但这种推想，不能解决目前所讨论的问题。灌溉的制度，和君主专制政权之确立，是平行不背的；但不是树立君主专制政权重要的因数。从战国时代魏西门豹凿十二渠，韩郑国为秦凿泾水渠，蜀李冰等筑灌县水渠，直到汉武帝在关中凿六渠，这期间水利的事业的确大有发展。黑格尔、恩格斯、马克思〔马克思〕和马札尔辈统主张水利工事的统制，建立了中国专制政权。李约瑟和维特福格尔亦多少抱这种见解。但建立秦汉专制政权的因数，决不只此一端。马乘风举出（一）财政的管理及田赋的征收，（二）常备军之训练和调动，（三）各地执行民法和刑法的衙门，和（四）专门选拔为皇帝作愚民政策，为国家做辩护士的考试和选拔制度。这四者对于确立秦汉专制政权统比灌溉水利事业更加有力量。^{注十三}

但究竟那一种势力能最有效的建树了帝王的政权，摧残了商业的发展，毁灭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呢？这我们不能不根据历史上的事实。在春秋时代，商业尚未发达，当时帝王并不感觉到商人夺取政权的威胁，所以《左传》有“务材顺农，通商惠工”之说；《国语》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之语。那时农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春秋时代经商的子贡，不失为孔子大弟子，太史公《货殖列传》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到了战国，铁器已普遍应用到农耕上；施肥的方法盛行，大规模的灌溉事业亦统建设起来；农业生产大大的增加，商业亦随之以活跃。自越之计然、秦之商鞅以后，重农抑商，以农为本商为末之议论勃兴。汉代初期，工商业更有长足之进步。富商之衣食住，拟于王侯；收养豪杰，权倾人主。当时的知识阶级如贾谊、董仲舒之流，就统主张严厉的裁抑商人。^{注十四}但是裁抑自裁抑，舆论自舆论，而文景之世，商业势力仍然继长增高。所以晁错叹息道：“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已富贵矣。法律贵农人，而农人已贫贱矣。”汉武开拓疆土，本可使工商业更形繁荣；但是相反的，商业于汉武之世反形凋落。这是因为根

据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武帝厉行了三种制度，使商人统濒于破产。第一是商人加算，与听人告缗，始于元狩三年。明邱濬《世史正纲》卷四云：“古者关市之征，盖恶其专利，就征其税，非隐度其所积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于元光五年，既算其行者之车，至是又并算民车，且及舡焉；凡民不为吏不为三老骑士，苟有轻车，皆一算。商贾则倍之。舡五丈以上者出一算。匿而能告者以半畀之。”匿而被告者称告缗。自告缗令施行后，据说中产以上的商人，大抵破产。第二是商人不得名田。汉初富商大贾，亦多为大地主，或投资农村，如蜀宛氏之规陂池。商人不得名田，即不得置产业；使商贾与大地主绝缘，商业资本遂以偏枯。第三是将当时最大的私人企业，盐和铁收归国营。这也是元狩三年的事，置盐官凡二十八郡，铁官凡四十郡，设有私铸铁器及鬻盐者，鈇左趾，没入其器物。据《史记·货殖传》秦汉之交的几位大富翁，以职业而论，多为矿冶。我们把《货殖传》的几个富翁，列举起来。猗顿用盐起家；郭纵以铁冶与王者相埒富；巴蜀寡妇清传丹穴，擅利数世，秦始皇为筑怀清；蜀卓氏用铁冶富秦破赵，……至僮千人，田池财猎之乐拟于人君。此外以冶铁致富者尚有程郑，宛孔氏，曹邠氏。惟白圭以善观时变，如今日之投机家，操纵市场。宣曲任氏以窖藏致富，乃今所谓囤积居奇。此外则齐师史以运输致富，乌氏保以畜牧致富。假定司马迁这统计可靠的话，那末以盐铁起家致富的，在当时富翁总数里，十一个中要占到七个。自盐铁归为国有，这类财产就要被收没了。从上面所叙述之事实看来，自春秋到汉初三百年中，我国商业有欣欣向荣的趋势，到汉武帝国势昌盛的时代，正应该继续发展，以达到像西洋初期资本主义的阶级，却为汉武帝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所打断了。

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亦是中国思想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诸子百家各种学说，统在此时出现，好比西方纪元前六百年到二百年时代的希腊。战国时代中国思想之所以突然解放，亦有其社会之背景。张荫麟说道：“当封建时代的前期，贵族不独专有权和田土，并且专有知识。闲暇和教育，是他们所独享的。在封建制度演化中，贵族的后裔，渐渐有降为平民的，知识遂渗入民间。”^{注十五} 马乘风

亦说“战国时代以前，知识是贵族所独占的，贵族与农奴处于绝对不同的生活状态之下。到了战国时代，因为阶级关系的变动。昔日隶属关系之羁绊，已被打破，所以平民而求知识就成为可能的事了”。^{注十六} 因为求知知识之机会由上层阶级推广至于中层，甚至于下层阶级，思想就骤然解放，而突然发生异彩，一时学说并陈。但何以在这思想解放的时代，科学的思潮不能发展？对于宇宙的观感，天然事物的剖析，中国赶不上希腊呢？对于这一点，张荫麟先生亦有很好的解答。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这篇文章里，他说道：“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于纯粹活动兴趣之上。以亚理士多德的《尼哥麦其亚伦理学》和我国的《大学》、《中庸》来比，是极饶兴趣的事。亚理士多德认为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的观玩。至善的生活，是无所为而为地观玩真理的生活。《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则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差别还不够明显么？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注十七} 荫麟先生所指出这中西文化在价值意识的差异，是极重要的一点，荫麟先生很谦虚地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可以解释这价值意识上的差异。”据作者的意见，以为这也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核心的关系。希腊社会曾经经过游牧时代。^{注十八}

她是一个半岛，沿岸布满了无数的小岛，所滨的海是内海，而非大洋，和海外来往是很便利的，所以商业从头即易于发达。我们是一个大陆国家，长江以北沿岸极少岛屿，一入茫茫大海，就毫无归宿。从殷墟时候起，即以农为主要经济生产。中国有史以来，并不知用奶酪。天上星宿，只有龙，凤，牛，龟，而没有畜牧时代主要的产业：山羊或绵羊。中国古代是否经过一个畜牧时代是疑问。即使经过亦必年代很久远，或是时间很短促。从殷商到汉初，经过至少一千二百年以农业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其束缚人民的思想、习惯、个性的势力自然非常雄厚。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他人民个性的好处是诚朴、稳重、和平和坚忍；他的缺点是愚昧、自私、乏冒险心和不能合作。到如今，我们民族还仍然反映这种优点和缺点。《吕氏春秋·尚农》篇云：“古先圣王之所以理其民者，先务于农；农

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私法立，力专一。……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古代帝王就利用这理论来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能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以发展。

照上面所讲，希腊古代求知之精神既如此充足，为何希腊亦只能发达科学到一定阶段，而近世科学亦终不能实现呢？这其中重要因数，是由于奴隶制度盛行于希腊。所以古代希腊一班哲人，如发明几何学之毕达果拉，主张原子论之德摩克莱特斯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辈，虽有闲暇以沉思其高尚之理想，而不愿胼手胝足以作实验。而近世科学，非手脑并用不行。英国拉伟教授说：“有闲阶级思想上之努力，可以得到理论上之发展；但有闲阶级不愿动手。奴隶阶级可以作实际之工作，但不敢奖励使之了解高深之理论。埃及、希腊、罗马之所以对科学上、机械上供献之有限度者，正以此数国社会上阶层之结构。”^{注十九} 故据伟大哲学家亚理士多德之意见，生产劳动者不具有公民资格。希腊社会组织为有阶层的。希腊人之奴隶，即希腊人之机器。只需奴隶之代价便宜，即不需另觅代替品。反观我国社会情形，亦和希腊相似。孟子谓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士大夫阶级是劳心者，而农民苦力是劳力者。这样阶层机构迄今还存在。长衫阶级以及学农学工的大学生，仍认动手做工为可耻。这种观念不改变，中国自然科学亦难望能发达。

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而此种机构，此种思想，到如今还大部遗留着。人民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阶级自居，不肯再动手。在学校所习科目，只问其出路之好，待遇之丰，更不校量科目之基本训练如何，个人之兴趣如何。把利害之价值放在是非价值之上。而社会上一般提倡科学的人们，亦只求科学之应用。怪不得维特福格尔说：“在现在的日益走向解体过程中的中国，上层阶级和最高官厅，也对于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加以奖励。但他们所怀抱的意义，和西洋完全不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谁也不能否认。”^{注二十} 据容闳所著《西学东渐记》，谓同治六年，曾文正公方初定捻匪回到上海，

去就南京两江总督任，极注意于其亲自手创之江南制造厂。文正见之，大为欢喜。容闳因劝其设立兵工学校，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大为文正所赞许。^{注廿一}从曾文正到现在，我们提倡科学已近八十年，而仍有人主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或类似的谬论。希望原子弹之发现，能打破这班人的迷梦，而使中国科学入于光明灿烂的境界。

卅四年八月廿二日完稿于遵义

注一 《科学与技术》，第一卷第四期，第一页至十一页。民国卅三年七月出版。

注二 《浙大湄潭夏令讲习会日刊》，第七八号，三十四年七月出版。

注三 见本卷第一期李约瑟演讲及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李约瑟在重庆 星期五聚餐会上《中国工业化前途》演讲。

注四 《科学时报》，复刊第一期，吴藻溪译 K.A.Witt fogel 著《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民卅三年十月一日出版。

注五 拉狄克 Rodek 著《中国历史上的根本问题》*Grund probleme des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注六 森谷克己著 孙怀仁译《中国社会经济史》第 84 页和 87 页，中华书局，民廿五年出版。

注七 拉斯基著《理想与实际之国家》Harold Laski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第 106 一 108 页，民国廿四年伦敦出版。

注八 同书 115 页。

注九 参考拉韦著《近世科学》。Hyman Levy, *Modern Science* 第四章与第五章。民廿八年伦敦出版。又竺可桢著《科学与社会》，载《思想与时代》第二十四期第五页至六页。

注十 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 176 页。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民廿六年出版。

注十一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十章，《汉初学术政治》浙江大学出版油印本。

注十二 同上，第九章，《汉帝国的发展》。

注十三 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 191 页。

注十四 谷霁光著《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七卷第一期。民国卅三年六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

注十五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六章“战国时代的思潮”。

注十六 马乘风《中国古代经济史》第一册第 271 页。

注十七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之差异》，《思想与时代》第十一期。

注十八 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思想与时代》卅五期第八页。民国三十三年出版。

注十九 Hyman Levy *Modern Science* 第 29 页。

注二十 英国发灵顿教授著 程石泉教授译《西洋科学初期史》第 134 页。重庆建中出版社，民国卅三年出版。

注廿一 何貽焜编《曾国藩评传》第 315 页，正中书局民廿六年出版。

9月17日 星期一 遵义至桐梓 阅《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即作一函与《大公报》编辑部寄出。八点至湘江大戏园作纪念周。余报〔告〕，首述抗战后世界形势，谓此次大战胜利系空前绝后之事。空前，因历史尚无如此大规模全球之战争，且侵略与反侵略之阵容如此分明；绝后，希望原子弹力量伟大，可以消弥一切以后战争也。次述我国内政，希望团结，实行民主。但欲实行民主，希望不要误解，以为只要颁一宪法、开一国民大会就行。必须人人努力，并非要人人努力去争权利，而人人尽力尽义务。其次则不要误解了抗战完结〔即〕苦尽甘来。精神上或可解放痛苦，而物质上尚须大吃苦，方能奠定工业基础。第三，不要误解以为战胜了，我们靠了美国做寄生草就可成为五强之一。以目前我国教育、卫生、工业之落后，必得大事努力。

9月23日 星期日〔重庆〕《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在《大公报》登出。

13. 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¹

（1945年9月23日）

抗战胜利以后，我国办理大学，应该取什么途径，实有从长商榷的需要。据笔者的意见，以为办理大学，有三个问题，最为基本而急需解决的。（一）国家办理大学的方针是取积极统制政策，还是取开明放任政策。（二）大学的目标是以培养道德为前提，还是以培养理智为前提。（三）大学教育的内容是通材教育，还是技术教育。第一个问题解决，我们对于办理大学的大政方针即明朗化。第二个问题解决，大学里校长、教授、导师人选的取舍，训导教科的安排，即随之而定。第三个问题解决，则重文抑重实，重质抑重量等等纷争，不致再起。试分别申论如下：

（一）大学虽不应受政治的影响，但必须适合社会环境，而对于国策亦须配合。我国战时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民族是人民的总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刊于《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23日第二版。

和，人民的利益，就是民族的利益。战事终结以后，我们的国策是人民至上，还是国家至上？我国古代孔孟之教，无国家观念，其理想世界为大同。所以《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尤主张提高人权，提倡平等与民主。到金元和满清经过两度亡国之痛以后，攘夷爱国之念油然而生。但忠君的观念，恐怕还胜于爱国的观念。所以要谋光复，还须抬出赵宋和朱明幌子出来。西洋耶稣教是超国家的宗教。十八世纪法国卢骚、孟德斯鸠等提倡民权，卢骚和孟子一样，主张人性本善，主张平等，主张人民高于国家。到拿破仑战争时代，英德和法国是仇敌，但拿破仑征服德国以后，一八〇八年德国哲人歌德和拿破仑初次在爱尔福地方相会，一见倾心，歌德称拿破仑为“我的皇”。同时英国著名化学家台韦游历法国，大受拿破仑之欢迎，拿翁并宣称台韦之游法将大有益于法国化学之兴起。足见当时欧洲人的国家观念，也并不怎么浓厚。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始提倡国家神圣之说，以为全体大于局部，故国家的利益超越人民的利益。这类学说，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逐渐盛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国政体已分为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借用《墨子·尚同篇》中名词，可称之为“上同”和“下比”。上同的国家是以国家为前提，人民不过是发展国家的工具，个人生活的意义，就在其对于国家的发展和贡献。为国家，他得牺牲一切。孟子说：“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但上同国家为了要完成五年计划，奠定重工业基础，不惜使百万生灵涂炭牺牲。相反的，下比的国家以人民幸福为前提。国家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增进大多数人民最大的幸福。在这两种类型国策之下，办理大学的方针也就不能相同。在上同的国家，大学如同车之有轮，机件之有螺钉。所以大学要标准化，课程要一律，思想要统制，大学教育要完全配合国家当时的需要，国家政策不断改进，大学里面造就人材目的也随之以转变。在下比的国家，则大学尽可发展其个性，学术研究尽可自由，私立公立大学尽可并存，只要不违背为人民求幸福的大前提。下比国家如英美等国的大学，除掉抗战时期以外，学术自由空气极为浓厚。政党的交替，政治舞台上人物的进退，决不影响到大学办学的方针。

（二）大学的目标，据我国古代传统的观念是在培养道德，《礼记·大

学篇》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至善，是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友信。到宋明两代的理学家；虽有朱陆之争，朱晦庵一派主张“道学问”，陆子静一派主张“尊德性”。但实际两派教人的目标还是一样，统要学做圣人。所以王阳明就说：“道学问即所以尊德性。”又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程伊川说：“人皆可以为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可见我国自古为学，是以明德为目标，圣人为模范。此与欧洲传统的看法完全不同。希腊哲学家崇拜理知，推崇真理。亚理士多德的《伦理学》书中说：“至善的生活乃是无所为而为的观玩真理的生活。”柏拉图在他《伦理》一书中亦说：“理知者固当君临一切者也。”罗马哲学家西塞禄，以为人生除满足生养之欲望以外，惟以求真为第一要义。至于知识之追求，是否有益于人生社会，在所不顾。近代欧洲大学，仍保持这种希腊和罗马先哲的精神。到十九世纪中叶，纽曼主教写《大学教育之性质与范围》一书，尚说大学教育是培养理智，而非培养道德。一般的说，英国的大学教育目的，在于养成一种英国式的君子。但这所谓君子，并非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的君子。而是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君子。到如今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哈佛、耶卢各大学中导师注重学生的理知方面。而我们大学的导师则注重学生的操行。欧洲大学起源于九世纪与十世纪之间，当时教育之权完全操之于僧侣之手。一直到十二世纪，要在欧洲各大学任意教课演讲，必须得到教皇或教会所发的执照而后可。大学所以补教会之不足。人们的道德，属于灵魂，而不是属于肉体，不在大学范围之内。大学之分野，是培养理知。近世科学发达以后，理知所包涵的内容，虽大为扩充，文理法商农工医无所不包，但仍不超越理知的范围。我国大学制度，完全抄袭欧美。如课程表之繁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只要是真理的片段，统可以排入作为教材。所请教员，亦只求其有一艺之长，一术之精，初不问其习惯性情之是否怪僻。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许多人批评我国大学只教而不育，这根本理由，就在于目前大学制度本来即专重传授理知。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培养道德，不是在讲堂上口讲指画所能为功，必得以行为来表现，以感情来号召。与古代鹅湖、白鹿书院山长相仿，与生徒朝夕相处，方可收砥砺言行之效。目前大学教授担任教科钟点以外，就想作专门研究工作，要叫他们当导师，既乏时间，又无兴趣。所以导师制度行之七八年，毫无成效。培养道德，家庭社会政府的力量，统要比大学大得多，就是因为家庭社会和政府给与个人的教训多以行为来表现的。社会上贪污盛行，政府赏罚不明，一个纯洁的青年，毕业以后不久就可以为社会所潜移默化。只有培养理知，大学虽短短的四年，他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若是一个大学能彻底的培养理知，于道德必大有补益。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能独行其是。惟有求真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如希腊的苏格拉底，义大利的勃鲁纳，其道德的卓越，足垂青千古，与文天祥、史可法同为不朽。许多人之所以盲从，自私，贪污，卑鄙，只是未能彻底明白事理。中山先生说：“行之匪艰，知之维艰。”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大学之最大目标是求真理。这可以说是理知的，但亦可以说是道德的，所以道学问，即是尊德性。

（三）大学教育的内容，应该注重通才教育，还是技术教育。这个问题，在美国目前争执颇为热烈。这是因为有少数美国教育家，如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青司等，要补救美国大学偏重专门知识的弊端，所以主张大学要读古代经典，课程要普通化。这虽不免矫枉过正，但其理由亦甚充足。抗战以后著名大学如哈佛，专门学校如麻省理工的教材，统预备加重普通的课程，如国际问题、科学史、文学史等，而减少专门学程。我国抗战以后，百废待举，需要大量专门技术人员。工业落后，要建立轻重工业，尤非造成大量工程人员不可。在此时，我们大学似乎应该注重技术教育，可是问题不是这样简单。从前清曾国藩提倡兴建实业，设立上海制造局，派留学生至美国学习制大炮轮船以来，到抗战前夕已七八十年，我国科学仍然不兴，实业仍然不振。这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加考虑。一般人以为近代文明即物质文明乃西洋功利主义的产品，这是错误的。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文中说道：“近二三百年西方人

在利用厚生的事业上，惊心炫目的成就，使得中国人在自惭形秽之下，认定西方文明是功利主义的文明。而中国人在这类事业的落后，是由于中国人一向不注重功利。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正惟西方人不把实际的活动放在纯粹的活动之上，所以西方人能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正惟中国人让纯粹的活动被迫压在实际的活动之下，所以中国人不能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道即真理，西洋人求真理，所以才能发明原子弹，从希腊提磨克列忒司，到近今荷兰的阜尔司鲍，英国的汤姆生，他们研究原子，决非因为有了什么用处才去研究，而是要晓得自然界物质结构的原委。科学上将来的发明在那个方向，既不能预料于事先，我们就单从功利主义着想，也得各项科目统加以研究，不能偏废。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我国自战国以来，即有功利主义的哲学。墨子以能用不能用为善的标准。《兼爱篇》云：“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韩非子更是一位极端功利主义者，所以说：“富国以农，拒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知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但在现行教育制度之下，大学课程实有重新厘订之必要。基本科目必须增加，而各系之必修课目必须减少，庶几能达到培养理知之目的。至于训练大量之技术员或低级工程人员以应目前之需要，则可由高等工业、高等农业等学校或大学内另设专修班为之，不必因噎而废食。

我们最高教育原则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在这种以人民为前提原则之下，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世界的安危全系乎各国人民是

否能辨别真伪是非，而尤在乎辨明真伪是非以后，能有毅力以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对于是非争执守中立的人，是没有正义感的人，也就是缺乏真知灼见的人。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是非曲直，昭昭在人耳目。但是列强均守中立，除掉美国外交部史汀生尚能仗义执言以外，其余各国政府噤若寒蝉，连口头上指摘都没有，侵略之风，从此盛行，酿成世界第二次大战。现在联合国已占胜利，我国脱离了次殖民地的地位，一跃而为五强之一。我们瞻前顾后，希望不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否则以现在武器毁灭力量之伟大，人类将与地质时代之恐龙，同灭迹于地球，偶然遗留骨骼在化石上，为其他有生物观摩之资料。大学教育如真能使人理知化，则于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必大有裨益。所以薪求真理，不但应为我国大学的目标，而亦为世界各大学共同的目标。

（1946年）5月6日 星期一 遵 参加浙大第十九届毕业典礼。到学生一百六十人，教职员易修吟、顾谷宜、孙祥治、王达生、余坤珊、苏步青等十余人。行礼如仪后，余述此届毕业为抗战胜利后最先一次，亦为贵州最后一次。并以入社会以后，虽易于失望，但弗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为戒。次荃谋报告本届毕业人数共291人，计文院25，理院40，工院131，农院69，师范18，研究院8人。

七、浙大复员离黔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浙大终于迎来了复员回杭的时机，但这是一项极其复杂困难的工作。竺可桢电浙大龙泉分校主任路季讷¹接收杭州校产，并接洽其他相关接收事宜。竺可桢亲赴重庆，出席教育部的迁校会议，筹措搬迁经费，落实搬迁路线和运输工具。回遵义具体部署。10月中回杭进行实地勘察，并派定路季讷为杭州校内部主任，吴馥初为教务主任，董伯豪为训导主任。回遵义后，成立杭州校舍委员会，调查、修复浙大校舍，成立由竺可桢、李絜非、胡刚复、吴馥初、蔡邦华、王

¹ 路季讷（1889—1984），江苏宜兴人。时任浙大龙泉分校主任。

璉、沈鲁珍、路季讷七人组成的常设委员会。在遵义、湄潭和永兴设立复员委员会，统一协调，分工负责。

（1945年）8月11日 星期六 遵义 日本正式投降，附有条件，即不损日皇之威严。……九点至何家巷三号，……顾谷宜主席。首由余报告胜利后学校行止，谓今晨已电分校路主任，嘱接收校产；并洽黄季宽收回城内报国寺、蒲场巷，城外哈同花园、华家池与临平、湘湖、万松林之产业，并嘱派陆子桐、杨其泳。但总校返杭须视交通工具与杭州交〈舍〉〔涉〕而定，至早亦须在明春。

8月19日 星期日 三点至柿花园一号，开遵教授会议，到四十人左右，尊生主席。讨论迁校问题，议定第一学期在此结束，并要余去重庆再函政府营救香曾等各项。

9月14日 星期五 湄潭 八点半至数学研究所开校务会议第四十七次。……首由余报告，述胜利临头，本月二十号教部召集会议讨论复员，故余须提出召集校务会议。次述龙泉方面已派人去杭州，惟交通工具缺乏，何日启行毫无把握。……成立复员委员会，以校长为主席，共十三人，另设湄、永、遵三处分委员会，以校长、胡院长、储主任组织其各别分会。校产如有出售，由分会核准呈校长许可后行之。

9月15日 星期六 〔湄潭〕 九点开复员委员会总会，到刚复、季梁、乔年、润科、邦华、亦秋（荃谋、劲夫以开升等委员〔会〕未到）。决定教职员托学校带书以大学教科参考为限，行李以数量限制，校产以不变卖为原则（否则经复员委员会通过，校长核准）等数案。余偕邦华晤林汝瑶，嘱渠赴杭为筹备之一人。

10月18日 星期四 上海回杭州 到杭州站已十二点，即有陆子桐在站相接，未几定安、杨其泳亦来。至大学路中膳后，偕鲁珍、馥初二人在文理学院视察一周，知校长官舍与文理学院尚比较完好，此外大礼堂、教员宿舍、图书馆均已全毁。总务处、物理工场、史地系、刀茅巷生物〔系〕与化学〔系〕亦然。

10月19日 星期五 杭州 查勘华家池校址。日本人进城后农院大厦被拆之经过。……午后三点半偕子桐、鲁珍至庆春门外农学院地址上，则昔日伟大四层楼钢骨水泥已一无所有，连底脚亦全拆去。

10月20日 星期六 杭州 下午三点偕馥初、鲁珍、子桐及李成卿等人察勘附近校址。由大学路之武林公司燕子弄，至庆春路之铜管巷、刀茅巷，出庆春门沿铁道至平民住宅尽头。始由马路回至华家池相近，折入城后至下刀茅巷看化学系、生物系之屋，全被拆平。即医专之屋变为瓦砾之场，直至机神庙。凡私人产业，如仁爱医院保存完好，但公家产物夷为平地。

10月27日 星期六 杭州 十一点召集季訥、馥初、子桐、聿茂、鲁珍开会，定安记录。决定十一月十三在杭州召集一年级开课。龙泉二年级及师院学生于十一月十日起停课。学生能回家者回家，不能回家者于十二月十日以后来校，在此间（杭州）定明年元月三日复课（迁移教职员有家者得每人借支三万元，单身者一万五千元。学生每人津贴八千元。行李教职本人150市斤，每口75斤，五岁以下不计。参考书籍学校可以代运。学生每人六十市斤）。

10月29日 星期一 杭州至上海 临行余交与致沈光卿囑出屋函，又章定安一函。八点姜丹书来，系来接收艺专校产者，并带有潘天寿书。始知艺专租哈同花园为五十年期，当函劲夫查之。余告以接收哈同花园及对面照胆台之经过，至于苏白二公祠则由民政厅接收。姜去后，余作函与劲夫，并派定路季訥为杭州校内部主任，馥初教务主任，董伯豪训导主任，总务则由沈鲁珍暂代家玉，但杨次廉仍为总务主任，此外陆子桐庶务主任，章定安文书主任。

（1946年）1月2日 星期三 贵阳 四点偕尊生往晤西南公路局谢文龙，托以浙大回杭时之赴渝车辆。据云，目前公路局正在改组，故难预言。公路工程总局改为公路总局，仍以萧庆云为局长。但浙大可设法向上海购汽油，因该处每Gal.只400元，而此间酒精需3000元也。

2月20日 星期三 遵义 二点至柿花园开校务会议，到四十余人。……次讨论提案。有派定校舍委员会案，决定各院一人，总务一人，并余与季讷组织之，共九人，决定杭州校舍。……张晓峰提议设立常务委员，交委员会审查，提下届校务会议报告。

2月21日 星期四 遵义 至柿花园一号，推举昨日议定之成立常务委员会办法之委员七人，又昨推定由余选任之杭州校舍委员，已决定为：文院李絜非，理院胡刚复，工院吴馥初，农院蔡邦华，师院王季梁，总务沈鲁珍，一年级路季讷，连余七人。……开湄、永、遵三处复员委员会，附中王道骅，学生自治会赵家骞、曾守中亦列席，絜非纪录，余主席。推定各组主任，公物处置陈立，运输谢家玉，调查王劲夫，卫生李天助，分配易修吟，供应魏春孚。

2月25日 星期一 重庆 教育部开第一次各校迁校会议，到大、中学代表八十余人。骊先因病未到，立武主席。高等教育司周鸿经、中等教育司曹刍及总务司贺师俊，均有报告。中学方面，本地学生概不迁移，中等校教员以送至原籍为限，公教人员子弟随校迁者，须得父亲服务机关之证明。总务司报告补助费，工友八万元，教授、校长抵“简任”得卅五万，副教授、讲师抵“荐任”卅万元，组主任同助教、组员抵“委任”廿五万元，“雇员”廿万元。眷属，教职员准带三人，校工一人，学生不带。补助费于到校后一个月内须报销。伙食作预算时，学生每日以1000计，工友二口1400元，教职员一家四口6400元，川省以外减少若干。每处停留地点如汉口、宜昌以五十计。明日分组会议，高等组以章友三、胡建人、周鸿经及余为召集人。

2月26日 星期二 重庆 八点至教育部，出席迁校会议分组委员会，到高等教育组者六十余人，周鸿经推余主席。八点半开会，分为组织、迁校次序、经费及迁校工具四项讨论。组织方面，决定在部成立一机构，由部行文至川、桂、滇、黔、湘、鄂各省省政府，嘱帮同照料复校员生，并在重要埠头成立教育厅所设立站。迁校次序，依照教育部所拟，凡在渝乘轮，以离渝之远近为先后，近者先

走。飞机票依照教职员人数支配比例，但每单位以三票为基本数。十二点散会。

在部中膳后，继续开会讨〔论〕。经费问题，以中央党政机关还都办法为蓝本，逐条讨论。员工眷属以配偶及直系亲属为限，但职员之旁系亲属确由本人护养者，经二人之联保，长官之保证，亦可带眷属。职员可带三人，工友一人，6—12岁作半口，5岁以下不计。学生不得带眷属。本年度毕业生尚未就业而家在前方者可带走，但八月份以后无公费。员工、学生行李，职员暨眷属每人百公斤，工友及眷属每人40公斤，学生同。随身携带之行李，依所乘交通工具所规定章程办理，余数交由各机关统筹办理。补助费：校、院长、教授作简任算，每人卅五万元。副教授、组主任、讲师作荐任算，每人卅万元。助教、组员、事务员作委任算，廿五万元。书记作雇员算，每人十五万元。校工每人八万元。在出发时一次发给，并于全部还原地后一个月内报销。各机关雇员、员工不随同机关还都者，给发三个月遣散费。次讨论工具问题，请教部力争水、陆、空运之容量，因得报交通报告，川湘、川黔二公路每月运输量均为15,000人。空运四月后中国航空公司月3500人，中央航空公司月800人。水运渝宜段月18,000人至24,000人，汉沪段三倍之，但上游只46领港员〈而〉〔耳〕。故民生公司虽有96只轮，不能全用。交通工具，中国航空公司飞机18架，中央航空公司五架，湘渝路上汽车600辆云云。

2月27日 星期三〔重庆〕余至教育部开会。今日系大会，杭立武主席。将昨日高等教育组之议案逐条宣读纪录，魏万泰所纪错误颇多，关于迁移先后次序，以距离路程之远近为标准，离渝近者先迁，武大周鲠生提出异议，加入有特殊情形者得提出教育部予以考虑。次则讨论经费，占时间最久。至十二点中膳散会。

遇交通大学吴宝丰，渠方于日前自沪回。据云交大房屋全好，且日人添屋数幢，但内部须修理，要经费七十五亿（同济要修建费二百亿，中央大学六十亿），而浙大最初三月前只要十二亿，教育部

列十七亿，现物价高贵，拟要廿九亿。宝丰谓沪价物涨高之速，出人意表。后晤咏霓，知学校、工厂、公务人员均已罢工，因不能维持生活也。余与宝丰方谈借校舍事，贺师俊忽谓白沙女子师范谢循初已辞职，女生均欲往南京，教员为参谋，因之解散，迁九龙坡，故交大房屋将不能腾空云。胡定安系浙医专毕业生，欲浙大办医学院，继续以前之医专。余以教育厅许绍棣素不与浙大合作，若医专并入浙大，则必疑浙大在并医专，故余不能贸然允诺。二点继续开会，讨论中等教育迁移问题，规定附中随大学迁。

3月1日 星期五 重庆 偕谢家玉至春森路八号晤谢文龙，据估计，如算浙大员生三千人，须车载25人，则需120辆。如走长沙，自遵至长沙1125公里，以每公里55元计，UNRRA贴卅元，余25元，则需84,000,000。若用租车办法，则租费与油费合计需一万八千〔万〕元。但若UNRRA不津贴，且需出回空费75%，则每公里需97元而非25元，将超出三万万元矣。出。偕家玉至救济总署晤难民输送组主任梅君，据云自渝至汉，用木船，大者八十吨，小者四十吨，小者装90人，每人35,000元。难民之运费、膳宿免费云。

3月9日 星期六 遵义 下午二点至柿花园一号开复〔员〕会议，遵义分组委员到易修吟、王劲夫、万人选、陈卓如、郭洽周、黄尊生、沈尚贤、苏元复等卅人，李絜非记录，学生自治会陈贵耕与赵家骞等三人。余报告廿分钟关于教育部迁校会议经过。次讨论关于迁校途径、行李多寡、人走先后等等问题。议决五岁以下小孩亦可带行李五十公斤，学生以四年级先行，走公〔里〕〔路〕。若每人带卅公斤，则以卅公斤留下为甲种，与甲种仪器同行。四十公斤为乙种，与乙种仪器同行。若随身带十五公斤，则其余十五公斤有优先权。设站事以管卧房为限。病人与看护者得坐飞机。

3月19日 星期二 遵义 午后二点至校。三点开行政谈话会，到洽周（代晓峰）、劲夫、欲为、季恒、苓谋，谈及复员时非直系亲属及毕业生随同偕行问题。

4月2日 星期二〔遵义〕二点至柿花园一号开复员会议，到湄潭舒鸿、陈鸿逵及朱习生，永兴储润科，遵义（全部委员）易修吟、魏春孚、谢觉予、陈卓如、王劲夫、沈尚贤、李天助等等。学生赵家骞、徐含章、鲍映澜列席。议决第一批出发五月十号以前，四月十号以前派舒鸿、马宗裕赴汉口、长沙沿途观察，并勘定设站地点，先修班及二分之一不及格学生均带走。谢觉予报告杭州校舍2717方须修理可用，已修一半，报毁坏者2400方，如修理可以恢复之房屋需一万五千万。恢复全破坏者，以一方五十万计，十二万万元，若再加四千方，即廿万万。要开课须添1500（即2400中之一部）。易修吟报告教职员愿走长沙者69家234人，重庆者88家238人，未定24家52人，湄潭方面愿走重庆者180人，长沙与柳州各60〔人〕，永兴教职员愿走重庆者105人，长沙24人，广州2人。次魏春孚报告设站，陈卓如报告公物处理。

4月3日 星期三〔遵义〕二点半开行〔政〕谈话会。适教育部分配复员经费之公事已到，计建修费十三万万元，复员旅费三万七千万先，二数均不足，后者需要尤迫〔均〕〔切〕。次讨论设站问题、借车问题、公物处理问题、教职员离校领费问题、学生复学等等。教职员非因公赴杭，七月以前薪水照贵州待遇开支，八月以后全体依杭州待遇。决定五月十五六招收新生一次。一年级与研究生同时招，不再用审查保送办法。

4月26日 星期五 遵义 九点开行政谈话会。决定复员费。学生九万九千元，连三个月公费（五、六、七），共每人先走者发十二万元。凡学生均须写明是否系中央公务人员之子，如系中央公务人员之子而冒领旅费，一经查明须开除学籍。公务人员之子而欲借支者亦行，于下学年上学时交还。教职员则教授发十五万，副教授十四万，讲师十三万，助教、雇员均十二万。家属妻子与丈夫同，子女均各十万元。仆人亦十万，其家属半之。

5月16日 星期四 遵义至桐梓 将各院系之教授、讲师与助教名额排定。并将文、理、农、工四院之教授、讲师、助教等人名，

计中国文学系 12 人，外国语文系 17 人，史地系 15 人，文学院 44（本年 46）。理学院数学系 18 人，物理系 18 人，化学系 16 人，生物系 15 人，药学系 7 人，共 74 人（本学期 86 人）。工学院电机 16 人，化工系 14 人，土木系 15 人，机械 16 人，航空系 9 人，共 70 人（本学期 60 人）。农学院农艺 10 人，园艺 8 人，农化 8 人，病虫害 9 人，蚕桑 7 人，农经 9 人，共 51 人（本学期 49 人）。师范学院聘书暂不发。公共科目体育教员十人，公共科目陈庸声、沈思岩、余岩竹、许仁章（三民主义）、罗凤超（经济）、黄炳坤（政治）、谢幼伟、毛起（哲学）等八人，农院公共科目邵均及陈乙枢二人，以上总共 249 人。查浙大除师范学院以外，名额为 434 名，内除中学 50，职员 120，尚有 264 名额，与 249 相比尚有 15 名也。

（竺可桢于当日下午离开遵义赴重庆，后飞南京，于 6 月 11 日星期二从上海至杭州筹备复校。）¹

1 括号内容为编著者据竺可桢日记综合表述。

第四部分 做浙大校长的最后三年

(1946 年 6 月—1949 年 4 月 29 日)

竺可桢执掌浙大的最后三年中，一是经费短缺，不断地找教育部要钱；二是学生运动不断，很使他头痛。于子三事件，他目睹活蹦乱跳的学生变成一具尸体，是极受刺激的。他多次提出辞职。但只要在岗位上一天，他就认真负责地干，直至1949年4月接教育部长电报才离校。1948年4月1日校庆会，竺可桢发表演讲：“讲到浙大本身，自从抗战以来，十一二年中学校虽日在颠簸困苦之中，幸赖各教授同事的努力，研究和教课两方面均勉强维持，过去中央研究院《科学纪录》中所发表的文字，浙大教授独多，近来研究院第一次选举院士，浙大教授有四名膺选，仅次于北大、清华。浙大的毕业生在各界服务素来以负责著称，本届中央建设人员高等考试，与考者一千零八十四人，取了八十八人，浙大占十一人。考取公费及奖学金赴欧美者亦日多。英国牛津大学近来并承认了我国七个大学，其毕业生中之优秀者可以直接升入牛津的研究院，浙大即为七个大学中之一。所可顾虑者，教职员同人待遇菲薄，尤其人口多者，入不敷出，不能维持生活，不得不写文稿甚至兼旁的职务来过活；薪水最高的教授，一月所得以购买力来计算，仅仅抵到战前三十元之数，这如何能使人安心教课与研究。为了政治上的不安定，学生时时又罢课，损失学业甚大。古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大学生。大学生〈而〉关心国是也是应该的，但不能以罢课作为要挟的一种工具。过去一年中浙大罢课的时间，竟达八星期之多，即是上课时间的四分之一。这种荒废学业，凡是关心教育的人，统引为极痛心的一桩事。我们从过去看到未来，如何改善师生的生活，而得到大学的安定，是目前大学教育最迫切的问题。”

一、主持校舍修复，安排浙大复员

1946年6月竺可桢抵杭，主持校舍修复工作。竺可桢看到被战争破坏的校区感叹说，“本校空地荆棘满地，不像一大学也”。他在杭州数次召开行政谈话会，讨论迁校、招生和建筑问题。会议决定一年级新生在华家池。筑学生宿舍两幢在大学路操场，四幢在华家池。筑教室两幢，于文理学院之南，女生宿舍于大礼堂西，教职员住宅十七所于刀茅巷操场。经过半年的努力，浙大教职员和学生、图书、仪器设备终于陆续迁回杭州。第49次教务会议决定新学年开学时间。一切安排妥当后，竺可桢于10月30日离杭开始为期半年的欧美之行。

6月11日 星期二 上海至杭州 十二点十分（车误点廿分）到杭站，即有杨其泳偕车夫长生来，接至校中。晤季讷、邦华、鲁珍诸人，谈半小时。吃面一碗后，阅积压信件多种。三点偕馥初至工学院及文理院一走，鲁珍同往。见大礼堂、大办公室及单人宿舍与工学院之北大楼、图书馆、工院礼堂、化工、电机诸室大致修竣，但工院方面水电未装，且仁斋已毁而信斋未修好，因白蚁已将房屋蛀坏也。西一、西二均住家眷，养鸡、洗衣，杂乱不堪。子弹库尚未悉数移出，而本校空地荆棘满地，不像一大学也。

6月13日 星期四 杭州 二点开行政谈话会，到季讷、鲁珍、馥初、邦华及韩雁门、陆灵法、董伯豪、潘渊、夏承焘、孙增光，沈金相记录。余首先报〔告〕迁校经过及招生情形，次谈建筑，拟于日内先投标九百余方，第二期再造六百方，惟目前教职员住校内，管理成大问题。……与邦华谈农院聘书问题及建筑问题。

6月18日 星期二 杭州 九点偕董伯豪赴文理学院物理大楼及工学院各处视察一周，见本校与省立图书馆间及军械库间之樊篱尽撤。至西斋一楼、二楼，均成为教职员住宅，仁斋已拆至平地。而大礼堂前之工人石像已不见，而另有一挟书包之铜像，不知来自

何处也。午后二点开行政谈话会，到馥初、伯豪、皮高品、沈铸颜、杨次廉诸人。决定自四月起收水电费，每月住家眷者每人收每间二千元。

三点召集全体教员在新教室三楼谈话。余报告黔校迁校情形及杭州建筑计划，并促教员明日起照常上课。

6月21日 星期五〔杭州〕一点半开各投标建筑公司投标审查会，到馥初、季讷、鲁珍、舒厚信、杨次廉、蔡邦华、林汝瑶¹诸人。计投标者卅七家，新金记、新康均有标，其中有少数无甲种营造厂证件及五千万以上之经验。审查毕，讨论建筑地点。决定一年〔级〕新生在华家池。故筑学生宿舍〔舍〕二幢在大学路操场，四幢在华家池。筑教室两幢，于文理学院之南，女生宿舍于大礼堂（净庵）西，教职员住宅十七所（住六十八家）于刀茅巷操场。在华家池造螺祖、神农两馆及办公厅，单身教职员宿舍与大饭厅，共计1500。决定大学路大门在省立图书馆之北。并至院中周视。

10月25日 星期五〔杭州〕午后二点半开四十九次校务会议，到代表廿八人，适过三分之二全体评议会人数。首由余报告迁移、建筑、法、医二院及附中筹备情形，教部召集会议时关于训导及研究院院长之修改与废除，今年招生及国际合作、UNESCO等问题。次荃谋报告学生人数。

10月26日 星期六〔杭州〕九点继续讨论校务会议提案。成立行政会议，以校长、三处处长、院长及代表七人组织之。改组校务会议，依照七月间高等教育会议办法，将系主任改为非当然委员，副教授不在选举、被选举之列。又整理委员会，将委员会列成十四个常务委员会，其中尤以预算委员会与聘任委员会为尤要，后又加一体育委员会，成十五个委员会。……二点半继续开会，通过卅五年校历：旧生上学期十一月十一日至二月十五，下学期三月十四至六月卅日，新生上学期十二月十六至三月廿二，下学期四月七日至七月十二日。永久校址决定在大学路至华家池地段。

1 林汝瑶（1901—1976），时任浙大园艺系教授，杭州复校筹备人之一。

10月28日 星期一 杭州 三点开行政谈话〔会〕与校舍委员会联席会议。余报告余将赴欧美，出国期间请王季梁先生代理，俟郑晓沧先生回国时，以晓沧先生代理。

二、欧美之行

竺可桢于11月13日抵达巴黎，11月19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一届会议，之后访问法国、瑞士和英国，参观科研机构、大学，会见中外科学家、亲朋好友及浙大留学人员，延揽人才，还不忘为浙大购买图书。1947年1月20日乘邮轮，10天后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国的访问。一路上参观大学、科研机构，进行演讲，看望朋友及留美人员，并为浙大采购图书、设备。5月30日从旧金山乘邮轮，6月17日回到杭州。竺可桢此次欧美之行在日记中有详细记录，他对事物细致全面的描述，他极强的学习精神和渊博的知识，都让人十分佩服。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会议

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有竺可桢、赵元任、陈源、程天放¹、李润章² 5位代表，钱存典、萧子升、瞿菊农、谢次彭 4位专员，赵俊欣、钱能欣、邝自修 3位秘书，共 21 人。增聘团人员包括汪德昭³、钱三强⁴，凌叔华、周麟，胡天石、叶君健、梁方仲等。会议于 11 月 19 日开始，12 月 10 日下午结束。

1 程天放（1899—1967），曾任浙大校长、中国驻德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

2 李书华（1889—1979），字润章。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北平研究院副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

3 汪德昭（1905—1998），物理学家、大气电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水声所首任所长。时任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

4 钱三强（1913—1992），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约里奥—居里实验室研究员。



1946年11-12月，竺可桢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时摄于巴黎。

11月13日 星期三 Marseilles—Paris 巴黎晴。

11月19日 星期二 Paris 晨雨 11°，房中 21° UNESCO 联合国文科教会议开幕。……十壹点半在 401 号开[会]，指定增聘团中人员……王承绪以在英旅费太大不能聘(需 800 美金)。谢次彭(寿康)决辞团秘书长，以瞿菊农(世英)代。……至巴黎大学文理科之大礼堂 Sorbonne 举行第一次正式联合国文教会议开幕典礼，极为隆重。此礼堂成立于 1839，为著名建筑家 Robert Sorbon 索邦所造，内有大会堂，成半圆式，故称 Hemi—Cycle。因法国临时主席 Georges Bidault 到会，故有带盔甲穿制[服]之宪兵四人立台上。巴黎大学教授在半圆之外圈，余等代表在内圈。在台上者除今日演讲之人外，尚有穿五颜六色之法官及外交官等等。礼堂并〈大〉[不]大，可坐三四千人而已，但声音极好，而四周刻有 Recheu、Pascal 帕斯卡、Lavoisier 拉瓦锡及 Sorbon 之像。开会时 Bidault 主席说数语后，即请 Gustave Roussy (Rector of Paris 大学) 演讲(用法语，有英译)。次则为法国教育部长演讲，M. Nagelen 之演讲。继以英国首席代表教育部次长 D. R. Hardman 之演说，最后 Georges Bidault 致辞。自三点十分开幕，五点即告结束，中尚有音乐。开幕前为法国国歌，音乐系 Société des Concerts du Conservatoire 之人马。回后六点又至 Place

de Etat Unis, Maison des Allies, [参加] Preparatory Commission 会长 [……] 及秘书长赫胥黎之 cocktail party。

11月20日 星期三 Paris 晨阴，外间 12.5° 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会议第一次常会 UNESCO General Conference。……十点即赴 UNESCO House（昔之 Majestic Hotel, 19 Ave. Kleber）开会，直至十点半始开成。中国代表得票十张，故只能有十人入 General Conference，限于代表五人赵、程、李、陈通伯与余及专家五人萧子升、谢寿康（次彭）、钱存典（述尧）、瞿菊农及胡天石。首由巴西代表致开会辞，请上次 Preparatory Commission 之会长 Wilkinson 代理人 Hardman 为主席。首先推定 Credential Committee 为中国、法国、希腊、Lebanon、英、美、新西兰七国，并推定法国为会长。首席代表、前国务总理 Leon Blum，另有七个副主席为英、美、中、巴西、Saudi Arabia、菲列宾与南非。三个 Commission Chairman，Program 为墨西哥，Administration 与 Legal 为丹麦（丹辞以脑威〔挪威〕代），Rehabilitation 为波兰。

11月21日 星期四 Paris 十点半 UNESCO General Conference 开会。今日为各国代表致辞，……我国有元任代表致辞约廿分钟，颇得各国之注意。述骝先¹因教育复员不能来法，次述东亚对于科学之应用，并述及中国乃首先提议将教育、文化列入联合国机构之国家。

11月22日 星期五 Paris ……今日上午十点半继续开大会，继续有各国之讲演。

11月23日 星期六 Paris 至 UNESCO House。十点半开会。今日由 Nominating Committee 推举十八国代表为常务理事 Board of Executive。英 John Maud、波兰 M. Falski、荷 N. R. Kruyt、Venezuela Parra Perez、中国陈通伯、澳洲 E. R. Walker（以上六人任期一年）。……七点半至巴黎西北城郊叶南太太处晚膳。叶即楚伦先生之子、叶元之兄。本人回国，由其夫人出面约全体团员并刘海粟之子、音乐家周小燕、齐太太（袁女士）、林太太、杨女士等。至十点回。

1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政治家、教育家、地质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教育部长。

浙大民卅级学生王祖农来谈。据王祖农云，在此读书租房屋 Cite University 便宜，如廉者每月只一千二百法郎，贵者亦不过二千。吃饭廉者每餐 30Fr.。但在外间则每月要一万余法郎云。

11 月 24 日 星期日 Paris 八点余罗大刚来谈，知系罗杨柏之公子，其父年已近七十，欲大刚回家，但渠患回国后无事可做，故欲至浙大。余以周麟若至浙大则无需再请法文文学教员，故允介绍至英士大学。

早餐后在 401 号开会，讨论明日 Program Committee 开会事，拟提出中国代表团之意见。结果，余主张 UNESCO Song 即制国际歌以为开会时及各国中小学之用；及 Regional Center，与瞿菊农所主张之 Teachers Charter 均得大多数赞助。今日到会者除代表、专员外，又有钱三强、叶君健及梁方仲诸人。

11 月 25 日 星期一 Paris ……渠已将今日拟在救济委员会中中国代表团提出之演辞写好。十点半在 UNESCO House 开会，……余亦继述中国之损失，其数字为七亿三千万美金。……王承绪来自英国，已十年不见矣。据云晓沧至十一月初尚未能动身回国。王本人拟十二月底乘轮回上海。七点偕通伯夫妇、润章、元任、承绪赴 Dorcet 晚膳。膳后至 Palais de la Découverte 看国际科学展览，有关于 Radar、Television、atomic bomb 等展览，并有中国兰州防疫处、北碚西部科学院照片及解剖刀叉，兵工署之望远镜及《天气》、《科学与民主》等杂志等。李约瑟以中文、英文、法文讲演。十点回。

11 月 26 日 星期二 Paris 九点三刻至 UNESCO House，在第八室开 Reconstru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ommission 会议。今日副会长英国 Ronald Adams 主席。余告以昨日未能演讲，彼谓因昨法国代表致辞太久，遂致无时，甚抱歉云云。10：30 开会，Drzewieski 主席，首先邀余讲演。余依钱存典（述尧）所预备之演讲加以修改删定，讲演约六分钟。讲毕即讨论提案，直至一点余始散。……四点吃 coffee 时遇 UNRRA Chief Fellowship Unit (11a Portland Place, London) Mr. S. A. Mathiasen，渠〈有〉〔云〕UNRRA 有六十万美金

（本年）为交换 Fellowship 之用，但以训练已经成为专家者为原则，故时间只 6—9 月。将〔来〕 UNESCO 或可接手，因 UNRRA 年终将告结束。但旅费自出，但 Fulbright Act 《富布赖特法案》中国向美购抗战剩余物资五亿美金中，美国政府拟二千万为交换师生之用，可以利用此款云。

六点半至 Hotel de Rohan，应教育部长 Nagelen reception。晚在 Doucet 晚膳。九点在 401 开代表团会议。

11 月 27 日 星期三〔巴黎〕九点三刻赴 UNESCO House。十点开 Reconstruction & Rehabilitation 委员会，将秘书处提议各项除预算外均予以通过。重要者有 Resolution 11 Fellowship Training Scheme，此系继续 UNRRA 之工作。余提议通过此案，得希腊之赞助。十二点半回，王祖农已在寓。一点半陈士怡、蒋天鹤来。……至 Musée de Louvre 看雕刻与图画。雕刻分两馆，一称 Appolo，称 Venus de Midi，多罗马、希腊时代人像，如 Marc Aurele（罗马皇，161—180 AD）、如 Augustus 奥古斯都等。屋顶均绘有画，梯级均大理石。油画部分分荷、比、意、西班〔牙〕，陈列最多出品为 Rubens（1577—1640）、Rembrandt Van Ryn（1606—1669）。有英国 John Russell（1745—1806）所绘女小孩持搂桃，颇为可爱。余购照片若干而回。其中有一张 Van Eyck—La Vierge au donateur，看远景极佳。又至一室，陈列 Louis 14 及雕刻美术家之绘像，中有拿破仑一世之冕及鲁意十五之皇冕，以及重 130 Carats 之金刚钻石等等。按 Louvre 博物院分六部份：（1）希腊、罗马。（2）埃及。（3）东方。（4）油画。（5）雕刻。（6）Object d'art 工艺品。（2）、（3）两部今日未见到。

……九点在 401 号开团务会议，至十一点半散。

11 月 28 日 星期四 Paris 九点半秦国献来。十点偕秦乘车赴 Quai D'orsay 法国中央气象台之新办公室，由交际员 N. Clausse（Chef. Bureau Information）招待参观。先看气候部份，其主任 M. Guillon（Chef. Climatologie）。知法国有气象站，最足取法者为计算机。其法以各气象要素排在一纸上，将每地之温度、气压等放入一数内，然

后将此卡片再由机器安排，则每月各地之平均数即可得。以此法较用人工可速百余倍之多。出至旧办公室 196 Rue de Universite 参观预报部份，主其事者为 M. Douchy, Chef—Adjoint Service Prevision, 其人能讲英文。知法国有九个 Radiosonde stations, 所用方法系 Isollobars 与云之组别法与 Air masses 法两用。据云 Isollobar 法更可靠。办事人在此部约二十人，绘图、翻译在内。二地均无图书馆。余欲参观 Tower Eiffel, 晤其管理员 Papillon。据云塔上有一部无电，须徒步走 150m, 乃作罢。……二点出发，向巴黎西南郊之 Trappe 高空气象台，路过 Versailles 凡尔赛王宫，未入。一小时抵 Trappe 气象台，即有高空组主任 L. Marc, Chef, du Center d' Aerologie et de Experiment 招待参观放 Radiosonde, 知法国 Radiosonde Receiver 系 Maison Metox(104 Rue Pelleput 巴黎 20e) 制，汽球 Maison De La Coste & Cie 制 (7 Rue Notre Dame de Nazareth, 三区)。Radiosonde 极重，计 5900grs., 价每只 2000 法郎，66% 可以收回。据云甚精密。汽球上升每分 250m, 三个地方相距 30km 左右测量，故风向、风力亦可知。并参观其修理及订正之实验室。此高空台为法人 Teisserenc de Bort 所手创，办公室尚有其遗像。据云 Angot 亦于十年前去世，而 P. Wehrle 则已升为 Inspector—General of Aeronautics。又在此晤 N. Roulleau, Director del Etablissement d' Etude et Recherche Meteorologique。4 : 37 兴辞出，4 : 51 过浮赛尼〔凡尔赛〕宫，5 : 17 到寓。六点至 Hotel de Ville, 即市政府 Reception。八点至中华饭店请 Holmes 夫妇晚膳。

11 月 29 日 星期五 Paris 九点约李润章、钱三强、汪德昭三人谈明日 Sub. Commission of Natural Science 开分委员时应提出讨论之点。余主张关〔于〕Reparation 应由 UNESCO 提议于 UNO, 使德、日两国之仪器公司赔偿受损国家之损失，钱则提议由 UNESCO 补助科学人员来往于各国间之旅费以及交换书籍，此皆系李约瑟¹所编 Science & UNESCO—小册中所有者。十点半至 UNESCO House

1 李约瑟 (1900—1995)，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组组长。

晤叶渚沛¹及李约瑟。余询李何故将 Reparation 问题原列议案反而列入缓议之列，渠以为无人热心赞成。余告以中国代表将提出此项问题，并约渠吃中国菜。

一点偕各代表至申江。通伯报告今晨 Board of Executive 讨论 Director General 问题。据〔云〕十八个理事中，各人以不记名提出二十四人，内有 Mrs. Roosevelt、Hutchins、赫胥里、Biddle、Compton、适之、Radhakrishnan 等，其中有若干人如 MacLeish 即自动不干，尚剩十四人明日再谈。

三点，余偕王承绪至第五区 Panthem. 即 Foucault's Pendulum 傅科摆试验之所。其旁之 Ulm 街 Musée Pédagogique 原为教育博物馆，中陈列法国中小学之成绩及图画、照片甚多。楼下为 UNESCO 教育展览，陈列者有捷克、波兰、比利时、英、美、澳、新西兰及丹麦与中国，各有特长。

11月30日 星期六 Paris 阴，下午大雨。九点至433号润章房中，阅王承绪昨晚所拟今晨 Sub—Commission 自然科学组中国代表所演之稿。阅后交自修打字，于十点半带往 UNESCO House。今日自然科学组会议〈会〉〔由〕印度 Bhabha 主席。首请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报告，颇为详细。对于秘书提出各案分析，大概列为：A. 明年即须办理之事，B. 明年研究之事，C. 暂缓办理之事。法文翻译系一法国女子，〔翻译〕颇有出入。次讨论。中国代表李书华首先发言，述赔偿问题须由大会讨论，由 C 类移 A 类，希望东亚能有数学研究中心与营养研究中心，最后并感谢李约瑟在中国之工作，希望 Regional Office 能成立云云。次美国 Arthur H. Compton 讲演，主张以科学达到世界和平之路径需要 World Community。十二点半散会。中午在申江中膳。

四点偕王承绪至 Palais de la Decouverte 看科学展览会，详观美国化学会展览原子弹之造成步骤。

1 叶渚沛（1902—1971），冶金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首任所长。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组副组长。

12月1日 星期日 Paris 晨阴8°，下午晴。早餐后罗大刚〔来〕，知其星期二将回Lyon，明年一月归国。十点半至401号开团务会议。通伯报告Board of Executive对于总干事人选问题。美国之A. H. Compton、澳洲Walker等均不愿入选，故现在Julian Huxley、Biddle、Noyes、胡适之、Wilson等八人而已。余主张目前代表团指定人选作对国内介绍UNESCO之文章，登《大公报》星期评论，并主张由王承绪担任之。十二点散会。

午后一点至中华楼请英国教育方面代表人员……

晚七点至中华楼，郭子杰及瞿菊农约美国代表团教育组人晚膳。

12月2日 星期一 Paris 阴。晨11° 九点半至110 rue de Crenelle (7e) (七区)，偕钱阶平大使及元任、天放、润章、通伯等见教育部部长Nagelen。……至UNESCO House大会堂开自然科学会议Sub—Commission Natural Science, Bhabha主席，讨论李约瑟之报告。

12月3日 星期二 Paris 晨阴8° 十点余至UNESCO House时，自然科学组已在开会，仍由Bhabha主席，讨论自然科学组应做之事并先后次序。主席以印度代表地位，首先提出在印度应设营养站，此外如巴西、中国、非洲亦应设立。经美国Arthur H. Compton之反对，以为地点太多，只能设印度、巴西两处。余与润章商量是否应出而相争，抑仅提中国要设立数学中心，结果以中国不能提两个要求，乃不发言。此案通过后，余代表中国提出数学中心问题。Blackett及Bhabha均以为Calculating machine制造需时，不能当作Top priority，余谓即须加以计划，但终未能列入议事日程，颇为懊丧。

一点至申江中膳。三点回。预备下午五点对美国无线电台转播国内之演讲，题为“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机构”。在UNESCO House 531号？，Miss Peart偕同至演讲处先行试音，一分钟内即演讲，凡演讲六分钟，并将音灌入留声机内。余之讲题为“复员问题”，即文化、科学、教育复〔员〕也。

五点十五分又至大会场参加自然科学组会议。余入场时适李润章重新提出中国应设立营养中心问题，用法文讲演。辞毕，Compton 即起而反对，以为 UNESCO 无此力量，新西兰代表亦然。余即起而驳复，希腊代表赞同，墨西哥代表 V. Corillo 亦赞同中国主张。纽西兰代表起而询问中国是否有充分准备设立营养研究之地点，余又加以答复。主席询中国代表团是否要把此事付表决，余等首肯，终以 7—5 票通过，亦云险矣。

八点偕天放、通伯夫妇、元任至 Fonquet (99 Champs Elysées) 晚膳。膳后至 401 号开会。梁方仲提在 UNESCO 中国应付会费问题。依会中排定：美国 49.5%，英国 10%，法国 5.5%，其次为印度与加拿大，如苏联不在内，中国列第六，出 2.7%。骝先来电主张与法国相等，代表团主张与 UNO 中国数字相等，但亦未便擅决。中国人爱面子，而有时反失面子。如世界测量会议，中国欠钱不付。会中以中国抗战多年，欲免除，外交部来电不允，但又未将款交还云。

12 月 4 日 星期三 Paris 膳后三点在 UNESCO 开 Reconstruction 大会议。

12 月 5 日 星期四 Paris 阴。晨外间 6° 九点半承绪来，偕乘车至 43 Rue d'Ulm 参观法国高师范。此校成立于 1794 年，至 1847 建立现在校舍。余等今日参观为理科部份，分数学、理化与博物三组，……一点至大使馆，钱大使请教育部长 Nagelen、Louis Joxe（教育部文化司司长）、法学家 René Cassin（Vice president du Conseil d'État；Cassin 于民廿九曾到重庆、昆明）及 Joliot-Curie（即居利夫人之女婿也）。

三点至 UNESCO，Programme 委员开会。……七点半偕天放赴 Rue des Cannes 中华酒楼刘天富老板处晚膳，请 Illinois 大学校长 George D. Stoddard、A. W. Noyes 及 Richard Kenyen 三人。九点半回。在 401 号开会，至十二点散。

12 月 6 日 星期五 Paris 晨阴 6° 下午有阳光。十点至 UNESCO House。十点半开 General Conference Plenary Meeting，通过

Administrative & Legal Commission report。……十二点由钱大使陪同看法国临时总统 Georges Bidault。

12月7日 星期六 Paris 晨3° 一点至Ave. Hoche, Royal Mimceau Hotel开自然科学组会议。下午二点半大使照相。……十点至UNESCO House。昨日总干事已选出。计有权投票者卅国。有Iraq、Lebanon及Equador三国代表不到。二十七国中赞成者22票,反对者三票,弃权者二票,赫胥黎Julian Huxley既得大多数,理事会照章即作全体一致推举于大会。

12月8日 星期日 Paris 阅王承绪作《第一届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会议纪录》,约六千言,预备寄《大公报》。十一点偕叔华、通伯、自修、菊农四人乘车赴巴黎东南郊外六十公里之Barbizon,乃法国各画家(十九世纪)之小乡村也,称Barbizon巴比松派(School)与Fontainebleau枫丹白露,此处为Napoleon之宫室。

12月9日 星期一 Paris 十点半至UNESCO House开大会。今日讨论程序委员会所编之报告,其序言Preamble为Madeish所作。下午听赫胥黎Julian Huxley以法文在Sorbonne讲演。晚中国代表团招待Soirée Musicale,周小燕唱,李献敏琴。¹

12月10日 星期二 Paris 大会讨论Administrative and Financial Report。下午大会终结。

(二) 在法国的参访活动

竺可桢参观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实验室,钱三强、何泽慧工作的居里实验室,以及中央气象台、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巴黎职业学校等科研、教育机构。

12月11日 星期二 Paris 上午参观巴黎职[业]学校College Diderot,下午参观天文台。钱述尧回London。下午太平学社茶点未

1 12月7—9日内容为编著者据竺可桢日记综合表述。

往。萧子升请晚膳。晚 Georges Bidault 招待。Needham 谓中国营养〔学〕人材有金女太卢桂英，安顺医专之万新，联大沈同，浙大孙稚荪、罗登义。

12月12日 星期四 Paris 上午至 Laboratoire de Bellevue, C. N. R. S (Centrale Nationale Recherche de Scienc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c)。……此 Laboratory 系 Cotton 教授所创办，专研强磁与低温之研究，蔡柏林即在此工作。余等先至蔡处见其磁，其磁力为 76,000 gauss, 1 cm diameter, 1/2cm gap, pole piece 75 cm 直径，重 96 吨，400 amps, 250 volts。现正试验生物学 Virus 之大小，以 Spectroscope 量其大小与长短之比例。由此再至邻室，有俄国研究员 Solomon Rosablum 主持。而蔡柏林计划之 Permanent Magnet 作方形，40 cm × 76 cm，其 field 为 13,000 gauss，相距 2cm。在此看 a particle 在磁场的照片。此实验中有工作人员 30 人，隶属于法国中央科学研究所。

下午至 College de France Joliot—Curie Laboratoire。据云渠工作分三部：一为原子核研究，二为 Radium，三为工业应用。在今日所参观者为原子核研究。首看 Cyclotron 回旋加速器，钱三强、何泽慧二人陪同参观，亦为一 Strong Magnet，直径 75cm，磁力 15,000 gauss。如有 Proton 〈即〉〔或〕 α particle 在内，则有 7 million electron volts。据钱云，此实验室之设备亦不过二十万美金，Cyclotron 七万美金。余等又见其 Remote Control 之机件、Geiger Counter 盖革计数器（计算 β or γ particle 之计算器，可以每秒计数至一万以上，其 Cylinder 甚小，不过一 cm dia.）。 γ particle 〔检测器〕以铜制。又 Wilson Chamber 威尔逊云室可见 β particle 之弯曲。并至化学实验室工场与照相室。钱三强夫妇近得照片，证明以 Neutron 打 Uranium，可分成四瓣，已由钱太太证明，实为重大发现，最近将登 *Comptes Rendus*。据钱云，Joliot 已允将该室全部蓝本送给，以备在中国设立。

12月13日 星期五 Paris 上午参观法国小学第六级。上午

参观 Centre Internationale D' Etudes Pedagogiques, Sixiemes Nouvelles
Universite de France, Sevres, Seine et Oise, 在校内并参观其用幻灯
办法 Photoscopie, 价三千法郎。下午至浙江同乡会及中国学生会。

(三) 在瑞士的参访活动

12月16日 星期一 Paris 巴黎—Geneva, Switzerland 瑞士日内瓦

12月19日 星期四 Geneva—Zurich 苏黎世—Saint Moritz 圣莫里茨

12月20日 星期五 St. Moritz 圣莫里茨—Bern 伯尔尼

12月21日 星期六 Bern 伯尔尼—Jungfraujoch 少女峰—Bern
伯尔尼

12月22日 星期日 Bern 伯尔尼—Geneva 日内瓦—Paris 巴黎

(四) 在英国的参访活动

竺可桢在英国停留近一个月，参访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到伦敦
经济政治学院，参加英国地理学会之讲演会。参观英国国立图书馆。会
见教育和科技方面的新老朋友，如赫胥黎、贝尔纳等。会见留学人员，
参加浙大同学会。

12月23日 星期一 Paris—Calais 加来—Dover 多佛尔—London
伦敦

12月24日 星期二 Lontion—Cheshire 柴郡 (Abbots Moss Cottage,
Oakmere, Norwich, Cheshire)

12月29日 星期日 London 即有刚复¹来寓，遂同至 Charing
Cross 附近之 Greek St. 上海酒楼参加浙大同学会。到浙大同学十三
人，与承绪大公子合刚复与余，十六人在伦敦。有浙大同学如此之
多，为余始料所不及也。计到王承绪² (C. S. Wang, '25 教育)、李纪

1 胡刚复，时任浙大理学院院长，正在英国访问。

2 王承绪 (1912—2013)，伦敦教育学院硕士，后任浙大教育系教授。

和（Lt., C. H. Li, 电机'31）、沈庆垓（C. K. Shen, 电机'31）、霍少成（S. C. Huo, 机械'30）、钱万（W. Chien, 电机'28）、胡济民（T.H. Hu, 物理'31）、裘克安（K'an Chiu, 外文'32）、程开甲（K. C. Cheng, 物理'30）、周方先（Sub. Lt. F. S. Chow, 机械'32）、张直中（C. C. Chang, 电机'29）、卜昂华（M. H. Po, 机械'26）、毛振琮（C. T. Mao, 电机'30）、赵端璫即承绪太太（教育民廿五）。其中承绪、裘克安 Oriel College Oxford 与程开甲 Edinburgh 大学（Depart, of Applied Math.）、胡济民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Math.）四人在大学念书外，余均在实习。李纪和在空军，周方先在海军 S. S. Marlborough 轮上，张直中在陆军。尚有浙大毕业生未到者，计有陈汝铨、喇华崑、李彼得、沈乃斌、陈鲤、袁广澍及余承华七人，合为廿人。膳后余述浙大迁校情形，并及 UNESCO 会议经过。刚复讲五十分钟。

1月1日 星期三 在 London 伦敦 偕瞿菊农赴 Portland Place 49 号中国大使馆。今日元旦，照例在伦敦之中国人员均到使馆贺喜，到者约近二三百人。遇使馆秘书施德潜、参事钱存典、秘书陈尧圣。由郑大使天锡说数语。在此遇通伯夫妇、郭于杰、葛毓桂、Miss Saru 即龙太太、东大化学系毕业之周庆祥¹、费孝通、王承绪、钱万、王〔 〕、仲揆女公子李林（熙芝）、社会所梁方仲²、地质所张文佑、读经济政治与王承绪同出国之谢志耘诸人。余约周庆祥到浙大教化工，谢志耘至法学院教政治。昨方仲云，谢志耘及谢强为政治、经济二课不可多得之人才云。……一点半偕通伯、子杰及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赴上海楼，约 Julian Huxley 赫胥黎³中膳。据赫胥黎云，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副总干事与 Assistant D. G. 助理干事人选与人数未定，而预算亦不能确定。渠意

1 周庆祥（1901—1985），江西玉山人。化工专家。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时在伦敦大学从事科研工作，应竺可桢邀请回国任浙大化工系教授。

2 梁方仲（1908—1970），广东番禺人。中国经济史学家。时在伦敦大学从事科研工作。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3 赫胥黎（1887—1975），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见 Assistant Director General 须至少四人：远东、南美、东欧、西欧各一人，而 Deputy 则为美国人。但渠对 Howard Wilson 与 Biddle 均不满。

1月2日 星期四 London 十点三刻鲍觉民¹来，遂偕乘地下车 Tube or underground 经 Holborn 至 Aldwych 上升至街上，行数十码至 Houghton S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 Political Science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参加英国 Institute of Geography 地理学会之讲演会，听 Mr. J. N. L. Baker, Senior Reader in Geography 地理学高级讲师讲演 Doctrine of Balance in Geography 地理平衡学说。遇见 Reading 雷丁大学 Prof. Austin Miller 及伦敦大学 Mr. Church。Baker 演讲一小时，无甚特长，以为地理以人与地为出发点，但必须有 Balance 平衡。如工业不应集中在一处，目前人口、资源、技巧均未能在世界上得平均之分配，因此有五年、十年计划之办法。但 Security 安全与 Freedom 自由二者不可兼得，谁去谁存是个问题。在国际问题上，Balance in politics depends upon power 政治的平衡依赖于实力云。Miss Tayler、伦敦大学教授 S. W. Woodridge 与讲师 Eask 均有问题提出。十二点出。参观地理展览会，内陈列教科书甚多。

1月4日 星期六 London 十点赴 British Museum 英国国立图书馆，在 Great Russell St. 与 Tottenham Court Rd., 内藏书数百万卷，并有希腊、巴比伦古物，成立于 1759 年。十九世纪末叶 Karl Marx 马克思在此作有大著 *Das Kapital* 《资本论》。余之目的，原拟观览所藏中文书籍。昨 British Council 英国文化协会曾约定与 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ed Books 东方图书部 Mr. Fulton 于昨上午一谈，但改于今日来，Fulton 不在，由 Mr. Lavin 陪同视察。知有中国书籍二万册。外国书籍之关于中国者，如河内所出 *Bulletin de Ecole de Extreme Orient* 《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等全册，亦数千册。……与钱述尧、瞿菊农、王承绪三人同进餐。由菊农编定《中国战后复兴教育之需要》英文小册之大纲，请承绪写浙大西迁经过及中小学所需要

1 鲍觉民，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时任西南联大教授，并作为访问学者前往英国讲学。

之物事。……刚复约听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伦敦爱乐乐团，由 Bruno Walter conduct 指挥。今日所奏者为：（1）*The Overture : Beethoven Leonora No.3* 《贝多芬的莱奥诺拉序曲第三号》，（2）*Mozart Symphony G Minor* 《莫扎特 G 小调交响曲》，（3）*Schubert Symphony No. 9, C Major* 《舒伯特 C 大调第九交响曲》。

1 月 6 日 星期一 London 作《浙大近六年在遵湄情况之大概》，约三四百字，交与承绪。

1 月 7 日 星期二 London—Oxford—London 11：20 到牛津，出车站即有 British Council 之女职员 Miss B. R. Sants 来接，已将日程排就。11：30 至物理实验室见 Reader in Meteorology 气象学高级讲师 Dr. G. M. B. Dohson，谈半小时。渠向来研究 Ozone 臭氧工作，近则研究大气中之湿气，谓 Stratosphere 平流层水气惊人之少，1 kg 之空气中所含不及 1 (mm) [mg]，故 Radiosonde 无线电探空仪与 Wet & dry Bulb 干湿球温度计均无效，必须由飞机带 Dew Point Apparatus 露点仪。又谓其助理近曾以 C. T. R. Wilson Chamber 威尔逊云雾室量空中之微尘核。又剑桥方面曾有关于辐射方面之工作。

十二点至 Geographical House 地理楼晤 Prof. Mason，遇曾到中国成都、北平之 Air Vice Marshal 空军少将 MacNeece Foster (23 Linton Road, Oxford)。一点由 Mason 送至 High St. corner，余至 Mitre Hotel 中膳。曾打电话与 Prof. Dodd，不值。而裘克安住 90 Abridglon Road，以乏时间未往。

三点至 St. Giles St. Black Hall British Council，在途遇其职员 Peter Secretan (11 Frenchay Road, Oxford)，遂偕至 Bodleian Library 为全校总[图]书馆，藏书一百五十万卷，古色古香。其中藏古书甚多，有 Milton 弥尔顿书迹、Shelley 雪莱起草诗本。房屋内部甚黑，不甚适用。现对街新屋已造就，可为藏书之所。最老之图书馆建筑成立于 1440 年，但大部系 Thomas Bodley 博德利于 1598—1612 年造成。出至 Christ Church College，为 Oxford 40 余 College 之一。全 Quadrangle 四方院，系砂石造。参观宿舍、膳厅，厅内有 High

Table, 为先生食桌。学生每人一星期至少须吃五餐, 每餐约 $2\frac{1}{2}$ S 至 $3\frac{1}{2}$ S。剑桥学生半为公费, 年得二百六十镑。战前全校四千人, 现六千人。全校经费半数由 Parliament University Grants 委员会给。近年牛津约四十万镑, 剑桥六十万镑。虽有校长, 而各院有 Dean 或 Provost、Master、Warden, 等等。大学事务, 大者由 Convocation 校务评议会决定云云。回 British Council, 五点五十分车回, 八点廿分到寓。

1月10日 星期五 London—Cambridge 8:20 车开, 原定 9:54 可到, 但以雾大, 又迟廿分钟。即有李善邦¹及 British Council 之 Bennet 相接, 先至 Royal Hotel, 住 11 号房, 将行李放入, 然后至 British Council 之 Office, 晤 Wort。十一点至 Cavendish Laboratory 卡文迪许实验室, 为十四年前曾经之所。在此遇 Kapitza 卡皮查, 现 Lawrence Bragg 布拉格为 Director 主任, 见其书记 James, 由渠约参观。据云, 全部在新成立之 Austin 实验室, 分为 Nuclear Physics 核物理、Radiation 放射、low Temp. 低温、X ray X 射线与 Metal 金属五部。有研究生一百余人, 教授四人。见其 Cyclotron 回旋加速器, 其 Plate 靶板直径为 37", 大于 Joliot—Curies 约里奥—居里夫妇者。

十二点至 Geographical Department 地理系, 晤 Prof. Debenham, 由渠介绍与 Reader Gordon Manley (M. A., M. Sc.)。渠对于历史气候有兴趣, 故谈得极为投机, 并将渠之近作 *Some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limate Changes* 《在气候变迁研究方面之若干最新贡献》等著作奉送。在此又遇 Gilbert Walker, 即长望²之老师, 乃同拍一照。

一点至 88 Hill Road Guest House Hotel, 晤 Dr. Stephen D. Sturton 与其夫人, 同进餐。渠为广济之医生, 不久回杭州, 余与约定浙大与该院合作, 并招其幼女 Ruth 明年夏在剑桥毕业后赴浙大任事。其长女 Mary 已嫁美国 G.I. 军人, 去 Illinois 伊利诺伊州, 婿名 E. O.

1 李善邦 (1902—1980), 地震学家。时任职中央地质调查所, 为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2 涂长望, 时任中央大学气象学教授。

Johnson, 在 Carin High School, 将去 Illinois 大学云云。三点回。四点善邦偕王铃来, 偕至 Trinity St. Bowes & Bowes 书店购 Haurwitz *Climatology* 《气候学》、Byers *General Meteorology* 《大众气象学》、Kendrew *Climate of C* 《大陆气候》、Dyson *Eclipse* 《日月食》四书, 加四仙令六便士邮费, 共 £ 4, S12, D11 寄中国。

五点至 Trinity College 三一学院。又至 Caius College 凯尼斯学院李约瑟办公室, 坐二小时, 王铃在此为李编《中国科学史》。七点至 Festival 晚〈馆〉〔餐〕, 剑桥理科同学李先正、罗河、傅种孙、张国隆、张宗耀、李蕃、张文佑同进餐。

1月11日 星期六 Cambridge—London 九点在 Royal Hotel (Trumpinton St.) 早餐, 将账付清。即至 Market 附近 Petty Curry 3 or 4 W. Heffer and Sons 书店购 Ferrel *Winds* 《风》、Baker 《地理发现史》、Smart 《天文基础》及 Barton and Joseph *Starcraft* 作《占星术》等书四本, 计两镑十二仙令, 加邮二仙令。李善邦、王铃及曹天钦三人来, 遂偕至 Fitzwilliam Museum。进门即见中国之玉器, 有泰山上庙宇之物、慈禧之玉玺及明代之玉器, 以及直径二尺之景泰蓝。楼上则陈列比、荷、西、法各国古画甚多。楼下陈列磁器, 有荷兰 Vicksburg 绘十七世纪之泰晤士河一张, 其中有人背负, 有二人抬重物, 其情形与中国相似。余在室内拍照。

十二点至大学图书馆, 由中文部主任 Haloun 招待。据云有书籍二百万本, 但目录不甚科学, 放大纸抽屉与 British Museum、牛津大学一样, 无 Card Catalog 卡片目录。剑桥图书馆于十年前落成, 故甚新式, 光线亦佳。有 Royal Collection 皇家收藏品, 即中世纪古书。据云, 藏音乐书称世界最。收藏中国书籍亦五六万卷, 其中手抄本占 2/3, 有《明代实录》与《清太祖实录》。尤可宝贵有《永乐大典》二本, 一本系算术。据云有钱琢如《中国算学史》所谓已失传者, 《永乐大典》有之(李俨已有考证)。又藏太平天国文件甚多, 为西洋最, 怡和洋行并送近百年来中英交涉史料。按剑桥之中国书多得于 Wade 及 1870 年前英国大使也。

一点 Mrs. Needham 李约瑟夫人在 Festiva1 Grill 约中膳，到李善邦、曹天钦及 Prof. F. J. W. Stratton, Gonville & Caius College 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天文教授，知 Eddington 爱丁顿死后最近始由 Jeffrey 继任教授。每一 Chair 教授席位由大学推三人，教授推三人，校外专家推二人，合八人选举之。二点至 Caius (读 Keyes) College, 即李约瑟之 College。并至 Park Parade 十三号晤 Spurr, 不值。四点至 Jesus College 与 Dr. Pickens 茶点。乘 5:00 车回, 七点到 Liverpool St. 站。八点与经济部张天泽晚膳。

1 月 15 日 星期三 London—Harrow 哈罗—London 一点至 Charing Cross, Denmark St., 在大世界 Universal Restaurant 中膳, 约 Prof. J. D. Bernal, 伦敦 Birkbeck College 物理教授, 及承绪与通伯、叔华夫妇中膳。Bernal 现为政府 Ministry of Work 建筑工程部科学顾问, 研究如何改进房屋构造。据云, 英国全部有房屋一千六百万幢, 被炸毁二百万幢, 现需建筑四百万幢, 有一百余万幢已在进行之中。对于 Froth Concrete 加气混凝土可以固热不散, 故墙可以减薄。余询以夏天拒热之法, 据云屋顶加铝可行。渠对于苏联在沙漠以镜子收日光及以沙保水办法颇为赞扬。关于科学研究, 谓月前英国一年所费于 Physical Sciences 物理科学研究四千万镑, 生物科学四百万镑, 而教育、社会则仅三十万镑而已。全国研究费为六千五百万镑, 军事占三分之二。又谓大学教授薪水比新进助教四倍, 即一千五百镑与三百五十镑之比。理、文教员兼政府之工作, 不兼薪, 但工、农教授兼私人企业, 则可兼薪, 且五六倍于薪水, 极不平云。渠著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一书将再版。

伦敦感想 卅六年一月十八日记

所到伦敦, 觉伦敦有三多, (一) queue 排队多, (二) Bus 多, (三) 要 coupon 配给券地方多。伦敦看戏、上车、吃饭均排队, 两层 Double deck Bus 满街跑, 几秒钟一辆。买肥皂、chocolate 和手巾、袜子均要 coupon, 自来水笔要等八九个月才买到。比巴黎, 伦敦是 much more businesslike 讲究实际得多了。在旅馆就可以看得出, Mt.

Royal 和 George V 再说同类，日价 George V 是 1500 Fr.，约合五美金，Mt. Royal 21 S，是四美金多点，后者连早膳。但是 George V 房中电灯多，天天换浴巾、面巾，天天有人来取皮鞋拭。Mt. Royal 则无浴巾、面巾，亦不天天换，拭皮鞋到楼下，电灯、镜子限于数处必需之地。英国人吃茶之习惯极牢不可破，早起，中午十一点，下午四五点，晚上床前，均要茶。从我们看大不要，浪费时间。火车只一等和三等，二者分别并不大。教育制度最纷乱，1945 Education Act 要整理，中学有私立、公立与教会立。私立的偏叫 Public school，公立的最近叫 Modern school，这和 Grammar school 又不同。后者是收优等生，预备 Professional or academic；Modern school 是预 trade。现在 Modern school 11—14 岁，不久强迫教育要到十五岁才完成，则 Modern school 要改至十五岁出校了。英、法一样工作时间甚少，礼拜休息。巴黎礼拜一多不开店，伦敦则不然，礼拜天吃饭成问题。英国最可佩的是物价和战前比没有大涨。瑞士涨一倍，法国涨三倍，英国不到一倍，皇家吃着的东西，一样和平民同受限制。

（五）乘邮轮去纽约

竺可桢在去美国的邮轮上，抓紧时间读书，所读书籍有《大学的使命》《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人类进化散论》《环境之革命》《现代中国之形成》等，他认真做了笔记。此处摘录片段。

1 月 20 日 星期一 离开英国乘 John Ericsson 邮轮去纽约。……今日阅 Jose Ortega Y.Gasset 加塞特著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大学的使命》。

氏为西班牙之有名教育家，此书系 1930 年氏在 World Federation of Students 世界学生联盟之演讲，系英国人 Howard Lee Nostrand 翻译，并有一序，谓著者 Ortega 奥尔特加生于 1883，氏曾为报馆主笔，1931〔年〕曾组织政党（Magazine Revista de Occidente《西方杂志》，Newspaper El Sol《太阳报》，政党民主会）。自 1911—1935 为 Madrid

马德里大学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教授，著有 The Revolt of Masses 《大众的反叛》(1930)、The Modern Theme 《现代主题》(1933)。书中大意。p.27: Everyday the conviction forces itself upon me with new clarity, that too much security demoralize s men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Because they came to feel too secure, all the aristocracy of history have fallen into irreparable degeneracy.

中国元、清的蒙古、旗人即是二个好例。

p.31: In his Philosophy of Universal History, Hegel asserts that passion, without doubt is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significant accomplishment in history, but he qualifies ‘cool passion’.When passion is simply a frenzy of turbulent emotion, it is of no use at all.It should be both critical&creative.

p.32: The fundament al ailment of Spain&Spaniards is slovenness 〈麻胡〉〔马虎〕, it is something inferior to crime.The opposite of slovenliness is to be inform. You people will know the tremendous difference there is between an athlete who is inform and who is not, and that indulgence of oneself, your “let it go anyhow”, “what of it” .That is slovenness.

p.44: The convulsive situation in Europe at the present moment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average Englishmen, the average Frenchman, the average German are un cultured.They are ignorant of the essential system of ideas concerning the world&man which belong to our time.The average person is the new barbarian.He is a professional man, more learned than ever before, but al the sametime more uncultured 工程师、医生、律师、科学家。

p.46: It is imperative to setup once more in the university the teaching of culture, system of vital idea, this is the mission of 大学。

(以下为编著者翻译：

书中大意 p.27：信念每天都以一种新的清晰的方式强加于我自己，那就是太多的安全使人们士气低落。由于他们变得太安全了，

历史上的所有贵族都陷入了无法弥补的堕落之中。

中国元，清的蒙古，旗人即是二个好例。

p.31：黑格尔在其《通用史哲学》中断言，毫无疑问，激情是历史上所有重要成就的成因，但他将“冷酷的激情”定性为情感。完全没有用。这应该既重要又有创意。

p.32：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基本病是斯洛文尼亚语〈麻胡〉〔马虎〕，这是次于犯罪的事情。

你们会知道，有知情的运动员与没有知情的运动员之间的巨大区别，以及对自己的放纵，即您的“不管怎样去做”，“要做什么”。这就是斯洛文尼亚。

p.44：目前欧洲的动荡局面是由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缺乏文化背景。他们不了解属于我们的关于世界和人的基本思想体系。普通人是新来的野蛮人。他是一个职业人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学识渊博，但同时还有更多的未受过训练的工程师，医生，律师，科学家。

p.46：当务之急是在大学中再次设置文化教学，重要思想体系，这是大学的使命。)

Arthur Keith Essays on Human Evolution 《人类进化散论》。Page 181，在 36 章关于和平民族这一章，有以下的話：“我们现在以人类进化论者的眼光来看中国民族，以进化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民族，我们要以中国民族在世界上地位之稳固与永久来观察他们，身体心灵上使他们能在将来艰难于旅途中能寻求生存。我（Arthur Keith）的标准和我同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 Humanist Dr. Gilbert Murray 完全不同。Murray 的理想是纪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雅典人），但照我的标准看来，四世纪（B. C.）的雅典人是进化途径上的失败者，他们在文化的祭坛上牺牲了。他们的同时的侨辈司把泰〔斯巴达〕人不比雅典人高明。他们的灭亡，由于好战的缘故。在目前生存的民族中，中国人是最接近于进化论的理想的，他们根深蒂固的立建于大地上，代表了亿万生灵，如同巍巍无限制的森林，虽狂风暴雨亦所不能撼

动。而中国人得到这个地位，并非由于好战的性情，而由于缺乏这好战性情的缘故。”

Arthur Keith *Essays on Human Evolution*。Page 186, Chap. 37, 著者的意见，以为在中国村庄中人民睦邻为基本政策 The code of amity, 而仇视心理 Spirit of enmity 减至最少限度，竞争这类事竭力减少，所以无进步可言。暴行为村中所不许，所以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村庄成了选择民族的机械，使守法、安分、和平、忠实者得以生存，而暴狂者因以淘汰。中国人之好和平是后天的，而非先天的。The pacific soul of China has been evolved, not created……假使二次大战日本战胜了，日本是否是最后的胜利者？中国人同化了满洲人，假使中国人不能驱逐日本人，安知其不能同化日本人。在这种形态下，中国人仍是最后胜利者，而和平为进化政策之妙处，可说是证明。

读了以上，我个人有如下的感想：（一）著者太注重了遗传和进化，把环境和教育的重要完全抛弃了。他没有把我们二千年以来孔、老宣传和和平的道理的影响加以估计。他说 pacific soul of China is evolved, 我说是 cultured, not evolved。（二）他说中国民族没有经过 Tribal 和 National stage, 这是大误。我们在殷、周时已是有许[多] Tribes, 到了春秋战国可说已是 National stage, 目前村庄的组织是受了农业社会的影响。（三）他说日本若吞并了中国，中国仍可为最后胜利者，这是汪精卫、李陵的心理，亦是阿 Q 心理，著者自己就不赞同西欧人有这种心理的。

（六）在美国的参访活动

1. 在纽约的参访活动

竺可桢在纽约会见姜立夫、华罗庚、樊畿、孙本旺等人，参访了普林斯顿大学数理学院、图书馆和高等研究院，到学习物理的吴健雄、袁家骝家。参访纽约大学数学部，晤应用数学专家理查德·库兰特（Richard Courant），并遇计算机教授弗兰德斯（Flanders）。“据云，计算机设计费

时半小时可以做出之问题，须二星期之设计”。竺可桢告以英国气象学家于 25 年前曾著《以数值方法作天气预报》，谓预告明天之天气须 14 天方能算出，预见计算机可大有用处。又由叶桂馨女士陪同至纽约大学，晤其气象系教授詹姆斯·米勒（James E. Miller），参观该校气象系。此外还参访亨特学院，会见浙大留学生等。

1 月 29 日 星期三 中午到纽约 New York City

2 月 3 日 星期一 New York City—Princeton 普林斯顿—N. Y. C. 早餐后即偕硕民¹至 Times Square（42nd 街）乘第 7th Ave. Subway 赴 Pennsylvania Station，坐 9：20 车赴 Princeton。……在车站遇在 Princeton 大学习 Topology 拓扑学之李孝传（中大毕业，来此间 Graduate College 研究生院）及 N. Y. U. 纽约大学习 Applied Math 应用数学之孙本旺²（南开毕业，由华罗庚³带出来美）。遂由孙君领余等至姜立夫⁴住处 28 Vandeventer Ave.。立夫不在家，由硕民通电话，未廿分钟立夫偕华罗庚来，谈约一小时。……在 Peacock Alley Bar 中膳，北大数学系（分析）樊畿⁵亦同膳。膳后即偕立夫、硕民、罗庚、樊畿、孙本旺至大学数理学院之 Fine Hall。上有图书馆藏数理书，内 Open Shelf 开架任人自取阅览，其旁即为 Palmer Hall 物理实验室。由此坐车至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高等研究院，系一犹太人 Bamberger 与其妹 Fuld 夫人出资创立，分数学、经济与政治。过去以 Albert Einstein 爱因斯坦为 Director 院长，现已退休，但尚每日到此。云数学组有教授八九人，von Neumann 冯·诺伊曼及 Harvard 哈佛之 Morse 莫尔斯均在此。中国方面之 Member，除立夫、樊畿、华

1 蒋硕民（1913—1992），获马尔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时在美国纽约大学数学力学研究所进修。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数学教授。蒋作宾之子，竺可桢外甥。

2 孙本旺（1913—1984），时在纽约大学读研究生，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教授，军事工程学院教授、数学教研室和基础课部主任，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主任、副校长。

3 华罗庚（1910—1985），数学家。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4 姜立夫（1890—1978），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南开大学数学系创始人。曾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

5 樊畿（1914—2010），浙江温州人。数学家。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后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任数学教授。

罗庚外，尚有北大物理马仕俊。并至 Graduate College，遇钟开莱¹、王湘浩²。钟习 Probability 概率论。晚膳后至吴健雄、袁家骝家。二人均习物理。8：45 火车回，十一点到寓。

2月4日 星期二 N.Y. 程毓淮³及硕民来，约明日上午十点晤其老师 Courant⁴。浙大电机系民廿七级张世璘 S. L. Chang, Main-4-5000 Ext. 17030 (Hotel St. George, Room 17030), Brooklyn, 来谈，知渠于二年前来美，为中央通讯社购 20 KW Broadcasting set 无线电广播电台，系 Press Wireless Co. 所制，定四月间回国。据云施梅芳、吴为正与 Wang N. W. 三人系浙大毕业生，在 N. Y.。此外，Columbia 哥伦比亚大学有施履吉与盛祖嘉二人。

2月5日 星期三 New York City 九点早餐后硕民即来，十点毓淮亦来，遂偕行赴第八街 Washington Square 附近 Astor Place。下车至 New York University 数学部份，由程、蒋二甥之介，晤其老师德国犹太人 Richard Courant，为应用数学专家。并遇美国教授 Prof. Flanders，系专于 Calculating Machine 计算机。据云，计算机设计费时半小时可以做出之问题，须二星期之设计。余告以英国气象学家于廿五年前曾著 *Weather Prediction by Numerical Process* 《以数值方法作天气预报》，谓预告明天之天气须十四天方能算出，则计算机可大有用处矣。渠二人均不赞同中国数学研究将理论与应用分开，并介绍德国教授 Alwin Walther (Tech. Hochschule Darmstadt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为其对计算有特供献。又 Prof. Daetsch of Freiburg 弗赖堡大学 (General Math 普通数学) 亦愿来中国云。对于教育部请 Hermann Weyl 外尔去中国，渠等均甚关心 (一万美金一年)。谈一

1 钟开莱 (1917—2009)，世界知名的概率学家、华裔数学家。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

2 王湘浩 (1915—1993)，时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49 年回国，任吉林大学数学系系主任。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历任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系主任、吉林大学副校长。

3 程毓淮 (1910—1995)，获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美国麻省州立大学等校任教。时在纽约大学数学力学研究所进修。

4 理查德·科朗，德国裔美国籍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苏联科学院院士。哥廷根学派的重要成员。与希尔伯特共同撰写了著名的教科书《数学物理方法》。

小时出，借硕民至 65th St. 125 号华美协进社 China Institute 晤孟治。该屋系 Time《时代》主笔 Henry Winter Luce 所捐三万美金所购，有五层楼。孟搜集留美学生材料颇多，并办美国人中文班与中学教中国文化班，据云有同事卅余人。

2月6日 星期四 New York 至 Hunter College 亨特学院。此校为市立，专收女生，成立于 1870 年。现校长为 George Shuster，已任校长八年。氏毕业于 Notre Dame 圣母大学 1915，去年 UNESCO 巴黎开会渠亦到会，因此相识。至校长室后，余询以校中情形大概。据云有学生 5500 人，教员职员约四百人，每十至十五名学生抵一个教员。68th St. 之校舍于 1940 年完成，花千万元美金，约合 41 ¢ per cu. ft. 每立方英尺。学费全免，学生每学期收八元书籍费用，但以土生纽约人士为限。闻中国女生亦有十八人，均土生。渠并陪余看 Auditorium 大讲堂，能坐 2200 人，另有戏园，该屋共 16 层。由生理学教员 Mrs. Bertha Gold (7 East 82nd St. N. Y. C.) 领同，Miss Greenberg 偕同，参观生理、Home Economics 家政、生物、化学、物理。据云女生年岁 17—22。除少数在屋中外，不准吸烟。余对于 Home Economics 甚感兴趣。该校有 Department of Home Economics，主其事者为 Mrs. Dane S. Lewis (28 East 10th St.)，为 Professor。学程廿二种：衣着三种，衣料二种，食物二种，烹饪二种，营养二种，住屋三种，家庭小孩三种等等。据云，该校毕业生 20% 入中小学教书云。

2月10日 星期一 New York City 至纽约大学，……九点叶桂馨女士来，……至 Univercity Height Blies Building。晤其气象系教授 James E. Miller，知该校气象系成立于 1938 年，系主任系南非洲人 Spielhaus，现将回南，而以 Dr. Haurwitz 代之，Miller 乃 Spielhaus 之学生。在战时整个 Blies Building 为训练气象人员之用，现只限于三层楼，有廿五个学生，Graduate School 约廿人，陆军二十余人。并遇 Dr. Panofsky。渠等研究之问题为 Vertical movement of atmosphere 大气之垂直运动，系用温度之变动，风向之变动为主，丘万镇之

Master thesis 硕士论文即为研究 Tropopause 对流层顶部之高低与空中温度之升降。叶女士研究 Correlation 相关方式，亦关于 Vertical Movement。

2月12日 星期三 New York City 上午至第五街拍 Empire State Building 帝国大厦之照相。余此次至纽约未至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自然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大都会博物馆或 Woolworth 伍尔沃思大厦与 Empire State，亦未往观 Planetarium 天文馆，实系乏时间，且前两次在纽约已见过。余第一次至纽约在民七年，住晓沧 Columbia 大学宿舍，第二次至纽约在民廿二，住 International House，均只数天或一星期（第二次自欧洲来回经纽约，均住 International House）。此次民卅六至纽约，住 Edison Hotel 计半月，为时最久，而所看地点实最少，亦竟未至 Columbia。苏东坡平山堂词云：“三过平山堂下，十年弹指声中”。余三过纽约，为时卅年，亦如弹指声中耳。

下午六点半赴 China Town Mott St. 三号“广州”，应浙大同学之邀晚膳，到张世磷、王鄂桦及吉彭述（文理学院，民廿一年毕业）与董希贤（电机，民廿三年毕业）。董君在 Chung-Yu industrial Co.，而吉则与王鄂桦同在资委会同时出国者，吉君与晓沧同住 in Claremont Hotel（140 Claremont St.），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余再托王君以世界贸易公司购书事，并托其觅人缮录已经为浙大所购之仪器单。

2. 从纽约到波士顿，再到华盛顿特区

到波士顿后，在同学好友、哈佛大学赵元任教授的安排下，竺可桢重返母校哈佛大学，为期三个多月，主要做了以下事项：①追踪气象科学前沿。会见麻省理工学院气象系主任霍顿教授，了解研究方面的四个项目，参观雷达部分。听气象学报告会。加入哈佛大学地质与地理学系教授每两周一次聚餐。参观哈佛天文台。②到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看书、做笔记、写作。阅读《论毕奥与韦伯关于印度星座体系和中国星座

体系关系之观点》《史记·天官书》《希腊数学与东方数学之比较史》等。写作《中国东三省之历史及将来展望》等。③广泛会见知名学者、中国留学人员（特别是来自浙大学生），部分罗列如下：赵元任、李方桂、卞学鐙、赵如兰、赵松乔、秦元勋、钮因美、吴文洸、戴振铎、赵忠尧、林树棠、张宝堃、张子春、任之恭、杨兆龙、朱兰成、顾培慕、卫立煌将军夫妇、吕保维、费正清、费慰梅、梁思成、裘开明、程天放、刘貽谨、童世纲、陈衡哲、钱学森、冯·卡门、林家翘、胡志远、顾学箕、张彭春、卢丹墀、倪吉文、吴仲华、赛珍珠夫妇、林语堂、钱临照、卢庆骏、杜威、梁庆椿等。④为浙大采购图书、设备，聘请人员回国。

2月13日 星期四 New York—Cambridge 上午作函与晓沧，告以教育部于五年前给浙大购图书、仪器之款。迄今尚有一万四千美金（运费三千七百元在内），急应开书单以备购买。旧书单已为袁守和失去，而六月以后即不能动用也。十二点程毓准来，即收拾行装，离爱迪生旅馆，乘 Taxi 到 Grand Central，尚有三件行李已于昨交与旅馆中人送往 Grand Central。至车站后即上车，为 Pullman，名 Yankee Clipper，别毓准后未十分钟车即开。……2：25 过 New Heaven 纽黑文，3：27 过 New London 新伦敦，4：30 至 Providence 普罗维登斯，均按时且停不久，至 5：30 到 Boston 波士顿 South Station。下车后元任夫妇、卞学鐙¹与赵家大小姐 Iris²均在站相接，即乘元任车回 Cambridge。过 Commonwealth Ave. 与 Anderson Bridge，时晚上已不能辨认。至 Walker St. 后遇元任三、四小姊 Lencey and Bella。未几李方桂³夫妇及周君亦来。方桂夫妇住赵家，但渠在哈佛教中文，有相当长期居留，故已在 35 哩外（西北）租得一屋，可知剑桥居屋之不易得。余今日宿 Quincy St. Faculty Club 教

1 卞学鐙（1919—2009），航空航天学专家，固体力学和结构力学专家，杂交有限元学派创始人。曾参与美国“阿波罗”计划。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赵如兰丈夫。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2 赵如兰（1922—2013），音乐学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首位华裔女教授。赵元任长女。

3 李方桂（1902—1987），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留美执教哈佛大学。

授俱乐部，由 Harvard 学生会戴振铎¹带至该处，住三层六号屋。后由赵太太安排住 Harvard St. 331 号下学镞处，下现在 MIT 读博士学位云。

2月14日 星期五 Cambridge 九点宝堃来，知于去年十二月廿五日离南京，本月八日到剑桥，早余五天。已与 Charles F. Brooks 接洽，今日至大学部办理手续。渠自旧金山至 Boston，在 Chicago 芝加哥未停留，故与郭晓岚、叶笃正等均未晤到。……出至 Walker St. 廿七号与元任谈。五点半偕李方桂及赵太太赴 1683 Cambridge St.，晤 Sophia Chen 陈衡哲²。渠方拔去牙齿七粒，故不能吃硬物。知叔永于上月廿七离剑桥，余甚以不能一见于少年旧游之地为恨。……七点至 331 号 Harvard St.，到钮因美、戴振铎、元任夫妇、方桂夫妇及 Peter（方桂公子）、Nancy 诸人……

2月15日 星期六 Cambridge—Blue Hill 布卢希尔—Cambridge 遇宝堃，偕由 Harvard Square 坐 Subway 经 South Station 至 Ashmont。由此换车至 Mattapan，再更电车至 Foot of Blue Hill。偕宝堃上山至顶，共费时一小时二分。今日车〈不〉〔之〕连接甚佳，毫不费时。与卅年前不同者，即 Subway 已由 South Station 直通 Ashmont，而 Mattapan 之电车亦有改良，Blue Hill 附近一如过去。至 Observatory 气象台，遇 Charles F. Brooks，渠今年才 55，反小余一岁，且精神亦佳，并不见老，惟耳聋。遇 S. P. Ferguson（Research Fellow 研究员）及秘书 R. W. Burhoe、Chief Observer 首席观测员 John Conover。上午 C. F. B. 与余及宝堃巡视全台一周，则建筑毫无增加，但工作大有改进。全台经费六万元，而陆军部津贴三万四千，故人员大有增加。除今日所遇诸人外，尚有 B. Haurwitz（Research Fellow）、Frances Burhoe（Sec.），Sarah Wollaston（observer）及 F. da Costa（caretaker

1 戴振铎，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协会研究员，美国电子和电气工程师协会无线和传播学会主席。时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哈佛大学留学生中国学生会负责人。

2 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女作家。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女生，中国现代第一位大学女教授。其夫婿任鸿隽是著名的“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和领导者。

看管人)。台上现有陆军有关之 Cosmic ray apparatus 宇宙线仪与 Radiosonde apparatus 无线电探空仪，拟以气球带高空，全部重二十五磅，但另有 Simons Radiosonde，重只一公斤而已。又有 Dew Point apparatus 露点仪与各种风向、风力计，并在 Mt. Washington 1900 m 顶上作 Icing test 冰冻试验。有 technician R. B. Smith、observer R. A. Honhala 及 Icing observer 四人，厨子一人，山下管事一人，共七人之多。中膳后并曾与 Smith 通电话，知山上今晨 20° F。下台后，余将近出书籍抄一单，约五十本，值 200 元，交与 Burhoe 购办。六点回。赵松乔、秦元勋、钮因美、吴文洸、戴振铎至 China town Hudson St. 20 号晚膳，学镛夫妇同往。

2 月 16 日 星期日 Cambridge 偕宝堃至 Harvard Yard，在图书馆 Widener Library 旁见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时中国毕业同学所赠之大鼯鼠（备西），上有碑，刻赠碑缘起（记）数百言。此碑于民廿四年发起，廿五年送来，1936 年九月行三百周典礼时已到 Yard。当时购碑之费不过数千国币，而运费达四千元云。由此经 Memorial Hall 纪念大厅前而回。……十二点偕卞学镛与 Iris 同赴 Walker St. 元任寓，遇戴振铎在元任处。与元任夫妇、Lencey、Bella 同进餐。谈及晓峰在剑桥时约人达二十余，后以学校不能容纳如此多人，余来函只能聘八人。此八人中，现已到校只黄炳坤、严仁赓¹、李春芬，而郑儒铎²到校与否未可知；杨联升原允去北大，近尚留纽约；黄明远与张培刚均往武大。浙大失人实可惜云。次谈及卞学镛与如兰事，则以名义关系不愿回国，因 Iris 与郑儒铎同班毕业，而 Iris 只得讲师资格也。余为解释告以当时不知郑儒铎如此年青，赵太太之意愿二人同去浙大，但须俟卞于本年年底得博士学位后始能动身。如兰则愿教中小学，与大学之音乐并教，余均允之。旅费教部已寄到，严仁赓、郑儒铎、卞学镛、赵如兰四人各 800 元，郑未领去，严

1 严仁赓（1910—2007），天津人。经济学家。时在浙大法学院任教。

2 郑儒铎，时任浙大外文系副教授。

仁赓已由友人代领，目前汇兑可抵千万元国币矣。三点半赵忠尧¹、林树棠及张宝堃²来，与元任等谈至五点，借赵、张、林三人回至 Harvard St. 三三一号。七点偕至 Harvard Square Coach Grill 晚膳。

2月17日 星期一 Cambridge, Mass.……十二点至 Quincy St. Harvard Faculty Club 中膳，到宝堃、Prof. Houghton (M. I. T., Head of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气象系主任) 及 Brooks，知 M. I. T. 之气象虽 1917 年已启端倪，但至 1941 年始离航空系而强立。现在教授五人，除 Houghton 系主任外，尚有 Prof. Haurwitz (Dynamical 动力气象学)、Austin (Climatology 气候学) 与 Willet (Synoptic 天气学)。目前有 Graduate Student 研究生卅余，陆军派来廿人及 undergraduate 本科生十余人。Research 方面有四个 Project：(1) Radar，以测空中 Moisture 湿度与 Rain fall 雨量，定空中雨点大小、众多，有二十人研究此事。(2) Cause of pressure change 气压变化之原因，有八人从事于此。(3) Instrument to study relative humidity 研究相对湿度的仪器及 (4) Long range forecasting for 5 day period 五天长期预报。前在 M. I. T. 之 Namias，现去 Weather Bureau 天气局作此类工作云。M. I. T. 学生现已增至 5200，战前不过 3000，哈佛自 6000 增至 12,000。

二点半偕 Brooks 至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地理考察研究所，至 Class Room 2r 听 V. Conrad 讲 Microclimatology 微气候学。氏奥国人，曾于民廿年左右与通讯一次，讲演并不佳，今日讲 Radiation 之 Microclimatology。四点讲毕。余在图书馆阅书后，至五点回。六点至 Harvard Square 晚膳。膳后七点 Brooks 车来接，至 M. I. T. Main Building ground floor Meteorology Symposium 气象学报告会。由 Houghton 主席，Craig 讲 Transfer of Heat & Moisture in Turbulence Along Moss Sea Coast 沿莫斯海岸之湍流中热与水汽之传递。遇 Austin、Haurwitz、Willet 等。

1 赵忠尧 (1902—1998)，物理学家，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时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访问学者。

2 张宝堃，时任中研院气象所副研究员。

2月18日 星期二 Cambridge 十二点 Brooks 以车来接，先至 Massachusetts Hall 看 Conant 校长之代理人 Lee，适以事不在，留题名而出。至 Faculty Club 二楼中膳。今 Division of Geology & Geography 地质与地理学系教授每二周一次聚餐，余亦加入。到 Chairman of Section 分部主任 Billings、Whittlesey（地理）、Leet（地震）、Hulbret（矿物）、Graton（矿）、Birch（地理）、Larsen（岩石）、Mather（地质）、Kemp（地理）Bryan（地理）、McUmstry（矿物）、Ullman（地方）Clould（古生物）。膳后 Billings 介绍余与诸教授。Leet 询及中国地震观测情形，Larsen 及 Graton 询及中国教员之待遇。

余与 Brooks 即先退，至 Graduate School，向其取得阅书证至图书馆。晤馆长 Metcalf，并取得一人 Slack Canl 书库准入卡，遂至 Boylston Hall,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哈佛燕京学社，遇 Director Elisseeff、裘开明¹、Reischauer、Cleaves 诸人。知藏中国书十八万卷。晚至元任家膳。

《思想与时代》战后复刊第四十一期贺麟《王安石的心学》。大凡一个政治家必有哲学见解，如王安石哲学倾向最接近孟子的心性之学，而他所最推崇的除孔子外，即为孟子与扬雄。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王安石主张，洁白之操基于晨霜。他赞同韩愈“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又说：“时然而然，众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圣人之道在焉（Truth）。）”以后陆九渊、王阳明和张居正均有此魄力。陆九渊说：“读书时候心中自有主宰，自能致良知以读书，不惟六经皆我注脚，即诸子百家皆我注脚也。”张居正云：“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

2月20日 星期四 Cambridge 作函与浙大行政谈话会同人，并发步青、坤珊等同人一函。渠等来函（十二月底）以薪水低薄不克维持生活为言。余谓已函驺先，请将杭州与京、沪一律待遇公教人员，并谓政府主张以 UNRRA 之食粮、布匹值二万万元者售诸于市，但美国舆论业已大哗。此事不成，且如能事实，此等物资尽入

1 裘开明（1898—1977），图书馆学家。1931—1965 年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

奸商之子，公教人员毫无益处。故余主张恢复公粮、公布制度，庶几奸商不能再抬高物价。

2月22日 星期六 Cambridge 上午作函与骆先，提出四点：（一）浙大教职员待遇菲薄，希望下次行政会议调整公教人员待遇时，杭州能与京、沪相等。（二）希望中央能将 UNRRA 所给之面粉、布匹分与教职员。（三）医学院建筑费五亿元请速拨给。（四）寄 Universal Trading Corporation 电准浙大购书单由余径行交去。午后又作函与周纶阁¹，提上述四点。

2月23日 星期日 [剑桥] 十点半由 Kirkland St. 至 Oxford St., 卅年前时常来往之所，今日重到，不胜感慨。余于1918年离 Cambridge, 1933年夏参加 Vancouver 温哥华太平洋会议后曾一度来此。今日到此，见 Foxcroft 膳厅已不见，起而代之有 Mallincroft 化学实验馆。余从前所住 64 Oxford St. 1933年时已不在，现则有 Garden McKay Engineering Lab. 工程实验室。至 Mellon St. 30号裘开明寓，从前余住过 28 Mellon。

2月24日 星期一 [剑桥] 早餐后至 Concord Ave. (Garden St. No. 60号) Harvard College Observatory 哈佛天文台晤张子春²，知渠于十五号到 Cambridge，迟余二天。此次乘 General Gordon 戈登将军号邮船来哈佛，系应 H. Shapley 之招为 Fellow。渠注意做 Variable 变星工作。哈佛现有英国人 Dr. Sergei Geposchkin 女士，系世界著 Variable Star 专家。Harvard College Observatory 以贮照片出名于世，现已有五十万张 Photograph 照片云。

2月25日 星期二 Cambridge 中膳后至 Widener 图书馆，见 February number of *Popular Astronomy* 《大众天文学》二月号已将余著文 *The Origin of 28 Mansions in Astronomy* 《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起源》登出。……至 M. I. T. Building 24 五楼晤 Prof. B. Haurwitz，知渠现在研究 Sea breeze 海风，及 radiation 辐射等问题云。定礼拜五去看

1 周鸿经，字纶阁。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2 张云，字子春。中山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时为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访问学者。

设备，由 Research Associate A. C. Bemis 管 Radar 部份，Assistant Prof. D. P. Keily 管理仪器部份云。

3月7日 星期五 Cambridge 七点至 27 Walker St.，遇吕保维 P. W. Lu（28 Mellen）及钟士模，均系电机，及顾培慕夫妇、任之恭¹夫妇、赵忠尧、宝堃、黄明远、卫立煌将军夫妇（太太即月涵太太妹）、戴振铎、任以都、Chaucy 徐夫妇、李方桂夫妇、朱兰成夫妇等多人，与赵忠尧、顾培慕、戴振铎谈知识阶级应如何主持舆论。

3月13日 星期四 Cambridge—Worcester 有阚纫琼及赵松乔²在此相接，乘车至 Clark（克拉克）大学。晤 Director，Graduate School of Geography 地理系研究生院院长 Van Valkenburg（Samuel）。渠系荷兰〔人〕。在 Utrecht 乌得勒支、Zurich 苏黎世、Berlin 柏林等大学毕业。在 Java 爪哇五年，曾出席 Australia Pan Pacific Series Congress 澳大利亚泛太平洋系列会议，著有 *Economic & Social Geography*《经济与社会地理学》等书。据云去〔年〕Prof. Atwood 辞职，以 Dr. Jefferson 为校长，以渠为地理组主任。渠在 Clark 已十二年，乃于 1931 年继 Charles F. Brooks 者。对于赵松乔，渠以为工作不坏，甚能思想。尚有燕京来此之林观得君，则近欲考 Ph.D. 尚不能通过。尚有浙大来此一女生阚纫琼，则以不懂语言，故颇难有进步云。我〔尚〕未进，见余卅年前之老师 Dr. Atwood, W. W.，知渠对于地理与世界和平工作极有兴趣，以 *Journal of Geography*《地理学杂志》中 The New Meaning of Geography in World Education《世界教育中地理学的新意义》一文相赠。四点茶点，遇地理教授 W. Elmer Ekblaw（AB,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10）、Prof. Murphyhy，及 Lodge 等，并遇校长 Jefferson。

四点半，余至楼上，对 Graduate School of Geog. 讲演。此为余十年来第一次以英文对外国人讲演 Maiden Speech，事先起稿十张，完全照预定讲三刻钟，并有幻灯十三照。五点半散。乘 Prof. Van

1 任之恭（1906—1995），时任哈佛大学物理学客座教授。

2 赵松乔，时任浙大史地系地理学讲师。

Valkenhurg 车至其寓晚膳，11 S Flagg St.，见其少女公子及夫人（瑞士人），谈至九点回。

3月14日 星期五 Worcester—Cambridge 至 Clark University 地理系晤赵松乔，余告以 Clark 大学地理教员 Van Valkenburg、Ekblaw 及 Murphy 均告余，以成绩论，赵之成绩可称超等，惟阙纫琮则因不懂英文是以吃亏，因教员不知其究竟程度。余屡劝阙，嘱不要怕，但说，说错外国话亦无关也。……十一点听 Jefferson 之课，讲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谓阿氏云：All men desire to know 人皆欲知。余谓孔孟如讲则说：All men desire to be good 人皆欲圣。此是东西哲人不同之点也。十二点至 Worcester Club，应 Jefferson 之邀中膳，到 Prof.Dodd、Murphy（Eco. Geog. 经济地理）、Van Valkenhurg（Poli. Geo. 政治地理）、Louggi（Physical Geo. 自然地理）、Lea（历史）诸人。

3月15日 星期六 Cambridge 七点至 30 Mellen St. 裘开明寓，今日所到客极多，计朱兰成、程天放、任之恭夫妇、李方桂夫妇、元任夫妇、学镛夫妇、刘贻谨（M. I. T. 之航空 Assistant 教授）、杨兆龙、童世纲、萧庆云等多人。晚〔膳〕后，余谈法官夏玉芳在遵义能不避艰险力持正义，听者动容。偕杨兆龙至其寓 28 Mellon，余学生时代曾住此一年，后住 64 Oxford St.，则其屋于十四年前已拆去矣。偕萧庆云到 331 Harvard St.，谈片刻。

3月19日 星期三 Cambridge—Wellesley 韦尔斯利—Cam. 六点乘街车至 Commonwealth Ave.374 号 Harvard Club of Boston，由新任会长 Charles Watkins 介绍见 President 校长 Conant 与 Governor Bradford（省长）。七点晚膳。旧会长 Ralph Lowell 主席，即请余以杭州会长讲演。余述 Charles Eliot Harvard Spirit 埃利奥特之哈佛精神为 Spirit of Service 服务精神，及中国情况与国际关系不能分离，但〈加〉〔假〕以时日必可有出路为言。次 Conant、Bradford 各讲半小时。十点散。

3月20日 星期四 Cambridge 五点至 Winthrop St. 41 号晤 John Fairbank 费正清，知其夫人 Wilma 费慰梅已到旧金山，尚未到此。……

7:30 至 Emerson Hall 楼下开哈佛中国学生会，戴振铎主席，到张子春、许心武、田浩征（律师）、卞学镛夫妇、赵忠尧、秦元勋、宝堃、顾学箕（S. C. Ku）、吴纪先等。余讲“一个哈佛中国学生卅年的回忆”，实该时哈佛中国学〔生〕状况；并及 Charles Eliot, Abbott L. Lowell, Cha. Townsend Copeland, Kittredge, Jo. Royce, Palmer, Osgood, Pearce, Richard, 与德国气死教授 Hugo Munsterberg, 开战后辞职之 Kuno Franku, 日本教授 Anaseki, 与其后之 Hattori（二人均东京帝大送来，前者教宗教哲学，后者于 1902—09 在北大教孔子）；R. O. T. C. 后备军官训练队之成立；Widener Library, Anderson Bridge, Freshmen Dorm 之造成；M. I. T. 与 Harvard 之合作；因 Gordon McKay 后期反对而不能用其二千三百万美金，终致好事多磨；科学社之成立等。

3 月 28 日 星期五〔剑桥〕至十一点半至 Massachusetts Hall, 晤 David Little。渠云接 Associated Harvard Club Attrocchi 自加州来函，欲推余为远东组 Associated Harvard Club 会长，余允之。

3 月 31 日 星期一 Cambridge—Worcester—Cambridge 晚赵家约燕京 Clive 及 M. I. T. 航空教授钱学森晚膳。钱，杭州人，与钱钟韩为交大同班。来美十一年，系清华派来者，现为 Associate Prof, 下学期升 Full Prof., 为中国在 M. I. T. 作教授之第一人。专研 Aerodynamics 空气动力学，定今夏回国省亲两个月即回 M. I. T. 云云。八点张子春〔来〕，余将 Wm. Calder 之函交阅，子春允与 Harlow Shapley〔商〕再请另觅人，因 Calder 以有小孩教育等问题不愿至中国也。

4 月 1 日 星期二 Cambridge 浙大廿周成立纪念，约吴尊爵夫妇、吴文沆、秦元勋、钟士模、钮因美、戴振铎在哈佛教员俱乐部晚膳。……余抵校而后头痛之事甚多，无怪晓沧¹要辞去代理之事也。

4 月 5 日 星期六 Cambridge 至 Tyler St. 八号醉香楼，应硕豪之约。醉香楼已有卅五年之历史，为 Boston 最老之中国馆，余在

1 郑宗海，时任浙大师范学院院长及教育系主任。竺可桢出访期间，代理浙大校长。

此为学生时殆已开设，但余则只记有上海楼与红龙 Red Dragon 也。硕豪在美国已十三年（1934 年来），初在 Washington，自 1936—1940 在 M. I. T.，毕业后任事于航空委员会。前年曾令其为 Propeller 推进器厂厂长，但寻又作罢。现在加拿大 Montreal 蒙特利尔民航会议 Chinese Representative to P. I. C. A. O. 临时国际民航组织之中国代表。……五点胡志远、顾学箕来。又卢丹墀、倪吉文、钮因美来。倪习化工，已在 M. I. T. 于 1946 得 Ph. D.，在东吴 1943，〔圣〕约翰 1941 年毕业。卢丹墀习机械（内燃机），北洋 1940，后在清华为助教，于 1943—45 在 M. I. T.。渠等均愿至浙大，卢于明年夏可回，倪于今夏可回，但须于家中商后可回云。倪与宋子文为中表，倪吉文之二姑嫁温姓，三姑嫁宋姓，四姑嫁牛姓。牛即牛惠生、珠等之母亲，宋即子文之母，而温即毓庆之母也。闻孔令侃在哈佛雇三书记打字，写 800 页长之论文交政治系，卒未通过。孔在校极不守规则，在图书馆争闹。Boston 欢迎宋美龄时定下午七点半，人已全集，Mayor 市长 Tobin 及在场全体人员相候一小时半不至。Tobin〔只〕得在台上演讲中国时事，唇焦舌敝，至九点余始到，即〔因〕在孔处吃面（并拉 Wellesley 校长 Mrs. Homer 一起）。到后演讲四分钟即走，宋美龄此等行为使人切骨。Mrs. Roosevelt 罗斯福夫人请渠住白宫时，渠行为亦不能受人重视，如半夜至公使馆吃消夜等等。因之第二次到纽约时遂无人理睬，且谣诼繁兴也，其受害于孔令侃兄妹颇不少云。

4月6日 星期日 Cambridge 下午至哈佛校长家。……在 Quincy St. 校长室晤 President J. B. Conant。余在此为学生时，Abbott Lawrence Lowell 为校长，不住 Yard，每年于冬至节邀学生于晚间前往。现 Conant 于每月第一星期日约会教授家属……在 Farrington House 晚膳后即聚会，先由以都主席，约余演讲“中国之自由主义”，余以政治、社会方面余素不注意，故单讲大学，题 The Working of Liberalism am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ies。分（1）What is Liberalism 何谓自由主义，（2）Why Chinese Universities come to be the seat of

Liberalism 为何中国之大学成为自由主义之温床 and (3) How liberal are the Chinese Universities 中国大学之自由程度。讲三十分钟后讨论。

4月7日 星期一 Cambridge 发电与晓沧，因三日曾接 Western Union 谓浙大有电来，今日始接函” Li Elected President PUMC, He recommended Chu Chang Kan. Reply acceptance or other suggestions. Tsunghai” 李宗恩当选为协和医学院院长，彼推荐朱昌赓，请告同意或另外建议。宗海云云。我已去信曰 Chu Chang Kan 不知何许人，故仍主张约王季午，王不来再约 Chu Chang Kan（朱昌赓），故复电” Dean Medical School first choice Wang Chiwu, second Chu Chang Kan”。

4月19日 星期六〔剑桥〕六点半至 Apian Way Radcliffe College Dean Cronkhite 家晚膳。Dean Cronkhite 之丈夫名 L. W. Cronkhite，现在 Boston 作 Business。Cronkhite 所管者为 Radcliffe 女校之 Graduate 研究生部份。……Mr. Cronkhite 又以朱福炘¹来函相示，知王淦昌欲购 Geiger Muller Counter 盖革计数器，曾来函询 Cronkhite，其代表之公司名 Atomic Instrument Company, 160 Charles St., Boston。谈至十点回。

4月20日 星期日 Cambridge 中膳梁思成来。梁近得 Princeton 之 Lit. D. 文学博士，渠在 Yale 教中国美术史并 Chinese Architecture 中国建筑，又在 UNO 为联合国设计建筑 UNO 会所，因洛基弗罗〔洛克菲勒〕送地与 UNO 值八百五十万美金，自 42 街至四十八街，不久将造三幢巨厦，值一千五百万美金。……午后 Mrs. Owen Lattimore 及 Mrs. Wilma Fairbank 费慰梅来。Fairbank 夫人将去华盛顿交代外交部文化参赞而辞职另就，渠以 Prof. Cannon 坎农之女 Owen Lattimore，现在 Johns Hopkins 大学为教授。晚膳后偕 Iris 及元任夫妇等至 Boston Washington St. 之 Keith Memorial 看 *Song of Scheherazade*《六宫粉黛》。

4月21日 星期一〔剑桥〕回至 Commander Hotel 443 号〔

1 朱福炘，时任浙大物理系教授。

晤]梁庆椿¹，渠于去年十月来此，在 Internal Monetary Fund 国内货币基金组织，据云 International Bank 系长期放款，而 Internal Monetary Fund 则短期放款云。渠以为目前中国财政情况较佳。十点回。元任来谈，欲余学习语言十五小时，余甚愿受教也。

4月22日 星期二 Cambridge 钱学森约 T. von Karman 冯·卡门在醉香楼晚膳。到顾培慕夫妇及林家翘²夫妇，林之夫人即梁守槃之妹也。Karman 今年65，耳虽聋，仍甚矍铄也。每星期二来，晚即回 N. Y.，其妹亦在纽约云。余于民国十七年在南京气象台见渠，后于1935年曾至 Pasadena 帕萨迪纳与渠相见。渠极热情，询及朱正元、谈家桢、赵忠尧诸人。

4月25日 星期五 [剑桥] 七点半顾培慕来，接余至其寓 2 Prescott St. 晚膳，到任之恭夫妇及交大同学朱承基（航空）、周文牧（化工）。九点半回。

4月27日 星期日 [剑桥] 清华大学卅六周年纪念会。清华同学会假赵家开会，到刘贻谨、林家翘、钱学森、陈可忠诸人，共卅余人。知清华同学及家属在 Greater Boston 竟达六十人之多，可谓盛矣。……今日由卞学鐸为主席，建议为清华募款、捐书等事，并请元任与余讲演。

4月29日 星期二 Cambridge 九点 Rapid Transportation 快运公司车来，即将 United China Service 送浙大之箱抬上车。……一起为九箱，即 U. C. S. 三箱，书二箱，冰箱一箱，Projector 一箱，Radio Receiver 一箱及钢琴一箱也。由 Proctor 公司经手取提单，今日晚间 Wallis Victory 轮即由 Boston 开出，六月十一二可抵上海云云。

5月5日 星期一 Cambridge 晚膳，系浙大有关学生请客，到吴尊爵、钮因美、戴振铎、钟士模、张思侯、秦元勋、吴文沅等，

1 梁庆椿，曾任浙大农经系教授，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远东部主任及顾问。

2 林家翘（1916—2013），力学和数学家。1951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62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渠等并送四字四本与母校，余为接受。

5月6日 星期二 Cambridge—New York City 至羊城中国餐馆（Yang Lin），元任请客，到赛珍珠¹夫妇 Pearl Buck & Mr. Walsh、郑莱夫妇、张彭春²夫妇及林语堂³夫妇。据林云，渠新著一书关于苏东坡与杭州一段故事，将在美国出版云。Walsh 系哈佛大学 1907 年毕业。

5月7日 星期三 New York City—Camden 卡姆登—Philadelphia 费城 十点半偕硕民及卢庆骏，乘 Subway 地铁至 Columbia University Low's Memorial 307 号房中文部，Goodrich 不在。与北大毕业之王〔〕贞君谈数分钟。据云，哥伦比亚大学有中、日书籍十三万册，与 Harvard Yanching 图书相差不远云云。……今日元任约 Bell Telephone Co. Laboratory 贝尔电话公司研究所主任 Buckley 夫妇、King 及 Palter 夫妇中膳。……三点偕元任夫妇至 Fifth Ave. 1158 号看 Prof. John Dewey 杜威。……五点至 57th St. Argonaut Building. 美国外交部文化服〔务〕广播部，广播讲演“中国大学教育”。

5月8日 星期四 Camden—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 此次自剑桥来，经 Mass. 马萨诸塞州、Conn. 康涅狄格州、N. Y. 纽约州、Penn. 宾夕法尼亚州、Delaware 特拉华州、Maryland 马里兰州、N. J. 新泽西州及 Washington D. C. 八省之多。……三点至 Library of Congress 国会图书馆（B St. and 1 st St. SE），晤 American Book Center 主任 Lawrence Kipps。知前后由该处送交中国之书二十万卷，其中杂志占 2/3。送各国之书籍以中国占首位。

5月9日 星期五 Washington D.C. 餐后由元任开车赴 Highway Bridge Jefferson Memorial 杰斐逊纪念馆……至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看无名英雄墓、General Robert E. Lee House。……钱临照来。七点陈之迈、程天放来，偕至 Connecticut Ave. Fan & Bill

1 赛珍珠（1892—1973），美国作家，人权和女权活动家。1938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 张彭春（1892—1957），时为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代表。1947 年 7 月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1948 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张伯苓之弟。

3 林语堂（1895—1976），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

Restaurant 犹太饭馆晚膳。九点回。与钱临照谈至十点。

5月10日 星期六 Washington 十点半至 Airport 晤 Schmidt, 不在, 见 Beebe, 领导参观 Radio sonde 无线电探空仪及 Radar, Radar 可看远 100—200 miles。……赵忠尧、钱临照及 Kendric N. Marshall 相继来。……二点偕萧庆云、陈叔时、楼韵午夫妇、胡博渊四人, 乘陈之迈车赴 Mt. Vernon 弗农山。陈在芝利为公使馆职员四年, 于 1944 年与楼结婚, 时楼在遵义为浙大三年级学生。……即乘原车至 H. St. 之中兴馆晚膳。又到唐君, [在] 清华与萧同班。至八点, 浙大毕业生汪达(廿九电机)来, 偕楼韵午夫妇与汪往隔邻 Pavilion Restaurant 凉亭饭馆, 到梁庆椿、江厚栅(廿六机械)、华忠(廿五机械)。汪以留美浙大毕业同学所捐 430 支票交余, 余嘱江厚栅将支票存入 Brentanos 书坊店, 并嘱组织浙大毕业学生会中心于华府。梁庆椿与楼韵午均有相当之逗留也。

3. 一路西行、穿越美国, 回国

从华盛顿到匹兹堡, 再到芝加哥、麦迪逊和香槟, 向西到丹佛, 最后抵达旧金山。一路参访大学, 研究机构, 看望浙大留学校友。在匹兹堡遇许声潮、蔡昌年、刘隆士、陈仰圣、姚元恺、汤永谦、张禄经、孙翁孺等。在兰辛密歇根州立大学会见李绍昌、熊全治、余文琴、朱祖样、赵明强等。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见许超、钱人元、唐陶华、侯虞钧、王仁东、周祖豫、许平等。在香槟伊利诺伊大学, 参加第十个校长典礼, 听高等教育报告会, 与薛秋农、冯绍昌、徐宝箴、严之永、杨则久、戚启勋、楼仁海、戚叔纬、朱邦旭、薛家楹晚餐。在芝加哥参观芝加哥大学气象系, 晤罗斯比教授, 遇王文钰、王承明、陆以楚、郭晓岚、谢义炳、冯慧(叶笃正太太)、叶笃正、程天放、葛庭燧¹。在丹佛见陆钦侃、严自强、赵大龙、朱鹏程、陈运铤、刘寿高、吴熊光、郑保定。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报告中国大学状况。在旧金山遇朱福炘、王通裕、李立爱、

1 葛庭燧(1913—2000), 金属物理学家。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在芝加哥大学任研究员。

何国模、胡瑜、生物系单君、彭先荫、陈兰田、殷大钧、张福范等，竺可桢在此期间做浙大留美校友表，共 40 余人。这些留美校友后来很多成为知名学者、科学院院士，在学术上颇有成就。

5 月 11 日 星期日 Pittsburgh 匹兹堡 七点五十五分到 Pittsburgh 车站，即有姚元恺、张禄经、孙翁孺、汤永谦四人来接，皆化工系毕业生也。……七点至中国饭店 China Inn，到浙大同学许声潮（恽荫棠¹之婿）电机 1936、蔡昌年（电 1924）、刘隆士（电 1941）、陈仰圣（化工 1939）、姚元恺（化工 1938）、汤永谦（1940）、张禄经 1937、孙翁孺 1940 及丘伟，前电机系助教。

5 月 12 日 星期日 East Lansing, Michigan 密歇根州东兰辛 七点五十分到 Lansing, Mich. 密歇根州兰辛站。余下车即有熊全治²、余文琴³夫妇及朱祖祥⁴、赵明强⁵夫妇在站相接，李绍昌夫人亦开车来，即乘李夫人车至 International Center。此乃 Mich. State College 密歇根州立学院所建，在校长住宅对门，为〔研究〕国际问题之处，分欧洲、远东及拉丁美洲三组，李绍昌⁶其主任也。余在此稍休息后即偕熊、朱两对夫妇至 Mich. State College 之校内一走。此 College 成立于一百年前，原为农学院，后加工、文、理等。自 Mr. John Hannah 汉纳任校长八年以来，俨然与 U. of Michigan 密歇根大学对抗。现有学生 12,000，已名国内第十三个大学。……七点至 Grand Rapid St. 熊家晚膳。膳后至 Morrill Hall，约余讲演 Chinese Universities, Ancient & Modern，听者四五十人，半数为中国，到数学系主任 S. J. Frame、教授 V. G. Graoes 及荷兰人 S. G. G. Vandenberg、Mrs. Lila Brodoed。讲后回 International Center。与蒋文达（化工）、刘永济、黄志谦、谢震白、郑

1 恽震（1901—1993），字荫棠。时任资源委员会驻美总代表。

2 熊全治，时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系就读研究生（浙大本科），后获博士学位。

3 余文琴，时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物理系就读研究生（浙大本科），后获硕士学位。

4 朱祖祥（1916—1996），时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土壤系就读研究生（浙大本科），后获博士学位。后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1980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5 赵明强，时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农经系就读研究生（浙大本科），后获硕士学位。

6 李绍昌，时任密歇根州立学院国际中心主任。

象铤(地理)等谈至十一点。

5月13日 星期二 East Lansing—Chicago 芝加哥 七点半在 International Center 与李绍昌伉俪早餐。餐后至 Horticulture Hall, 在 Prof. Hawkins 远东史班上讲东三省问题卅分钟, 到该班学生十五人, 熊全治、李绍昌二君亦到。……中午李绍昌约 Dean L. C. Emmons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 哈佛数学系 1915—16 M.S.)、Dean Stanley Crowe (Dean of Students)、Dr. H. H. Kimber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Dr. H. Stafseth (细菌学教授, 曾至中国)、Prof. Authur J. Clark (Chairman, Scholarship Committee)。……二点半至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晤校长 John Hannah, 谈十分钟, 其人年约 45。三点半偕熊全治、余文琴、朱祖样、赵明强及李绍昌夫人至站。4:20 车到, 即上车, 系 Canadian National Line, 至 9:10 即 Central Standard Time 中部时间 8:10 到 Dearborn 站, 即有廿九级毕业同学王文钰在站相接。渠在此间为《三民晨报》主笔。……未几王承明、郭晓岚¹二人亦来。

5月14日 星期三 Chicago—Madison, Wisconsin 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在站有许平及钱人元二位同学相接, 即至 University Club。始知 Madison 有二火车站, 一为 N. W., 一为 Milwaukee, 而两站同时有 Chicago 来之火车, 遂致无所适从。Prof. Glenn T. Trewartha 及许超与王仁东均赴 Milwaukee 站, 未几渠等均来相见。计浙大毕业同学有钱人元(物理化学)、侯虞钧(化工)、许平(生化)、许超(农经)四人。尚有周祖豫, 系中大地理毕业。……三点至 Science Hall, 即地理系内, 晤 Prof. Glenn T. Trewartha, 与谈一小时, 知毛汉礼与严德一二人下学期均将来 Madison。严德一乃此间之 Fellowship, 而毛汉礼则为考取教育部者。……在系中有数学生研究中国问题, 如中国气候区域与中国人口分布等问题, 并知 Wisconsin 大学欲开辟中文研究, 请人来此主持, 余介绍元任。

1 郭晓岚(1915—2006), 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浙大硕士), 师从国际气象学泰斗罗斯比教授。

五点至 Student's Union。与许超、钱人元¹、唐陶华²（政治）、侯虞钧³、王仁东⁴、周祖豫、许平等谈半小时。六点至 Madison Inn 中国餐馆。应此间中国学生会之邀晚餐，到中国同学约卅人，学生会主席苏均炜及周文楷、（人事管理）吴大莹、黄鸿宁（化工）、万建中、杨叔进、邵丙昆、黄文逊、简浩然、张为申、方中达、刘广益等。八点偕 Prof. Trewartha 至其家，遇 Dean Ingram, Prof.。

5月15日 星期四 Madison—Chicago—Urbana 七点王仁东来谈，偕出早餐。九点半至 Science Hall # 315 号晤 Prof. Glenn T. Trewartha，见房中有美国制地理 Handbook 及美国陆军制气候书，均非卖品。至 Boscon Hall 见 Wisconsin 大学校长 Prof. Fred 弗雷德，系微生物专家。……谈半小时告别。由 Trewartha 送至车站。……车将开，许超、钱人元、许平等来送行，王仁东亦来，告别后 10：45 车开。……六点半到，即有任传榜及浙大毕业生、在附近 Chanute field 空军教练者薛秋农、项锦西、蒋以明等及伊大中国学生会王达鹏在此相接，即至 Illinois Union，地址在昔日之 University Hall 旧址，余住 403 号。

5月16日 星期五 Champaign—Urbana 八点偕任传榜、程天放、王达鹏早餐。王达鹏于飞律滨失陷时适在 Manila 马尼拉，知朱少屏、杨光洙死难经过。……九点至 Library 借 Cap, Gown & Hood 学位帽、袍，租金五元。排队入 George Huff Gymnasium, Presiding officer 主席 Park C. Livingston, Master of Ceremony 司仪 Dean R. P. Hollscher, President of Board Trustees, Sec. of Uni. Senate。唱国歌后教士 Burt 作 Invocation 祈祷。来宾演说有 Ill. 州 Governor D. H. Green、中央高教司 John Dole Russell、各大学代表 G. F. Zook、各省大学代表 V.

1 钱人元（1917—2003），时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读研究生。历任浙江大学化学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2 唐陶华（1907—1979），时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读研究生，后任华南师范学院教授。

3 侯虞钧（1922—2001），时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读研究生，后获麻省理工学院化工实践硕士学位和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后任浙大化工系教授。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4 王仁东（1908—1983），浙大机械系教授。时在阿立斯却默斯机械制造公司进修。

M. Haucher(Io—wa)、伊州各校〔代表〕Mary A. Chuk、教职员代表 R. D. Carmichael, 学生代表 Moham, 毕业生代表 Victor Cullen 等。然后举行 Installation 就职 of Dr. George Dinsmore Stoddard, 为省立伊州大学第十个校长典礼, 礼毕 Stoddard 讲四十分钟。然后给名誉学位, 计 General Bradley、动物〔学〕家 Crawley、哈佛大学校长 John B. Conant、芝加哥 Robert Hutchins 及 Archibald McLeish 等五人。礼毕更有天主教主教 E. J. Duncan benediction 祝福。

散会中膳后, 偕程、任二君至 Auditorium〔听〕Symposium on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报告会, ……晚在 Champaign 晚餐, 到薛秋农、冯绍昌、徐宝箴、严之永、杨则久、戚启勋、楼仁海、戚叔纬、朱邦旭、薛家楹等。

5月17日 星期六 Champaign—Chicago 二点由薛秋农派车来接, 赴 Rantoul 车站附近之 Chanute field 训练所, 在 Champaign 之北 20 miles。在此由徐教官招待, 遇蒋以明、冯秀藻、项锦西、冯绍昌、严之永、杨则久、戚启勋等, 惟楼仁海、戚叔纬、朱邦旭〔应为冯绍昌〕、薛家楹四人已回 St. Louis 附近 Scott field 之机械班

5月18日 星期日 Chicago 九点半王文钰、王承明、陆以楚、冯慧(叶笃正太太)、郭晓岚来谈。十点出。先至 Lake Shore Drive, Roosevelt Road 之 Grant Park 之自然博物馆 Chicago Natural History Museum。……十二点偕王承明等在楼下中餐。餐后至附近 Aquarium 水族馆及 Alder Planetarium 天象馆……又作浙大留美校友表, 共得四十余人, 教员五人: Stanley Hornbeck、Franz Michael、梁庆椿、王仁东及朱福炘也。七点王承明、冯慧等又来, 偕至 China Town 在 Wentworth 与 Cermak 即 22 街间之大东餐馆晚膳, 到谢义炳、陆以楚、叶笃正¹、程天放、葛庭燧(清华物理)诸人。膳后偕王文钰至附近中国人之会馆安良工商会,

5月19日 星期一 Chicago International House 遇郭晓岚及

1 叶笃正(1916—2013), 气象学家。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浙大硕士), 师从罗斯比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 并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谢义炳¹。偕至 University Ave. 5727 号 Met. Department 气象系晤 Prof. Rossby, 与谈半小时。渠招待极为殷勤, 先由郭与叶笃正二人陪同至仪器室参观制仪器, 有气象研究所之杨君在彼实习。由 Soumi 君指示, 此部目的在制造 Radio Sonde 无线电探空仪, 主要在于 Eliminate Logging。关于温度、风速均〔用〕Sound Velocity 如 Radar 之办法, 气压用 $PV=RT$ 定律, 放一定 Vol. 之气体, 以瞻其膨胀力。惟湿度用化学方法, Lithium 锂与 Glycerine 甘油, 因电阻之大小而测量, 一经潮湿即失效力。现正用 liquid air 以测 Dew point, 则一秒钟可以减少至 120°F 。但 Marvin 之表迄今仍用以计算 Absolute Humidity 绝对湿度, 则殊不可靠。全部 Radiosonde 重 3 kg, 较 Weather Bureau 重四倍。

中午由 Rossby 约至 Faculty Club 中膳, 到 Prof. W. R. Sears of Cornell (知范绪箕将至该校)、Mr. Kenna of France。一点半听 Bergeron 讲预告天气史(第二讲), 述 Galton 高尔顿及 Abercromby 阿伯克龙比之供献。又与叶笃正谈其所作檀香山雨量之研究。四点参加 Rossby、Bergeron (芬兰人)、Erik Palman〔之〕map discussion。六点晤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y 东方研究所中文部主任 Creel 及董彦堂。董来校二月, 讲演用翻译。出外晚膳, 遇齐鲁大学侯宝璋, Prof. of Pathology 病理学教授, 乃应美外交部而来者云。

5月20日 星期二 Chicago—Denver 丹佛至楼下早餐后即赴 59th St. International House, 即有谢义炳相接至气象系。十点半 Rossby 专为余讲系中之工作, 自西风带 Wave (长 60° , 在纬度 45°) 起直至风暴之演成, 以影片制 700 mb、500 mb 高空之情形。对于北半球全球高空之状况, 于 1945 冬天已可制成 500 mb 即 20,000' 上之图。知西风带并非循环不息, 其间有 Trough 槽, 亦有高压之 Ridge 脊。全球之 Tropopause 对流层顶亦不如理想之南高北〔底〕〔低〕, 而在北纬五六十〔度〕之间往往为最低之所, 与过去之理想完全不同。而此处亦正为西风最盛、温度变动最大之所在。在西风带

1 谢义炳(1917—1995), 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浙大硕士)。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以北则有东风，不但地面如此，即 500 mb 之地亦有东风，是实不可以理解者。……至车站，即有郭晓岚、王承明、王文钰在站相送。五点上车，坐 Zephyr 号 Stream—liner 火车赴 Denver。

5 月 21 日 星期三 Denver 至 Denver,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丹佛，已经过 Iowa 艾奥瓦、Nebraska 内布拉斯加二州，经 Lincoln 林肯、Omaha 奥马哈等大城均在晚间。

在 Denver 站即有陆钦侃（25 土木）、严自强（27 土木）、赵人龙（29 土木）、朱鹏程（30 土木）及陈运铤¹（31 机械）在站相接。陆等四人系经济部派来至此间 Bureau of Reclamation 农垦局练习 Y. V. A. 扬子江三峡水利发电工程事，晚间在 Denver 大学读书。……由陆钦侃开车至 Boulder 博尔德，相距 35 miles，约四十五分钟即到，至 Stat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Boulder。至 Arts Building 晤历史教员 Earl Swisher。曾在岭南教书，不久将至北平。渠嘱余在班上报告中国大学状况，余即席报告十五分钟，并答问题若干，班上有学生七八十人。出十一点。晤校长 Steam，知该校有学生 7000 人，战前仅二三千而已。中国学生廿三人，即有谢璉造、黄中纬、黄月桂（女）丁三生来约中膳，余以浙大学生在 Denver 有约故未允。晤教部派来之李超英，及东北中学之李秀熙二君。一点回。至 Denver，由浙大同学八人约中膳。膳后至 City Park 及 Museum。五点至 Union 车站，别陆钦侃、陈运铤等，上 Union Pacific 联合太平洋铁路车。

5 月 22 日 星期四 不久车到 Ogden, Utah，在此停一小时。离 Ogden 即至 Great Salt Lake 大盐湖，火车直穿 Lake，计 35 miles，费 45'。自 Denver 以西雨量即锐减，Denver 一带草木与东方相似，可远见 Rocky Mt. 落基山山上白雪皑皑，但 Denver 昨日不觉冷。但闻四月间多雪，前数日尚冷云。昨晚过 Rocky Mt.，今日所经均 Semidesert 半沙漠，但见 Sage Brush 北美艾灌丛而已，直至 Reno，天时地理均相类。

1 陈运铤，时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硕士。后任浙大电机系副教授。

| 地点 | 时间Pacific time | 天气 | 人口 |
|---------------------------|-----------------|----|-----|
| Ogden, Utah 犹他州奥格登 | 7：30—8：30A. M. | | |
| Winnemuca, Na. 内华达州温尼马卡 | 3：20 P. M. | 晴 | |
| Lovelock, Nevada 内华达州拉夫洛克 | 4：50 P. M. | " | |
| Sparks, Na. 内华达州斯帕克斯 | 7：00—7：30 P. M. | " | |
| Reno, Nevada | 8：20—8：30 P. M. | | 四十万 |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学生 9000 人，教职员〔学生〕之数如下：

| 文理 | 工 | 医 | 法 | 研究院 | 商 | 看护 | 药 | 音乐 | 男生 | 女生 | 共 |
|------|------|-----|-----|-----|-----|-----|-----|-----|------|------|------|
| 4348 | 2559 | 240 | 234 | 650 | 419 | 408 | 245 | 207 | 6056 | 3073 | 9129 |

教职员人数如下：

教员：专任教员 454 人，兼任 64 人，助教 144 人，共 630 人。

职员：Professional administrative 100, Office & Clerical 155, Parttime students250, Building & Grounds 130, Dormitory 140, 共 775。

（以上 Script Ink 写）

5 月 23 日 星期五 车已到 Berkeley 伯克利。朱嘉谷（福炘）即来，知自 Berkeley 至旧金山本有电车过 San Francisco Bay Bridge，长 8.5 miles，为世界最长之桥，而 Golden Gate 则为 Single Span（2 miles）最长之桥。但余等自火车下后，即登 Ferry 至旧金山 Southern Pacific 大厦之 Ferry Building，即雇车至 Sutter St. Sutter Hotel。时已十点，住 Room 649 号。稍息后，至 Grary St. 152 号 American Presidential Line 公司，询 S. S. Gordon 何时开。知于卅日启行，经 Honolulu 夏威夷及日本，但在日本不能上岸，十六日可到。余将行李保险二千美金，费十二元。

至 Western Union。打一海电复晓沧，因渠来电以学生罢课欲余先乘飞机回也。但乘飞机必须事先声请登记，待此种于续完成起飞，其日期未必较乘轮为快，故复电不（去）〔飞〕。

5月24日 星期六 San Francisco 九点 Prof. Walter Hacker 来，知渠在 College of State of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州立学院教地理。……浙大化学系毕业生王通裕及朱嘉谷、陈兰田（西北农专，作物育种）、彭先荫（清华毕业，数学，湖南国师）、何国模（胡瑜〔浙大蚕桑〕之丈夫）等来。由彭开车赴 Golden Gate Bridge，在此拍数照后再前〔往〕 Mill Valley，至 Muirs Woods，此处始见美国著名之 Sequoia 红杉（Great Red Pine）大树。

5月25日 星期日 San Francisco 知大学罢课迄未了，真使人焦急。昨又骊先嘱余飞回……且实际此次学生罢潮靡漫全国，非一校内部之事，使余回国，亦是一筹莫展耳。但为自身责任计，不能不设法探询有无办法能于六月二日以前赶回杭州，因学生会定六月二日为大罢工、罢课之期限也。……七点至 Hotel Durant 晚膳，到李立爱、何国模、胡瑜、王通裕夫妇、生物系单君、彭先荫、陈兰田、殷大钧等。

5月30日 星期五 Board on S. S. General Gordon 登上戈登将军号邮船

6月16日 星期一 Shanghai

6月17日 星期二 Hangchow 杭州

三、复员回杭后的浙大校务会议

校务委员包括校长竺可桢、三处处长（教务长张绍忠¹、总务长谢家玉²、训导长顾谷宜³）、各院院长（文学院：张其昀⁴；理学院：胡刚复，出国期间由王璉⁵代；工学院：王国松⁶；农学院：蔡邦华⁷；师范学院：郑宗海，

1 张绍忠，时任浙大教务长、图书馆馆长、物理系教授。

2 谢家玉，时任浙大总务长。

3 顾谷宜，时任浙大训导长、史地系历史学教授。

4 张其昀，时任浙大文学院院长、史地系主任。

5 王璉，时任浙大理学院代院长，化学系教授。

6 王国松，时任浙大工学院院长。

7 蔡邦华，时任浙大农学院院长。

出国期间由孟宪承代；法学院：李浩培¹；医学院：王季午²），以及选举产生的7人校务委员代表，并设立行政会议和15个常务委员会。后续两年半，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曾多次变动更换，由于政局动荡，经费短缺，学运不断，竺可桢数次提出辞职，高层不允，学生挽留，无可奈何，艰难维持校务。在此期间，共开33次校务会议（第49—81次）和有记录的123次行政会议。

（1946年）9月18日 星期三〔杭州〕 晤宪承，请其担任代理师范学院院长，并约季梁代理理学院院长，发表李浩培为法学院院长，李伯纶为医学院筹备主任。

10月26日 星期六 杭州 九点继续讨论校务会议提案。成立行政会议，以校长、三处处长、院长及代表七人组织之。改组校务会议，依照七月间高等教育会议办法，将系主任改为非当然委员，副教授不在选举、被选举之列。又整理委员会，将委员会列成十四个常务委员会，其中尤以预算委员会与聘任委员会为尤要，后又加一体育委员会，成十五个委员会。

（1947年）8月13日 星期三 杭十一点晤李乔年³，请渠担任教务长，继张荃谋职，渠已首肯。

10月1日 星期三 杭 校务会议选举开票结果：校务委员七人为陈鸿逵、杨耀德、苏步青、李天助、余坤珊、孟宪承⁴及陈立，候补许道夫、钱琢如、赵之远等。校务会议为文学院王驾吾、余坤珊、吴均一、诸葛振公四人，理学院为谈家桢、钱琢如、（何增禄）、王爱予、江希明、苏步青、朱善培、储润科、贝时璋、孙宗彭⁵十人，师范孟宪承、陈立二人，法学院至多只严仁赓22票，未当选，

1 李浩培（1906—1997），上海人。法学家。时任浙大法学院院长，顾谷宜辞后兼任训导长半年（1947年3月至8月底）。

2 王季午（1908—2005），江苏苏州人。内科学、传染病学专家。时任浙大医学院院长。

3 李乔年，时任浙大化工系主任，1947年8月至1948年9月任浙大教务长。

4 孟宪承（1894—1967），在郑宗海出国期间（1946年9月17日起）代理师范学院院长。

5 孙宗彭，时任浙大药学系主任。

医学〔院〕李天助一人，公共科目舒鸿一人，农学院陈鸿逵、雷男、吴耕民（告假）、萧辅三人，工学院杨耀德、吴馥初二人。因章程规定每十人至少须有一人，而总数不超过廿二人，法学院应至少出一人严仁赓，工学院应有三人，范绪箕递补，文学院、农学院正好，理学院过多，储润科、贝时璋二人告假不再递补，故选举结果如右表〔原文置于日记右边〕所示：

| | 文 | 理 | 工 | 农 | 师 | 法 | 医 | 公 | 合共 |
|-----|----|----|----|----|---|---|---|---|-----|
| 总人数 | 33 | 30 | 22 | 23 | 9 | 7 | 4 | 2 | 130 |
| 代表 | 4 | 7 | 3 | 3 | 2 | 1 | 1 | 1 | 22 |

10月29日 星期三 杭 三点开行政会议。……产生本年度之预算委员陈鸿逵、吴钟伟、王葆仁、陈立¹、余坤珊、各院院长及会计主任，稽核委员会陈立、陈鸿逵、余坤珊、雷男、杨耀德、校长、总务长，章则委员会李浩培、李寿恒、诸葛麒、孟宪承、钱宝琮、张其昀、王国松，聘任升等委员会王季午、杨耀德、李浩培、郑宗海、陈鸿逵、苏步青、张其昀、蔡邦华、李寿恒，校舍委员会吴钟伟、李天助、王国松、张其昀、顾谷宜、谈家桢、蔡邦华，当然委员校长、总务长、会计主任。

12月5日 星期五 杭 下午三点开预算委员会，计到校务会议选出之委员王爱予、吴钟伟（馥初）、陈鸿逵、范绪箕、余坤珊、陈立及各院院长、谢总务长及谢赓会计。余非为预算委员，但此次为召集人，因系第一次开会故到会出席者。以预算重要，故余终会为主席。

（1948年）3月27日 星期六 杭 总务长改请储润科²，家玉专对外。……储润科来。家玉今日已去京、沪，以后渠专对外。总务长事将由储担任，但只允担任至七月底，以后须由朱仲翔，余将于明日与仲翔谈之。午后与傲南〔谈〕，渠决定以后不视事。训导一

1 陈立，时任浙大师范学院教授。

2 储润科，时任浙大化学系教授，1948年3—8月任总务长。

职必须另觅人。今日晓峰、振公二人又与李浩培商之，未得结果。

3月29日 星期一 杭 上午朱仲翔来谈总务事，渠与家玉、润科均谈过，润科允担任至七月底，嗣后要仲翔担。渠谓如一年〔级〕主任辞去，渠可以担任。午后二点至建德村丁种十四号晤李浩培，告以俶南联任训导长一年半不能再留，且身体确不能支持。此外晓峰已任年余，劲夫拟请其任预算委员会主席，仲翔将任总务，故均不便请。拟囑其任半年，渠允任至八月底。

5月22日 星期六 杭 下午二点在体育馆招待四年级毕业生班，到约四百人。各院院长（除劲夫已去上海），总务、教务长，一年级主任外，并请苏步青、顾俶南二人致辞。余首谈本届毕业生为湄潭、遵义患难之交，不日将入社会，勗以就业时应注意之点：是非与利害关头之不可忽视是非而专重利害，以及健康之道。次谈及目前学校之危机，迫切希望师生合作等。……晚七点偕仲翔赴华家池与一年级谈话。余述浙大之组织，自校务会议、行政会议、各委员会以及教授会、学生自治会之职权，标榜教授治校精神。次讨论浙大校风：（1）万事公开，（2）实事求是，（3）师生合作，此点甚隔阂，由于接触之机缘太少之故。

8月2日 星期一 杭 总务长储润科辞，朱仲翔继。

9月6日 星期一 杭 布告苏步青为训导长。

9月8日 星期三 杭 下午三点开训导委员会……决请步青、俶南、浩培、仲翔、耀德、江希明为训育委员会常务委员。

9月9日 星期四 杭 今日乔年来谈，知其辞教务长已坚决，不可挽留，故决计约王爱予担任，余约振公征求王爱予同意。

四、浙大“一·四”事件

（1947年）6月18日 星期三 杭州 晴。晨72° 下午许绍棣来。晚学生自治会大会，余到会讲演一小时。

晨六点起。上午九点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宋仰成、谷超豪（数

三)、任亚冠(电三)、周尚汾(化二)、李冠勇(外文三)、雷学时(物理三)、向惟浣(化工一)来谈话,并请顾倬南陪同接见。由雷学时报告此次罢课之经过,谓罢课开始于五月十六,乃响应于中央大学为增加学生膳费至十万元一月(原为二万元),增加教授津贴及增加教育经费至全国收入15%等之运动而罢课。五月二十日,南京七千学生游行,为警察所阻,至起冲突。因标语中有要求停止内战等各项,故政府加以干涉,自此风潮突形扩大。北京学生议决于六月一日大罢工、课运动,各地均事先防范,但警察有擅入校内、军政当局又有捕人之举,因之武大学生毙三人。事后警长撤职,但上海交大、复大各校均纷纷捕人,迄今未放者尚四五十人。本校原可于一号上课,但以响应武大被击死之学生及上海等地被捕学生,又继续以迄于今云云。余告以本校临时校务会议于六月八日议决:[(1)]自六月九日起一律上课,不上课者以旷课论。(2)倘有阻挠上课者,予以惩处。(3)愿上课并参加本学期学期考试者,须于六月十一日以[前]亲到各系办公室等名。(4)凡未经准假而不参加学期考试者,不准补考。(5)不复课各生所缺之课,本学期及下学期在任何状况之下决不补授。(6)四年级及先修班与本校其他各级学生一律办理。余谓教授方面以校务会议为代表,学校亦以校务会议为代表机关,既有如此议,不应推翻,学生应体谅教授之苦心云云。

谈后王季午、李浩培、张苍谋、王劲夫、蔡邦华等诸人来谈。午后睡一小时。下午开行政会议,到卅余人。关于罢课问题处置,一例主张维持校务会议原案。但学生组织纠察队,阻止要参加应考之人,学校竟无法应付,一切均推之行政方面身上,因之学风更嚣张。苏步青¹开校务会议时为主张严惩学生之一人,今日忽提出目前放假至九月一日补考之办法。

6月19日 星期四 杭 二点半开临时校务会议,并请未被选之系主任亦出席。首由余报告赴欧美经过情形,次讨论处理学生不复课之办法。余提出主种办法:(一)由教授组织阻止学生纠察队干

1 苏步青,时任浙大数学系主任。

涉愿上课之学生上课。（二）派军警维持〈维〉秩序。（三）本年照学历放假，〈明〉〔今〕年九月一日上课。此三种办法于上次校务会议均经讨论，但无具体办法。如第一项原有此意而不执行，认为行不通；第二种办法认为不可行；第三种办法与原议适相违背，不愿行。因此，讨论自三点至七点，晚膳后又讨论，迄无结果，惟决定二、三年级生照原定日期（廿二）放假，假后一星期内离校，无家可归者得由训导处核准留校，但须依照训导处规则等诸条。一年级则亦依照原定学历于下月廿日边放假。

8月13日 星期三 杭 晚八点约留校自治会代表李景先、雷学时、于子三¹、彭国梁、卢禹五人来谈，倣南亦到。谈处置罢课学潮将崔兆芳、许殿英、陈全华、朱元明四人停学一年问题。留校学生前日开会，欲校中收回成命，所提理由谓校中已安定，何以忽发生处置，许、陈诸人为全体学生所推，不能单独负责。余告以处分之所以迟延，原为少所株连，若〔按〕校务会议议决案，则牵连尤多。至于罢课，并非全体之意，乃比较的大多数所决定。校中无从查稽谁是大多数，故只能处置见诸行为之人。现争执之焦点在于，学生自治会议决案有与校章冲突时，是否可以将校章不管；学校行政如上课等问题，学生自治会之权是再超出于校务会议。此外并提到壁报、游泳取费等诸种问题。谈三小时，至十一点散。

8月15日 星期五 杭 上午八点半至梅花碑省政府晤雷秘书长，偕往晤省主席沈成章。余回国尚系第一次见面也。渠对于过去罢课学潮，对于浙大之印象极坏，谓校中无纪纲达于极点，并谓浙大乃共产党大本营。英士大学之闹，由于浙大学生之支持。余告以浙大处理学潮除名四人、受警告二十人。渠嫌过宽，谓之江大学开除十人、退学四十人。之江学生人数仅浙〔大〕三〔分〕之一，而处分如此严重，两两比较浙大实失之过宽云云。渠对于李培恩之处置罢课事件，由军警入校搜查，停课若干时后再行复课，认为处置得当。余告以学校处置学潮，不能用武，始终认大部学生系优良子弟。

1 于子三，时为浙大农艺系学生、校学生自治会主席。

学校须以德服人。目前要点在于组织教授，扶植善良，潜心读书，不为政潮所左右。沈亦认消极方面在于防范，积极方面在于改良膳食、住宿，以及增加娱乐，并谓有人公开承认系共党派来活动者。余认为无此事。

9月3日 星期三 杭 今晚召集暑期同学会代表雷学时、彭国梁、卢禹、于子三、周尚汾、周西林、江泽亮、张勤汉、蔡为武、李景先、李浩生来谈，为陈全华、朱元明、许殿英、崔兆芳四人停学事。谈三小时，以彭国梁话最多。

9月11日 星期四 杭州 自治会于子三来，为考试不及格学程准予补考事。

（四同学被捕，于子三被害）

10月25日 星期六 杭 浙大农学院学生于子三、邝伯瑾及农经毕业生陈建新、黄世民于晚间在延龄路大同旅馆被捕。

10月26日 星期日 杭州 余回寓，遇程振华、徐晓及顾傲南。据自治会周尚汾、彭国梁、陈业荣、任亚冠、谷超豪等报告，知今晨二点农院学生于子三、邝伯瑾及农经毕业生陈建新（道中女中）、黄世民（农民银行）等四人为警所捕。彼等系因去年毕业之汪敬羞于星期五结婚，黄、陈自沪，于、邝自华家池贺喜，于昨十点开大同旅馆52号房间，即于今晨二点被捕（警二分局）。余打电话与毅成¹，毅成云此事当为询警察〔总局〕沈溥。未几得电话，谓因思想问题，可至省党部询林树艺书记长（因张毅夫未回）。余等遂至圣塘路友常别墅询林树艺，时渠方高卧也。据云渠不知情，遂至竺鸣涛司令家，渠亦推不知。余请其电话沈局长，询得确被捕，因共产党嫌疑。余请竺司令转告警局，四人如有重大嫌疑〔则〕送法院，如无则由余保释云云。遂至灯心巷十二号晤雷秘书长，不值。遂偕傲南赴九莲村并接季梁²、劲〔夫〕与叔永³共晚膳。膳后即至延龄路大同

1 阮毅成，时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

2 王璉，时任浙大理学院代院长，化学系教授。

3 任鸿隼，字叔永。时为中国科学社负责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

旅馆，询问并查客人簿，知昨于子三等四人定房间以后，即有警二分局三人定隔邻 53 号，至二点半即捕人云云。余等又至清泰第二〔旅馆〕晤汪敬羞，知昨在渠房中并未谈政治事。余等遂回校。

10 月 27 日 星期一〔杭州〕法律二学生郇仲瑜（郇伯瑾之弟）及教育三学生黄贤林（黄世民之弟）来，谓黄世民本夏毕业于农经，考入农民银行为雇员，其人素不作政治活动云云。浙大自治会已为被捕同学组织后援会，并发公报。

上午得竺司令及雷秘书长电话，知陈建新、黄世民、于子三及郇伯瑾确有共产嫌疑，约余于下午三点去看省府统计局即党军政汇报处干事俞嘉庸。余于电话中误听俞之寓所法院路仁德里十号为三号，于下午三时去时不见俞姓住客。后至圣塘路二十一号晤竺鸣涛，始知在仁德里十号。约俞来谈，鸣涛亦至。余与俶南请见四人搜出之证据，并与四人一面。但竺司令恐泄漏秘密，故不允相见。余与俶南遂至太平巷警察总局晤沈局长溥，得见渠〔等〕所搜得之函件、账目，在陈建新与黄世民身上所搜得尤多，其中有一函系中共策动进行读书会办法，并有中共拟定读书单等，但未允余等一面。余等要求早日渡至法院，可用司法手续办理。据云证据已充足，故明后日即可办云。

10 月 28 日 星期二 杭州 余请振公与俶南赴警察局晤沈局长溥，约见被捕学生于子三、郇伯瑾、黄世民及陈建新。

10 月 29 日 星期三 杭 上午打电话与竺鸣涛，知于子三、郇伯瑾、黄世民、陈建新等四人尚未送法院。余嘱其即送，渠谓不能限期送去。余告以星期一晤面时渠允星期二，怪其爽约。十一点约顾俶南至铁冶路一号看李仲揆¹，知沈主席成章于前日到后曾于昨晤仲揆。余告仲揆以于子三等四人被捕，校中屡次交涉送法院无效事。渠以为目前军警不可理喻，只有忍待之一办法，但允为告沈主席。下午学生等决定，如今于等不送法院，明日将罢〔课〕。

1 李四光（1889—1971），字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中央研究院地质所所长。

三点开行政会议。……最后讨论营救于子三、邝伯瑾、黄世民、陈建新四人问题，并劝学生明日不要罢课。

至五点半左右，省主席觅李超英来谈，谓于子三等四人于今晚，至迟明日即可送法院。余得此消息即以告行政会议诸人，预定八点召学生谈话，满拟以为此事可顺利解决。八点学生自治会代表会来四十余人，余与俶南、乔年、邦华各劝渠等不要罢课。学生代表雷学时答复，谓竺司令如此无信，难免省府亦将失信。未散，余电雷秘书〔长〕，渠谓四人已送法院，并谓渠将来此，余大喜。待十分钟不来，乃约俶南同往省府见沈成章（鸿烈），始知于子三已以玻璃刺喉管自尽，余等愕然。乃约李天助医生及学生代表叶玉淇、雷学时二人及军统局俞嘉庸往鼓楼保安司令部。先至竺司令办公室，时法院（地方）俞履安及法医检查员〔已在〕。余询于子三何时自戕。据云在6:20p.m.，五点半俞嘉庸尚在询问。询毕交与白纸三张，嘱写浙大自治会与学联之关系，不料回房后即以长五寸之尖玻璃破喉管自尽云云。（以下见本月廿七日记。）

于子三自尽后检验情形（续十月廿九）。余询此玻璃何自来，则无一能答。据〔云〕一片小者在手中，另一片大者落床下。余谓看守所与监狱不应有玻璃碎片与犯人，与羁押〔者〕以自尽之机会，疏忽之罪无可逃。于子三并无遗嘱。余等遂至自戕处，在保安司令部后面平房，警察颇森严，须经木门数道，至一小房间。内置两木板床，于子三睡在右床上，两眼开张，左边席上有甚多之血迹，喉上正中一孔，有一公分大。身上并无伤处，惟臀上有一块小皮伤，如铜板大，右手亦无伤。据李医生检验，谓伤口直入二寸许，割破大血管，故血流颇多云云。余立视十分钟后觉体力不支，因两日腹中觉欲吐，今日起且泻，晨间看李医生后服药，至是已将十二点，余几晕倒。李医为余打一针，始较佳。又回至司令办公室，俞首席检察官欲余签〔字〕证于子三以玻璃自杀字样，余不允。十二点半回。

10月30日 星期四 杭 晨七点半起 上午约校中所请常年法律顾问鲍祥龄来谈，余告以于子三等四人被捕情形。渠〔谓〕对于等

被捕后警察局与保安司令部均有责任，应将逮捕人于廿四小时内送交法院，但谓《动员勘共法令》公布以后此项法令是否有变动待查，俟回返家以后查明来函（见后）。其次关于子三身上带有玻璃，予以自杀之机会，则保安司令部之疏忽罪无可逃。

学生代表雷学时来，谓今晨自治会大会议决，下午三点将全体出动赴法院晤已解送第一法院之三学生郇伯瑾、陈建新、黄世民，并至保安司令〔部〕看于子三尸骸。予劝雷转告学生弗大批前往，雷有难色。余电询竺鸣涛，渠允可有代表十人前往，但不能有大批人至司令部。中膳后二点，学生千余已群集阳明馆前，预备出发。余与邦华、俶南、高锡昌（法学院）三人至阳明堂，开示学生弗集队前往法院与保安司令部。余等讲后，群众虽无言，而指挥者仍依预定计划，令学生出发。余一面嘱舒厚信¹、孙斯大²随同学生前往，顾俶南与邦华乘车至法院与警备司令〔部〕，告以大批学生将来。同时打电话与省府雷秘书〔长〕及保安司令竺鸣涛。因值午后均不在，乃打电话〔话〕与阮民政厅长毅成，渠允转达。

三点开临时校务会议，约法学院赵之远、高锡昌、周子亚列席。余报告经过后，决定发表于子三被捕经过消息，同时呈教育部，并请教授会于明晨十点召开会议。学生大队去后，余颇关心。至七点有警察来报告，未几李昌臣亦来，知到法院时颇有争议，经俶南解释，卒由代表廿人人内，见面郇伯瑾等。去保安司令部则至鼓楼即受阻，亦派二十人先后入内，看于子三之尸首。八点整队返。俶南、邦华、厚信与李天助³、刘振华及学生四人则共同偕法医蒋大颐验尸，十点始回。

鲍样龄律师函中附来关于《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第七条：为维持安全秩序，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合及其（行）（言）词行动，应依法惩处。《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第八条：共产党员或为

1 舒鸿，字厚信。时任教授会代表、浙大体育部主任、体育教授。

2 孙祁，字斯大。时任浙大教育系教授、校生活指导组主任。

3 李天助，时任浙大校务委员、医务组主任。

共产党工作人员潜伏后方，不为第六条登记之申请，应由当地治安机关一律予以逮捕，于法定期间内移送有〔关〕审判机关，依《刑法》及《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之规定惩处之……前项共产党员及其工作人员，不论何人均得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检举，但有挟嫌诬陷者，应依法惩处。

10月31日 星期五 杭 上午十点 在第一教室开教授会，到七十余人，余坤珊¹、谈家桢²主席。余报告于子三等四人被捕经过，俶南报告看四人被押情形，李天助报告于子三尸上之伤口，引起自杀与被杀上证据许多疑问。次学生自治会代表叶王祺报告昨学生自治会大会议决各点及希望教授方面辅助情形。毕业生在杭同学陈泽凤述其个人之感想。最后讨论教授会对于于子三善〔后〕应做各事：（一）发宣言主张公道及人权保障，（二）呈请处分主办拘捕于子三等违法不送〔法〕院及使于子三自戕者以应得之罪，（三）成立于子三善后委员会，（四）下星期一罢教一天，表示对于于子三事处置不当之抗议等诸点。午后鲍祥龄律师来，谓明日将偕毅成等赴京，于四号可回。……今日《东南日报》载于子三实为共党活动份子，有下列诸点为证（依据治安机关报告）：共党新潮社杭州负责人，受共党指使操纵浙大学生自治会，负责全国学联会与浙大学生自治会之联系。又谓浙大学生自治会于本月中旬推学生某秘密离校赴京出席伪学联所召开之重要集会。上述诸点有于子三亲笔签具之谈话笔录，渠并承认新潮社与全国学联两组织均接受共党、民盟之指导云云。

11月1日 星期六 杭 八点（今日改用冬令时间）驱车至法院路小车桥高等法院第一监狱晤狱长孙诗圃，与谈于子三惨死及要看被禁三学生。据云，三生于廿九子夜始到法院，故于子三若不死，则廿九或卅日未必送法院。渠云以私人资格亦嫌保安司令部不于规定时间内送法院为不是。次余即至客室内，与在监内引出之三生接谈。计黄世民，广西贺县人，沪中农银行雇员；陈建新，乐清人，私

1 余坤珊，时任浙大校务委员、外文系教授、教授会成员。

2 谈家桢，时任浙大生物系教授、教授会成员。

立道中女子中学生物理化教员：邝伯瑾，宁波人，农经系学生。余询三人身边被搜出之证件，昨登《东南日报》者是否确实。据云，陈建新所带信件中有九封，中一封系中农所彭昌祐寄，讨论民主问题以及应如何组织学生，此信最关重要。彼等之组织名新潮社，陈建新为社长，校中只周尚汾、余叔文、于子三、邝伯瑾四人。黄世民、陈建新、彭昌祐、汪敬羞均为会员。余询社中有社员多〔少〕人，据云十八九人，在湄潭时即有《新潮壁报》。其事业为举办桃园，于去冬创办。陈、汪为发起人，每人出薪水5%举办之。即在汪家奉化附近购廿五亩地种植，契约在汪处。技术由向协五负责，黄负经济责任。余询报载彼等所带之书籍，计陈带沈志远《近代经济学术史》、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又《雇佣劳动与资本》。询其作何用，系带交同学看。黄所带有沈志远书及《美国内幕》、《俄罗斯问题》并薛希孟托带与虞佩珍《展望》杂志、与沈德绪函。邝伯瑾身上有《学习纲要》一件，系抄自《读书与出版》，系讲哲学读书法，均系共产党书籍也。至于名单，黄世民身上有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农经组社员九人名（浙大只黄一人），邝身上有喜鹊歌咏队队员二十人名单及宁波中学考入浙大人名十一人。余询“新潮”既以桃园为惟一事业，何以不带园艺书籍而带经济政治且与共党有关之书籍，答彼等于政治确有兴趣，但无活动云云。

谈一小时。出。因校知仲揆有电话来，遂偕邦华与俶南至铁冶路一号晤仲揆。知昨沈成章曾至渠处谈浙大，颇以昨晨教授会议决罢教一天，事态严重，影响全国为虑。仲揆亦二天来不能安眠，希望浙大与省府不致成对立状态。……四点偕邦华、俶南、劲夫及教授代表爱予、希明¹、坤珊、家桢等晤沈主席，到李厅长超英、雷秘书长法章。雷述政府处置苦心，并将于子三自供抄录一份传阅。

（辞职抗议，仗义执言）

11月5日 星期三 南京 十点，余至教部晤骊先，告以于子三死事经过情形，并告以浙大事余不能再干。骊先深恐余之辞职

1 江希明，时任浙大生物系教授，为教授会成员。

引起学生之误传，故竭力劝弗辞。此类顾忌，实防不胜防。但值此困难关头，余若辞职，亦必受人责备，故不能不再硬得头皮干下去。……《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记者均来见，知祝修麟仍在《中央日报》。晚膳时谈社英来。当《申报》馆人问我于子三是否自杀，我说他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千古奇冤云云。

11月6日 星期四 南京 七点廿分赴颐和路37号晤谢冠生（司法行政部部长），谈及于子三惨死及酆伯瑾〔等〕被捕事。渠谓昨日起京中方开司法行〔政〕会议，为民廿四年之第一次，故浙江高等法院院长孙鸿霖及王首席检察均在京出席。浙省府曾来电催归，但大约于三日后始可回。侦查及搜集证据已在进行。因闻证据相当充分，故或难开脱。至于于子三等四人被捕后二十四小〔时〕内不送法院，乃是手续上之错误，不过治安机关欲充分搜集证据，用意亦可原谅云。

九点至行政院晤王云五，亦询及于案情形。渠亦谓上海租界巡捕捉人廿四小〔时〕内必送法院。如证据未足，巡捕房常向法院要回，但肯与不肯，法院可有权衡。……十二点至教育部……余晤骆先，告以浙大透支已达卅亿，如拨卅亿几等于零。余并提出至明春余决计辞职问题，因在内外特务、政客交迫之下，余实无以应付，且为校长已十二载，实亦可以对得起浙大，对得起国家矣。

陈雪屏¹来，乃与谈于案事。余首谢其派张公甫至杭。余告以浙大学生所希望者，乃于案之昭雪及酆伯瑾〔等〕之保释或早日开审。渠谓北大共产嫌疑被捕学生先后七人，有三人在联大毕业生袁某家（布雷之婿）被捕，迄今三人保释，四人未放，亦未送法庭，故对于浙大学生送法庭已是办得迅速。骆先主张不要提24小时应送法院问题，恐横生枝节。余则以为为将来青年保障，此问题应提出，俾军警多所注意。……膳后又与陈雪屏谈半小时，知渠将于下午四点同骆先晤蒋主席，恐于学潮事有所垂询。预备请蒋先生对于酆伯瑾等三生速开庭审判，最好在休止罢课三天以前，而对于逮捕之共产党

1 陈雪屏，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部长。

是否应即送法院或由治安机关决定，亦有一明定之办法。膳后雪屏送余回寓。

晚膳后驺先来，谓接沈成章电话，谓浙大学潮本已平静，今日上海《大公报》忽载余谈话消息，颇多刺戟之语，因之学生又纷纷要求开会再行罢课云云。又谓今日见主席，极关心于子三所引起之学潮。未几布雷来，首问杭州有否电话，料想亦因沈成章报告之故。余询《大公报》所载余之谈话，谓有关于法律问题及于子三自杀颇成疑问之说云。布雷之意，以为于是胆怯而自尽，余亦认为可能，但余发表谈话亦只说尚有疑窦，未说是被杀也。布雷之女陈璉（幼女），于胜利前在联大失踪，经半年之跟踪，乃回。胜利后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荐至《申报》馆任〔事〕。其友人尹（邢？）姓者责其懦弱，硬要〔其〕去北平，为荐一中学教员不成，失业，又为拉拢一袁姓讲恋爱，遂成婚。此次北京捕共产，即在袁家中。迄今袁夫妇尚未释，邢则已为胡适之所保释云云。余又提出辞浙大校长事，告以目前特务与反动内外夹攻，余实无术应付。若掬诚相对，则两方均不以诚相见也。

11月8日 星期六 杭 十点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谈话，到七十余人。余讲去南京接洽经过并辞职情形，告学生以部中已报告蒋主席：（一）在法院之三学生酆伯瑾等，必须早日开审。（二）于子三之惨死，予以澈查。至于余之辞职，乃由于治安机关不听吾言，酿成于之惨死。而你们同学不听吾言，将来难免不再出事，故余不能负责。关于保释，学校可以办，但肯不肯在法院。关于起诉，学校不能出面，学生自治会或家属可行。学生方面李浩生、李德容、周尚汾均起立声辩，不满意于所得之结果。但实际浙大三学生已移法院而北大方面被捕之毕业生陈璉等尚在司令部。李浩生则主张自星期一继续罢课。……至第一监狱晤孙诗圃，约同至牢狱中晤酆伯瑾、陈建新、黄世民等三人。渠三人合居一室，长14'，广10'。棉被三条已收到。伙食由同学及教授会、助教会等送来，故较学校为佳。余嘱其邀请律师以便申辩于堂上。

偕倬南至省政府晤雷秘书长，告以《大公报》、《申报》所载各节关于生事，均系当时无笔录，余未经理目，故各报所登不同，未免有出入，要以一号校长办公室所送书面报告为据。今日又发表谈话，关于玻璃之来源已寻出，亦可减少一疑窦矣。晤沈成章，至六点偕倬南回。

11月9日 星期日 杭 九点半晤顾倬南，知昨晚学生自治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议决于子三坟墓设华家池，纪念碑设于子三广场，另设子三纪念堂。治丧由各同学膳费中扣五千元或一万元。再罢课一星期，罢课期间向校外进行扩大劝募与控诉，并加强安全队。如此办法，则校外进行时必致与校外发生冲突。适理事会主席蒋世澄来，余告以若向外宣传募捐，必致发生冲突，故明晨必出布告，告诫周知。

十一点张公甫来。余告以昨日学生之议决案，希望以劝告方法渡过此困难时期。张今晚晋京。余与允敏赴铁冶路一号晤仲揆，始知余之谈话在《大公报》与《申报》发表以后，杭州治安机关大不以为然，即在七日之《东南日报》驳复，其后面所云“必为传闻之误”云云，乃系沈成章所改云云。可知党部与军统局衔余之切骨也。实则余所报告于报馆记者，亦与报告于教授会及教育部者无二致，不过报纸各有背景，遂致传说不一耳。

11月10日 星期一 杭 午后三点开校务会议，到四十余人，并请各系主任均列席。……次余告至京为于案事接洽经过，并与顾倬南同往法院晤王首席检察及至监狱访邴伯瑾〔等〕之经过，以及学生自治会代表会议决继续罢课情形。认为在此情况下学校处于机陉状态，急应设法，请大家发表意见。五分钟内大家不发一言。乔年首先述昨晚学生代表谒见，请同情于罢课。次仲翔¹表示应晓喻学生以利害。王爱予²主张由校务会议劝告学生上课，季梁起立赞同，晓

1 朱仲翔，时任浙大史地系地质学教授、浙大总务长。

2 王葆仁，时任浙大化学系主任、教授会代表。李寿恒辞后任教务长。

沧、邦华亦同意，步青¹更积极，遂表决，一致无异议通过。推王爱予、诸葛振公二人起草。余等讨论学生自治会要求葬于子三于华家池，及为于子三作纪念堂等提议。余谓余同情于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此说为全会同人所赞同。

11月11日 星期二 杭 九点半至电机系教室，讲师助教会干事谭天锡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干事谈话，教（员）〔授〕中请邦华与步青二人。讲师、助教中周本湘、杨士林劝学生弗罢课过久，章作藩赞成本星期罢课。余警告学生，如再派人至之江大学煽动罢课，必滋事端。因今日与李培恩通电话，知昨有学生卅余人，内女生二人，赴之大贴标语，并劝罢课，自上午九点直至下午一点，秩序颇难维持云云。

（法庭抗争）

11月12日 星期三 杭 午后二点徐家齐、鲍祥龄二律师相继来谈，并约孙斯大、邦华来，将昨浙高等法院检察官李载彭之起诉书详阅后，讨论将来公开庭审时之应有证据。并召现在校之新潮社社员周尚汾来，嘱周将桃园之账目及汪敬羞父子到杭作庭证。

起诉书以“内乱罪”起诉，认陈建新等受共党指使推行新潮社社务，秘密吸收社员。该社未向政府登记而积极推广至校外，经费数额甚巨。争取学生自治会代表，以图参加中共所领导之全国学联会，有于子三笔供为证。创设读书会，邝伯瑾拟有学习纲要，读书目录中列有《联共党史》、《唯物辩证法》、《思想方法论初步》、《毛泽东七大文选》、《四大家族》、*Red Star over China*《西行漫记》等书名五十余种，并分别传读，限期报告，有邝伯瑾之亲笔记载可资证明……被告陈建新等，既执行新潮社之重要任务，帮助共党推行策划，加强训练，则被告不无触犯《刑法》第卅条第一项（内乱从犯）、第一条第一项（内乱）之嫌疑。被告等均为青年学子，因意见未能坚定，致入歧途，情虽可悯，但既触犯刑章，自应依法起诉。被告于子三

1 苏步青，时任浙大校务委员、教授会代表、数学系主任。李浩培辞后接任训导长。

于本院受理前业已死亡，应免予置议云云。

11月13日 星期四〔杭州〕九点约凌纯声¹及晓峰、季梁、邦华、劲夫、孙斯大、李浩培诸人谈。凌纯声以教育部所发表于子三案件四种材料来，完全系官方看法，对于浙大校长办公室第一次函登各报不采取，而采取浙新闻处消息，其中不免失实，故阅者多为不满，未足以平青年之气。十点偕李浩培、蔡邦华、凌纯声赴高等法院晤孙鸿霖院长，因闻星期一（十七号）开庭公审，而十七号适为本校学生应复课之期，且十七号为青年节，故余等希望能提前于星期六（十五）开审。但孙鸿霖适不在。中膳后来电话，知以限于三日（自起诉书发出后需三日）之时间，不能缩短。午后徐家齐律师来，渠已将所有于子三、邝伯瑾之口供抄出，即嘱勘、石二君及注册课二人缮录油印，以便于明日交去，藉分发与被告及律师。

三点开行政谈话会。……次讨论对付学生罢课问题。拟定明晨九点召集学生代表谈话，再劝告即行上课，无效则召全校学生谈话，无效则召开校务会议，或将出诸解散自治会、勒令上课也。

11月14日 星期五 杭 上午九点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大会讲话，并约乔年、劲夫、邦华、季梁、晓沧、振公、季午、李浩培等。余首述浙大已到严重之危机，不能不再复课，并述三层原因：继续罢课于于案及邝伯瑾等三人案并不能有所助益，不能得教授、讲师、助教之同情，校务会议既有印刷之通告于先，讲师助教会复召集代表谈〔话〕于后。近来《公报》上将周子亚、方子勤、严仁赓、邝衡叔诸人之谈话断章取义登载报上，均大不满，足知同学已失去同情。最后外界啧有烦言，如之江、杭高、艺专均因浙大罢课后学生向各该校宣传，以致不能维持秩序，向省府告急，而省府即责备浙大。如再向外宣传鼓动，必致引起更大之惨案。故若不于最短期内复课，余将有断然之处置。次蔡邦华、李浩培均致辞。学生中讲话最多者为李德容、李景先等，多以不满于所交涉后之结果，如于案未能惩办首凶，三同学不能交保各点。此外井井谈及自治会代表

1 凌纯声，时任教育部司长。

议决于十六日星期日迎于子三灵柩回校问题。余毅然拒绝，告以张教务长在校一十五年，以身殉学，尚然不能停柩，何况于子三。次谈及葬地。余谓如葬校内，只能在凤凰山，不能在华家池，或你们另购地亩亦可矣。

11月16日 星期日〔杭州〕九点召集临时校务会议。请凌纯声司长致词。渠报告教育部对于浙大学生罢课之关心，以及此次处置事变之意见。讲毕，余述近礼拜学生再次罢课之经过，以及扰动之江、艺专、杭高及杭市传单布发引起不安之情形，及与法院交涉之经过；请律师徐家齐、鲍祥龄二人在高法院取得检查官起诉书中所述之证件，以及徐、鲍二律师之论断，以为〈二〉〔三〕人无重大罪名，或可得缓刑保释。次及学生自治会要求迎灵来校，及葬于子三于华家池，为于子三立纪念，均经余拒绝，并余已告学生自治会，无论代表会之议决案如何，星期一校中必上课。昨晚自治会代表以三票之多数得通过星期一休止罢课，其意如酈伯瑾、黄世民、陈建新三人审判结果不如意，将再罢课（一天）云云。至于迎灵则已放弃，葬地拟在华家池购地等各点。

11月17日 星期一 杭 上午九点偕步青、谈家桢、蔡邦华、李浩培、赵之远及学生代表汪敬羞、周尚汾、蒋世澄等十五人赴高等法院听审。法院前戒备极为森严，因事先有谣传，谓浙大学生将包围法院，及十一月十七青年节共产党将活动也。九点开庭，在高法院刑庭，容量不大，坐位仅百余，但门内外者站立近百人，秩序尚佳。刑一庭长张启鶚，推事韩作梯、李芬，检察官李载彭，书记官杨镇翰。开庭票提陈建新、黄世民、酈伯瑾三人审讯。陈、黄、酈由庭长问讯后，即诵已死于子三笔录。陈建新提出于口供未经签字，只用指印，认系死后所打。陈建新对于廿八号之自供谓非当场所记，拒绝签字，故不能作据。开始辩论，李检察官陈述起诉要旨后，被告律师徐家齐发言达一小时。鲍祥龄及法院指定律师汪绍功、陈仲达相继致词。因彭昌祐信中谓报告所读之内〔容〕不便具名，否则于收信人殊有未便一节，徐律师即根据函中“我们只有方向，无中

心目标”云云，可知与共党并无联系。渠等始终只十七人，并未吸收新社员。鲍律师称中央颁布《共党处置办法》，规定省会共党登记自新期间为十一月五日止，而被告等于十月廿五已被捕，大学生有阅读书籍之自由云云。最后四律师均要求保释，庭上未准所请，宣告辩论终结，三被告还押，定二十号上午九点宣判。

11月20日 星期四 杭州 晨九点半，高等法院宣判陈建新、黄世民、邝伯瑾三人，以内乱罪名监禁七年。今日余与倬南均未往听宣判，仅训导处派人往，故倬南来告余始知之。余觉此判决实嫌太重。因起诉书无非说三人有辅助共党叛国之嫌疑，是从犯而非主犯，故可判重三年半至七年。而今判决是主犯，故最轻七年也。据说判决重要根据是于子三之口供，而于之口供曾签字，但据徐家齐律师之亲见，所签字似系誊录口供之笔迹。此点是否确凿，待查。据今日徐家齐与李浩培二人之意，似有政治压力，由党、政二方加诸孙鸿霖，因之孙不能不令张庭长从严办理，因此案政治性重于法律性也。

午后一点半徐家齐来，约四点召学生理事谈话。四点到理事二十人，及徐律师、李浩培、倬南、斯大、邦华诸人。余与倬南、浩培及徐律师均谆谆告诫，以此次判决虽嫌过重，但校中只能以法律解决，向高等法院上诉。晚学生开代表大会，倬南、斯大列席。决定罢课三天，自礼拜六至星期一，迎灵事作罢，并欲请余早日赴京各点。

11月21日 星期五 [杭州] 十点偕倬南及蒋世澄、谷超豪二代表赴第一监狱，询邝伯瑾、陈建新、黄世民三人是否要上诉。渠等决定上诉，并仍请徐家齐律师为辩护人。余询渠等是否已见过今日之《东南日报》，因报上载有高等法院判决书之全文也，渠等谓已见过。余询陈建新有否写悔过，陈自承写过，但以手枪相恐吓，其悔过云：“以前行为失检，思想有误，自今以后愿改过自新，为国家出力，为民族求荣”云云。余等出，即偕倬南至省政府晤雷法章，知沈成章于明日可返杭。余告以校中罢课情形，并询新潮社在校社员余叔文、周尚汾是否有被捕之可能，答谓无此预备。余询以是否有

来校捉人之举，答以如来校必告余云云。但余恐临时告知，则一二分钟内即来捉人，亦等于不告也。

11月23日 星期日 杭 二点开行政会议，讨论罢课善后问题。决定出布告，告诫学生嗣后如有罢课及越轨举动，必严重惩罚，但未提及解散自治会及开除学生。当时对于此项布告明天或今天出，决定今日即出布告。如明日学生不上课，即解散学生自治会。

（于子三出殡、“一·四”事件）

（1948年）1月3日 星期六 杭 于子三原定明日出殡，但路线几经商榷，省政府最大让步是由停云山庄经竹斋〔街〕至鼓楼赴凤凰山，而学生必欲经官巷口、三元坊等热闹街道。省政府并不准有仪仗如军乐、照相亭以及喊口号、发传单等事，而学生则要把一二百挽联持之游行，且沿途唱挽歌。上午召蒋世澄来谈两次，余并约各院院长与李教务长、顾训导长熟商，无结果。下午决计出布告告诫学生不得任意出外游行，并说明自治会不听学校劝告，若有意外，学校决不负责。并有学生自治会蒋世澄、陈业荣、李德容、唐汉超〔后作“唐超汉”〕等，渠等均主张坚持代表会之路线，干事无权变更，惟彭国梁因近来失去六百万金，要向学校借，故闭口无言。至下午四点蒋世澄又来谈，谓路线可以迎柩后走竹斋街，但需将挽联自校门由整队学生送至停云山庄，且沿途唱挽歌。余等仍认为不妥，故告以明日不能领柩。

1月4日 星期日 今日学生自治会为安葬于子三欲排队游行。昨日已劝阻，谓拿标语旗帜、唱挽歌均为地方当局所不许。而自治会执行委员以同学主张激昂，今日八点半仍在阳明馆前召集约四五百〔人〕旗帜写明“报仇”等大字。所散〔发〕挽歌有“抬着你尸首往前走，走在这中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记着记着，今天将将士来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高兴，你的死期将到临”云云。此类挽歌比任何标语更为恶毒，故军警若知道势非冲突不可。余事先约各院院长及教务、训导长、舒厚信等于八点到校。乔年最早到校，谓校内外军警林立，断绝交通。次蒋世澄来，余告以环境之险恶，

今天如出外游行，必遭阻止，渠一味推委。至八点半，闻集合者在外唱歌。余与乔年、俶南、邦华、劲夫、子桐¹、季午、浩培等均往，学生适在公祭，蒋世澄主席。余对学生报告交涉经过，并说明何以原定四日出葬，因自治会条件省府不接受故已出布〔告〕缓葬，今日如大队出发，必致冲突，酿成惨案。辞毕，谭天锡代表讲师、助教，亦劝阻弗出。余等下台后，陈业荣方报告交涉经过。人马未出大门，闻大学路人声鼎沸，趋视，知有游民六七十人持红绿纸旗蜂拥入内。第一次阻止退出，第二次又闯入。直冲队伍，将学生所持牌楼、纸坊尽行撕散。压倒（教四）女生刘季会，折肋骨数根。国三女生贺光华头伤，电一男生韩祯祥亦头伤。当将大门关闭后捉获流氓十名，有头破出血者。出事后余即电雷秘书长，告以情形，并嘱设法制止流氓再来。渠对于流氓一名不甚心服，以为是工会工人与学生冲突。但渠等冲入校内则为众目昭彰之事矣。当请俶南赴省府，并将刘季会等三人送医院，电法院俞首席派人赴院检验。余电省府派车来接被擒之流氓，计有陈瑞标等十人及警察娄玉挺一人赴法〔院〕，省府派保安司令部车来接，不料一部分学生以于子三死〔于〕保安司令部，移恨于汽车，打司机并将车窗打破，司机急逃，冲门而出。

又下午学生二百余葬于子三之衣冠于校内土山旁，余与俶南等同往。余告学生以校内不得做坟，做就后将来亦将移去。学生中初亦无言，迨余与俶南走后，有人问不能做坟之理由，余告代表谷超豪、苏芳志二人。所捉之流氓送法院，因校车不便出，乃请地方法院派车来，分二批送院，由检察官许幌（玄斋）来接去。时已八点，俶南、劲夫、乔年、厚信等方去。派邦华赴京。

1月5日 星期一 杭 八点偕庶为乘车至田家园浙大医院看昨日送院之三病生。刘季会，湖南人，在校尚有一弟，左边三、四两肋骨已断。刘生自己称被暴徒打一棍，〔刘〕系教育系四年级学生。尚有国文专修科三年级贺光华右眼角边际〔被〕凿一洞。电一韩祯祥头皮上被击一棍，有6分长（6cm）。三人均无温度，刘季会可不开

1 陆子桐，时任浙大总务处事务主任。

刀，于两星期后可以出院，余则较轻。九点廿分偕王季午、李天助回校开校务会议，讨论昨日暴徒殴击学生事。事先昨晚学生自治会代表会已议决数项，如罢课三天及惩凶、赔款、根究祸首、保障安全，以及仍依原路线安葬凤凰山等诸点。自治会陈业荣来要求列席，以自治会已有书面报告，且昨日之事目击者甚多，故遭余拒绝。……一点半又开会。时有电话来，一为南京长途电话，驺先电话询校中情况。继杭立武¹电话，并询是否赞同程稚秋²来，余询何时，答今日晚车云。会中继续讨论善后办法，决定〈四〉〔三〕点：（一）向地方政府抗议暴徒闯入校中殴打学生，希望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情，并恢复学校左右交通；（二）学生克日上课，如不遵令上课，即依部令解散学生自治会，并呈部解散学校；（三）校地除公墓外不得另辟葬地。

1月6日 星期二 九点偕顾倬南召集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干事谈话。余最初谈及对于学生自治会代表会议决各点，校中均已办理，惟坚持将于子三出殡维持原案，如照原来唱挽歌、持仪仗，则绝对行不通。次则报〔告〕昨日校务会议议决三条：（一）向地方政府抗议暴徒侵入学校殴打学生，要求保证此后安全，并恢复学校附近交通；（二）令学生克日上课，如不遵令上课，依照教育部令解散学生自治会，并呈部解散学校；（三）本校除指定公墓外，校内任何地点不得作墓地。

1月7日 星期三 余在北教室广播，所能听到者惟工学院内部之学生。余讲十分钟。首述此次流氓破门而入，治安当局未能事先阻止，同人均深引为耻辱。与省府交涉结果，撤退军警，除去交通阻碍。昨晚省主席并亲允担保本校师生之安全。至于赔款等，必须俟法院之宣判，同时余等亦须对于校内自己之秩序加以注意。若四日早晨□听从学校布告，延缓举办葬于，亦决无此次之暴动。此次校务会议，各位教授均以学校为重，对于此次事件虽极愤慨，但皆

1 杭立武，时任教育部次长。

2 程稚秋，时为教育团体立法委员，代表教育部前来了解浙大“一·四”事件。

以诸生未能顺从学校之命令为遗憾，荒废学业为可惜。故如明日不上课，本学期即不教课，学校秩序不能维持，安全亦成问题。望诸生念学业之贵重，学校前途之应顾到，即日上课云云。同时余并告蒋世澄，以近日校门由学生看守，家属、外人出入需签名，极不自由，需撤除。

三点程稚秋〔来〕，知今午车到杭，未遇邦华。谈半小时，余告以此次事变经过情形。四点程去省府。开行政会议。余报告湄潭赵荣琛来函报告施教耐及陈柏林在湄以共党嫌疑被捕情形，及家玉来函中所述各点，美金二万六千元已收到。五点俶南来报告，知自治会议决明日起休止罢课至礼拜六。

1月8日 星期四 十一点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干事约十人谈话，到陈业荣、蒋世澄、李景先、徐型仪、向惟浚、周西林、李盘生等诸人。余介绍稚秋后即令学生报告。陈业荣起立致辞后，请稚秋报告部中意旨并与省府接洽，定日后再谈一次。

1月9日 星期五 杭 十一点复约学生自治会五人谈话，到谷超豪、陈业荣、李景先、吴士濂、蒋世澄等。程稚秋报告昨接洽经过。十二点约稚秋、李超英、孟宪承¹、俞子夷、王季梁、王劲夫、蔡邦华、俶南、晓沧中膳。膳后三点开校务会议，余主席，报告数日办理于子三出殡所引起之纠纷经过，并请稚秋说明部中态度，及本月份改良公教人员计划。苏步青、王爱予等六人提议派代表赴京要求实物配给。讨论甚久，决定派五人，以晓峰、步青、振公、谈家桢、江希明五人得票最多。次讨论上次所议决二桩提案，即一对地方政府抗议暴徒闯入校内殴人案，讨论甚久，决定成立委员会，以李浩培、徐家齐、鲍律师、顾俶南、蔡邦华五人为委员。对于学生仍责成继续上课，如下星期一二停课则须解散自治会。争论颇烈，有若干人以为此时不是解散学生自治会之时，但大多数以为如罢课即解散。

1月11日 星期日 杭 三点余约稚秋与自治会学生代表谈

1 孟宪承，时任浙大校务委员、师范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

话。因今日学生捐寒衣，故到者仅四五十人。余即请程稚秋演说，讲十五分钟。首述教部对于浙大之企望，次及浙大过去，最后述一月四日事件。劝学生弗操切从事。渠以教育界前辈地位与学生谈话，劝学生要听校中之命令及规则，免得贻外界之口舌。次余说数语后，倣南提出关于所望教部及学生两方之意见。次嘱学〔生〕代表陈述意见，有李浩生、陈业荣、杨振宇及李德容四人起立说话，至五点散。

1月24日 星期六 杭 为一月四日流氓五六十人闯入学校，杭州地方法院准予起诉，但作为两造互毆论，将工人屠兆亭、徐子云、俞寅康、钱志贤、楼先水、韩瑞根、陈金水、徐云灿、陈瑞标、徐仁康等作为被告，而将学生中之受轻伤者陈雅琴、杨孔嫻、何素心、金国华、王志洁、董静珊（以上女生）及陈文和、潘志新、欧观群、周峻璧等廿二人亦为被告，学生刘季会、贺光华、韩祯祥、工人黄东浩四名受伤较重〔者〕予以不起诉处分云云。现此事由李浩培等诸人处理，一方呈部说明司法处理此事之不公，一方则在觅证人，以备开审时到堂作证之用。

1月26日 星期一 杭州 李浩培偕倣南来谈，为呈部说明一月四日流氓五六十人闯入校内毆击学生事。地方法院对于此事不予起诉，但以互毆罪两造均作为被告，认为不公平，又向地方法院再为此事递呈起诉。

1月27日 星期二 杭 关于于子三安葬问题，余与振公商谈，以为此事学校必须有一政策。倣南不喜多事，故事事待学生主动。余则以为衣冠葬为校内所不准安葬在校址者，故主张早日除去。不如首先函于之家属于椿明，告以如不能来杭，嘱其全权交浙大办理。如得复可行，则校中即可径行办理，不再与自治会商酌。如不得复，则俟下学期上课后办理。

1月31日 星期六 杭 上午教授会代表苏步青、谈家桢、余坤珊、张晓峰、王爱予五人来谈，为余拟于四月间辞职事。余告以在校十二载，已属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

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

2月4日 星期三 杭 午后学生代表陈业荣、李景先等七人来，要余打消辞职之意，并以《上校长书》交来，有学生千余人（1139人）签名其后。余告以目前精力日衰而事务繁杂，已非余力所能任。且余如辞去，必须有接替之人，不致挂冠不顾而去也。

2月27日 星期五 三点召集学生代表、干事谈话，到李浩生、谷超豪、陈业荣、李景先、徐曼琛、胡则维、蔡希尧、唐超汉、徐良咏。余以理事会为“于故〔主〕席”殡葬问题的建议于代表会之油印品中有关于谓“当局以卑劣的手段来阻挠我们”，谓“校方答应付做坟之钱四千七百余万，但校方如此不履行诺言支付墓工款实在令人遗憾”，又谓“于子三之尸尚存在杀人者手中”，又谓“及早主动地解决是必要的”。一方面刺激省政府，而一方〔面〕则谓学校曾允为于子三坟墓出钱，这全非事实。建议里并谓校方意见与原案有着相当的距离。关于于子三安葬事，学校并无义务要安葬他，但人死以后总以入土为安。鉴于上次纠纷，如由学校安葬，自治会不再参加意见，定期安葬完全依照学校办法。

3月14日 星期日 杭 葬于子三于凤凰山。子桐借灵车先行，于6^h55'出发。到七点半，俶南、舒厚信等赴华家池，农院学生来大学路集合，因农院一年级有一百余人登记前往也。此时天雨虽〔止〕而云翳仍蔽天。八点余，校车兰辆、雇车二辆载学生二百七十八人往停云山庄，俶南、振公、舒厚〔信〕亦偕Jeep往，至停云山庄即随灵车赴凤凰山。余与家玉留校等消息。幸天未雨，未十一点学生即乘车回，振公、俶南等亦来。知今日秩序甚佳，警察局沈局长并在场照料。送葬车过膺白路后曾唱挽歌，但歌词不如过去之激烈。送葬者到敷文书院后，曾依秩序单行，并有李浩生等演讲，沈〔 〕（定一之公子）读祭文。沈读祭文时闻者泪下。李演说时有谓“于子三虽死如生，三五月以后，汝之坟将移于西湖之滨，为千万人之馨香拜祝，吾辈此时不为闭门读书之时，而为起而奋斗之时”云。闻报馆方面有四访员在旁观礼，吾恐政府如重视此事，难免不有下文也。

12月12日 星期日 杭州 接教育部转来情报，谓：“自八月廿二日由此间会同特刑庭拘捕吴大信后，竺校长之态度即形转变，甚至包容奸伪匪谍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问不闻，而对于特刑庭之传讯则加拒绝。兹举其事实如下：（一）被漏网之学生李浩生、楼宇希侦查已到校。由特刑庭传讯，均以未到校拒绝；（二）李雅卿被捕时，自认由朱元明介绍。朱虽休学，但仍潜留校内为自治会工作，经特刑庭传讯，以离校拒绝；（三）吴大信、李雅卿被捕后，亲到拘留所慰问，在交谈中暗示彼等弗自承认；（四）吴匪被捕后，九月十九、廿两日竟由学生决议正式罢课，并印发宣言长期罢课之重大学潮，当局事先不加制止，事后亦未予主谋分子以正式处分；（五）浙大匪谍学生拒绝特刑庭之传讯，并严密校内巡查，预备以武力阻止入校逮捕；（六）十月廿九日于子三自杀周年，举行殉难纪念，有鸣钟志哀、发动扫墓等等，学校当局竟不问闻……无怪社会人士认浙大为共匪之租界。总之各情，浙大当局包容匪谍学生之非法活动，实责不容辞……”教育部将此文附寄外，另有文曰：“竺校长密鉴：兹抄送该校有关情报一件，实情如何，仰即查明具报为要。教育部亥虞（十二月七日）。”此项报告当然为俞嘉庸所作。所谓余暗示吴大信、李雅卿弗自承共产党，全属子虚。因彼等自承后则罪名可以减轻。且校中发现共党能剔除，则校中风潮较少。余素来主张，政党不要入学校也。

五、复员回杭后发表的重要讲话和研究论文

8月30日 星期六 上海 九点余，中国科学社、自然科学社、天文学会、地理学会、动物学会、气象学会、解剖学会七学术团体开年会，假中央研究院大礼堂，到四百人左右，座为之满。首由主席任叔永报告。次市政府社会局李副局长致辞。次咏霓述前次渠旅欧之经过情形。最后余讲“科学与世界和平”，约二十五分钟（讲稿登《东南日报》副刊）。

1. 科学与世界和平¹

(1947年8月30日)

有人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科学家的战争，第二次大战为物理学家的战争。无疑的，近来发明的战争利器如同原子弹、雷达、飞弹、火箭、超声速度的飞机、优越力量的炸弹，全是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的把戏。因此，“国防科学”成了一个专门名词，尤其在纳粹时期的德国，一门科学的是不是值得提倡，有没有什么价值，全要看他和国防关系之大小。因此科学和国防便成立不解之缘。好像科学的可贵全在他能供给人们以残杀同类的利器。这并不是科学本性是凶恶的、狂暴的或是好杀人的，而是因为我们人类的不争气，内心怀了夺取霸占的心理才发生这类现象。若是人心统善良，那末科学很可以帮助人类，增进国际间情感，排除列强的困难，建立永久世界和平。诸位，这并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我可进一步说，若是我们不要人类绝种，地球毁灭于这宇宙之内，我们必得利用科学来造成一个和平的世界。

过去科学上的发明，已经对于建立世界和平有很大的贡献。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和混乱是有周期性的，而中国在历史上的人口增减也有周期性的。这在十七八年以前，中国科学社南京年会演讲里已经由马君武先生指点出了。李仲揆先生在上海苏韦培主编的《科学文艺》月刊上，亦曾说明中国历代兴衰存亡的周期性。大抵每朝开始的时候必有一期的初安和小康，继之以较长的承平时期；年久以后，人口增进，一遇到水旱灾荒就会弄到遍地土匪，不久到处流寇酿成革命，而开创另一个朝代。自汉以迄明清，统是如此。明末的徐光启早于英国的马尔萨司（Malthus）一百多年已经指出人口的增进是依几何级数的，他的速度较食物的增进来得快，不加控制必会造成人口过剩的现象而酿成混乱和革命。中国历史上之多混乱，人口过剩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在科学昌明的今日，马尔萨司的学说已需加以修正。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可以人工的方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刊于《东南日报》（杭州）1947年9月6日第6版，《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63期（1947年9月10日）及《科学》29卷10期（1947年10月）。以《校刊》载文人编，参照《科学》载文作了个别订正，用参校符号标明。原篇名下记为“八月三十日科学社等七学术团体年会讲演稿”。

法来限制；而食物的产量可用选种、肥料来增加。“马氏人口论”的应修正，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由安格耳指出了。科学不但可以免除地球有人满之患，而且可以增加财富，使家给人足，这于避免战争是不无小补的。

其次，卫生常识的增进，医药知识的进步，如维他命之发现，日光之利用等，对于人生健康大有裨益。精神之健全，必寓于体魄之健全。精神失常如希特拉〔希特勒〕者，一旦得志，便可为所欲为而以全体人类生命为孤注。故世界上卫生营养知识之增进，亦足以使人民趋向于和平大同之道。

近代科学家尚有一大贡献，亦足以拯救人民于水火使登衽席之上，这就是交通与通讯的改进。老死不相往来，闭关自守之民族往往流为夜郎自大。在山岭多的地方，相隔数十里言语即不能相通，易于引起误会。交通方便可以引起言语的统一，通讯方便可以引起意志的统一。无线电广播是一个统一意志〔的〕极大工具。言语上的统一和意志的统一，均可免除言语上的误会，意见上的分歧，使人民与人民，国家与国家减少冲突的机会。

所以科学对人生的三大贡献：增加生产，改造健康，和改善交通与通讯，照理统能使世界趋向和平。但是近三十年来科学进步最快，而此时期中我们这辈子就眼见了二次世界大战，不久第三次大战也许就要爆发，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就怀疑到科学进步太快了，我们人类控制物质的力量，远胜于我们控制自己的力量，物质科学该休假一二十年，使我们人类有喘息的机会。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我们所需要的倒并不是科学的休假，而是发展更多门类的科学，更多的人知道科学，科学家的更能本其科学的精神来研究科学。

（一）什么叫做“科学家的更能本其科学精神来研究科学”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两种学说所造成。在东方是日本人的八弦一字的学说，在西方是纳粹的领袖主义（Fii hrer prinzip）。八弦一字的学说以天皇相号召，支那人是劣等民族，大和魂是负天的使命来拯救到共荣共存的地位。领袖主义以日耳曼民族相号召，说日耳曼族是天之骄子，其余的民族统好像我们古代的南蛮北狄，从虫从犬（犹太人的犹亦从犬），只

配作奴才。二者可谓异曲同工。这种领袖民族的学说在赫胥黎 (Julian Huxley)、哈同 (Haddon)、卡尔—桑德斯 (Carr Saunders) 等三人合著《欧罗巴人》一本书里，早经道破其不合科学原理。但在日本和德国，不但有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随声附和，甚之物理学家、数学家也来助纣为虐。德国的物理学家 Lenard 著了一本《德国物理》(Deutsche Physik)，说犹太人绝对不能作科学工作 (但事实上德国人得 Nobel 奖金的，25% 是犹太人)。又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绝对不符事实。德国生物学家 Karl Brohmer 著了一本《国家社会主义生物学》，说社会组织要以纳粹德意志为榜样。日本的生物学家也把教科书修改了，以符合时行的政见。德国科学家当中，不乏守正不阿的人，如同 Heisenberg, Jordan, Sommerfeld，统被称为“白犹太人”。但有地位的科学家如 Lenard 亦会埋没良心，投机如此，这真可为科学寒心。往者已矣，来者如何呢？在本年二月号 Discovery 月刊上，英国著名遗传学家 Darlington 做了一篇文章叫《科学的革命》，讲到苏联列宁学院〔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Lysenko〔李森科〕近来的著作，关于遗传学说完全以共产主义出发点来写的。把 T. H. Morgan 的遗传学说完全蔑视。科学是研求真理的，歪曲事实以迎合潮流取悦于世，这是投机取巧。抗战未结束以前，美国 M. I. T. 数学教授 Norbert Wiener 维纳氏做了一篇关于飞弹 (Controlled Missiles) 的文章。到抗战胜利后，有人向他索阅此文，他就拒绝了。他说：“我知道了广岛、长崎两枚原子弹，杀死了数十万无辜生灵以后，才觉得科学家已经把生杀予夺的权操在手上。发表科学上的消息，其责任如何重大，我不能不郑重加以考虑。”若使每个科学家能如 Wiener 那么郑重，世界生灵或不致再受涂炭吧？在本年五月九日美国 A. B. C. 广播电台广播说，政府已请到两百多关于火箭有经验的德国人予以自新的机会，并以做美国公民之资格来奖励他们，使他们继续研究火箭。国家并预备以二万五千万美金的巨款来做这工作。你想照 Wiener 的理论，这辈专家不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吗？

(二) 为什么需要更多人知道科学呢 近世科学进步如此迅速，已经使门外汉莫测高深，望洋兴叹。但惟其如此，一般人民尤其不能不具

有点科学常识。如卫生常识，电气常识等。而对于宇宙观的常识，也不能不人人具有，尤其是做社会或是国家领袖的人们不能不具有。领导一个多数民众的领袖，而不知天高地厚、生物进化之过程、真理之永久不泯灭而妄自尊大，为所欲为，以为一手可掩尽天下耳目，如希特拉其人，那没有不使生灵涂炭天下鼎沸的。据地质学家说，人类在地球上不过五十万年，但自地球生成迄今已达十万万年。地球生命中不过最后1/2000之时间才有人类。在地球〈上〉历史上看，人类无非一个初坠地的婴孩。地球本身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比较小的行星，而在我们的宇宙里即是银河里，太阳是1000亿颗星中的一颗，还不能算大的。而全世界有多少像我们的宇宙呢？这天文学家尚不能确定，只知道〈最近的螺旋星云即是宇宙〉〔最近的一个宇宙—螺旋星云〕离开我们八十五万光年。从威尔逊100"天文镜中估计可以看到二百万这类宇宙，若用200"天文镜，估计可以看到八百万个。所以我们在宇宙的地位是微乎其微。从这眼光来看历史上的战争，自刘项之争〈巨鹿之战〉，以迄两次世界大战，岂非尽变成了蛮触之争，俗语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呢？假使各国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统看透了这点，世界何致再策划战争呢？

（三）什么叫发展更多门的科学呢 今年年初著者在伦敦的时候，伦敦大学物理学教授 Prof. J. D. Bernal 说本年英国政府补助科学的款项，是物理科学四千万镑，生物科学四百万镑，社会科学四十万镑。¹他虽是物理学家，可是言下甚为社会科学、生物科学抱不平。英美的科学家往往批评纳粹时期的德国太注意所谓 Wehrwissenschaft 国防科学。李约瑟在他所著的《历史在我们这边》这部书里说道：“德国科学的退步其故安在一言以蔽之曰，国防科学而已。”英国政府给与科学研究的奖助金，物理科学十倍于生物科学，百倍于社会科学，虽是物理科学的设备比较昂贵，但是大部分理由还是因为物理科学与国防有密切的关系。美国的情形更为显著。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军部继续津贴各大学研究与国防有关的问题，每年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美金不等。可知英美科学家之讥笑纳粹德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此句中之“四千万”“四百万”“四十万”依据作者抽印本之本人手迹订正，原文分别为“四十万”“四万”“四千”。

国注重国防科学，亦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有若干科学与国防无关，如优生学、遗传学、社会学等，相形之下，不免被漠视了。有人说物理科学是基本科学，基本科学解决了，其余的科学可随以进步。这是不错，但是人生最值得研究的还是人。若人类本身不改进，还是贪多无厌的争权夺利，物质的条件无论如何优越，仍然不会有和平。原子核可被击破之理论发明以后，美国 Manhattan 计划集了几千个科学家的殚精竭虑，总算把原子弹造成了。近来遗传学上发现了包含遗传性的 Gene，亦可以 X 光来击破。若是人类的劣根性如贪污、残忍、凶恶等等的性情，亦是由基因 Gene 来遗传的话，若是这类基因也可以各个击破，若是这类基因排除掉以后，人类细胞仍能生活，则我们人类就有统变成廉洁、仁爱、和善的民族的可能，那世界上还会有战争吗？基因的分裂是不是比原子核的分裂有一样重要性而值得人们的注意呢？

总之，科学应该是平均发展的，不能以这门科学与国防有关才去发展他。假使我们要提倡一个特种目标，亦须选择对世界人类全体有益，于建立永久和平有助的才去提倡他。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会议去年十一月在法国巴黎开第一次大会，不久在墨西哥又要开第二次大会了。这个组织的约章里开宗明义就说“战争既发动于人心，故和平之壁垒，仍须建筑于人心。……仅以政府间政治与经济协商为基础之和平，不能取得全世界人民一致永久而又真诚之拥护，故欲维持世界和平于不坠，必须植基于人类知识上及道德上之团结”云云。若是各国竞来提倡与国防有关之科学，同床异梦，尔诈我虞，我们如何能得到知识上及道德上之团结呢？

4月1日 星期四 杭 即偕至体育馆参加第廿一周浙大成立纪念。

2. 大学教育与民主¹

（1948年4月1日）

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今天是本校成立二十一周年纪念日，也是本校前身“求是书院”创立五十一周年纪念日，我们在此时此地举行庆祝，不觉感慨万分。第一是现世界的局面，战争胜利后将到两年半，已分成两个集团，尔诈我虞，相互猜忌，因此全世界的人民，恐惧第三次大战的爆发，惶惶不可终日。第二是国内的局面，自胜利后，和平仍无望，原有的建设既遭破坏，而新的建设又复不易，生产停滞，人民凋敝不堪，学校的经济更是竭蹶万分，发展实感困难。但是，反过来说，目前的情形虽然坏，但并不是说已经到了不可药救的地步。我们应该认清楚，一个国家的基本，应该是人民具有刻苦耐劳的精神，爱好和平的热忱。中国目前的情况，艰难黯淡，但是远景却仍是光明的。要达到光明的境域，就需要教育，我们教育界的人，尤应坚信不渝，实地去做。十九世纪的美国 Horace Mann 曾经说过：“教育是黑暗中的明灯，也是茫茫大海中指示航行的灯塔。”中国古代教育家，在春秋战国时的儒家学说，是相当民主的。孔子说如“有教无类”，这充分表示出阶级与门阀观念的淡薄。但照现在的教育立场看来，儒教的思想也有其缺点，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从这里看来，孔孟之教，还把知识阶级与非知识阶级分而为二。林肯说：“没有一个人或一派人，聪明到一个境界，使他或他们可以不得别人的同意而来管理别人”，这比较更民主了。杜威教授在他所著《人生问题》第四章里（一九四六年出版），曾经说：“民主主义的基本信仰是一般人的智慧，可以由他们的经验做向导，而走向进步之路；集权主义则信智慧集中于少数领袖。”西班牙教育家埃忒古（Artega）在他这本《大学之使命》书里，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学的使命也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人类可以教育使其更迅速更坚定的来执行合理的生活方式。”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79期（1948年4月12日）。篇名与演讲时间均见于作者当日日记。

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人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径的。这种理论较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说更要精密些。办教育者要有此信心方能有毅力去实干。

在宇宙间，有两种很伟大的力量，一种是“爱”，一种是“恨”，这两种力量成立了民主国家与集权国家的界线。民主主义国家的出发点是“爱”，它认为大部分的人有良知的，其智慧集中在一般人身上；独裁主义国家的出发点是“恨”，它认为智慧是操纵在少数人的手里，不服从这少数有智慧的人就得被淘汰了。目前世界两个强国苏联与美国虽均以民主相号召，但他们行为的出发点却统以为智慧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脱胎于德国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就相信在历史上某一时代必有一个国家具有指导全世界人类的使命，因此他认为国家与国家的侵略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的学说把阶级争斗代替了国家争斗，但苏联的外交政策却时时表现了侵略的作风，如抗战胜利后，苏联之不肯放弃东三省沙皇时代所侵占的旅顺、大连与中东铁路之权利，即其一例。同时民主国家应以大多数人民之最大利益为前提，而美国的资本主义却使少数有钱的人独占其利。美国南方的黑人和黑白混种实际竟无投票选举之权。卢沟桥事变以后，美国一面贷款援助中国，另一面却以废铁、汽油售予日本，又表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政策。目前苏联和美国在欧洲与近东勾心斗角，一边以威吓，一边以利诱。再加以种族间的不调和，第五纵队的活动等，国际间的仇恨恐惧日深一日。要拯救世界，免除第三次大战使人类自趋于灭亡，惟有用爱的力量才行。但爱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曾经表现过有力量吗？

要知道爱在政治上外交上能不能有巨大的力量，只要看一看印度圣雄甘地如何以重不满九十磅，身无寸铁之一个匹夫，能把根深蒂固建立在印度达一百九十年长久的大英帝国殖民地，以不用暴力的方法来铲除他。能把世世不共戴天的回印两个民族的仇杀以绝食的方法来暂时停止他。甘地自己说他“一生最得意的外交是在牢狱铁窗下办的”。不少的人绝过食，更多的人入了牢狱，但是绝少人有像甘地那样〔把〕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事业做出来。甘地的成功不是偶然，他的原动力是爱。“爱你的仇

敌”是基督教徒的教谛，但一千九百余年以来，有几个基督徒能实践此教谛？甘地的确做到了。他曾经说：“宁使我信任一个人而被骗，不要存心不信任他。”所谓宁人负我毋我负人，所以甘地被刺以前，已有许多情报，更有人劝他防范，他尽力反对。到一月三十号甘地被刺客枪击三弹倒地以后，他还对刺客以手加额表示宽恕的意思，半小时以后，一代伟人去世。萧伯纳说甘地是千载一人，要拯救现在的世界，只要甘地那么几个伟人就行了。中山先生素来主张用王道而斥霸道。王道的力量是爱，而霸道的力量是恨，两千年以来中西的哲人如孔子、耶稣、释迦，莫不以仁爱立教。而世界到现在还充满了仇恨、残暴和妒嫉，霸道横行。这还是因为仁爱的教育没有普及之故。大学是培养未来各界领袖人材的地方。办教育者，该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使大多青年学子，能剔除猜忌、妒嫉、仇恨的心理，而热烈的依其理智求本身学问品性的进步，以达到日后为公众服务的地步。惟爱的教育能普及，世界上方会有趋于永久和平的希望。

现在讲到浙大本身，自从抗战以来，十一二年中学校虽日在颠簸困苦之中，幸赖各教授同事的努力，研究和教课两方面均勉强维持，过去中央研究院《科学纪录》中所发表的文字，浙大教授独多，近来研究院第一次选举院士，浙大教授有四名膺选，仅次于北大、清华。浙大的毕业生在各界服务素来以负责著称，本届中央建设人员高等考试，与考者一千零八十四人，取了八十八人，浙大占十一人。考取公费及奖学金赴欧美者亦日多。英国牛津大学近来并承认了我国七个大学，其毕业生中之优秀者可以直接升入牛津的研究院，浙大即为七个大学中之一。所可顾虑者，教职员同人待遇菲薄，尤其人口多者，入不敷出，不能维持生活，不得不写文稿甚至兼旁的职务来过活；薪水最高的教授，一月所得以购买力来计算，仅仅抵到战前三十元之数，这如何能使人安心教课与研究。为了政治上的不安定，学生时时又罢课，损失学业甚大。古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大学生。大学生〈而〉关心国是也是应该的，但不能以罢课作为要挟的一种工具。过去一年中浙大罢课的时间，竟达八星期之多，即是上课时间的四分之一。这种荒废学业，凡是关心

教育的人，统引为极痛心的一桩事。我们从过去看到未来，如何改善师生的生活，而得到大学的安定，是目前大学教育最迫切的问题。

10月29日 星期五 杭 六点半偕季梁至工学院大礼堂召集一年级生谈话，到二百人之。季梁介绍后，余报告浙大行政之组织及校训“求是”之由来与意义。

3. 对 1948 年应届新生的训话¹

（1948年10月29日）

今天很愉快，得和诸位聚谈一堂。

第一点，欲言者为大学中学间之分别。大学之特点为大，非仅包含学科众多，罗集万异，即以人言，亦称特殊。今年虽限于招生困难，房屋不足，然同学亦有三市十四省者，苟相聚而谈，无异亲游各地，所得必多；且贫富有殊，环境不同，交换意见，所知益广，此在本身即教育。

第二点，欲言者为大学之使命。扼要而言，可分为二：1，养成专门人才，以备来日作医师、教员、工程师及进研究所、办集体农场等用。2，培育良好公民，作中流砥柱，社会领袖，为大众谋福利。大学一二年级中，工学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系院，庶几智识广博，而兴趣亦可盎然。

第三点，为文理学院之分别。理学院等注重在于智识，凭记忆及努力，由方法得结果，一一变化，步步而来。文学院则相反，不重记忆，重价值高低。《大学》中“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寥寥数语，可尽此意。近年政府奖励理工甚力，留学就业，均沾便利，致使学生几有尽趋理工之势。然吾人不可不自察趣味所在，以免天才埋没，终身苦痛。

第四点，关于浙大本身。构成学校要素有三，人为先，图书仪器次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本文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67号（1948年11月1日）“校闻”栏，原文篇名为“竺校长对本届新生训话记详”。文末署名“田孝桐”。

之，房屋则又次之。剑桥大学物理研究所名闻于世，此无他，J. J. 汤姆生、J. 龙纳出于此，世界物理权威七十余人出于此，人之要素健全所由。浙大房屋，虽较其他均不如，然当年上述名校房屋亦陋，深愿大〈众〉〔家〕青出于蓝。

第五点，关于世界大学之起源。依性质不同，大学起源，可分为二：一为意大利大学，由学生举办，以学生为主体；一为法国巴黎大学创自教授，以后剑桥、牛津等大学均仿此。我国大学始于汉武，历唐宋明清不衰，然民主之风甚鲜。大学宜民主，固甚彰明，惟民主有先后，当自教授始，如此可冀各安其位，爱校胜己，历十载五十载以至一生工作于斯。学生时间较短，故宜采取教授治校。

第六点，述及浙大行政机构。最高机关为校务会议，包括校长、各院长、总务长、训导长以及大多数之教授代表（每年选一次），每月举行一次会议。校务会议下为常设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以决临时问题。再下即为聘任、预算、监务建设、校舍、出版七委员会，分掌各项事宜。此外尚有教授会、讲师会、学生自治会、各级级会以及员工会等。如各会决议有冲突时，自取校务会议为准。

第七点为浙大起源史。浙大迄今已历五十一年。前身为求是书院，创自光绪二十四年，继之为文理学院、甲种工业以及乙种农业〔学校〕。迨民国十六年，始蜕变而成国立浙江大学。本人至此，尚仅文理工三院，日后逐加扩充，以至今日之七院，今后自当一秉前志，以成其大。

最后，为浙大校训及校歌。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利害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学始祖首推哥白尼、伽利略以及勃利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先哲王阳明氏有言：“我心以为为是，虽千万人非之而不改；我心以为非，即孔孟是之而不易！”壮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深冀诸位效之！浙大校歌，辞美曲高，唯歌之甚难，近有增创一曲之议，惟在未另创前，自应不畏艰难勤习之。

〔辞毕，复再三致意师生多接触交换意见，以谋融合，叮咛同学身体

宜保重。〕

1月16日 星期日 杭 九点至机工实验室参加杭州科学工作者协会，欢迎新会友及新自美国归来监事王淦昌先生，并讨论如何应付目前变局问题。黄焕焜、任雨吉、洪鲲代表理事会为主席。到新社友徐洽时（塘工局）、陈瑞炘（烈忱）（电厂协理）。首请王淦昌报告美国原子能近况。知原子能研究中心有三：（1）在 U. of California 之 Radiation Lab 加州大学之辐射实验室，正在建造 10 billion volts 之 Bevatron 100 亿〔电子〕伏之加速器；次（2）为 N. Y. 美东方九大学联合组成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之 Nuclear Reactor 核反应器，即 atomic pile 原子反应堆，地点在 Upton, Long Island。九大学有哈佛、耶卢、哥伦比亚、Princeton、Rochester、Cornell、Pennsylvania、Johns Hopkins 及 M. I. T.。最后讲科学工作者在患难中应有之精神。次余讲科学工作者之应为人类造幸福，战争之应该努力避免，与永久和平之并不一定不可能。次以指鹿为马为例，以为科学家不能埋没事实，须以真理为依归。

4. 科学工作者应抱坚定之立场，追求真理¹

（1949年1月16日）

科学工作者在目前此种局势下，不但要在物质上应变，而且要在精神上应变，就是说，科学工作者应抱坚定之立场，追求真理。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决不指鹿为马，抹杀真理。

六、离开浙大前的主要活动

随着时局的发展，竺可桢做校长遇到各种困难。一是物价飞涨，经费短缺，他不断地找教育部要钱。二是学生运动不断，很使他头痛，他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摘自《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 104 号（1949 年 1 月 19 日）“校闻·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座谈会志盛”。篇名为编者所加。

夹在当局和左翼学生运动之间，左右为难，多次提出辞职，当局不允。他在校长的岗位上艰难维持校务，认真负责，尽忠职守。难！

（1948年）3月28日 星期日 杭 作民国廿七年与卅七年教职员与学生之比如下：

按学生人数以廿五年为最少，541人，卅四年最多，2710人，相差五倍之多。职员人数除医院外民卅七年实只140人，故为二倍，非三倍也。表中教员与学生之比廿七年为1:4.8，卅七年1:5.5，但若将医学院除去则为1:6.0。理学院之比例特低，卅七年为1:2.2，而工学院特高1:8.9。实际二者应加以平均，因理院教员不少教工学院学生也。最可注意者法学院之比例为1:11.2，师院为1:8.8，而医学院则目前教员与学生之比为1:1.6。经费方面甚难有精确之比例，一则因经常费实际只占学校极小一部之经费，如卅七年一经常费为二亿九千万元，但生活补助为四十七亿，即生活补助费为经常十六倍也，如照此数则经常费比十年以前增十万倍。教员薪水战前最高360，本年最高六百元者，以八万五千倍计最初卅元，尾数八千五百倍，可得七百四十万元即二万倍也，但物价则已卅万倍矣。

6月22日 星期二 [南]京 参加南京浙大同学会……余即席致辞。首述学校为社会之缩影。因政治不安定，所以学生喜作政治活〔动〕，但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二述办教育者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学生青年多不满现状。三述办浙大之方针：（一）教授治校，（二）求是，（三）法治。

7月5日 星期一 杭 浙大第廿一届毕业典礼，……首由余致词，述本校历史后，并谈及本校设备情形，如书籍全校不过西文书三万、中文书六七万，而西方大学如哈佛有五百万本、东京帝大一百廿五万本，早稻田亦六十万卷。房屋尤为缺乏，如今日之礼竟须在破旧不堪雨操场举行，而此雨操场可以举头自隙中看到青天，不能蔽风。最后勸学生以自力更生。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以白米面包，但吾人生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

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故自强不息实为目前之急务。

10月20日 星期三 杭 请适之在校演讲。适之“自由主义”讲演中引用王安石《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第四云：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十一点允敏与松松赴新新旅馆约胡适之来校。十二点适之偕郑石君¹来，并约步青、阮毅成、丁庶为夫妇、振公、季恒、晓峰作陪。中膳后方一点，在院中拍一照留纪念。严仁赓、丁绪宝夫妇均来。一点半，适之偕晓沧、晓峰至文学院。二点约适之在体育馆演讲，题为“自由主义”，听者八九百人。听者大部均驻足而立，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适之小余一岁，近来人甚肥硕，但演讲时已汗流浹背矣，因下午相当热也。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二点讲至三点廿分。



胡适应竺可桢之邀到浙江大学演讲。

图为在校长公舍前的合影，由竺可桢摄于1948年10月20日。

左起：诸葛麒、郑晓沧、张其昀、陈淑、胡适、陈汲、孙恒、郑奠、阮毅成、丁绪贤、苏步青

10月16日 星期六 杭 浙大现有学生1800人，附中500人，教职员（742）合眷属2800人，校工合眷属900人，合6000人。每

1 郑奠（1896—1968），字石君，浙江诸暨人。时任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日每人七合米，每天要米四十二担（米限价廿元八，黑市五十六元）。每月学生需十万斤柴，老虎灶亦十万斤（限价一分六，黑市倍之）。油每人月十二两，即月 1350 斤，限价 65，黑市一倍余。



与浙大同人在校长公舍前合影（1948 年）。

立者右起：竺可桢、王国松、沈思珪、李今英、陆子桐、蔡邦华、谈家桢、王璉、孙祥治、孙恒、吴定良、董伯豪、张其昀、朱正元、顾谷宜、张其楷、李浩培、杨耀德、苏步青、贝时璋、陈汲、朱庭祐

前蹲者右起：杨其泳、舒鸿、余坤珊、谢家玉

10 月 30 日 星期六 杭 午后三点开校务会议。此为本学期第二次，但新选之评议员为第一次，计此次当选者：顾谷宜（48）、李寿恒（46）、孟宪承（42）、储润科（41）、杨耀德（39）、诸葛麒（39）、吴耕民（38）、贝时璋（37）、钱宝琮（35）、江希明（34）、陈鸿逵（34）、何增禄¹（34）、吴定良²（32）、严仁赓（31）、李天助（28）、赵之远（27）、陈建功（26）、束星北（26）、谈家桢（26）、戚叔含（25）、萧辅（22）、吴钟伟（19）。今日大半时间在讨论粮食、柴、油问题，决定储半月之粮，并由总务与训导与教授会、讲师助教会、学生自治会等随时取得联系。

12 月 4 日 星期六 杭州 午后三点开校务会议，到者四十余人，讨论应变方针。教授会提出即派人赴教育部要应变费，并要余至京。余答应前往，但须有人同往，以便留京坐索。因今日曾打电

1 何增禄（1898—1979），浙江诸暨人。物理学家。时任浙大物理系教授。

2 吴定良（1893—1969），字均一，曾用名吴士华，江苏金坛人。人类学家。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浙大人类学系主任、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话与唐培经，谓教部正在筹划拨给各大学两个月经费以应变，但是否能通过行政院不可知。故今日教授会束星北¹、储润科提议，通过此提案。余谓此时赴京索款非短期内所能生效，必有人同去，预备留京一相当时期始可。以后有人赞同刚复去，亦有赞同仲翔及家玉。但仲翔总务事一时亦不便脱身，而家玉则割治痔疮不久，后日又要割鼻子〔鼻子手术〕，故事实上均有困难也。次讨论迁移问题。决计暂时不提，亦不提前放假。惟休学申请之期已到，决计延期二周。准学生仍可休学，到目前为止不过四五十人，比平常时相差不大。刚复提出在非常时期大学应当担任何种工作，讨论后即散会。

12月22日 星期三 杭 开行政会议，通过节省印行讲义，及节电委员会所通过各点省电办法。余并报告明日决计去京，因新阁业已组成，教育部长已易人，而复有迁移、合并院校之议，并索一至三月份之经费，将其寄杭中行以备不时之需。

12月23日 星期四 自杭至沪 家声来报告，谓有学生来见余。余洗盥后下楼，见有学生约一百余人，由向惟浚报告，谓学生不能安心在校读书，怕余去京后有危险或不回。余告以不能不去，因迁校问题虽校中不愿提，但教部有否办法不能不面询，且一、二、三月份之经费亦未到，不能不去索。但学生中曾有要余不去者，余颇愤慨，告彼等：汝等不得包围校长室使余失去行动自由。余今日必去京，否则余不负学校之责。彼等大部散去，尚留二十余人。余再与彼等谈十分钟，乃早餐。学生推向惟浚、吴大胜与余同往。余谓渠等二人往京，余不反对。

12月27日 星期一 杭 三点开行政会议。报告去京之经过情形：（一）政府并无令各大学迁移、合并之意；（二）教部发卅万元，连银行透支尚存二十余万，勉可以发一月份薪水。至于一、二、三月份经费支付书，向例每年年初均略迟延，大约于一月初十边可到云云。

1 束星北（1907—1983），江苏扬州人。物理学家。时任物理系教授，为浙大教授会成员。

（1949 年）1 月 6 日 星期四 杭

浙大教职员人数

| 教授 | 副教授 | 讲师 | 助教 | 教员（共） | 职员 |
|-------|-----|-----|------|-------|-------|
| 144人 | 62人 | 63人 | 128人 | 397人 | 230人 |
| 22.9% | 10% | 10% | 20% | 62.9% | 36.8% |

1 月 11 日 星期二 杭州 三点开校务会议。余报告学校经济近况。个人方面四百元一月之薪水，依十一月份之收入十五倍计，只能得 1700，而昨日米价已 1600 一石。学校方面每月经常 12,000 元，而电费（十二月）已十二万五千元，水二万五千元，柴六万元。汽油用 750gallon，目前每 gallon 一百元，即七万五千。四项共廿八万五千元，全靠生活补助费余额及中央银行借到六十万元渡日，如此安能长久耶？次讨论本届毕业生 53 人之学业。组织安全委员会，暂定七人，推定四人为顾倬南、严仁赓、胡刚复、蔡邦华，三人由余推定。讨论经济改进办法。决定电行政院教育部告急，推王爱予、张晓峰、孙祥治三人起草。

1 月 22 日 星期六 杭州 四点开校务会议与安全会联合会议。余报告学校经济状况，谓今日将二月之十五倍薪给发后，学生公费二月份每人 280 元发出后，校中向中央银行所借之一百卅余万元悉数用罄矣。昨已打电与谢家玉即时进京，并电话唐培经拨款。次刚复报告安全委员会之组织，有住宅、粮食、救护、消防、警卫、情报联络、交通、水电、总务等各组。次讨论教务处提出 Fellowship 出国研究员人选，计 Rockefeller Foundation Fellowship 洛克菲勒基金研究员有 Biology 生物学，有朱润、孙羲二人，历史组有徐规、胡玉堂二人，又 Segram Fellowship 塞格兰姆奖学金有化工朱培真、谭天恩等七人。二种奖金均交升等委员会选择决定。

2 月 7 日 星期一 杭 上午晤顾倬南，与谈训导长事，因步青决辞而江希明不肯就也。渠荐蔡邦华，余以蔡已任农学院院长而又兼安全委员事，故事已忙为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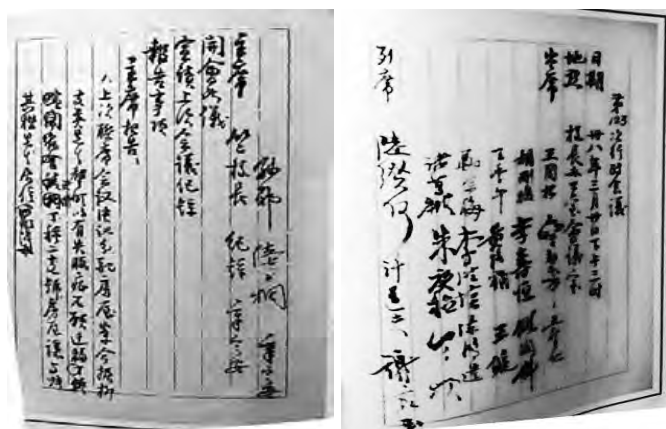
下午三点开校务会议，讨论经费问题。自三点半直至六点半，三小时之久，无非大家诉苦而毫无结论。目前已收到之经费为 1—6 月份（八月份经费）六倍，即 36 倍（ $36 \times$ 八万）。但一月份发双薪，已去卅倍。二月份发十五倍。三月份预支十倍。若中央〔银行〕再补足 1—6 月各九倍，为 54 倍，加一月之双薪，为十五倍，合 69 倍，约等于六百万元之数。如补发，每个教员尚可得 50 倍，亦不过六千元，等如一担米价而已，可知数目之小。而进小学之学费即需一担米也。余允于日内去沪，与上海各大学取得联络。

3 月 19 日 星期六 杭 三点开八十一次校务会议。余报告校中近况及目前最严重问题为经济、校舍及毕业生失业问题。教务处制造学生到校（本学期）如下，其中包括五十二名借读生。

| | 男 | 女 | 共 |
|------|------|-----|------|
| 文学院 | 196 | 59 | 255 |
| 理学院 | 141 | 43 | 184 |
| 工学院 | 601 | 10 | 611 |
| 农学院 | 166 | 36 | 202 |
| 师范学院 | 58 | 24 | 82 |
| 法学院 | 140 | 7 | 147 |
| 医学院 | 44 | 13 | 57 |
| 总 共 | 1346 | 192 | 1538 |
| 一年级 | | | 244 |
| 二年级 | | | 316 |
| 三年级 | | | 416 |
| 四年级 | | | 532 |

3 月 30 日 星期三 杭州 下午三点开行政会议。谈经济问题一小时余。今日报载江浙一带本月份公教人员薪给将照二千七百倍发。但广州教育部廿八号尚来一电，谓三月份照二百廿五倍发，此真可谓矛盾矣。昨日上海物价大涨，因中行发行五万、十万元本票之故。次讨论四月一日校庆节目。最后讨论湘湖农场杨行亮被人告

发贪污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王国松、蔡邦华、王葆仁、胡刚复、李寿恒、储润科、王季午、黄培福（会计）、王璉、郑宗海、李浩培、陈鸿逵、诸葛麒、朱庭祐（仲翔）、竺可桢。列席：陆纘何、许道夫、谢家玉、孙祁、陆子桐、章定安。

4月1日 星期五 杭州 廿二周成立校庆，上午开会，会后植树。上午九点起校庆。九点十分即开始，到学生、同事四百人。余报告一年来经济近况。（讲演《对于中国大学使命之检讨》刊于4月8日《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副刊新128号）

（一）浙大成立应变委员会

为了应对时局变化，浙大于1949年4月成立应变委员会，由安全会代表、教授会代表、讲师助教会、学生自治会和校工代表等组成。

1月7日 星期五 杭州〔补记：吴大胜为学生应变委员会〕……接钟仲襄来函，知武大因军事机关强欲其早日结束，故已组织一应变委员会。……四点约学生所推举之应变委员会来谈话，到刘景善、沈效良、寿纪仁、吴大胜、包洪枢、卢婉清（尚有戴知

贤、蒲代植、张申、杨锡龄、宁奇生五人未到)及步青、斯大诸人。

4月24日 星期日 杭州 成立浙大应变委员会。……晨七点李季谷¹来,知昨日省府会议决迁省府至宁波,半数职员给三个月一万倍薪迁散,余给二个月薪分别先后去甬,周奉璋主席将最后走。又谓国军均向沪撤,或去杭绍公路,故杭城已无兵士,惟京杭国道上有少数自京退下之军属家眷耳。

张晓峰来商渠去就问题,据云王东原来,曾与渠谈,劝渠离杭,谓必要时可以飞机相接。余劝渠不必如此惊动。为校着想,渠去系一巨大损失;为渠个人着想,则或以离去为是,因若干学生对渠不甚了解也。余劝其乘车去沪,不往宁波,因沪上友人甚多,可从长商酌也。

八点半开会,到安全会代表三人刚复、邦华、劲夫,教授会代表三人严仁赓、苏步青、顾倬南,讲师助教会三人谭天锡、黄焕焜、任雨吉,学生自治会杨锡龄、包洪枢,校工代表周士俊等,又安全委员联系各组主任杨鸿材、高尚志(职员会陆子桐、赵凤涛、陆绩何)等。余首先报告。为应付环境,急须加强安全委员会之组织。讨论后决定名称为“浙大应变执行会”,推定主席团七人。余以今日林社祭林迪臣太守,浙大本年为东道,照例应到会,故先离席。后知会中决议,以严仁赓为主席,苏步青为副,余名仍在主席团之列。

4月25日 星期一 杭州 下午开应变会执行会,知应变会现有储粮费购豆215担,去黄金24两;米310担,付廿八两,又100担,计九两;再由学校购柴十五万〈担〉(斤),算十两,米五百担,算四十五两。应变委员会原有黄金二百廿两,现〔用去〕116两,以45两拨归校中经常费项下。此外应变会尚有美金四百元。会中讨论,农学院学生搬入后,校工亦起恐慌,故每人借给白米二斗五升。储粮费内拨若干为应变费。

4月26日 星期二 杭州 下午亦在会中报告,应变会中与经常之经费必须分开,校舍支配与各种职权必须分明。因昨晨尚有人上

1 李季谷(1895—1968),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课，今日已全部停顿，余以上海捕人情形，嘱学生自治会敦促学生明日复课。至晚包洪枢来，谓接广播，谓上海七校大捕学生。余告以交大确有此事，被捕八十余人，但谓杭州不预备抵抗，可以安心。

4月27日 星期三 杭 下午开校中行〔政〕会议。请蔡院长出席杭州应变委员会。……杭州市参议会召集杭市应变委员会，请邦华前往出席。三点开行政会议。余报告校中混乱情形，如廿五号以来之停课，及学生之迁移房屋等事；出纳工作之严重等问题。决定五月一日起恢复夏季时间；预备以米五百担、柴十五万斤转让与应变执行会，作价五十五两，其中以二十两作为应变费。关于上课问题，促中学与农学院仍在华家池，并将北教室与大礼堂外之教室全行空出。晚郑石君来，余请其暂代文学院院长，并告余以《晚报》消息，谓上海各大学已被解散。

（二）竺可桢结束浙大校长生涯

竺可桢1936年4月下旬正式履职浙大校长，历经抗战西迁，于1946年带领浙大返回杭州，把浙大从一所地方性大学变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政府迁广州。教育部来电要竺可桢去沪。竺可桢认为“来电去沪，则表示余已可离校不负责，亦等于准余辞职矣”，决定离校，结束了13年的浙大校长生涯。

4月28日 星期四 杭州 晨邦华来，以市政府转来杭立武之电相示，谓“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杭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即嘱振公拟稿复去一电，谓“沪校被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杭（密）”云云。但晚间闻郑石君云，李季谷告彼，谓今晚七点开省务会议，周奉璋嘱彼与陈宝麟可于今晚或明晨先期离去；谓渠与保安司令决无入浙大捉人之意。余心为之大安，但从此亦决定余不能不离校。因杭〔立武〕既来电，嘱余去沪，则表示余已可离校不负责，亦等于准余辞职矣。晚间曾与顾倬南商谈久之。……四点回，参加校中之应变执行会。

4月29日 星期五 杭州 下午二点离浙大，姚维明同行。二点半至城站，三点半在第七轨道上火车，晚十一点余火车始至月台，近子夜开出。

晨五点半即起。作函与苏步青、严仁赓二君，又留书与振公。因余觉部中既有电嘱余去沪，余虽复电谓师生见沪上报载疏散十五大学莫不震惧，但昨晚郑石君已谓省府决无来浙大捉人之意，故余已无留浙大之理由。兼之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主席，故余若再留浙大，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暂时避开。不料晨间又接杭立武电，谓有要事相商，速来沪云云，因此余之地位遂成 untenable，不可避免的要离杭了，否则只能辞职离校，但后一着亦须离杭遂行。于是再四思维，不得不出之一走。

.....

与允敏、松、彬、宁等中膳后，即于二点离校。约姚维明同至车站。余等各以六元袁头购头等票。原定二点半开车，但到站时不但车中人已满，且车厢上亦坐满人。余等以挤不上，已回头，继思何妨一询站长。至站长室则朱酒仙等早已离去。余等询站长无结果。待一小时，原定 2:30 开之车始行，是为 23 号。站长谓 26 号已进站，在第七轨道。遂与姚维明至第七轨。车中人极少，余等即各占头等车位。坐定后，精神为之稍宁。自四点至六七点，车中陆续有客来。初为老百姓，继而大批兵士。七点左右座已满，但车仍不开，极焦灼。车轨上均满塞车厢，第八轨上有厂车多辆，满载军士家属，行李堆积如〔山〕，男女均在大雨中，衣裤尽湿，乃至车厢下引火干之。直〔至〕晚十点廿分，始有龙头〔机车〕来接余等车。

（附）致严仁赓、苏步青先生函〔离杭情由〕¹：

仁赓、步青先生道鉴：

昨晨邦华兄交来市政府电台所接杭部长一电，嘱弟即日去沪（电稿内附），使弟可释重负。适因前日报载上海各大学有逮捕学生及强迫疏散

1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据原竺可桢研究会藏件入编。

之消息，本校同事同人不免人心惶惶，故弟接电后即复一电（由振公秘书拟稿拍发），谓暂难来沪云云。昨晚遇石君先生，谓顷间教厅李厅长见告周主席，已面告并转嘱保安司令王云沛，谓渠等负责期内决不入浙大捕人，弟心为释然，但从此弟亦不能再事恋栈。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一切交代手续已托振公秘书办理，临别不胜依依。专此，即颂道安。

弟 竺可桢 顿首

卅八年四月廿九日

执行委员会诸先生均此

又启者：执行会重要职员如警卫组主任等必须住入校内，想兄等亦早见及，但急待实行耳。桢又白

4月30日 星期六 杭州至上海 十二点半车到西站，余与维明自窗口跳出。出站时因军警要上海身份证，颇有刁难。余打电话与陈君衡¹，再与警交涉始得出。乘三轮车至岳阳路，遇陈君衡。余即打电话与谢觉予，知范绪箕、来虔等四人已于今午向中央银行提到六十三亿赴杭。余乃〈将〉〔从〕中央研究院送姚维明赴北站，嘱告允敏余决不去台湾或广州。三点偕陈君衡晤杭立武于570号建国西路。渠嘱余赴台湾或厦门，余均不允。

七、离校当年提及的浙大相关事宜

竺可桢离开浙大后，拒往台湾，亦不下广州，回中央研究院任职。但他仍然十分关心浙大的发展。

1 陈宗器（1898—1960），字步清，号伯簠，又号君衡，浙江新昌人。地球物理学家。时任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常委兼上海办事处主任。

(1949年)5月1日 星期日 上海 晤子政,渠适在公司,遇钱逸云及樊蜚君之夫人,谈片刻。知子政方踌躇是否随中央航空公司飞广州、香港。余告以公司与政府性质不同。如余为浙大校长,故有部令不得不过来沪。公司为营业性质,是否随公司迁移,乃道义上之问题也。

5月2日 星期一 上海 八点至街上购烧饼充早点。见《新闻报》载钮永建¹、竺可桢飞台湾之消息,见之使我[大]为惊惶,不知此消息之何来。缘张默君确于卅日乘坐考试院专机赴台北,钮永建亦在内云。回寓。张晓峰来,知其已上轮将赴广州,其夫人与公子张镜湖均在轮上。适闻市政府接到一电,嘱去取时,轮船已过启碇之期。数日不开,晓峰以为有时间可以上岸,不料取电回来,而轮已离埠,尚得与其夫人相见,遥遥招呼云。陈叔谅来,知于四日前由宁波来此,渠或将去台湾。……又遇晓峰,立武正在搬家,似日内即将出发者。渠仍劝余去台湾,且谓办护照须在广州云。寄步青、

(附)致严仁赓、苏步青先生函[告未去台湾]²:

仁赓、步青先生转浙大同仁同学道鉴:

昨接惠电藉悉一一。此次事变,桢原拟维持学校至最后一小时,叠接部电,使桢不得不提早离校,接第二电更不得不过来沪。于狂风骤雨中仓皇出走,抛十余年共患难之友朋、生徒、妻子于不顾,此中苦心想均在台端等洞烛之中,必能见谅也。现桢已向部辞去职务,回中央研究院任事。报载(今日上海各报)昨桢已飞抵台湾,近代物理学尚未发现分身之术,兄等置之一笑可耳。专此,顺颂
近安

弟 竺可桢 顿首

卅八年五月二日

1 钮永建(1870—1965),上海人。历任国民政府秘书长、江苏省政府民政厅厅长、省政府主席、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等职。1949年赴台。

2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据原竺可桢研究会藏件入编。

5月6日 星期五 沪 与朱恒璧¹偕至其市府街寓所，途遇蒋经国。上海医学院又领得周转费七十亿，据云各校支票均已开好。余以浙大亦必有款，而杭州路已不通，是否领出大是问题。回院后商之君衡，君衡主张领出。打电话与觉予，未通。不久觉予来，余嘱其向教部提取五月份周转金计二百五十四亿。但觉予去交涉之结果，谓须在广州支取，但在上海无款付栈租运费及关税。杭立武昨始去广州，而前两天尚在寓谈此经费事，家玉亦在坐，竟不提起周转金事，怪哉！

5月7日 星期六 上海 作函与黄尊生及杭立武，为浙大驻沪办事处需款办理仪器进口手续，故余托尊生转交杭立武一函，嘱寄袁洋五百之数，寄与谢家玉，以便办理其事。

5月8日 星期日 上海 九点余觉予来谈，为浙大本月份周转金二百五十四亿余〔事〕。但杭州于五月三号失落，而五月六日此周转金始可提取。教育部于事先关照，凡沦陷之学校不能支款。故浙大二百五十四亿（约六千袁头）之数虽已确定，而家玉至教育部去交涉时，谓非经部长允许不可。余知此事关通例，不可争。但浙大在沪办事处陆续须提取仪器，目前有三种即需九十五袁头，故于昨函杭立武，嘱寄五百袁头至浙大办事处。九点三刻刚复来，渠意此款不应放弃，故应向教部留沪办事人程柏庐、钟道赞诸人要求将二百五十四亿之款拨出。但余反对如此办法，因教部规定，凡沦陷各校不能支款，则浙大何得独异？且如此巨款支出后何以送往杭州？万一有意外，则余个人之责任太重。

5月16日 星期一 上海 十点家玉来，适晓峰自广州有来函到。余即启，示家玉，知余前函向部要款五百袁头，以为在沪浙大办事处提取仪器物件之用，教部将派郑君来沪，可酌量给款。但吴士选之意，物件以运台湾为是，殊不知运费之大可以惊人。药物、化学二系，近有六十九箱仪器。自码头运至长宁路中央研究院，计要美金180元，连报关等费用一切在内。中和公司为王淦昌提取照

1 朱恒璧（1890—1987），字亚完，江苏阜宁人。医学教育家和药理学家。时任上海医学院院长。

相器二件，款由家玉垫付始得提出。红十字会送校中之药品亦存家玉处。如沪杭能通，即可运杭也。

5月17日 星期二 上海 日中亦不断有炮声。下午稍多，黄昏继续不绝。子夜十二点有炮声，使屋宇震动，迨明晨不止。九点半家玉、刚复相继来谈。刚复坚主张将五月份透支浙大部份二百五十三亿设法取出，谓如教部不允，可向上海政务会议设法。余极不以为然，主张可以向教部办事处争，力争而不得，则适可而止。浙大不能向上海政务会议要款。上海政务会议有陈良、毛森、雷震（傲寰）、谷正纲、方策诸人在内，渠等当然不会管浙大之经费问题。如欲向广州要款，则以信件来往为止，余不愿为此事专跑一趟广州。谈半小时，家玉出往教部交涉。

中午时得孟真自台北电，嘱赴台大。余将函复辞谢。因余十四年长浙大，若欲重执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温习、静读不可也。

5月19日 星期四 上海 晨接杭立武自广州电，云：“请与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并闻。弟杭立武辰巧”云云。

5月26日 星期四 上海 解放军由吴淞、江湾开入虹口，上海全部解放。

5月28日 星期六 上海 上海市长陈毅，副粟裕、曾山、潘汉年、韦悫。杭州市政府成立，市长谭震林，副张劲夫。

5月31日 星期二 上海 沈鲁珍、谢家玉、钱源泉来。沈、钱二人于昨晨六点由杭州出发，乘汽车，经乍浦、闵行而来。桥梁均经毁坏，故于晚九点始到云。钱源泉并带有允敏、振公及润科来函。系廿九日所书，时余廿五日寄出给允敏函尚未到也。据来函及沈、钱二人之报告，知杭州一切安好，并无轰炸城站及浙大之事；并知五月三日杭州之解放极为平安。学校尚未接收，但照常上课。每人曾由文教处发三千元之人民券，教授与校工一律待遇。校务会议

常务委员为蔡邦华、王劲夫及谭天锡三人云云。¹……振公函则谓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如此信固确，乃真不幸之事，因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

6月1日 星期三 上海 中午时浙大航空系教授梁守槃来。渠一月多未去杭上课，荒去甚多，定明日乘汽车赴杭。余托其带允敏第五号函。并嘱转告诸同仁、同学，以目前已就研究院事，一时难脱身，俟交代时当来杭；目前只可由委员会偏劳。

6月2日 星期四 上海 下午钱源泉来，余交与信三通带杭州。

（附）致王国松等函〔不回浙大〕²：

劲夫、邦华、天锡诸兄并转浙大诸同仁同学道鉴：

解放以来，叠接诸同仁诸同学惠赐函电，促弟回校，至为感激。惟弟自四月三十日抵沪以后，即向部辞去校长职务，故不遵部飞台湾之命，径返中央研究院任事。一俟军管会对于接收浙大办法定后，弟自必返校交代。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幸赖同仁维护，同学之协助，学校得以撑持。近则弟已年达耳顺，精力日衰，不能更应付繁剧，自当退让贤路，使年富强力者出而主持，则浙大前途庶可无限量。承同仁同学来函推许，且感且愧。尚乞转达愚衷，恕不一一作复。专此，顺颂
教安

弟 竺可桢 拜启

6月8日 星期三 上海 觉予交来允敏来函。知浙大校内壁报说我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澈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

1 据《国立浙江大学日刊》5月6日（1949年）报道，由临时主席郑宗海主持，在5月4日召开临时校务会（第一次），推举校务会议常务委员为蔡邦华、王劲夫及谭天锡三人，蔡邦华为主任委员。

2 《竺可桢全集》编者注 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54号（1949年6月8日）“布告”栏内。在信前记有“接竺校长来函一通，公布如下校长办公室（六、七）”。

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

6月19日 星期日 上海 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成立。……今日《解放日报》载第一届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将于七月十日在北平举行。邀请出席人员共254人，浙大有王季梁、王淦昌、苏步青、蔡邦华、贝时璋、程孝刚六人。是会为建国、生产与科学之关系，所包为自然科学与农、工、医，故研究院之院士（自然科学方面）均被邀请云。此预备会如与正式会议相距四十天之久，则时不免过长。

7月1日 星期五 上海 得允敏六月廿七日寄函。她怕我回浙大，说我若回浙大，她就要分居。这理由我真不懂，因我将希文劝我回浙大的信寄了去。我即回No.20信，说她看得太严重了。

7月3日 星期日 上海 午后二点浙江大学同学会上海分会召开年会，在永安公司大东酒家三楼鸾凤厅举行常年大会，要求是书院、浙大、工专等师长、同学出席。到求是、浙江高等学校、工专、农专及浙大毕业同学六百余人，为历来浙大同学会少有之盛况也。推陈悟皆主席。致词毕，……次余报告杭州及浙大解放情形。

7月5日 星期二 上海 电机系毕业生东阳人郭桂庭来，谓前天浙大同学会讨论事务，决计挽留余返校。并派郭桂庭、陈悟皆、胡鸣时等赴杭，与在浙大同人商量挽留余之办法。余表示决绝不干，并谓余在浙大十三四年，自四十六以至六十岁，实为余之壮年时期。现已达衰老，应让余退休。因大学校长职务繁重，非老朽如余所能胜任也。

7月17日 星期日 北平 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浙大校友会。到季梁、淦昌、邦华、时璋、步青、仲圭、王序及蔡昌年、丁邦年、贾锡龄、吴祖光、沈自敏、吴祖基、陈畅铭、刘达文、孙志远、邓恢煌、严钟豪、杨德岩、萧连川、王华俭、宋剑行、徐学镛、赵塘孙、雷引（谷长碌）、习林、胡焱、纪纫容、裘克安、黄宗甄、董维宁、蒋弘彬、张鸿漠、刘泰、盛家廉、郑长庚、戴昌楫、沈宜春、尹莘芸、李酉开、刘斌、赖兆亨、萧赋诚、赵梦瑞、杨珺、胡永畅、

王郑德、范崇武等。由吴祖光主席。膳后即在廊外谈话。由裘克安、蔡昌年、戴昌楫、吴祖基等诸人讲话，要余回浙大。余甚为感动，回答时余几不能发言。邦华、步青、淦昌、季梁等亦各有致词。由裘克安之提议，发起签名运动，要余回校。

7月29日 星期五 本溪赴抚顺，停沈阳过宿。

补记：七月廿九日《浙江日报》发表浙大校务委员为刘潇然、严仁赓（教务）、范绪箕（总务）、孟宪承（文院）、贝时璋（理院）、王国松（工院）、蔡邦华（农院）、王季午（医）、李浩培、陈立、任雨吉、黄焕焜、陆纘何、包洪枢、陆景善、周佳生等十七人。

9月1日 星期四 北平 上海发表马寅初浙大校长，江华杭州市长。

9月6日 星期二 北平 晚膳后邦华亦来。知渠与季梁等五人于七月廿四日回途在松江附近遇台风，轮不能走（当时沪杭车未通），各人行李、衣服尽湿云。又谓浙大接管后，军管会所派之刘某全听学生包洪枢及一二助教之言，取报复主义，停聘教授六十余人之多，储润科、朱正元、胡刚复等均在其内，职员如赵凤涛亦在其列，全以过去有恩怨关系为主，而不问教授法、学问之如何也。闻严仁赓夫妇极为活跃，批评各方不遗余力。此次任命马寅初为校长，颇出于严仁赓意料之外，陈立亦为喜批评之一人云云。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

9月7日 星期三 北平 与邦华谈，知浙大停聘教员有六十人之多，其中有诸葛振公、王驾吾、郦衡叔、储润科、朱善培、谢家玉、竺士楷、庄雍熙、赵松乔、周子亚、陈熹、张海帆等等。职员停职者更多，训导处全部，包括沈鸣鹓太太及孙斯大，总务陆子桐、杨其泳、丁祖炎等。其中有若干系为私人报复，有若干则确为不称职也。

9月21日 星期三 北平 中膳后邦华来谈，知叶左之已于本月十四号在杭去世。此次浙大改组，变动颇大。左之向来身体瘦弱，不能胜繁剧，而这次竟被聘为地系主任，每日须到校办公。这真不啻代他掘了坟墓，所谓爱之即所以害之也。渠大儿已在重庆税务任

事，次儿患羊颠疯，余息均尚在学校。一旦去世，如何得了。余与季骅谈，拟于今晚与马寅初谈，由浙大拨给一笔抚恤费（后以晚间未晤到，于廿二晨打电话给北京饭店马寅初，告以过去久年教授死后有给薪一年之办法）。

10月8日 星期六 北京 八点三刻偕邦华至北京饭店207号晤马寅初，托以邵裴子事。缘邵先生年将七旬，在杭无以为生，靠售书度日，故余托其照顾。余之所以想及邵者，因二次至清华沈荃斋家，见壁上挂有裴子所书之单条也。

参考文献



1. 樊洪业、李玉海编著:《竺可桢的抗战年代:竺藏照片考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年。
2.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40—1949)。
3.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4. 李杭春:《重走西迁路:我的求是精神之旅》,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5. 李杭春:《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1936—1949》,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6. 李絜非编:《浙江大学西迁纪实》,国立浙江大学 1939 年印制。
7. 钱永红主编:《求是忆念录:浙江大学百廿校庆老校友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8. 王钱国忠、钟守华编著:《李约瑟大典》(上下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年。
9. 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著:《竺可桢传》(上册),1982 年。
10. 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1.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2013 年。
12. 《竺可桢传》编辑组:《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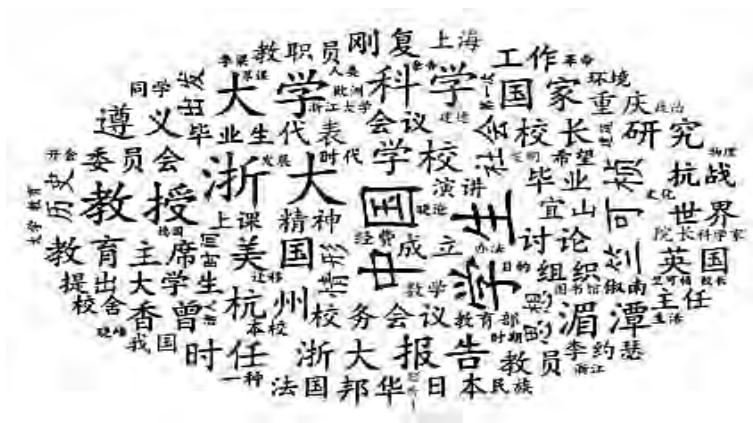
本书的编写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浙大同仁和西迁后人的大力支持。

感谢竺安兄，数次来信，不吝指教。他鼓励说：“你写的东西很好，既深度挖掘了浙大历史，又充满对浙大的深情。”竺可桢日记最大的价值在于真实，笔者在写札记时，从头至尾，事无巨细，继承古圣先贤严谨审慎的治学遗风，力求“无一字无来处”。“求是”二字，本是浙大校训，撰写校长竺可桢和浙大有关史料的札记，焉敢丝毫不“是”？

竺安兄特别强调竺可桢校长对于西迁选址的考虑——他并没有选择重庆、昆明等大城市，他当然知道教授队伍中绝大多数是留学归国者，习惯于大城市的优渥生活，但大城市正是日机轰炸的目标，即使没有轰炸，警报一响也得躲入防空洞或逃往郊外，不得安宁。竺可桢选校址，优先考虑环境幽美，物价低廉，易于维持生计，特别是能安心地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浙大数次搬迁，每次搬迁前，竺可桢都广泛听取意见，实地考察。遵义、湄潭两地，都没遭受过轰炸，连警报也极少响起。湄潭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物价低廉，师生生活相对安定，广大教师得以专心致志地投身教学和科研，取得了很多成果。

就在最近，竺安兄又发来邮件，谆谆嘱咐：“浙大遵湄时期，理科的教学与科研成果，你在札记里写了不少；文科、工科与农科，似乎相形见绌，应加以充实和增补。”竺安兄还指出：“（1947—1949年）这段时间浙大的科研成果似乎不甚丰硕，一是时局使然，经费奇缺；二是学生运动频繁，屡屡干扰教学和科研。”竺安兄年事已高，写东西有些困难，几次三番详细指教，真令笔者感慨不已，感激万分。

程家安先生对笔者发给他的每份稿件，都仔细阅读，从结构到文字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还有许高渝老师，原先笔者打算按时间



本书前 100 个高频词的词云图

从前两张词云图可粗略看出，最高频的词为“学生”“浙大”“中国”“大学”“科学”等¹，次高频的词为“教授”“会议”“报告”“遵义”“湄潭”“委员会”“教育”等。这足以说明，13年间，身为校长的竺可桢，心中装的都是公事、浙大的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事、会议报告的事、遵义湄潭的事。而且，两张图的高频词比较一致，说明笔者提取的日记札记没有偏离竺可桢日记的重点。《竺可桢全集》的主编樊洪业先生曾言，竺可桢 1949 年前的日记就是他任校长时期的浙大校史。从图中可以看出，13 年中他提及最多的教授是胡刚复、郑宗海、张其昀、蔡邦华和王琚等，都是浙大校务管理团队的成员。竺可桢强调办学最重要的是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浙大的发展壮大需要一大批教授共同努力。

1 “竺可桢”、“日记”、“全集”在竺可桢日记中呈现为高频词是眉页刊头部分的显示而被统计进去，而本文札记部分所显示则为笔者文所提及的次数。



从第三张图，可以明确看出浙大校务委员会的教授成员词频最高，其次是教授会的代表。频率高，说明这些教授与竺可桢联系频繁，地位相对重要，涉及包括搬迁工作、教学计划、教员聘任、校舍建设、后勤和财务管理等多项工作。该图显示胡刚复教授是词频最高者，然而笔者在2018年11月参观湄潭西迁历史陈列馆时，却发现这位浙大理学院院长、湄潭分部的重要人物被严重忽略了。据《浙大西迁遵湄办学竺可桢校长行迹资料统计》¹，自1940年1月16日竺可桢校长抵达遵义，到1946年5月16日复员返回杭州，6年多时间里，居住遵义1415天，占61.18%，居住湄潭216天，只占9.34%。这从侧面说明浙大湄潭分部的主要负责人胡刚复等居功甚伟。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后来没评为院士而在图中词频较高的一批教授的贡献。后来成为两院院士的，除一些当时的教授外，余下的大都是那个时期浙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如两弹一星功臣程开甲、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叶笃正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等。这正说明浙大遵湄时期办学和培养人才的成功。这是浙江大学办学历史的辉煌见证，也是竺可桢13年校长生涯的辉煌见证。

笔者先后接触过很多竺可桢时代的浙大人，在中国科学院，也聚集了一批浙大出来的叔伯阿姨，除竺可桢外，笔者也熟悉贝时璋、王淦昌、

1 该资料由陆昌友先生提供，李杭春老师也做过类似的统计，两者相仿。

黄秉维、王爱云、叶笃正、冯慧、郑竺英、方淑姝等，也接触过卢嘉锡、许良英、过兴先、竺士楷、李晨等前辈。和其他院校的人相比，笔者感到他们似乎有一种共同而特别之处，除了正直、低调做人、认真做事外，还有一种精神，就是浙大的精神——求真、求实、讲真话，这就是竺校长一贯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

谨以本书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 130 周年和浙大西迁遵湄 80 周年。



2020 年 10 月 22 日